B 区域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12~2013)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2012-2013)

主　编／梁昊光

副主编／杨维凤　游霭琼　王德利





区域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盘点年度资讯　预测时代前程

※ 本书以“区域经济的红利模型、红利边界和红利决策”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 本书分析了2009年以来，国家在区域经济的红利分配中更加注重区域的均衡性，陆续批准了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等一系列区域振兴规划，推动经济区域由“带状”向“块状”发展。

※ 中共十八大报告的经济政策显示，中国区域经济的红利现值是城镇化，报告提出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并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报告指出目前以区际分割、城际分割、城乡分割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 本书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决策者要高度重视行政区划分割的根本性体制矛盾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风险，务实地解决行政划分阻碍资源配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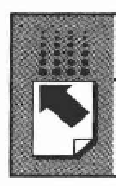
内赠阅读卡

中国皮书网：www.pishu.cn
皮书序列号：B-2008-091

上架建议：区域经济



ISBN 978-7-5097-4423-9
定价：69.00元



区域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12~2013）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2012-2013)

主　编／梁昊光
副主编／杨维凤　游霭琼　王德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12～2013/梁昊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

（区域蓝皮书）

ISBN 978－7－5097－4423－9

Ⅰ.①中…　Ⅱ.①梁…　Ⅲ.①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2～2013　Ⅳ.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019 号

区域蓝皮书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

主　　编／梁昊光

副 主 编／杨维凤　游霭琼　王德利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皮书出版中心（010）59367127

电子信箱／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周映希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责任编辑／周映希

责任校对／宝　蕾

责任印制／岳　阳

印　　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25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374 千字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4423－9

定　　价／69.00 元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编委会

摘　要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镇化的急剧发展，以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由注重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转变为对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引发的区域发展政策的关注，即转移到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形成的空间结构；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研究，成为经济支持系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和区域产业发展问题是密切联系并顺乎延伸的三部分，注重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应用是2012 ~2013 年度报告的基本特色。

2012 年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低迷，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与往年不同的是，经济增速减缓呈现全球普遍性，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普遍放缓。中国政府审慎应对外部形势，进一步扩大内需，并加紧制定产业振兴规划、区域经济规划，全面推进多领域重大改革，这是区域发展路径的重大演进。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长期跟踪和关注的东部沿海发达区域、老工业基地、山区和陆疆区域在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发展状态等多方面都分异出极其复杂的趋势，从而使得区域协调具有鲜明的不确定特征，应该说，这些道路，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将成为至 2015 年左右支持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内在动力。从国家层面来看，2013年区域经济战略重点将集中在：①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优势的发挥；②怎样建立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别的小康社会；③如何加强区域创新能力，突破区域性金融改革，提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④明确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思路，打造蓝色经济区。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and 1980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system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has begun to enter a new stage: ① the focus is transferring from natural factors-lead environment changing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riggered by economic,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is to say it transfers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processes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② focus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support system research. Earth surface system resource issu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linked three parts. Emphasis on theory and regional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is 2012 – 2013 annual report.

Along with the downturn in the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world in 2012 and the continuing deep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economic recovery is faltering. Unlike in previous years, the economic slowdown is on global universality,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ed economies,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rally slow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carefully deal with the external situation. Then the government will further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intensify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major reform in multi-field. This will be a significant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extremely complex trends showed in influencing factors, drive mechanism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other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no matter the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old industrial bases, the mountain areas or the land areas,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has showed some distinctive not-deterministic characteristics. It should be counted as par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urbanization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support economic takeoff around 2015.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in 2013 will focus on: ① how to bring on the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② how to build a harmon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③ how to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how to breakthrough in regional financial reform, how to improve new impetus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④ how to create the blue economic zone with a clear strategic marine industries ideas.

前言：发展红利、路径与决策

梁昊光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新一轮世界经济竞合与地域组合版图中，中国工业规模雄厚、现代服务业繁荣、对外贸易服务发达、水陆空立体化的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三大城市群都已跻身全球十大城市群带。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促进大城市群的形成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区域带动的主流形态与主导模式。按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理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研究结果认为，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中，区域中心（首位）城市与次级经济圈表现出更加突出的溢出效应、分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区域城市群的经济红利将极大地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区域经济的红利模型、红利边界和红利决策研究是 2012 ~ 2013 年本报告的主题。

中国区域经济的红利模型，从国际层面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区域性地缘的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从国家层面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城市之间的地缘、业缘的合作，各城市群间发挥地区优势，在全区域内促进生产要素自由选择和流动，优化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化的导向和政府的推动，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动态模型。

从 2008 年后，国家超常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入，跨海跨江大桥的建成、高速铁路的加密、海港空港吞吐的加强，其红利将直接影响到 2020 年左右，年均带动 GDP 值 0.9% 左右。另外，区域经济中心的空间地理格局及其生产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也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布局的最高形式。本报告研究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群内部城市逐渐走向融合，出现同城化趋势，形成交通出行的同城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同城化、就业居住与通勤的同城化和人口流动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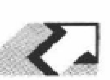
城化。

中国区域经济红利的边界值在哪？研究显示，2012 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特征体现在区域产业、就业、人口和中小城市在空间上的结构性调整。欧债危机的蔓延意味着经济还未完全触底，“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使得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更加紧迫。对中国而言，率先复苏乃至完全摆脱危机影响的办法是全国的城市化建设以及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红利。

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催生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从本报告的研究结论来看，红利的边界值还体现在节能减排的外部压力将继续增大，生态经济与生物革命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城市群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2009 年以来，国家意识到地区落差在进一步增大，在区域经济的红利分配中更加注重区域的均衡性，以此陆续批准了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辽宁沿海城市带、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区域振兴规划，推动经济区域由“带状”向“块状”发展，形成了若干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巨大城市群。参照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京湾与欧盟西北部城市群的世界城市城市群经验来看，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是世界级城市群条件的关键。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建设能使该区域摆脱一般制造业的竞争状况。真正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确定各级城市的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实现以服务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区域发展的测度看，我国三大城市群都已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结果看，在中国区域城市群的国际化进程中，其区域中心城市的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对外贸易优势和现代服务业集聚优势，这两者导致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从城市发展速度和效率的研究比较，城市群的国际化进程中的关系处理，实则关系到工业化、城市化与国际化路径的协调发展。从本报告中部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区域经济研究来看，要素驱动和服务业比重比较低，产业重构的现象非常严重。



中共十八大报告经济政策显示，中国区域经济的红利现值是城镇化。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并促进工业化，但是，城镇化对以城市为边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现在以区际分割、城际分割、城乡分割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公共部门效率低于私人部门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现代化受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挑战。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新的考验。2012 年的宏观经济运行轨迹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将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而消费主导主要依赖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这取决于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更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体系创新与突破。

从新的城镇化发展路径看，不能简单地用恩格尔消费规律来测度，不能盲目地诠释为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它至少应该包括非农人口的市民化和人际、城际、乡际、区际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抓住了两个极好的机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决策者要高度重视行政区划分割的根本性体制矛盾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风险，务实地解决行政划分阻碍资源配置的空间聚集效应和协同治理环境、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首都经济研究的重镇，围绕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首都经济、总部经济四个研究方向产出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经过 13 年的连续出版，已成为国内区域经济研究的风向标之一，希望国内外同人继续给予关注。

2013 年 1 月 10 日



权威报告　热点资讯　海量资源

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高端智库平台

皮书数据库 www.pishu.com.cn

皮书数据库是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资源总库，以大型连续性图书——皮书系列为基础，整合国内外相关资讯构建而成。包含七大子库，涵盖两百多个主题，囊括了近十几年间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国际问题等多个领域。

皮书数据库以篇章为基本单位，方便用户对皮书内容的阅读需求。用户可进行全文检索，也可对文献题目、内容提要、作者名称、作者单位、关键字等基本信息进行检索，还可对检索到的篇章再作二次筛选，进行在线阅读或下载阅读。智能多维度导航，可使用户根据自己熟知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导航筛选，使查找和检索更高效、便捷。

权威的研究报告，独特的调研数据，前沿的热点资讯，皮书数据库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现实问题研究的成果库和资讯库。

皮书俱乐部会员服务指南

1. 谁能成为皮书俱乐部会员？

- 皮书作者自动成为皮书俱乐部会员；
- 购买皮书产品（纸质图书、电子书、皮书数据库充值卡）的个人用户。

2. 会员可享受的增值服务：

- 免费获赠该纸质图书的电子书；
- 免费获赠皮书数据库100元充值卡；
- 免费定期获赠皮书电子期刊；
- 优先参与各类皮书学术活动；
- 优先享受皮书产品的最新优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皮书系列
卡号：7599421030549650
密码：

（本卡为图书内容的一部分，不购书刮卡，视为盗书）

3. 如何享受皮书俱乐部会员服务？

（1）如何免费获得整本电子书？

购买纸质图书后，将购书信息特别是书后附赠的卡号和密码通过邮件形式发送到pishu@188.com，我们将验证您的信息，通过验证并成功注册后即可获得该本皮书的电子书。

（2）如何获赠皮书数据库100元充值卡？

第1步：刮开附赠卡的密码涂层（左下）；

第2步：登录皮书数据库网站（www.pishu.com.cn），注册成为皮书数据库用户，注册时请提供您的真实信息，以便您获得皮书俱乐部会员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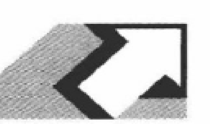
第3步：注册成功后登录，点击进入“会员中心”；

第4步：点击“在线充值”，输入正确的卡号和密码即可使用。

皮书俱乐部会员可享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他相关免费增值服务
您有任何疑问，均可拨打服务电话：010-59367227　QQ:1924151860
欢迎登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官网(www.ssap.com.cn)和中国皮书网（www.pishu.cn）了解更多信息

法律声明

目 录





BⅣ　长三角与长江流域

BⅤ　珠三角与南部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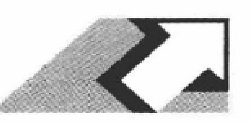
BⅥ　中西部区域

BⅦ 东北区域

BⅧ 大事记

皮书数据库阅读使用指南

CONTENTS



B III Around the Bohai Sea Region

B IV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Around

B V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Southern CO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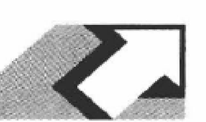
B VI The Mid–western Region

B VII The Northeast Area



B VIII Chronicle Event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1

2012～2013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势分析与展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

一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低迷，进入深度调整期

2012年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低迷，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因陷债务困局举步维艰，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酝酿新的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一）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低迷

2012年的世界经济与往年不同的是，经济增速减缓呈现全球普遍性，无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成员：梁昊光、杨维凤、景体华、刘薇、王德利等；报告主笔：杨维凤、景体华。杨维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景体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普遍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年1月23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只有3.2%，低于2011年的3.9%和2010年的5.0%。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2012年增长率为1.3%，低于2011年的1.6%和2010年的3.0%。其中，美国2012年增长率为2.3%，欧元区17个国家负增长，为-0.4%，日本增长率为2.0%。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放缓，2012年增长率为5.1%，低于2011年1.2个百分点。

欧债危机的恶化对世界经济复苏形成最大威胁。资料显示，到2012年底，西班牙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了85.3%，创出历史新高。希腊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债务率）逼近180%。即便欧债危机被抑制在了一定的安全边际范围内，更大规模的债务“地雷”依然可能随时引爆。据IMF发布的报告，2013年，全球债务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57.85万亿美元升至60.27万亿美元，全球整体负债率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81.16%上升至81.29%，仍处于80%的国际警戒线上。其中南欧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大大突破GDP比率100%，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世界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①。

2012年底，美国白宫和国会虽然通过了“财政悬崖”议案，但风险犹存。预计在两个月的时间窗口内，美国再度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债务上限的危机将比跌落“财政悬崖”的后果更为严重，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诸多不确定性。

（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分工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快了“再工业化”的进程，以互联网和制造业相融合、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美国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充分展现了美国政府振兴制造业的决心和愿景。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成立了高附加值制造技术创新中心，整合研究力量，计划在随后6年内投资1.4亿英镑，以促进英国先进制

---

① 张锐：《全球在忧虑中踏入逆风艰行新一年》，2013年1月4日《上海证券报》。



造业的发展。高效、智能化、网络化、绿色的先进制造技术带来的再工业化，将使定制化和分布式生产成为可能，势必将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和劳动力的素质成为最重要的竞争要素。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使全球制造业的秩序和分工格局发生改变。发达国家制造业凭借先进制造业技术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外流的趋势得以逆转；而以劳动力成本低、能耗大和附加值低为特点的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优势将不再显著。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出：科技，将使制造业重归美国。

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中，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共同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也为新兴经济体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跨越式转变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发达国家转嫁危机

在国际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美日欧央行2012年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从它们刺激本国经济的角度考虑的，完全不考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在国际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休戚相关。这种无度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说得形象一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它们的货币优势，肆无忌惮地向国际市场注水，而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没有任何节制机制。这不仅必将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且同时推动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给这些国家的本币带来升值压力，对当地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冲击。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美国于2012年9月中推出QE3后，又接连推出QE3.5，至10月20日以来，金管局两个月内已在银行体系承接932.42亿港元买盘。热钱大规模涌入，资金流入的速度、规模、频率，明显较QE1更快、更大、更密。国内外学者已经发出警告，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流动性大增的形势下，潜在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再度全面加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又一次被“剪羊毛”的风险，各国应该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①]。发展中国家面临着

① 李文云、李宁等：《发达国家转嫁风险新兴市场国家要警惕再次被“剪羊毛”》，2012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巨大的货币稳定性挑战。

国际金融机构是发达国家的办事机构。该机构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约束力。但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已是主导未来的大趋势。如何加强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已经提上日程。全球经济在史无前例的恶劣环境中运作。但是，这也给我国创造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倒逼机制，从对外贸的依赖中，走向以内需与经济转型的双轮驱动，在“寒流”中，增强了自己的内生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　我国正确把握国际分工的大势，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综观国际和国内的发展大势，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中国经济率先回暖

2012 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率先回升，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力。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了连续 14 个季度回落后，9～10 月，宏观经济数据企稳；第四季度增至 7.9%。2012 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达 7.8%，实现了 7.5% 的增长目标。2012 年 10～12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三个月运行于 50% 荣枯分界线之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呈现连续三个月的小幅回升，12 月达到 56.1%。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现筑底企稳的表征，引起外媒的高度关注。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区所受冲击比预想的要猛烈得多的情况下，“中国令世界重新燃起希望”，成了“振奋全球市场信心”的定心丸。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 年 11 月，我国政府果断地作出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应对国策，通过 4 万亿元投入，全力刺激经济。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内需，并加紧制定产业振兴规划、区域经济规划，全面推进多领域重大改革。这些措施既着眼于抵御当前的全球危



机，又着眼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正是这一系列的应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因素逐渐形成，实现经济缓慢回升。

（二）准确判断国际环境的变化，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在国际分工中主动再定位

2008 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持续累积的深层矛盾的释放；后危机时代，全球分工以及贸易格局的调整，将是长期失衡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再平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形式与内涵都在进一步演变。在加入 WTO 十年后，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由 2002 年的 4.4%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 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20%。2012 年 7 月 9 日，财富中文网同步发布 2012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共有 73 家公司上榜，比上年增加了 12 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 132 家，实现历史性突破。用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在加入 WTO 后的十年里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①]。我国对机遇的把握，显然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扩大出口、增加海外投资，而是要在加强自身经济内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上下功夫。这意味着我们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加强民生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二是主动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潮，大力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我国在加入 WTO 十年后，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新技术潮流，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动再定位。这将在全球分工以及贸易格局的调整与再平衡中，发挥积极、健康的重要作用。

（三）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身经济内在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行之路。十八大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实现这一目标，从我国发展的长远大计，保证了国内与国际发展的同步。

这是我国走在复兴之路上的系统工程。从科技领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和

① 鲍显铭：《十年发展成就举世无双》，2012 年 6 月 28 日《经济日报》。

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番；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建设；都将在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中，在相应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中得以实现。任务艰难而繁重。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国家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支持其加快改革开放；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些区域政策都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　新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的转型探索和路径选择

2012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艰难的一年，但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来看，在全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这里感受的却是游刃有余的活力，预示着不久即来的暖意。

（一）区域发展呈现东优西快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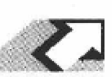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格局由“东快西慢”转为“东优西快”。

2008～2012 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连续 5 年超过东部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由 2006 年的 44.7% 上升到 2011 年的 48%。从世界经济动态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外需疲软，东部外向型经济遭重创的情况下，正是这一力量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出现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下的“风景这边独好”。同时，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增长格局首次发生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变化。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五年来，虽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 8000 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 1000 多美元[①]。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从 2005 年底到 2010 年底，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 0.77 倍，虽然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 1 倍左右，但绝对差距

---

① 李克强：《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是富民动力》，2012 年 12 月 29 日 CCTV《新闻联播》。



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元，扩大到了2.8万亿元[①]。

然而，换一个角度思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却蕴含着两大利好：一是后发地区经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二是这种差距在客观上必将激发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低收入地区赶上高收入地区的内在动力。近些年来，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并落实于区域规划，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大发展力度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五年冲高的发展奇迹，正是在这种动力下奋发努力的结果。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将成为未来支持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内在动力。2012年11月，中原经济区作为第一个明确城镇化要与“三化”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示范区正式启动。2013年1月15日，李克强同志在国家粮食局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将按照立足于科学发展主题，紧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着力探索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纳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中部和西部潜在的发展空间非常巨大。这不仅意味着中部地区将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深层次的以中谋势的布局，必带动中西部地区将“四化”协调的发展潜力尽快转化为现实，在人均收入、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的基础上，区域发展差距也将从目前初步遏制的态势走上合理差别化的协调之路。

（二）实业四重奏

1. 回归主业，扶持中小企业

2012年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国家出台金融、财税等多项政策，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日益趋好。

（1）回归主业，央企开始走向实体经济正轨。

金融危机后，在新技术杠杆的作用下，回归主业是全球性的大趋势。美国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中，精简业务、由多元化经营向核心业务回归。日本在

---

① 李迅雷：《中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难在哪》，2013年1月14日《环球时报》。

泡沫经济破灭后，逐渐分离非核心业务，集中发展主营业务。

最近的调查显示：有近40%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准备回迁；欧盟也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准备迎接回流企业。这种回归与回流并不是简单的搬迁，核心是要运用新技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迎头而上。我们在担心“世界工厂”地位时，更应当关注的是如何在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中取得主动。

国企，尤其是央企以强大的产品和资本运营能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决定着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和资本运营能力，是发展实体经济的主要责任主体。

在实体经济回归主业的潮流中，央企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功合并航空一和航空二后，突出主业，提出“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战略目标。即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实行品牌价值、商业模式、集成网络；达到市场化改革、专业化整合、产业化发展、资本化运作、国际化拓展以及实现2017年挑战销售收入上万亿元的目标[①]。中国移动全部退出宾馆酒店业务，所属四星级优质酒店平稳划转港中旅集团。

中国建材集团首先选择以水泥为切入点，做大宗建材，回归行业主流。中国建材从过去单纯发展新型建材，转变为发展新型建材和建材工业主导产业的水泥、玻璃、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并逐步发展成为集制造、科技、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建材集团从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建材企业。2012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建材集团以300.2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世界500强第365位，比2011年排名提升120个名次。中国建材集团超越了爱尔兰CRH集团、瑞士豪西蒙集团和法国拉法基集团，紧随法国圣戈班集团之后，稳居全球建材企业第二。中国建材集团在世界建材行业地位的迅猛提升，有力地证明了回归主业、精干主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走创新之路是实体经济做强的必经之路。

（2）国家出台政策，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

① 陈玮英：《主业回归：央企实体经济正轨》，2012年1月17日《中国企业报》。



2012 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2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的多项财税举措。在强调落实 2011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九条财税金融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将 2012 年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扩大到 141.7 亿元，并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中央财政安排 150 亿元资金，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地方、创业投资机构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处于初创期的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向基金捐赠资金，在一定比例内给予税收优惠。规定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各部门，应安排不低于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 18% 的份额给小型微型企业；在政府采购评审中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给予 6% ～10% 的价格扣除。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各种不合规收费等①。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不同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见表 1）。

表 1　2012 年全国各省市出台的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汇总

区域	省　市	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东部	北　京	调整小额贷款政策,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提出申请。
	上　海	财政出台补偿资金,鼓励机构支持中小企业;上海银监局采取五项措施服务小微企业。
	天　津	出台“担保＋保险”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促发展;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出台 10 条措施,促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帮扶科技型中小企业列入干部考核。
	广　东	规定银行扶持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市场准入方面优惠。
	山　东	试点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机会;助力小微企业信贷,银行机构承诺不抽贷不压贷;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有“保险”;小额贷款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可获补偿奖励。
	福　建	2012 年新增 300 亿元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拓宽小微企业融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贷款开绿色通道,支持民营经济;出台扶持小微企业新措施,贷款最低只需 40% 担保;福建中小企业融资可申报风险补助,最高补助 500 万元;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可获贴息。
	江　苏	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债务融资;成立中小企业合作投资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河　北	启动亿元引导基金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布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每年累计投放不低于 400 亿元资金支持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试点地区中小商贸企业通过融资性担保机构获得融资。

①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 号。


续表

区域	省 市	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中部	山 西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内蒙古	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力度。
	陕 西	与12家银行签约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试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支行制度；出台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挂牌成立"小微企业金融合作社"。
	江 西	构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体系，组建担保联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将小微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覆盖范围。
	安 徽	为小微企业"定制"专用贷款。
	湖 南	搭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禁止银行收取小微企业贷款承诺费。
	河 南	通过创新金融产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建立集合债券发行机制等多项措施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新增100亿元小额贷款支援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发行小企业金融债；打造网上融资平台，服务中小企业贷款。
西部	广 西	放宽民间资本设小金融机构条件；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鼓励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将获贴息。
	新 疆	取消小额担保贷款户籍限制，成为全国第14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省区。
	贵 州	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计划用五年时间培养一支万人创业队伍；加大扶持小额贷款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中小科技企业应用贷款融资新模式获10亿元贷款；正式启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开展中小企业局部署信用评级工作，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甘 肃	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选百户小微企业支持上市。
	青 海	强调打造小企业服务品牌，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开辟小微企业贷款"绿色通道"。
	云 南	加大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力度，试点小微企业融资超市，鼓励民间资本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重 庆	全力支持有志之士创办小型微型企业，财政拨付微型企业创业扶持贷款贴息、奖励近3000万元，并认定9个新的市级小企业创业基地；信贷资金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倾斜；微型企业贷款贴息额度提高至15万元；试点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微企无抵押最高可贷50万元；拓宽小贷公司融资渠道，支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规定小贷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基准利率4倍。
	宁 夏	出台多项措施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千家中小企业可获120亿元信贷支持。
东北	黑龙江	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设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专利将可质押担保贷款。
	辽 宁	鼓励针对小微型企业金融产品创新，出台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办法，建立中小商贸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有关资料整理。

上述国家和区域各类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87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2012年第三季度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2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分别比同期大、中型企业贷款增速高9.9个和4个百分点，比全部企业贷款增速高5个百分点。

2. 实体经济向中西部的布局

（1）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产业转移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为了探索产业承接的新模式和科学有序地转移产业，国家在中西部的优势地区布局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从2010年以来，中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湘南和湖北荆州5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2年国家又批设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设立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涉及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四市，其中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均定位为全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产业承接初见成效。皖江城市带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成立两年来，产业承接已经初具规模。数据显示，在2011年前11个月，皖江城市带引进外省投资项目2800多个，其中来自珠三角地区的项目2600多个，外商投资项目140多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4268亿元，同比增长约21%[①]。广西桂东示范区2010年10月设立，两年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3289个，投资额达2745亿元[②]。2012年上半年，湘南3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579个，占全省的38.1%，同比上升8.6个百分点[③]。2009～2012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内资金额分别为1468亿元、2638亿元、4920亿元、5915亿元，年均增速59.1%。四川省在2007～2011年期间，实际利用内资每年也以超过千亿元的规模递增，2011年达到7083亿元，年均增长37%。宁夏回族自治区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资金由

---

① 刘紫凌、冯国栋：《中国在中西部地区为东部产业转移搭建"跳板"》，新华网，2012年3月6日。

② 任丽梅：《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入快车道》，2012年8月21日《中国改革报》。

③ 张京明：《产业转移掀浪潮》，2012年10月31日《湖南日报》。

2007年的24亿元扩大到2011年的277亿元，四年翻了三番多[1]。甘肃省的最新统计显示，仅在2012年，就有包括山东信发、湖南湘电、江苏金浦等一大批大型企业集团到甘肃投资发展。据统计，甘肃省当年新签约工业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有583个，总投资6911亿元，而往年续建和新建产业转移项目达848个，总投资2960亿元[2]。

中西部各地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积极探索产业转移的新方式，呈现出园区共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等多种方式，以有利于向科技前沿突进。皖江城市带重点通过园区共建等方式，主动融入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中。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了18条产业承接链，高起点、有选择地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宁夏积极承接产业，充实产业集群，如石嘴山在打造全国光伏产业基地时，引进宁夏阳光硅业、国电太阳能、中节能尚德及浙江正泰、国投华靖、比利时羿飞等公司投资建设的光伏产业项目，形成硅石（硅料）—多晶硅（单晶硅）—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电站构成的完整产业链条，年可新增产值100亿元以上。目前，石嘴山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光伏产业示范基地[3]；同时，各地还在积极探索飞地招商模式，期望以飞地工业园，促进当地技术进步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兴起，带动就业。

另外，产业转移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英特尔、富士康、联想、戴尔、宏基、纬创、一汽大众、现代汽车、吉利沃尔沃、格力电器、上海重工、北车集团等一大批电子、汽车、家电、装备制造等大型企业落户重庆、四川、山西等省市。2012年1～5月，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40%，分别比中部和东部地区高出9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4]。

在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中西部担纲起实体经济的重任，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中西部各省市间的

---

① 任丽梅：《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入快车道》，2012年8月21日《中国改革报》。
② 屠国玺：《甘肃：利用资源“吸附效应”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新华网，2012年12月28日。
③ 艾福梅：《宁夏承接产业转移初见成效仍面临五大挑战》，新华网，2011年1月17日。
④ 任丽梅：《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入快车道》，2012年8月21日《中国改革报》。



产业承接竞争日益激烈。避免恶性竞争，避免产业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异地生根，已经提上日程；同时，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不能重走东部地区的老路，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产业承接和转型升级结合起来，甄别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加强承接地的配套建设，促进转移产业在承接地的顺利发展，增强承接的倍增效应，将是中西部在发力实体经济时关键把握的问题。

（2）大项目布局凸显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西电东送，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大工程，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布局。这将变西部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在西电东送工程中，我国致力于自主研发，勇攻技术难关，取得了创新性的进展。

西电东送过程中的 500 千伏直流输变线电路和 800 千伏直流输电技术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直流输电被誉为世界电力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距离世界上第一条直流输电线路在欧洲诞生，中国落后了近 50 年。50 年来，虽然技术不断更新，但从不外泄。2004 年我国科研团队，从零起步，开始追赶这 50 年的差距。一年后，我国完成了贵州到广东的直流输电自主设计研发，仅这一项工程就相对于外方承包节省了 1. 15 亿元。高压直流输电自主研发项目获得了国内最高荣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四年之后，该团队成功冲击世界电压最高峰，实现了云南到广东 800 千伏高压自主研发，这是世界上第一条达到 800 千伏的电力高速路，中国的特高压输电在世界电力史上创下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大展拳脚，海外并购成果凸显

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业的经济体量也从过去的千万级别上升到千亿、万亿的级别。靠着这样的实力，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它们跨越地域的界限，在国际经济舞台中大展拳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据投中集团发布的数据，2012 年中国海外并购金额 3077. 9 亿美元，创近 6 年新高。数据显示，2007 年至今，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规模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其中 2012 年增势较为明显，交易规模由 2007 年 1034. 7 亿美元增至 2012 年的 3077. 9 亿美元，累计增幅达 197%。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涉及能源及矿业、机械、汽车、互联网、金融行业、文化产业和医药等领域。从交易规模看，能

源、互联网、金融、制造业交易规模居前；在并购市场交易完成案例中，制造业以450起交易居首，而能源及矿业以335.26亿美元的并购交易规模居首[①]。英国《金融时报》评价："我们正从'中国制造'阶段进入'中国收购'阶段。"

2012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果逐渐显现。中国能源界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实现了新突破，尤其是"三桶油"（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三家公司）的表现颇佳。12月7日，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成功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此举成就了中海油乃至中国企业迄今完成的海外最大收购。它的年产量将跃升1/5，已探明和概略储量将增加1/3以上。12月12日，中石油以16.3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天然气资产，这是中国石油2012年最大的一笔海外资源收购。12月18日，中石化以约15亿美元交易价格收购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公司英国子公司49%股份项目正式交割。该交易是2012年全球范围内，针对英国油气资产交易金额最大的单笔收购，不仅开启了中石化在英国北海地区油气业务，也标志着中国能源企业首次挺进北海油气资源投资开发行列。4月，"三一"集团在33天内花了3.6亿欧元，闪电般收购了德国工程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成功打造了一个新的全球混凝土机械制造巨头。这是中德贸易史上最大的并购。这次战略性的收购，让"三一"集团收获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在完成这一并购后，"三一"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5月，大连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万达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该笔交易成为文化传媒行业交易规模较大的一起案例。此外，鞍钢集团与韩国LG商事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广西柳工斥资3.35亿元并购东欧最大的波兰工程机械企业HSW的工程机械事业部；山东重工以3.74亿欧元获得全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75%的控股权；武汉梧桐硅谷天堂以3245万欧元收购奥地利领先柴油发动机制造商斯太尔动力100%股权[②]，也都是值得注意的大手笔。

---

① 《2012年中国并购金额3077.9亿美元　创近6年新高》，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6日。

② 徐森、霍玉菡：《2012年跨国公司行走在路上》，2012年12月27日《中国贸易报》。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显示中国企业的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展现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企业的份额日益增加。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如何“走进去”和“走下去”，如何通过深化全球化，助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将是未来发展中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4. 实体经济之魂——科技创新

创新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动力。世界上的创新强国都注重培育实体企业的创新能力。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1 年，中国受理了 526412 件专利申请，占世界总数的 1/4，中国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2 年上半年，我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实现快速增长。共受理 3 种专利申请 85. 7 万件，同比增长 26. 8%，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5. 8 万件，同比增长 18. 3%；共授权 3 种专利 53. 0 万件，同比增长 19. 1%。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0. 7 万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8. 9%①。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国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 2012 年上半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前十名的企业中，大多为科技型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科技、中芯国际、大唐移动等（见表 2）。华为以 2034 件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 1484 件授权量，跃居上半年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第和授权量排行榜首位；中兴通讯在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均居第二；鸿富锦精工、中石化、腾讯科技、联想、深圳光启创新、海洋王照明、格力电器、上海芯超生物分别名列 2012 年上半年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第三到十名；鸿富锦精工、中石化、友达光电、中芯国际、大唐移动、比亚迪、华三通信、中石油则名列 2012 年上半年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第三到十名②。

科技创新提升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而在关键领域技术方面的创新，则大幅提升了国家的实力。中国自主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12 年 12 月 27 日正式为亚太地区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发的北

① 《2012 年上半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情况简评》，中国行业研究网，2012 年 7 月 26 日。

② 《上半年我国企业专利申请量保持快速增长》，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2 年 8 月 8 日。

表 2　2012 年上半年全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前 10 名的企业（含港澳台）

单位：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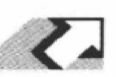
序号	发明专利申请前十名	数量	发明专利授权前十名	数量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3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4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59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472
3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1017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565
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4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19
5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48	友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51
6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717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250
7	深圳光启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626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48
8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46
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63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12
10	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76

资料来源：《上半年我国企业专利申请量保持快速增长》，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2 年 8 月 8 日。

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BDS），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 GLONASS 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位精度优于 20m，授时精度优于 100ns。自 2004 年开始，8 年时间我国成功研制发射了 16 颗卫星，形成了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中国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基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及长远发展做出的重要决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军民两用系统，既能满足本区域的民用需求，也有利于中国国防建设。北斗系统已应用到中国各行各业。目前，我国涉足卫星导航应用与服务产业的厂商与机构超过 5000 家，2010 年产值超过 500 亿元，预计 2020 年有望达到 4000 亿元①。

结语：2012 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活动冠名为“实业的使命”，道出了世界金融危机中，我国悟出的哲理：实业强，则国家强。如何把握经济增长的动力？如何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201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答案。

① 《实业的使命》，2012 年 12 月 19 日 CCTV《焦点访谈》。



（三）中西部新增长极崛起

近年来，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题，各区域展开了大力度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企业的大进大出中，东部地区逐步完成新一轮产业布局，同时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培育一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最新完成的《2010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城市群有 23 个。其中原有的东部城市群，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正在努力奔向世界级的城市群。还有 12 个：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峡西岸、长株潭、武汉、成渝、环鄱阳湖、中原、哈大长、江淮、关中、天山北坡，也已经初具规模；而南北钦防、晋中、银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兰白西、黔中和滇中则正在形成中。可以看出，除了原有的东部城市群，新崛起的绝大多数为中西部城市群。

城市群是与经济增长极伴生的地理区位单元。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一是东部地区经过 30 多年快速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深层次矛盾越来越突出。向高技术转型，原产能向中西部分流，势在必行。这种转移，绝不是原封不动的搬移，而是一种抛弃原有模式劣势的提升。

二是随着产业转移的步伐，我国中西部将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这必将带动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推进和深化。我国东部地区目前城镇化率大约为 60%。从国际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点来看，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中西部城镇化率均处于 40%～50% 的高速发展时段内。两者的差距，将成为后者发展的强大动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成为中西部下一步发展的最大红利。

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由外需转向内需。对民生的关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到首位。随着工业产能从东部地区的转移，在中西部地区丰厚市场的吸引下，区域经济布局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以上三方面的趋动下，中西部新增长极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

（四）改革深化的先行先试

1. 区域性金融改革——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口

区域性金融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继续深化和推进改革的新突破口，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经国家批准全国正在推进的区域性金融改革有20多项，区域性金融改革试点有10个。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和发展定位不同，区域性金融改革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如前几年推进的区域性金融改革试点，上海市以国际化和完善市场体系为重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是现代服务和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重庆，将成为内陆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主推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城乡统筹；海峡西岸和平潭地区，目标是组建大陆和台湾经济交流的金融服务中心；长株潭城市群，探索支持城市群发展的金融改革；新疆霍尔果斯特区和喀什特区探索金融对外开放。

2012年，我国掀起了区域性金融改革的又一轮新浪潮。随着浙江温州、福建泉州、浙江丽水和珠三角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先后获批，对金融的改革和探索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浙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以引导民营资本，改进中小企业服务为核心，主要内容是使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水平。福建泉州，将进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的改革试点。其中构建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对农村的金融服务，将是其主要方向。浙江丽水，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林权抵押贷款为核心。它是我国首个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点，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好的成绩，特别是在林权抵押贷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进展。珠三角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在人民币离岸和国际化操作。特别是2012年批复的深圳前海，国务院批准其作为对外开放和与粤港澳加强金融合作的试验区，将在加强前海地区金融合作方面给予更多试点政策[①]。

上述区域性金融改革试点，在探寻过程中遵循着“错位发展、多点突破”

① 周小川：《金融改革中有十大重要领域》，国际金融论坛，2012年11月17日。



的思路。各地金融改革定位不同，各有侧重。显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对地方金融改革模式和路径的探讨。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必走这一步，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寻求新突破口的需要。通过金融改革和创新，先行先试，改善区域融资环境，吸引金融资源和投资项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区域性金融改革事关全局，影响很大，应谨慎、务实，但也允许“试错”。通过探索总结得失、积累经验，将为中国深层次金融改革铺路。

2. 中原经济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探索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达到 51.27%，比 2002 年提高近 12.18 个百分点。该数字表明城乡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分地区看，2011 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为 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 47.0% 和 43.0%，与 2010 年相比，东中西分别上升 1.1 个、1.7 个和 1.6 个百分点。显然，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加速态势。

但是，51.27% 城镇化率并未被公众认可，理由是有 1.6 亿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成为城镇户籍人口，他们漂浮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 40%。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城镇化。显然，这种顶层设计，摆脱了原有的模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12 年 11 月 1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 ~ 2020 年）》。

中原经济区涵盖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共涵盖 30 个地级市和 3 个县区。区域总面积达 28.9 万平方公里，2011 年末总人口 1.79 亿。规划明确：中原经济区要在破解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难题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四化”协调发展之路。这种协调将要达到的高度是可做出如下阐释。

第一，探索一条不以牺牲粮食和农业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让人

振奋的思路，近年来已经在中原经济区实践中逐渐丰满。人地挂钩、合村并点；在拆旧建新中，置换出大量土地，不仅能够确保建设用地占补平衡、耕地面积稳中有增，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由家庭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转变。农村人口合理、有序转移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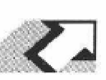
我国农业和人口大省的上述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原经济区具体目标是到 2015 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到 2020 年，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更加稳固，粮食生产能力稳定达到 1300 亿斤。新型城镇化将扎扎实实为我国建成小康社会打好这一基础。

第二，在打牢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的同时，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产业集聚平台和开放平台建设，明确了 100 多个重大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区域。产业集聚区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载体。近两年，河南省大力推进产城互动与融合，引导城镇化内生式发展。产业将为工业化集聚生产要素，城镇将为工业化营造环境和提供平台；二者在互动中融合，农民有工可做，才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而市民化；农业才能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的人口密集区。河南省人口密度是全国的 4.3 倍，人地、人与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从这一实际出发，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严格坚持集约、节约的理念，即统筹推进土地利用、城乡建设和产业集聚区三个规划的协调衔接。明确规定，三个规划在空间上要实现精准重叠，合理配置建设用地指标。积极而大胆的探索，必将使这百多个重大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区域落地生根，支持中原列车快速前进！

第三，从实际出发，城市转型由单项推进转向以城镇化为引领的“四化”协调发展。河南省核心工业城市焦作，曾经是全国著名的“煤城”，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2008 年国家宣布其为资源枯竭危机城市。实际上，焦作人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危机感的驱动下，努力摆脱传统煤炭产业一支独大的局面，向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四大新兴产业进军，开始了城市的转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本地的实际，它们没有在工业上单项推进，而是转向全面协调发展。焦作对市、中心镇、中心村进行了集中布局规划，构建以县市城区为中心、以中心镇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与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城



乡一体化规划体系。按照规划，焦作市每一个新型农村社区都将配备医疗、教育等各种机构、设施，具备和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条件。同时，加大了农业现代化的力度。焦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发展快，目前已达 2788 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5 家，居全省第一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民的抱团发展，不仅粮食生产实现了由高产向优质高效的转变，而且，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正在从梦想逐步变为现实。2011 年焦作创 20 万亩、10 万亩、5 万亩、500 亩及 100 亩以上连片 5 项小麦单产全国新纪录。小麦种子繁育面积 70. 25 万亩，生产小麦种子 2. 8 亿公斤，销售范围辐射 8 省 106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8. 5%，达到 8902 元。

2012 年 2 月 20 日省政府正式批准通过了《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了焦作经济转型示范市的战略定位：着力在现代城镇体系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互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在全省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焦作的示范带动，将在中原经济区的崛起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原经济区在新型城镇化上的突起，将率先开掘城市化发展红利，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原经济区农业人口众多，城乡差距较大。以河南省为例，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在 2000 年为 2780 元，而 2010 年则扩大到 10407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 4∶1 扩大到 2. 88∶1。应该说，这是制约该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改变现状的巨大动力。为此，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众既“安居”又“乐业”，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受益者，成了各项政策的根本目标。除了上述城乡统筹发展的多项措施外，一些地区开始探索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大力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在城镇，则重点解决居民就业、社会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现实问题。夯实这些民生政策，增加城乡居民对新型城镇化的感受度，民众巨大的内在需求将得到释放。如此发展红利，将首先支持中原提升发展区位，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战略支点。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制和政策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中央规划的引导，地方与民众改变现状、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和创造热情，上下拧成一股绳，将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上，书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浓重一笔。

（五）海洋经济——东部沿海经济转型的蓝色动力

21 世纪是海洋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盛宴。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海洋经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海洋大国，中国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制定了国家级海洋战略。我国在十八大中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20 世纪 60 年代全球海洋经济产值仅有 130 亿美元，70 年代初这一数字达到 1100 亿美元，80 年代为 3400 亿美元，90 年代飙升至 6700 亿美元，21 世纪更是达到了 1.3 万亿美元，50 多年里，全球海洋经济以总产值每 10 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着①。我国有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300 万平方公里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域②，超过 6500 个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岛屿。我国海洋经济总体还处于成长期，海洋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011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4.56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7%。“十一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速为 13.5%，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海洋经济正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蓝色动力。

1. 我国海洋经济的战略布局加速起锚，空间布局基本成形

为有序推进海洋经济发展，2012 年，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特别提请注意的是，3 月 3 日，横跨两个五年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 年）获国务院批准，正式下达（以下简称《区划》）。随后，国家密集批复了沿海 11 个省市的海洋功能区划。《区划》是我国对海洋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总体战略部署。将我国全部管辖海域划分为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矿产与能源、旅游休闲娱乐、海洋保护、特殊利用、保留等八类海洋功能区。确定了五大海区的总体管控要求，明确了重点海域主要功能和开发保护方向。

顶层思路清晰，同时需要地方探索步伐更坚实。东部沿海 11 个省市纷纷

① 吴力：《海洋经济开发保护须双管齐下》，2012 年 12 月 25 日《国际商报》。

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出台了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应地方政策。2011 年，国务院先后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2012 年 10 月《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局的信息显示，天津已被列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城市名单之中。上述 5 省市的“3 +2”试点，将为我国海洋经济铺下战略基石。

沿海各省市发展海洋经济有着各自的地方特色，相继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目标。山东依托青岛、烟台和威海的“抱团”优势，突出蓝色半岛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提出到 2015 年实现海洋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8 万元。青岛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和主体单元，近两年，青岛大胆探索，主动攻坚，在陆海联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11 年，青岛海洋经济实现 660 亿元的增加值，增速为 20%；2012 年海洋经济增加值突破 1100 亿元，增长 20% 左右①。浙江突出港口航运和海岛开发的特点，依托港口航运优势带动经济发展，提出到 2015 年全省海洋经济增加值达到 7000 亿元。广东提出了“三区、三圈、三带”海洋综合开发格局，统筹协调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的临海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科技研发等空间布局。福建的目标是：力争成为深化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的核心区，全国海洋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重要基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全国海湾海岛综合开发示范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创新海洋综合管理试验区。

除了制定有关海洋经济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我国还设立了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2011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后，我国决定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被定位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舟山群岛新区将建成中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中国海洋海岛科学保护开发示范区、中国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中国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舟山群岛新区以新加坡、香港等世界一流港口城市为

① 《青岛 2012 年海洋经济增加值破 1100 亿增长 20%》，2013 年 1 月 5 日《青岛早报》。

学习目标，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探索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创造经验。

东部沿海的产业转型向海洋经济发力，是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资源短缺、陆地环境承载能力日益紧张的现实情况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将有利于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沿海的整体经济布局。同时，发达的海洋经济有利于我国海上贸易的安全。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空间从陆地延伸到海洋。东部沿海，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新的发展境遇下，再一次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时代先锋。

2. 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海洋经济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随着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迈进的思路逐渐明朗。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科技含量大、技术水平高、环境友好为特征。目前，以海洋高技术为引擎的海洋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领域。我国沿海大部分省市在海洋经济“十二五”规划中都对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如辽宁省提出了2015年“海洋新兴产业产值翻两番”，天津市提出了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基地”，江苏省提出了力争“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主要海洋产业的比重提高至20%以上”，上海市提出了“加快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广东省提出要实现“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在构建“海洋新兴产业”上提出了自己的目标。

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发达的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发达的程度基本上依赖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在各省市积极探索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则从全局给予引导。2012年6月，中国财政部、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的通知》，决定以发展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支持部分地方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并通过专项资金对相关工作予以支持。

2012年，我国海洋经济的战略布局已经加速起锚，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基本成形，未来十年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随着海洋功能区划规划的实施，我国海洋经济将处于快速增长期。东部沿海地区在转型探索海洋



经济的过程中，也将面临众多的挑战和问题：海洋资源和环境问题仍将是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如何实现海洋经济总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实现绿色发展；近海海洋资源开发过度与深远海开发不足的矛盾等；各地要在实践中探索海洋经济的新模式，促进蓝色经济的形成，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将会重塑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格局。

（六）扩大对外开放的脚步

在国际贸易环境异常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加速了在亚太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同周边区域的开放合作，我国向西、向北和沿边开放的步伐加快。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驱动下，这些沿边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沿边发展长期滞后的格局开始突破。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近年来，在全球市场严重衰退的环境下，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保持持续增长，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2011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三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000.93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自东盟进口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方顺差85亿美元。中国和东盟的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上半年，东盟对华投资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7.5%；中国对东盟投资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的投资增长明显。中国和东盟在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制造和加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2012年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10周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有力推动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合作等。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是从中国广西南宁南下，经过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直到3800公里外的新加坡的一条陆上经济走廊，它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新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中国和东盟各方致力于这一通道

的基础设施建设，南新经济走廊雏形初现。我国2009年设立了100亿美元的"中国和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有15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支持合作项目。目前，南宁至新加坡公路通道基本全线贯通，广西已建成南宁至友谊关高速公路，防城至东兴高速公路已开工，同时获批到越南的国际道路运输线24条，其中10条已开通。2009年1月1日，南宁－河内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开通。南新经济走廊将成为沟通华南与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的经济大动脉，构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联运大通道。太平洋西岸的新经济增长带有待形成。

2. 东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加速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东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和合作层次不断提升。中俄之间在投资、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经贸合作加速。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对俄直接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0.3%。2012年前7个月，两国间贸易额增长17.7%，达509.4亿美元。目前，中蒙关系处于历史的最好阶段。多年来我国一直是蒙古国的重要投资国之一，在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较快。2012年上半年，中蒙贸易额达33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蒙古国投资总额达37亿美元①。

近年来，为解决困扰东北亚区域的通道不畅问题，东北亚大通道建设提速。中蒙通道、中俄珲卡铁路、中朝元汀口岸至罗津港公路以及环日本海线路均顺利推进，多条跨国线路开始运营。由中俄交通走廊、中朝交通走廊、中蒙国际贸易通道和环日本海港口腹地物流系统等四大通道组成的"东北亚大通道"，已初具形态。

为深入促进经贸合作，我国积极搭建国际合作示范区战略平台。2012年4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吉林省珲春市设立"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并印发了《关于支持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珲春在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中发挥了对外窗口的作用。珲春市经朝鲜罗津港至上海的内贸货物跨境运输项目成功实施；珲春市经扎鲁

① 王晓明：《东北亚经济圈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2012年9月12日《中国信息报》。



比诺港分别到达日本新潟和韩国釜山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正式开通，建成了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珲春出口加工区和珲春中俄互市贸易区。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建立，是进一步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合作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对于推动与朝鲜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沿边地区人民富裕、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东北亚地区的开发开放战略获得国家支持。2012年7月31日《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年）》获得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复。规划区范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东北地区将被打造成新时期全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睦邻友好、兴边富民的沿边发展示范区，以及先进生产要素聚集的现代产业基地。《规划纲要》是指导我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各国加强区域合作与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对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全面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意义非凡。东北东部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在全国沿边开放的大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纲要的实施，将推动东北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通过面向东北亚的开发开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增加动力和活力，带动东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源配置注入强大动力，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东北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将大幅提升。

3. 打造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开放高地，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面向阿拉伯国家，我国加大向西开放，将宁夏打造成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动深化和中东国家的经贸交流、投资合作和友好往来。2012年9月，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宁夏同时被定位为全国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聚集区。

宁夏具有面向阿拉伯国家开放的地缘优势和人文基础，同时也具备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2010～2012年，连续三年在宁夏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共签订项目协议478个，合同投资2500多亿元，使宁夏“向西开放”的集聚效应逐步增强。吸引的投资合作涉及新能源、装备制造、

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加工等各个领域[①]。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目前，世界穆斯林人口达到15亿，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仅占其进口的1/10，深化和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互利共赢，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通过对外开放和开发，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有利于促进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形成；稳固与中东石油生产国的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格局；促进宁夏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西部大开发。

4. 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粤港澳的区域合作更加务实有效。粤港澳的区域合作领域主要涉及创意产业、医药研发、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物流、高增值服务和旅游休闲）、共建优质生活圈和重大基础设施对接等，合作的重点区域是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岛。

2012年9月《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南沙新区继兰州新区之后升级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是粤港澳全面合作的综合试验区。2012年7月，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获批，前海的战略定位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是深化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的战略平台之一。由此，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岛共同担纲起打造粤港澳合作平台的重任。在一国两制和CPEA框架下探讨区域合作的具体模式和协调机制，是粤港澳合作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问题。

四　2013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2012年，是我国在世界经济逆风中艰行的一年。2013，世界经济仍将处于深度转型调整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原动力在逐渐减弱。我国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主动响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唤，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

① 邹欣媛：《宁夏作为中阿交流的平台作用凸显》，新华网，2012年9月20日。



“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与深度融合，展示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城镇化、实施金融改革和保护环境，将是我国经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主要推手。2013 年将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继往开来的深水开路，将会为我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展望新的一年，在以下多重问题的破冰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步入多元化时代。

（一）重塑中国制造业优势

坚实的制造业是国家强盛的必要基础，即便发展至今，美国经济的 1/4 仍然是制造实体产品的产业。如果将其产品分销和零售都计算在内，则制造业占经济的比例将近 3/4[①]。金融危机以后，重塑国际竞争优势，深化调整、促进发展是各国的重要战略任务。发达国家推行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二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三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②]。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制造业是我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目前，世界正在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时代，创新能力和劳动力素质是最重要的竞争要素。2012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超过 20 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但我国制造业发展对发达国家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可能失去对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敏感。我国在创新体系建设、市场环境等方面都面临考验。新工业革命将改变原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定制化生产将得到青睐，而中国的制造优势将不再显著，如何重塑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是区域发展的新引擎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

---

① 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

② 张茉楠：《中国经济缘何大幅减速》，2012 年 9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

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将于2013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规划》显示，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优势明显。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优化提升，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而同时，在战略布局上，将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比如沿陆桥“两横三纵”通道，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培育若干新的区域性城市群。改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滞后状况。中原经济区成为第一个城镇化与“三化”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示范区，是上述战略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未来我国城镇化的着力地区。

“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互动与深度融合，将是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标。“新四化”意味着：今后的城镇化，既要告别我国过去的城镇化模式，也要与西方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分道扬镳。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将主导区域发展方式转型，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

（三）区域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深化改革的红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要素红利和改革红利。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低增长周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全球化红利由盛转衰。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的人口红利趋于衰退。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的退化，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日益凸显。由此，以低成本、大量资源和资金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将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路径，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的新时期。

随着全球化和人口红利的衰减，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深化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反腐败、改善民生、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等深化改革的措施，将会全面释放要素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和谐社会目标

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进步。我国目前已有部



分地区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如贵阳提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青海的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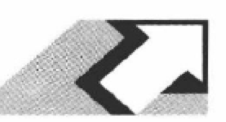
最近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2013年1月，我国东部连续出现的雾霾天气；斜穿1/3国土的巨大污染带，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北京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让我们格外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如何做到加强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进行，环境污染防治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建立刚性评价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建设中，是关键的一步。

（五）区域经济进入多元化时代

近年来，国家区域开发政策更注重各地区比较优势。这一点将在区域经济今后的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开发政策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各区域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转型路径和动力，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基础上，将形成不同的增长路径和增长方式。东部各地以科技促转型，积极探索海洋经济，已经现出发展的差异化模式；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各地对产业承接模式和路径的探索也将更加多元化；东北地区探索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将在与俄、蒙、朝的区域合作中，更上一层楼。随着我国与周边次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适应周边地区文化与宗教特点的交往方式，经济合作也将各具特色。总之，不同区域突显比较优势的转型与发展之路，将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变革中，显示各领风骚的风采。

综 合 篇



Comprehensive Chapter

B.2

中国城市化特征及转型发展研究*

王德利　梁昊光**

摘　要：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由“速度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提速”与“提质”的辩证关系，研究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走新型城市化建设模式。本研究在对中国城市化阶段性特征、空间差异性特征及规模差异性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中国城市化转型发展的新思路、新步伐，为中国城市化转型发展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

城市化　问题　转型模式　中国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87）。

** 王德利，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市规划；梁昊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中国城市化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且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正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城市化格局呈现区域动态不平衡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存在明显的动态不平衡性，本文从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空间差异性、规模差异性及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四个方面对中国及省域城市化发展的动态不平衡性进行研究。

（一）中国城市化阶段性发展特征

1. 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

通过对1953～2012年间的六次人口普查标准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复杂多变的问题。1953年我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采用市镇区划范围内的人口统计标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采用市镇区划范围内的非农业人口作为统计标准，这种统计方法使得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较小；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采用城镇范围内总人口作为统计口径；但随后随着中国设市及镇人口的口径标准不一致，使得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多变。由此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时，正确且一致的城市化统计标准是基础。本研究利用联合国法修正1949～2012年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联合国法是联合国用来预测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水平时常用的一种方法。它的关键是根据已知的两个代表年份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求取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假设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在预测期保持不变，则向外推可求得预测期末的城镇人口比重，向内推也可以估测代表年份之间各年的城镇人口比重。

$$URGD = \frac{\ln\left(\dfrac{\dfrac{PU_{(2)}}{1 - PU_{(2)}}}{\dfrac{PU_{(1)}}{1 - PU_{(1)}}}\right)}{n}$$

式中：$URGD$ 为城镇人口增长率差，$PU_{(1)}$ 为前一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比重，$PU_{(2)}$ 为后一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比重，n 为两次人口普查年间的时间间隔。

（1）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阶段性分析。

基于对 1949 ~2012 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阶段行演变规律分析，可以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阶段（表 1）。

表 1　1949 ~2011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情况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市化水平（%）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市化水平（%）
1949	54167	5765	48402	10. 64	1981	100072	20171	79901	20. 16
1950	55196	6169	49027	11. 18	1982	101654	21480	80174	21. 13
1951	56300	6632	49668	11. 78	1983	103008	22274	80734	21. 62
1952	57482	7163	50319	12. 46	1984	104357	24017	80340	23. 01
1953	58796	7826	50970	13. 31	1985	105851	25094	80757	23. 71
1954	60266	8249	52017	13. 69	1986	107507	26366	81141	24. 52
1955	61465	8285	53180	13. 48	1987	109300	27674	81626	25. 32
1956	62828	9185	53643	14. 62	1988	111026	28661	82365	25. 81
1957	64653	9949	54704	15. 39	1989	112704	29540	83164	26. 21
1958	65994	10721	55273	16. 25	1990	114333	30195	84138	26. 41
1959	67207	12371	54836	18. 41	1991	115823	31203	84620	26. 94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9. 75	1992	117171	32175	84996	27. 46
1961	65859	12707	53152	19. 29	1993	118517	33173	85344	27. 99
1962	67295	11659	55636	17. 33	1994	119850	34169	85681	28. 51
1963	69172	11646	57526	16. 84	1995	121121	35174	85947	29. 04
1964	70499	12950	57549	18. 37	1996	122389	37304	85085	30. 48
1965	72538	13045	59493	17. 98	1997	123626	39449	84177	31. 91
1966	74542	13313	61229	17. 86	1998	124761	41608	83153	33. 35
1967	76368	13548	62820	17. 74	1999	125786	43748	82038	34. 78
1968	78534	13838	64696	17. 62	2000	126743	45906	80837	36. 22
1969	80671	14117	66554	17. 50	2001	127627	48064	79563	37. 66
1970	82992	14424	68568	17. 38	2002	128453	50212	78241	39. 09
1971	85229	14711	70518	17. 26	2003	129227	52376	76851	40. 53
1972	87177	14935	72242	17. 13	2004	129988	54283	75705	41. 76
1973	89211	15345	73866	17. 20	2005	130756	56212	74544	42. 99

续表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市化水平（%）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市化水平（%）
1974	90859	15595	75264	17.16	2006	131448	57706	73742	43.90
1975	92420	16030	76390	17.34	2007	132129	59379	72750	44.94
1976	93717	16341	77376	17.44	2008	132802	60667	72135	45.68
1977	94974	16669	78305	17.55	2009	133450	64512	68938	48.34
1978	96259	17245	79014	17.92	2010	134091	66978	67113	49.95
1979	97542	18495	79047	18.96	2011	134735	69079	65656	51.27
1980	98705	19140	79565	19.39	—	—	—	—	—

注：①1981 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1987 年、1995 年和 2005 年数据根据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其余年份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1982 ~ 1989 年和 1990 ~ 1999 年数据分别根据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②总人口和按性别分人口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按城乡分人口中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

1949 ~ 1957 年的城市化恢复调整期。自从 1952 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设立了 694 个重点建设项目，按照“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1958 ~ 1965 年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波动调整期。1958 ~ 1960 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工业主要以钢铁工业为主，新增 30 多个城市，在这期间中国城市人口从 1958 年的 10721 万人快速增加到 1960 年的 13073 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 19.7%，这种短时间内急剧增生的城市化现象使得城市欠债较多。所以，在 1961 年中国又陆续撤销了 52 个城市，且动员 3000 万城市人口返回农村，这 3000 万人在当时相当于全国所有城镇人口的 25.7%。

1966 ~ 1978 年的徘徊停滞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方面大量的城镇人口及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另一方面由于大搞“三线”建设，这一阶段将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等力量分散到乡村，致使城市建设滞后，城镇化发展处于徘徊停滞阶段。

1979 ~ 1995 年的持续发展期。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极有了较快发展，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逐渐增强，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6～2011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城市化的稳定发展期，在本阶段中新设城市的数量逐渐减少，城市化扩张主要以城市规模的扩大为主，大城市周边的区县被合并到大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从而扩大城市规模。这一阶段城市数量变化不大，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较快。

（2）人口城市化速度阶段性分析。

按照周一星等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界定研究，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 0.6～0.8 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的，0.8～1.0 个百分点属于高速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年均提升 1 个百分点也是有可能的，该指标连续多年超过 1 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年均提升速度达到 1.44 个百分点是有水分的，是不可能的。按照以上关于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界定分析，本研究将城市化发展速度划分为四个层次，包括高速度（$0.8 \leqslant v$），中上发展速度（$0.6 \leqslant v < 0.8$），中下发展速度（$0.3 \leqslant v < 0.6$），低速度（$v < 0.3$）。按照以上四种类型的划分，可以得出 1949～1957 年为中国城市化的中上速度发展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为年均提高 0.594 个百分点；1958～1965 年为中国城市化的低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为年均提高 0.247 个百分点；1966～1978 年为中国城市化的低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为年均增长 0.005 个百分点；1979～1995 年为中国城市化的中上速度发展阶段，城市化年均速度为年均增长 0.630 个百分点；1996～2011 年为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为年均增长 1.410 个百分点（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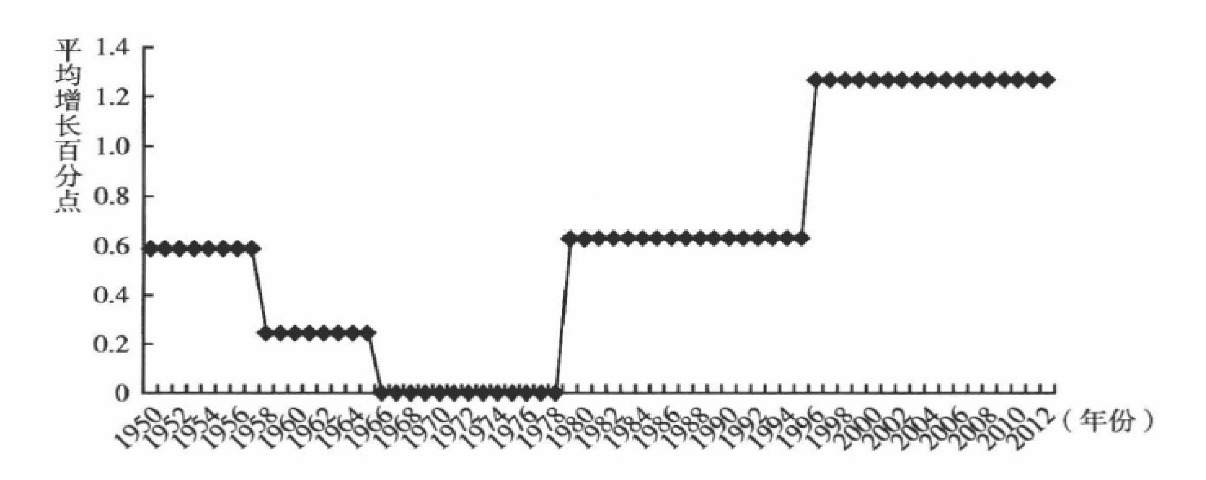


图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速度阶段性变化情况



2. 土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

（1）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变化特征分析。

中国城市化水平反映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城镇人口对应的城镇建设用地势必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和乡镇建设用地两部分。我国在进行城镇建设用地统计时，对城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统计较多，而关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及县城建设用地面积的统计较少。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仅对1990～2011年的城镇建设用地进行分析，利用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作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总量的计算标准。通过分析发现，1990～2010年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呈现稳定变化趋势，1990～1994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增长速度较快，1995～1999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降低到5个百分点左右，增长速度急剧下滑，2000～2006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稳定在7个百分点左右增长，2007～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变慢，仅有2008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达到6.76个百分点，其余年份均在1个百分点左右。通过对1990～2011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呈现线性增长趋势，$y=3100x+19666$（纵轴y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横轴x为年份），判定系数$R^2=0.959$，中国城镇建设用地以3105km²/年的速度呈直线增长（表2）。

表2　1990～2011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情况

年份	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比上年增加百分点(个)
1990	8250.0	5098.0	11608.3	24956.3	—
1991	8700.0	5467.0	12907.9	27074.9	8.49
1992	9750.0	5836.0	13918.1	29504.1	8.97
1993	11190.0	6205.0	15429.8	32824.8	11.26
1994	11880.0	6574.0	20796.2	39250.2	19.57
1995	13860.0	6943.0	22064.0	42867.0	9.21
1996	14370.0	7312.0	19001.6	40683.6	-5.09
1997	15530.0	7681.0	19504.6	42715.6	4.99
1998	16300.0	8050.0	20507.6	44857.6	5.01

续表

年份	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比上年增加百分点（个）
1999	16750.0	8419.0	20877.0	46046.0	2.65
2000	18200.0	8788.0	22113.7	49101.7	6.64
2001	19720.0	9157.0	24192.7	53069.7	8.08
2002	20320.0	9455.0	26832.6	56607.6	6.67
2003	21000.0	10180.0	28971.9	60151.9	6.26
2004	22360.0	11106.0	30781.3	64247.3	6.81
2005	23690.0	12383.0	29636.8	65709.8	2.28
2006	31200.0	13456.0	34166.7	78822.7	19.96
2007	28430.0	14680.0	36351.7	79461.7	0.81
2008	30160.0	15534.0	39140.5	84834.5	6.76
2009	31319.0	15558.0	38726.0	85594.0	0.91
2010	31790.0	16585.0	39758.0	88133.0	2.96
2011	33860.0	17376.0	41805.3	93041.3	5.56

注：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对1990～2011年的城镇建设用地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财务和外事司编《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0），中国计划出版社。

从分类城镇建设用地变化趋势来看，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较为平稳，从1990年的5098.0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16585.0平方公里，年均增长547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波动较大，从1990年的11608.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39758.0平方公里，年均增长961平方公里。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在1990～2006年间波动较小，但2007～2010年间变化较大，2011年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县城建设用地面积以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33860.0平方公里、17376.0平方公里、41805.3平方公里。

（2）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特征分析。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较大，1990～1995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呈现稳定增长趋势，1990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82.7m^2/人，1995年逐年增加到121.9m^2/人，本阶段是近20年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快的时期。1996～2005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不大，从1996年的109.1m^2/人增加到2005年的116.9m^2/人，年均增长约5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较为缓



慢。2005～2006 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急速增长，从 2005 年的 116.9m²/人增加到 2006 年的 136.6m²/人，一年之内增加了近 20m²/人，2006～2010 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不大，2007 年为 133.8m²/人，2008 年为 139.8m²/人，2010 年降低为 131.6m²/人，但与城市规划法中规定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100～120m²/人）相比，土地城市化仍旧呈现冒进增长态势（表 3）。

表 3　1990～2011 年中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分析

年份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增长速度(%)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m²/人)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比上年增加百分点(个)
1990	24956.3	30195	—	82.7	—
1991	27074.9	31203	3.34	86.8	4.98
1992	29504.1	32175	3.12	91.7	5.68
1993	32824.8	33173	3.10	99.0	7.91
1994	39250.2	34169	3.00	114.9	16.09
1995	42867	35174	2.94	121.9	6.09
1996	40683.6	37304	6.06	109.1	-10.51
1997	42715.6	39449	5.75	108.3	-0.71
1998	44857.6	41608	5.47	107.8	-0.43
1999	46046	43748	5.14	105.3	-2.37
2000	49101.7	45906	4.93	107.0	1.62
2001	53069.7	48064	4.70	110.4	3.23
2002	56607.6	50212	4.47	112.7	2.10
2003	60151.9	52376	4.31	114.8	1.87
2004	64247.3	54283	3.64	118.4	3.06
2005	65709.8	56212	3.55	116.9	-1.23
2006	78822.7	57706	2.66	136.6	16.85
2007	79461.7	59379	2.90	133.8	-2.03
2008	84834.5	60667	2.17	139.8	4.49
2009	85594.0	64512	6.34	132.7	-5.09
2010	88133.0	66978	3.82	131.6	-0.82
2011	93041.3	69079	3.13	134.7	2.36

注：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对 1990～2011 年的城镇建设用地及人均城镇建设用地进行分析。

3. 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分析

本文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用以分析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率与城镇人

口增长率的关系。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年均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率/年均城镇人口增长率，用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可以反映城镇建设用地及城镇人口增长的合理性，当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时，说明城市发展是一种正常理性的增长（刘海燕，2008）。通过对1990~2011年间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的分析，发现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呈现递减趋势。1990~1995年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为4.352，为建设用地弹性系数最高期；1996~2000年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降低为0.897，为近20年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最低值；2001~2011年间建设用地弹性系数维持在1.40左右，建设用地增长速度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从1990~2011年整体研究区间来看，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为2.378，总体呈现建设用地冒进增长趋势（表4）。

表4　1990~2011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变化分析

时间	指标	全国	时间	指标	全国
1990~1995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2.748	2006~2011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1.710
	年均用地增长率	11.961		年均用地增长率	2.542
	用地弹性系数	4.352		用地弹性系数	1.486
1996~2000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4.612	1990~2011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5.311
	年均用地增长率	4.138		年均用地增长率	12.628
	用地弹性系数	0.897		用地弹性系数	2.378
2001~2005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3.390	—	—	—
	年均用地增长率	4.764		—	—
	用地弹性系数	1.405		—	—

注：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对1990~2011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变化分析。

（二）中国城市化空间差异性特征

由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城市化进程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省域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侧重于对省域人口城市化及土地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差异性进行分析。其中，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性研究包括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及人口城市化速度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土地城市化包括省域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空间差异变化及省域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差异性变化分析。在以上



分析的基础上，对省域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进行深入分析，以此对省域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性进行分析。

1. 省域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

（1）省域人口城市化水平时空分异分析。

中国省域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性非常明显，1990 年仅有北京、上海及天津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后期，浙江、广东及山东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中部及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1995 年相比 1990 年城市化发展阶段性变化不大，上海市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终期，东部沿海各地区大多处于城市化发展的终期。2005 年中国城市化在省际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仅有贵州、云南及西藏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北京、上海均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终期。2011 年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云南等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辽宁则进入城市化后期。

（2）省域人口城市化速度的时空分异分析。

按照相关学者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阶段划分，本文界定高速度（$0.8 \leqslant v$）、中上速度（$0.6 \leqslant v < 0.8$）、中下速度（$0.3 \leqslant v < 0.6$）、低速度（$v < 0.3$）四种城市化发展类型。1985 ~ 1990 年间中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于中等发展速度或低速度发展阶段，城市化高速度发展地区较少；2000 ~ 2005 年中国大部分省份进入高速度发展阶段，这与中国城市化的总体演变特征类似；2005 ~ 2011 年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减少，但仍有部分地区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辽宁、浙江处于城市化的中下速度阶段，上海、广东处于低速度阶段（表 5、图 2）。

表 5　1985 ~ 2011 年省域城市化发展速度分析

区域名称	1985 ~ 1990 年	速度判定	1990 ~ 1995 年	速度判定	1995 ~ 2000 年	速度判定	2000 ~ 2005 年	速度判定	2005 ~ 2011 年	速度判定
北　京	0.46	中下速度	0.74	中上速度	1.01	高速度	1.20	高速度	0.43	中下速度
天　津	0.10	低速度	0.00	低速度	0.24	低速度	0.62	中上速度	0.71	高速度
河　北	0.36	中下速度	0.74	中上速度	0.69	中上速度	2.29	高速度	1.40	高速度
山　西	0.53	中下速度	0.46	中下速度	0.54	中下速度	1.41	高速度	1.00	高速度
内蒙古	0.74	中上速度	0.51	中下速度	0.82	高速度	0.88	高速度	1.50	高速度
辽　宁	0.38	中下速度	0.62	中上速度	0.28	低速度	0.87	高速度	0.45	中下速度

续表

区域名称	1985～1990年	速度判定	1990～1995年	速度判定	1995～2000年	速度判定	2000～2005年	速度判定	2005～2011年	速度判定
吉　林	0.53	中下速度	0.59	中下速度	-0.02	低速度	0.55	中下速度	0.23	低速度
黑龙江	0.73	中上速度	0.37	中下速度	0.21	低速度	0.29	低速度	0.77	中上速度
上　海	1.38	高速度	1.89	高速度	1.28	高速度	0.12	低速度	-0.16	低速度
江　苏	0.85	高速度	1.35	高速度	2.04	高速度	1.67	高速度	1.40	高速度
浙　江	0.29	低速度	1.02	高速度	1.45	高速度	1.42	高速度	0.53	中下速度
安　徽	0.61	中上速度	1.03	高速度	0.65	中上速度	1.51	高速度	1.67	高速度
福　建	0.67	中上速度	1.45	高速度	1.04	高速度	1.10	高速度	0.87	高速度
江　西	0.21	低速度	0.62	中上速度	0.30	中下速度	1.85	高速度	1.45	高速度
山　东	0.95	高速度	1.31	高速度	0.12	低速度	1.36	高速度	0.87	高速度
河　南	0.37	中下速度	0.78	中上速度	0.32	中下速度	1.47	高速度	1.79	高速度
湖　北	1.01	高速度	1.50	高速度	0.72	中上速度	0.54	中下速度	0.67	中上速度
湖　南	0.57	中下速度	0.96	高速度	0.88	高速度	1.41	高速度	1.72	高速度
广　东	2.58	高速度	2.62	高速度	0.51	中下速度	1.06	高速度	0.90	高速度
广　西	0.59	中下速度	1.51	高速度	0.61	中上速度	1.05	高速度	1.51	高速度
海　南	0.94	高速度	1.24	高速度	2.18	高速度	0.68	中上速度	0.93	高速度
重　庆	0.64	中上速度	1.90	高速度	1.34	高速度	2.36	高速度	1.60	高速度
四　川	0.39	中下速度	1.03	高速度	0.41	中下速度	1.26	高速度	1.47	高速度
贵　州	-0.09	低速度	0.50	中下速度	0.02	低速度	0.59	中下速度	0.75	中上速度
云　南	0.32	中下速度	0.55	中下速度	0.62	中上速度	1.20	高速度	1.17	高速度
西　藏	0.30	中下速度	0.76	中上速度	0.64	中上速度	1.52	高速度	-1.35	低速度
陕　西	0.29	低速度	0.58	中下速度	0.78	中上速度	0.97	高速度	1.62	高速度
甘　肃	0.31	中下速度	0.37	中下速度	0.31	中下速度	1.18	高速度	0.71	中上速度
青　海	0.45	中下速度	0.33	中下速度	0.24	低速度	0.87	高速度	0.54	中下速度
宁　夏	0.87	高速度	0.49	中下速度	0.07	低速度	1.95	高速度	0.90	高速度
新　疆	-0.05	低速度	0.23	低速度	-0.01	低速度	0.66	中上速度	0.83	高速度

注：以上为按照联合国法修正的城市化水平计算得到的城市化发展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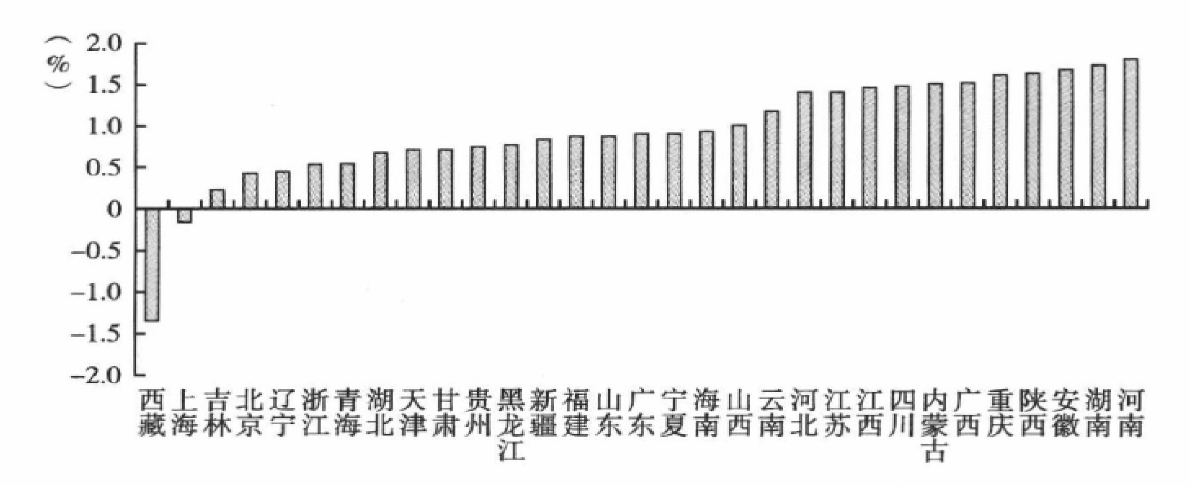


图2　2005～2011年中国分区域城市化发展速度对比分析



2. 省域土地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1） 省域城建用地总量时空变化分析。

基于省域城市建设用地量的地域分异特征，本研究将省域城市建设用地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低用地量区域（$<500km^2$）、较低用地量区域（$500\sim1000km^2$）、中等用地量区域（$1000\sim2000km^2$）、较高用地量区域（$2000\sim3000km^2$）及高用地量区域（$>3000km^2$）。1990 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为 $11608km^2$，建设用地总量较高的几个地区包括黑龙江省、辽宁省及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达到 $935km^2$、$982km^2$、$745km^2$。1995 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达到 $22064km^2$，辽宁省、黑龙江省、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等城市建设用地均达到 $1000km^2$ 以上。到 2011 年省域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迅速增加，高用地量地区主要包括山东、广东两个地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基数较大，非农业人口较多，导致城市占用土地量也较大。上海和江苏属于城市建设用地较高用地量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城市数量较多、产业较为发达，城市建设用地占地面积较大。中等城市建设用地量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辽宁、湖南、湖北、浙江、河北、安徽、吉林、四川及北京等 11 个省市。低用地量地区主要包括西藏、海南、青海、贵州及宁夏五个省区，这与本地区城市人口较少，城市产业不发达有很大关系。

（2） 人均建设用地变化特点分析。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本研究采用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业人口比值作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的核算标准。但实际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不仅仅包括非农业人口还包括大量的流动人口，而在统计城镇建设用地时，不仅仅包括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还包括建制镇建设用地面积、县城建设用地面积等。所以本文统计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可能略有偏高。基于对 1990～2011 年省域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等级划分研究，可将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划分为六个等级：极高（$\geq140m^2$）、高（$120\sim139m^2$）、较高（$100\sim119m^2$）、中等（$80\sim99m^2$）、较低（$60\sim79m^2$）、低（$<60m^2$）。1990～2011 年中国省域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并构成周边地区高于内陆地区的环状分布态势。2011 年省域范围内没有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低区和较低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中等地区有陕西、山西、北京和贵州四个省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较高地

区有河北、湖北、江西、辽宁、四川及重庆六个省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高地区有湖南、河南、吉林、天津、安徽、山东、上海、甘肃、江苏、青海、江西及黑龙江12个省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极高的地区有广东、新疆、云南、浙江、广西、海南、内蒙古、福建、宁夏及西藏。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统计的是非农业人口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而在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的不仅仅是城市非农业人口，还有大量的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所以本文统计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略有偏高。

3. 省域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差异性分析

目前，中国各省城市化均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部分地区城市化进入后期或终期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中的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性问题是未来城市化研究的焦点问题。表6反映了1990～2011年间中国各省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弹性系数的变化情况。与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差异性较小，而西部各个省份的用地弹性系数相对大些。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协调性最好，建设用地弹性系数为1.07；北京、河北、山东、甘肃、青海及宁夏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相对较低，均在1.50左右；而西部的四川、重庆、贵州及东部的天津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较高，均达到4.0以上，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但需要说明的是，东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天津、上海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较高，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没有将现实中的流动人口统计在内，另一方面和目前中国特大城市房地产连续多年升温，投资开发力度很大相关（刘海燕，2008）。

表6　1990～2011年中国各省份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

	省　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东部地区	城市用地年均增长率(%)	14.38	4.49	6.90	4.60	11.72	19.41	21.41	17.31	16.94	30.66	17.11	41.02
	城市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	9.26	1.07	6.17	1.98	3.10	5.21	6.03	16.22	9.60	11.07	7.64	15.28
	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	1.55	4.18	1.12	2.33	3.77	3.73	3.55	1.07	1.76	2.77	2.24	2.68

续表

	省　份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	—	—
中部地区	城市用地年均增长率(%)	5.86	3.44	3.79	3.82	15.51	13.55	11.43	10.81	8.82	—	—	—
	城市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	4.48	1.98	2.04	1.28	6.13	3.89	6.45	4.27	3.86	—	—	—
	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	1.31	1.74	1.86	2.98	2.53	3.48	1.77	2.53	2.28	—	—	—
西部地区	省　份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	—
	城市用地年均增长率(%)	13.24	13.19	14.64	12.57	3.85	8.46	5.70	2.60	10.48	7.47	—	—
	城市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	2.11	2.94	3.01	3.33	2.60	3.20	4.31	2.02	7.31	3.70	—	—
	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	6.26	4.49	4.87	3.78	1.48	2.65	1.32	1.29	1.43	2.02	—	—

（三）中国城市化规模差异性特征

由于关于城市人口统计方面仅有非农业人口的统计数据，难以模拟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规模差异性，所以本文在研究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差异性方面，仅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做研究。2006～2008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改为《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但并未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做统计分析，所以本文将 1985～2005 年的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差异性作为分析对象（表 7）。

1. 土地城市化规模差异性分析

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口径统计的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情况如表 7 所示。由图 3 可以看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小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中等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大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特大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可分为 1985～1994 年的稳步增长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1985 年的 2823.4km^2 增加到 1994 年的 4312.7km^2；加速增长期，城市建设用地从 1995 年的 4574.3km^2 增加到 1998 年的 8491.58km^2；1999 年至今为波动增长期，城



表7　1985～2005年中国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历年建设用地总量变化

年份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城建用地（km^2）	占总用地（%）	非农人口（万人）	占总非农人口（%）	城建用地（km^2）	占总用地（%）	非农人口（万人）	占总非农人口（%）	城建用地（km^2）	占总用地（%）	非农人口（万人）	占总非农人口（%）
1985	2823.40	32.84	4747.20	40.20	1697.30	19.74	2247.60	19.03	2251.20	26.19	2899.10	24.55
1987	3173.30	32.40	5288.50	41.00	1688.50	17.30	2154.70	16.70	2589.60	26.50	3086.30	23.90
1988	3526.20	32.60	5708.50	40.90	1610.30	14.90	2081.40	14.90	2864.60	26.50	3338.20	23.90
1989	3471.20	31.10	5808.60	40.40	1730.20	15.50	2161.60	15.00	2971.80	26.60	3464.30	24.10
1990	3653.80	31.50	6004.10	40.70	1673.20	14.40	2089.80	14.20	3160.50	27.20	3622.90	24.60
1991	3875.40	30.00	6159.30	41.30	1805.20	14.00	2120.80	14.20	3282.60	25.40	3429.90	23.00
1992	4263.90	30.60	6312.10	40.80	1839.70	13.20	2149.90	13.90	3462.30	24.90	3534.70	22.90
1993	4432.90	28.70	6549.90	39.60	2114.80	13.70	2399.20	14.50	3966.40	25.70	3941.50	23.80
1994	4312.70	26.40	6011.30	35.90	2097.00	12.80	2389.20	14.30	4404.40	26.90	4293.10	25.60
1995	4574.30	25.90	6242.90	35.60	2404.80	13.60	2635.90	15.00	4760.40	27.00	4526.20	25.80
1996	5458.05	28.72	7061.00	37.39	2775.51	14.61	2920.00	15.46	4949.05	26.05	4540.00	24.04
1997	6977.51	35.77	8454.26	43.42	2895.89	14.85	3117.10	16.01	5295.28	27.15	4806.69	24.69
1998	8491.58	41.41	9543.73	48.05	2877.73	14.03	2977.43	14.99	5381.57	26.24	4841.30	24.37
1999	6622.77	31.72	7841.56	38.89	3222.48	15.44	3234.41	16.04	5330.33	25.53	4858.75	24.10
2000	7179.18	32.46	7355.22	35.10	3537.02	15.99	3504.09	16.72	5445.47	24.62	4861.15	23.20
2001	7179.18	32.46	8732.29	40.53	3537.02	15.99	3902.68	18.11	5445.47	24.62	4686.42	21.75
2002	10107.7	37.67	9554.36	43.39	4379.80	16.32	3796.78	17.24	5536.70	20.63	4627.99	21.02
2003	11518.48	39.76	10091.82	43.90	4407.78	15.21	4174.39	18.16	5914.24	20.41	4788.03	20.83
2004	11307.49	36.73	10251.61	43.37	5414.24	17.59	4409.39	18.66	6399.78	20.79	4909.74	20.77
2005	8954.48	30.21	10075.25	42.60	6000.13	20.25	4707.80	19.90	6588.56	22.23	4939.89	20.89



续表

年份	小城市				全国		统计城市数量
	城建用地（km^2）	占总用地（%）	非农人口（万人）	占总非农人口（%）	城建用地（km^2）	非农人口（万人）	
1985	1825.00	21.23	1916.30	16.23	8596.90	11810.20	317
1987	2324.10	23.70	2338.50	18.10	9787.90	12893.00	370
1988	2807.50	25.90	2841.30	20.30	10821.60	13939.50	423
1989	2997.50	26.80	2943.20	20.50	11170.70	14377.70	441
1990	3120.80	26.90	3035.30	20.60	11608.30	14752.10	455
1991	3944.70	30.60	3211.10	21.50	12907.90	14921.00	473
1992	4352.20	31.30	3462.70	22.40	13918.10	15459.40	506
1993	4902.40	31.80	3665.80	22.10	15429.80	16550.10	549
1994	5532.60	33.80	4051.50	24.20	16360.00	16745.90	607
1995	5799.50	32.90	4144.20	23.60	17627.90	17558.70	633
1996	6013.01	31.64	4273.00	22.63	19001.60	18883.00	658
1997	5741.49	29.44	4191.65	21.53	19504.60	19469.90	670
1998	5758.87	28.08	4177.33	21.03	20507.60	19861.80	670
1999	5842.82	27.99	4249.78	21.08	20877.00	20161.60	667
2000	5951.99	26.92	4231.99	20.20	22113.66	20952.45	663
2001	5951.99	26.92	4224.10	19.61	22113.66	21545.49	662
2002	6808.40	25.37	4042.09	18.36	26833.00	22021.22	660
2003	7131.40	24.61	3932.56	17.11	28971.90	22986.80	660
2004	7659.77	24.88	4065.17	17.20	30781.28	23635.91	661
2005	8093.66	27.31	3929.08	16.61	29636.83	23652.02	661

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 333. 1km²。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演变曲线比较相似，城市建设用地分别从 1985 年的 1825km²、2251. 2km² 增加到 2005 年的 8093. 66km²、6588. 56km²。大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具有稳步增长趋势，从 1985 年的 1697. 3km² 增长到 2005 年的 6000. 13km²，年均增长 12. 07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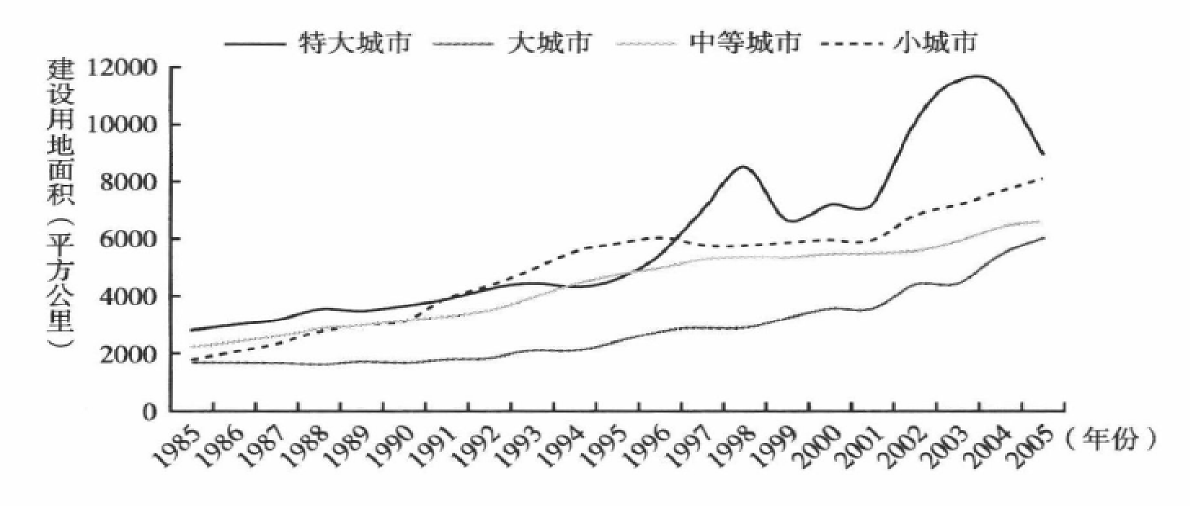


图 3　1985 ~ 2005 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规模差异性变化分析

2.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差异性分析

按照城市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计算的全国城市非农业人口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和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情况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看出，小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中等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全国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大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特大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特大城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1985 年的 59. 47m² 稳步增加到 1998 年的 88. 97m²，1999 ~ 2003 年属于波动上升时期，年均增长 7 百分点，2003 ~ 2005 年属于下降时期，从 115. 11m² 下降到 81. 55m²。大城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的演变趋势与特大城市颇有相似，但从 2003 年至 2005 年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中等城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曲线相对特大城市及大城市具有稳步增长趋势，从 1985 年的 77. 65m² 增加到 2005 年的 133. 37m²。小城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可以明显分为三段，1985 ~ 1990 年的稳步增长期，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1985 年的 95. 24m² 增加到 1990 年的 102. 80m²；1991 ~ 2001 年的加速增长期，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从 1991 年的 122.88m² 增长到 2001 年的 140.91m²；2001～2005 年的超高速增长期，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2001 年的 140.91m² 增加到 2005 年的 205.99m²，年均增长 13.1m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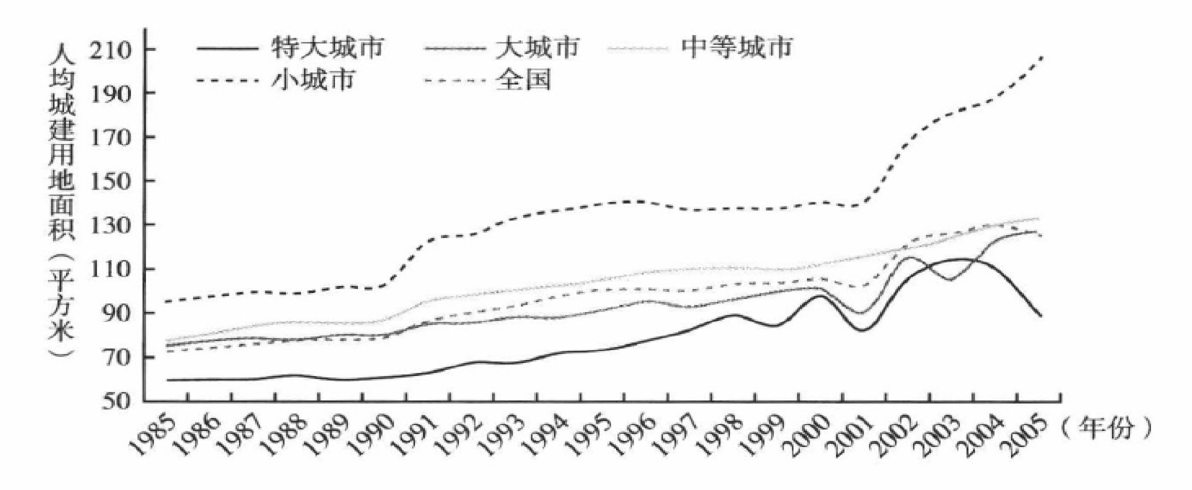


图 4　1985～2005 年中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数量规模差异性分析

3. 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规模差异性分析

从表 8 可以看出，1985～1990 年、1991～1995 年、1996～2000 年、2001～2005 年四个时间段内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用地弹性系数处于稳步增长态势，但

表 8　1985～2005 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规模差异性

时　间	指　标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1985～1990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4.413	-1.170	4.161	9.732
	年均用地增长率	4.902	-0.237	6.732	11.834
	用地弹性系数	1.111	0.202	1.618	1.216
1991～1995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0.271	4.858	6.393	5.812
	年均用地增长率	3.607	6.643	9.004	9.404
	用地弹性系数	13.287	1.368	1.408	1.618
1996～2000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0.833	4.001	1.415	-0.192
	年均用地增长率	6.307	5.487	2.006	-0.203
	用地弹性系数	7.568	1.372	1.418	1.057
2001～2005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3.076	4.126	1.082	-1.397
	年均用地增长率	4.946	13.928	4.198	7.196
	用地弹性系数	1.608	3.376	3.881	-5.152
1985～2005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	5.345	5.212	3.352	5.002
	年均用地增长率	10.341	12.072	9.175	16.357
	用地弹性系数	1.935	2.316	2.737	3.270

特大城市及小城市的建设用地弹性系数时间波动性较大。特大城市从1985～1990年的1.111增加到1991～1995年的13.287，1996～2000年处于降低态势，到2001～2005年间降低为1.608。小城市城市建设用地弹性系数1985～1990年为1.216，1991～1995年增加到1.618，1996～2000年略有下降，2001～2005年间由于城市非农人口呈现负增长，而建设用地增长率较大，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变为－5.152。但从1985～2005年整体来看，用地弹性系数特大城市（1.935）＜大城市（2.316）＜中等城市（2.737）＜小城市（3.270）。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数据限制，按城市非农人口口径计算的用地弹性系数结果较实际情况偏大。

二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结构和功能正面临着空前大规模变化和转换，虽然城市化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在城市化高速增长下，城市发展普遍存在以下现象：城市化速度快，但水平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城市化”速度较高，呈现冒进增长态势；区域发展不平衡由速度型向结构型转变，部分社会问题矛盾突出；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城市风貌雷同；高速城市化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破坏。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城市化速度快，但水平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前，受相关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1950～1980年间，世界城市化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而我国仅仅提高了大约8个百分点。尽管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现在加快了，但是受以往长期滞后性积累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存在速度快、水平低的现象（耿海青，2003）。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低度城市化类型（方创琳，2008）。本研究主要从GDP、非农业水平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化展的滞后性进行分析。



1. 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的比较分析

（1）2011 年全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非农化水平滞后约 13.9 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间的滞后性存在较大波动，1980～1988 年城市化水平相对非农化水平滞后约 13 个百分点，1989～1992 年城市化水平相对非农化水平滞后约 11 个百分点，1993～2001 年城市化水平相比非农化水平滞后程度波动性较大，从 1993 年的 12.70 个百分点，增加到 1996 年的 16.59 个百分点，到 2001 年降低为 12.34 个百分点，2002 年滞后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2001～2010 年滞后性又逐渐增大，截止到 2011 年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非农化水平滞后约 13.9 个百分点（表 9）。

表 9　1980～2011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对比分析

年份	修正城市化率（%）	非农化比重（%）	滞后百分点（个）	年份	修正城市化率（%）	非农化比重（%）	滞后百分点（个）
1980	19.84	31.30	11.46	1996	32.91	49.50	16.59
1981	20.53	31.90	11.37	1997	33.75	50.10	16.35
1982	21.22	31.90	10.68	1998	34.51	50.20	15.69
1983	21.91	32.90	10.99	1999	35.28	49.90	14.62
1984	23.52	36.00	12.48	2000	36.25	50.00	13.75
1985	24.44	37.60	13.16	2001	37.66	50.00	12.34
1986	25.50	39.10	13.60	2002	39.09	50.00	10.91
1987	26.55	40.00	13.45	2003	40.53	50.90	10.37
1988	27.28	40.70	13.42	2004	41.76	53.10	11.34
1989	27.93	39.90	11.97	2005	42.99	55.20	12.21
1990	28.35	39.90	11.55	2006	43.90	57.40	13.50
1991	28.53	40.30	11.77	2007	44.94	59.20	14.26
1992	30.12	41.50	11.38	2008	45.68	60.40	14.72
1993	30.90	43.60	12.70	2009	48.34	61.9	13.56
1994	31.65	45.70	14.05	2010	49.95	63.3	13.35
1995	32.33	47.80	15.47	2011	51.27	65.2	13.93

（2）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协调性的省际差异。

通过对 1990～2008 年中国 31 个省份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关系的分析，发现 1990～1995 年中国 31 个省份均为城市化水平滞后型区域，2000 年上海、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云南为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基本协调

型，仅有海南省为城市化水平超前型，其余省份为城市化滞后型，其中江苏、山西、天津、河南、湖北、浙江、安徽、江西、甘肃、宁夏、河北、辽宁、重庆、四川、湖南、北京、贵州、陕西、福建、山东、广西、新疆22个省份为城市化水平过度滞后型。2011年除山西、海南、湖南、陕西、北京及新疆外，其他地区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系数有增大趋势，其中浙江、江苏、西藏三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非农化水平滞后20个百分点以上（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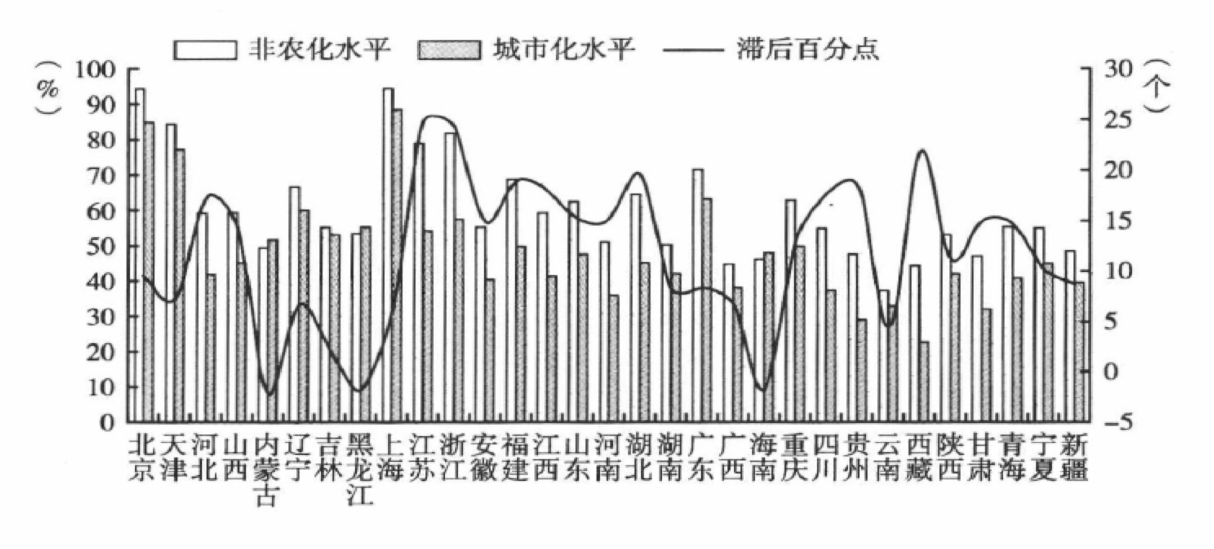


图5　2011年省域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对比分析

2. 城市化水平与GDP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1）2011年全国城市化水平相对GDP发展水平滞后约12.7个百分点。

在以往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与钱纳里标准的对比分析中，大多直接以现实的人均GNP（或GDP）数据与钱纳里的数据（1964年美元）相对照，得出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的结论，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GDP缩减系数，存在较大误差。这主要是因为1964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与现在的经济数据不能直接形成对比，必须将1964年的美元数据换算为2011年的美元标准。由于GNP与GDP在统计标准上差距较小，本研究采用GDP作为界定依据。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22698元，按2008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6.3∶1换算，约为5584美元。依照钱纳里标准，对应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4%，而2011年底我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为51.27%，与钱纳里标准相比滞后约12.7个百分点（表10）。



表 10　钱－塞发展型式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人均 GNP 标准(美元)		对应城市化水平(%)
1964 年	2011 年	
70	360	12.8
100	510	22.0
200	1020	36.2
300	1540	43.9
400	2050	49.0
500	2560	52.7
800	4100	60.1
1000	5120	63.4
1500	7680	65.8

注：2008 年美元与 1964 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使用此期间美国 GDP 缩减指数，换算比例为 5.12。
资料来源：钱纳里、塞奎因：《发展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

（2）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协调性的省际差异。

基于 2011 年 31 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对比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化水平的仅有 5 个，而高于城市化水平的有 26 个。上海、吉林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型；天津、北京及黑龙江为经济发展水平过度滞后型；海南、辽宁及重庆为基本协调型；河北、安徽、江西、湖南及宁夏为城市化水平滞后型；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甘肃、广西、青海及新疆为城市化水平过度滞后型（表 11、图 6）。

表 11　2011 年省域人均 GDP 分析

区域名称	2011 年人民币	2011 年美元	区域名称	2011 年人民币	2011 年美元
北　京	16251.93	2579.67	湖　北	19632.26	3116.23
天　津	11307.28	1794.81	湖　南	19669.56	3122.15
河　北	24515.76	3891.39	广　东	53210.28	8446.08
山　西	11237.55	1783.74	广　西	11720.87	1860.46
内蒙古	14359.88	2279.35	海　南	2522.66	400.42
辽　宁	22226.70	3528.05	重　庆	10011.37	1589.11
吉　林	10568.83	1677.59	四　川	21026.68	3337.57
黑龙江	12582.00	1997.14	贵　州	5701.84	905.05

续表

区域名称	2011 年人民币	2011 年美元	区域名称	2011 年人民币	2011 年美元
上　海	19195.69	3046.93	云　南	8893.12	1411.61
江　苏	49110.27	7795.28	西　藏	605.83	96.16
浙　江	32318.85	5129.98	陕　西	12512.30	1986.08
安　徽	15300.65	2428.67	甘　肃	5020.37	796.88
福　建	17560.18	2787.33	青　海	1670.44	265.15
江　西	11702.82	1857.59	宁　夏	2102.21	333.68
山　东	45361.85	7200.29	新　疆	6610.05	1049.21
河　南	26931.03	4274.77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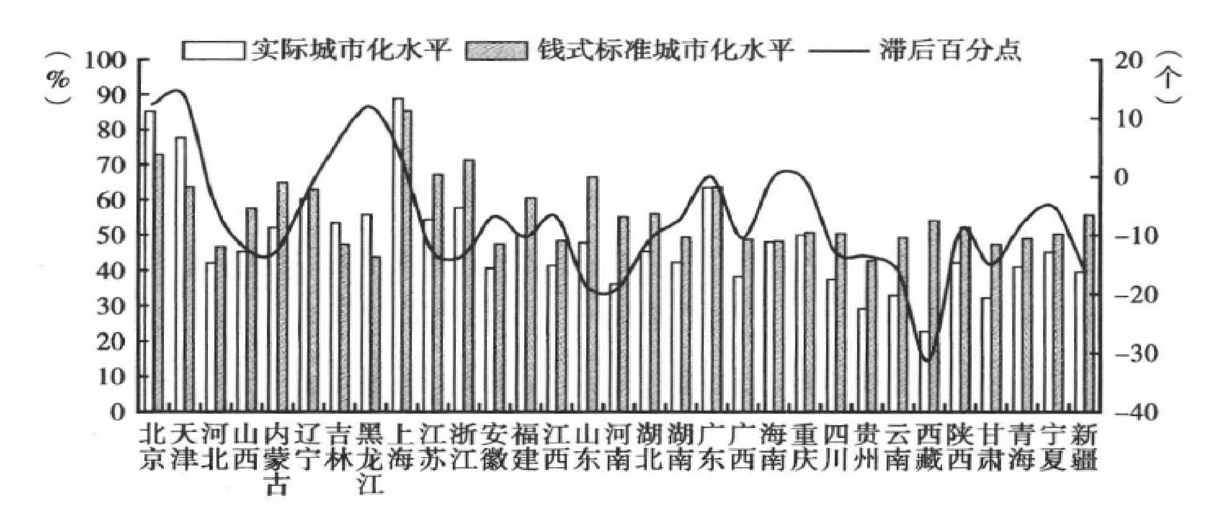


图 6　2011 年省域城市化水平与钱式标准对比分析

（二）“土地城市化”速度较高，呈现冒进增长态势

理想的城市化发展状态是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同步推进，并且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相适应。本文对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分析是基于以下理念，即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同步发展的程度越高，说明其协调性越好。

$$L_{(t)} = \begin{cases} \dfrac{M_{(t)} - V_{(t)}}{|M_{(t)} - V_{(t)}|}\left[1 - \dfrac{\min\{M_{(t)}, V_{(t)}\}}{\max\{M_{(t)}, V_{(t)}\}}\right] & \cdots M_{(t)} \neq V_{(t)} \\ 0 & \cdots M_{(t)} = V_{(t)} \end{cases}$$



式中，$L_{(t)}$ 为土地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协调系数，如果 $L_{(t)}>0$，表明土地城市化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L_{(t)}<0$，表明土地城市化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L_{(t)}$ 值越接近于 0，表明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间的协调性越好。$M_{(t)}$ 为第 t 年或 t 区域土地城市化指数，$V_{(t)}$ 为第 t 年或 t 区域人口城市化水平指数（王德利，2011）。

根据对 $L_{(t)}$ 计算结果分析，本文界定 $L_{(t)}<0$ 为土地城市化水平滞后型，$0<L_{(t)}$ 为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型，$|L_{(t)}|\leq 0.1$ 为基本协调型，$0.1<|L_{(t)}|\leq 0.5$ 为滞后型，$0.5<|L_{(t)}|\leq 1$ 为过度滞后型。研究发现，1990～1991 年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型；1996～2001 年为人口城市化水平基本协调型；而 2002～2010 年一直为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且 $L_{(t)}$ 一直呈现递增变化趋势，从 2002 年的 0.113，增加到 2008 年的 0.285，土地城市化水平呈现冒进增长态势（表 12）。

表 12　1990～2011 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分析

年份	实际城市化水平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城镇人口*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L_{(t)}$	城市化发展类型
1990	26.41	249.56	21.83	-0.173	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1991	26.94	270.75	23.38	-0.132	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1992	27.46	295.04	25.18	-0.083	基本协调型
1993	27.99	328.25	27.70	-0.010	基本协调型
1994	28.51	392.50	32.75	0.129	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型
1995	29.04	428.67	35.39	0.179	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型
1996	30.48	406.84	33.24	0.083	基本协调型
1997	31.91	427.16	34.55	0.076	基本协调型
1998	33.35	448.58	35.95	0.072	基本协调型
1999	34.78	460.46	36.61	0.050	基本协调型
2000	36.22	491.02	38.74	0.065	基本协调型
2001	37.66	530.70	41.58	0.094	基本协调型
2002	39.09	566.08	44.07	0.11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3	40.53	601.52	46.55	0.129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4	41.76	642.47	49.43	0.155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5	42.99	657.10	50.25	0.144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6	43.90	788.23	59.96	0.268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7	44.94	794.62	60.14	0.25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续表

年份	实际城市化水平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城镇人口*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L_{(t)}$	城市化发展类型
2008	45.68	848.35	63.88	0.285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09	48.34	855.94	63.83	0.261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10	49.95	881.33	65.41	0.282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2011	51.27	930.41	69.07	0.284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注：* 为按照城乡规划标准，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00m^2 计算得到的当年城镇建设用地可承载的城镇人口数量；** 为按照以上计算的可承载的城镇人口数量及当年人口总量计算得到的城市化水平。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对 1990～2011 年全国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土地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进行分析。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由速度型向结构型转变，部分社会矛盾突出

在改革开放的头 30 年中，我国实行的是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先富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先富地区，占尽了国家政策优惠、区位优势，并率先得到了经济及社会的极大发展。可以说，今天我国的区域不平衡性是过去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

1. 城乡发展日益失衡，城乡间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均呈不断拉大趋势

受二元经济结构及国家政策的影响，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从相对差距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由 1978 年的 2.57 倍缩小到 1985 年的 1.86 倍，到 1990 年扩大为 2.20 倍，2005 年收入差距扩大到 3.22 倍，2011 年为 3.13 倍。从绝对收入差距来看，1978 年城乡收入差距为 209.8 元，1990 年扩大为 823.9 元，2000 年继续扩大达到 4026.6 元，2011 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绝对差距为 14832.5 元（表 13）。

2. 地区间经济增长相对差距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八五”之前地区间收入增长速度差距在两个百分点左右，“八五”期间地区间收入增长速度差距扩大到 7 个百分点，在这个时期，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部及中部地区。自“九五”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011 年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平均



表 13　1978 ~ 2011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年份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相对收入差距(倍)	绝对收入差距(元)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1978	343.4	133.6	2.57	209.8	57.5	67.7
1980	477.6	191.3	2.50	286.3	56.9	61.8
1985	739.1	397.6	1.86	341.5	53.3	57.8
1990	1510.2	686.3	2.20	823.9	54.2	58.8
1991	1700.6	708.6	2.40	992	53.8	57.6
1992	2026.6	784	2.58	1242.6	53	57.6
1993	2577.4	921.6	2.80	1655.8	50.3	58.1
1994	3496.2	1221	2.86	2275.2	50	58.9
1995	4283	1577.7	2.71	2705.3	50.1	58.6
1996	4838.9	1926.1	2.51	2912.8	48.8	56.3
1997	5160.3	2090.1	2.47	3070.2	46.6	55.1
1998	5425.1	2162	2.51	3263.1	44.7	53.4
1999	5854	2210.3	2.65	3643.7	42.1	52.6
2000	6280	2253.4	2.79	4026.6	39.4	49.1
2001	6859.6	2366.4	2.90	4493.2	38.2	47.7
2002	7702.8	2475.6	3.11	5227.2	37.7	46.2
2003	8472.2	2622.2	3.23	5850	37.1	45.6
2004	9421.6	2936.4	3.21	6485.2	37.7	47.2
2005	10493	3254.9	3.22	7238.1	36.7	45.5
2006	11759.5	3587	3.28	8172.5	35.8	43
2007	13785.8	4140.4	3.33	9645.4	36.3	43.1
2008	15780.8	4760.6	3.31	11020.2	37.9	43.7
2009	17174.7	5153.2	3.33	12021.5	36.5	41
2010	19109.4	5919	3.23	13190.4	35.7	41.1
2011	21809.8	6977.3	3.13	14832.5	36.3	40.4

每人全年收入分别为 29226.04 元、19868.19 元、19868.03 元、20163.20 元，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6406.04 元、18323.16 元、18159.40 元、18301.31 元，东部地区收入最高，中部及东北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表 14）。

表 14　2011 年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分析

单位：元

指　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	29226.04	19868.19	19868.03	20163.20
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26406.04	18323.16	18159.40	18301.31

3. 与经济发展差距相比，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平衡问题较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也已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从区域不平衡来看，地区间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11 年东部 10 省份人口总量占全国的 38%，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9.5%，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53.1%，普通高等学校数占全国的 39.6%，卫生机构数占全国的 32.5%；中部 6 省份人口总量占全国的 26.8%，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10.7%，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9.7%，普通高等学校数占全国的 26.0%，卫生机构数占全国的 28.6%；西部 12 省份人口总量占全国的 27%，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71.5%，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8.6%，普通高等学校数占全国的 23.9%，卫生机构数占全国的 30.8%；东北 3 省人口总量占全国的 8.2%，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8.2%，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8.6%，普通高等学校数占全国的 10.5%，卫生机构数占全国的 8.1%。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高的省份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万人拥有执业医师数较高的省份集中于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师生比较高的省份集中于南部及西南地区。

（四）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损坏，资源、环境和生态效率预警频繁

由于近几年城市化发展过快，城市规划及城市建设缺乏特色，造成自然和历史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难以延续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造成中国千城一面，城市形象相似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将出现以下情形：中国的城市建筑包含了世界大部分的建设风格，但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却没有了，唯独缺少中国自己



风格的建筑和城市风貌，本土化建筑缺失。另外，由于城市化进程中急需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使地方政府不顾重点风景名胜区及各类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利用，对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破坏。

已故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中国的城市化曾做出这样一种评价：中国城市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种评价在近期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越发得到了验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风貌保护越发值得人深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一座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中国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特征几乎被“冒进城市化浪潮”淹没殆尽，所以我们不得不深思高速城市化背后的城市化特色建设问题。

城市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社会极大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破坏、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等粗放式发展方式，利用资源能源等的高投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资源比较紧缺，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目前我国资源能源消耗较大，2011 年我国每万元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7 倍，是美国的 4.1 倍，是日本的 8.2 倍，是巴西的 2.1 倍，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土地资源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但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摊大饼”式的冒进增长，造成土地利用效率极其低下。

城市化进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尽管工业污水处理率较高，但自 1999 年开始，中国的生活污水量就超过了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中的氨氮、COD 等主要污染物成为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水体和大气中污染物已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机动车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城市垃圾处理率较低，大量垃圾未经过处理，就堆置在城市周围，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带来严重的固体废弃物污染、垃圾围城的局面。

城市内部生态环境失衡较为严重，现代城市大多被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包围，城市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城市热岛”问题突出，城市生态承载能力的弱化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三　中国城市化转型发展的战略路径

基于对城市化发展特征、格局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发展的“六化”路径，包括适度城市化、适速城市化、集群城市化、紧凑城市化、公平城市化、生态城市化，以此构建中国城市化转型发展的新思路、新步伐。

（一）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走“适度城市化”道路

通过对城市化发展水平与非农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1980～201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GDP发展水平、非农化水平等一直处于滞后发展状态。198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20个百分点，而到201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约12个百分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程度有较大幅度的减小。尽管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建设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但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系统及社会发展系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逐渐提高，经济发展代价将超越倒“U”形发展曲线的最高点逐渐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水资源保障能力、建设用地保障能力及能源、生态保障能力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目前，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在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这个速度相对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已经处于高速发展水平，所以未来应在稳定当前1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尽快摆脱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工业化水平滞后的局面，减小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及空间建设的阻碍作用，促进城市化发展水平及速度的协调。另外，由于各个地区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各地区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个地区实际的发展目标，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率及有关城镇发展指标方面进行攀比。



（二）遵循循序渐进的土地城市化原则，走“适速城市化”道路

2010年全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31.6m²，这与城市规划法中规定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100~120m²）相比，土地城市化呈现冒进增长态势。未来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土地城市化原则，走“适速城市化”道路。通过对省域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协调性分析，可将省域城市化划分为土地城市化超前型、土地城市化过度超前型及基本协调型三种类型，针对省域土地城市化发展类型的划分，本文提出以下发展对策（表15）。

表15　未来分省土地城市化推进对策分析（2010年）

区　域	实际城市化水平（%）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m²）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L_{(t)}$ **	城市化发展类型	未来土地城市化发展对策
北　京	84.9	113.3	96.2	0.11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天　津	77.2	102.9	79.4	0.028	基本协调型	顺应土地城市化发展速度
河　北	41.9	130.4	54.6	0.23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山　西	45.1	118.2	53.3	0.154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内蒙古	51.7	209.1	100	0.48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辽　宁	60.1	123.0	73.9	0.18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吉　林	53.2	139.1	74.0	0.281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黑龙江	55.4	139.3	77.2	0.282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上　海	88.6	194.0	100	0.114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江　苏	54.3	145.7	79.1	0.314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浙　江	57.6	152.3	87.7	0.34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安　徽	40.5	161.7	65.5	0.382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福　建	49.9	116.7	58.2	0.143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江　西	41.4	138.4	57.3	0.27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山　东	47.6	157.9	75.2	0.36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河　南	36.0	140.1	50.5	0.28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湖　北	45.2	146.7	66.3	0.318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湖　南	42.2	135.3	57.0	0.260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广　东	63.4	120.0	76.1	0.16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广　西	38.2	118.8	45.3	0.157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海　南	48.0	164.6	79.0	0.392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续表

区　域	实际城市化水平(%)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m^2)	基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人口城市化水平*(%)	$L_{(t)}$ **	城市化发展类型	未来土地城市化发展对策
重　庆	50.0	105.3	52.6	0.049	基本协调型	顺应土地城市化发展速度
四　川	37.4	123.6	46.2	0.190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贵　州	29.1	150.4	43.8	0.336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云　南	33.0	124.9	41.2	0.199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西　藏	22.6	352.3	79.8	0.717	土地城市化水平过度超前型	严格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陕　西	42.1	135.5	57.0	0.261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甘　肃	32.2	155.5	50.0	0.356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青　海	40.9	166.5	68.2	0.400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宁　夏	45.0	183.8	82.7	0.456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新　疆	39.6	177.9	70.5	0.438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前型	控制土地城市化水平

注：* 为按照城乡规划标准，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00m^2$ 计算得到的当年城镇建设用地可承载的城市化水平。** $L_{(t)}$ 为土地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系数。

1.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基本协调型区域，采取顺应土地城市化的发展对策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型区域主要包括重庆和天津两个地区，2010年人口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105m^2$、$103m^2$，由于以上区域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基本符合城乡规划法对人均城市占有面积的规定，所以未来应顺应当前土地城市化发展趋势，促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间的协调发展。

2. 土地城市化超前型区域，采取近期控制建设用地面积的对策，直至土地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相协调

土地城市化超前型区域主要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安徽、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山东、河南、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28个省份，这些区域的土地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系数介于0.10～0.50，土地城市化相对于人口城市化有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趋势，未来应在稳定当前人口城市化的基础上，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实施紧凑城市发展战略，从城市化外延型扩展转变为内涵式提升，直至土地城市化水平与人



口城市化水平相协调。

3. 土地城市化过度超前型区域，采取严格控制土地城市化发展的对策，直至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相协调

2010年中国土地城市化水平过度超前型区域仅有西藏自治区，土地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协调系数 $L_{(t)}$ 为0.717，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352.3m²，超出中国城市规划法规定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230m²/人。针对西藏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严重超前的现状，本文提出未来应严格控制西藏自治区建设用地使用的对策，直至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相协调。

（三）以城市群引领中国城市化发展，走“集群城市化”道路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城市化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未来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中小城市构建城市网络体系，逐渐形成辐射作用较大的城市群，协调共建大中小城市。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主要包括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等。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联动发展中部及东北部城市群，主要包括哈大长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在西部地区主要构建天山北坡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等（图7）。

未来应按照以人为本、生态环保、突出特色、保护文化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健全城市群建设标准，强化城市群规划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合理确定城市群开发边界，提高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人口密度，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防止大城市无序扩张，减少城市问题。有重点地发展小



图 7　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方创琳、宋吉陶、蔺雪芹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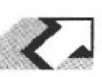
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四）适当降低现行城镇人均综合用地标准，走“紧凑城市化”道路

合理的城市节点配置可以达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节约城市运行成本，提高城市空间运行效率的目的。鉴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尤其是用地资源稀缺，本文提出适当降低现行城市建设用地标准，走“紧凑城市化”道路模式。

1. 降低现行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 110～130m^2，但这不应该作为土地资源较为紧缺的中国城市化用地标准。在人口较为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适当降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参考韩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



区的建设用地标准，可以将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降低为 60～100m²。

2.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区域空间紧凑度

城市空间节点配置及城市空间网络体系是区域内城市节点在空间上的组合形式，合理的城市节点配置和空间结构表现为合理且具有等级化的城镇空间体系，而不是均质空间。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可以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效率，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经济发展代价，促进城市社会发展水平，进而提高区域城市整体空间运行效率。反映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方面，对于那些发育程度较低或者城市空间配置欠佳的区域，可以通过相应路径，加快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力，提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通达能力，借以改变城市空间节点联动方向和强度，达到优化城市空间配置、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推动紧凑城市建设的目的。

3. 构建城市产业轴带，提高区域经济紧凑度

首先，通过构建城市产业发展轴带，可以推动城市产业链合路径，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主要产业集群，构建城市产业发展高地，从而实现产业经济效率、经济规模的双向提升；其次，通过构建产业轴带可以促进城市节点间的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要素流动性，促使这些行业在不同产业节点之间实现分工与合作，提高区域运行效率；最后，通过区域城市节点间产业带的构建，各种要素流日益频繁和密切，通过产业链合路径升级实现区域经济重组，促进城市间的产业联动强度，实现各个城市节点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紧凑度。

4.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提高区域交通紧凑度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空间紧凑度提高的重要载体，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城市交通便利程度，优化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城市交通网络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形态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城市交通组织既可以引导城市空间扩展，导致城市空间紧凑度降低，也可以通过较为合理的城市交通体系促进区域空间紧凑度的提高。

（五）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公平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的动态不平衡性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发展水平均有较

大的差异，进而引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本文提出“公平化”城市化发展模式，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公平性、社会服务设施公平性、基础设施公平性及城乡一体化程度。

1. 加强社会保障水平公平性，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了解决社会贫困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均有较大作用。然而，社会保障制度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解决的一大难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差，许多区域难以支付居民的各类社会保险。面对这样的现实，目前应尽快侧重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的完善，进而带动社会事业的发展。另外，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尽快促进社会保障“国有化”、“政府化”向“社会化”转变，把原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由国家投入转变为由社会投入。

2.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公平性，提高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社会基础设施是保障社会经济活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实现区域资源共享的主要载体，主要包括交通设施、能源、水利、邮政等通信设施等。长期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教育科研设施、卫生服务设施等都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城市是以上基础设施的主要承载体，但是农民却享受不到或仅仅享受到部分基础设施，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除了与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外，国家在农村建设方面投入相对城市较少，这样必然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难以用计量模型定义，但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是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未来应着重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公平性。

3.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通过以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1980 ~2010 年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省域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城市化发展质量较低的重要因素。针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本研究提出三条提高城乡一体化建设路径。①城镇化推动路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因此未来应尽快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针对区域承载能力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使分散的农村居民逐渐集中到城市中，扩大城镇规模，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城市，享受城市生活；②产业化推动路径。积极发展农村产业，努力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化路径，使农民有更多的收入渠道；③制度创新路径。制度是影响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解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种种障碍，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六）降低资源环境代价，走“生态城市化”道路

1. 降低水资源消耗代价，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

由于当前中国城市化速度发展较快导致许多地区城市化发展规模超过或者接近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水资源保障水平已经不能适应区域城市化继续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得水资源系统阻碍或者延缓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化转型发展的思路。①加强节约水资源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形成节约用水的好风气，良好的用水意识和节水行动是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水资源保障程度，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②建立健全水资源法规和对策，完善城市节水法规，加大对水资源浪费等的处罚力度，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监督的水资源使用对策；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效益低下的产品，推进能耗少、水耗低、环境污染小的产业发展；④提高生活用水及生产用水的利用率，推广中水回用技术；⑤合理调整水资源价格，逐渐将水资源市场化、商品化，分时、分类、分质定价，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 降低土地资源消耗代价，提高土地资源保障能力

土地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以上研究发现部分地区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过高，土地浪费较为严重，因此，要准确把握并处理好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后者才是问题的主体和核心。本研究提出以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措施：①构建“集中城市化”发展战略，本着城乡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的原则，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尽快研究制定土地集约节约用地技术标准，推动农村村屯合并，加快中心村开发建设，释放农村浪费较为严重的土地；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合理适度开发土地资源为原

则，优化土地资源利用，促进建设用地在区域内部的合理分布，将规模控制和土地利用类型控制落实到区县及镇（乡）级的土地利用规划中；③健全土地管理制度，合理安排土地建设规划与用地审批之间的关系。在土地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从调控者变成牟利者，不但扭曲了市场，也扭曲了城市化的进程，健全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对于土地用途和利用，甚至其他水利、交通、林业、农业等部门的土地利用均有重要意义。

3. 降低能源消耗代价，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中国人均能耗较低，单位产值的能耗较高，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次商品能源的人均消费量为1050kg标准煤，这个水平相当于美国的9%，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16%，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能源保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国人均能源拥有量较少，而且能源结构落后、区域空间分布不均是制约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瓶颈。在未来城市化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本文提出如下能源保障对策：①逐渐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力，因地制宜规划各类产业发展，使高“能”地区有所用，低“能”地区也能保证自身城市化发展所需的能源供给；②加快区域能源通道建设，逐步完善铁路、海运以及管道的建设，实现国内区域能源供给平衡；③提高国民对能源节约及环保建设的意识，加快建设能源合理利用信息平台，政府机关要带头付诸行动，引领做好环保工作，提高国民的环保节能意识。

4. 降低环境破坏代价，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加大，因此，着眼于战略眼光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发展中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由于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的污染，所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途径。未来应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仅对能源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根本的作用，对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环境污染程度等也有直接影响。



参考文献

周一星：《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城镇化水平修补的建议》，《统计研究》2002年第4期。

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调控机理与提升对策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论文，2011。

刘海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用地保障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

耿海青：《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分析及未来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期。

方创琳、宋吉陶、蔺雪芹：《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Wang Deli　Liang Haogua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confronted by "speed type" to "quantity ty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UDQ)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We must tak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go for a healthy urbanization. Whilst guaranteeing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ow to improve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to secure the consistent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s a major scientific proposition urgent to be studi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blems; Improvement path; China

B.3

中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沈正平　马晓冬**

摘　要：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省域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和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关键词：

基本现代化　建设水平　综合评价　省域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多层面、全方位、动态的变迁过程，它以现代工业、信息与技术革命和社会进步为动力，以知识、人才、制度、体制等创新为保障，以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不断提高为标志，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及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革，从而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变。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就首次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对基本实现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且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东部沿海许多省份都曾提出在全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01）子课题《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阶段性研究成果。子课题负责人：沈正平；成员：马晓冬、欧向军、仇方道、孟召宜、范文国等。本文由沈正平、马晓冬修改定稿。

** 沈正平，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淮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布局与区域发展、城乡与区域规划；马晓冬，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城乡规划、GIS空间分析。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例如，2003 年 7 月，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确立：21 世纪初叶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即 2010 年左右在全省总体上实现全面小康、2020 年左右总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通过国际现代化实践与经验的比较分析，参照中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我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科学合理地选择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对于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目前，国内外有影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主要有：1960 年在日本箱根召开的“国际现代化会议”提出的衡量现代化进程的 8 项标准；1966 年布莱克提出的有关现代化的 10 项标准；20 世纪 70 年代英克尔斯提出的度量现代化的 10 项标准；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由三个指标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1989 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课题组建立的由四个部分 16 个指标组成的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中提出的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评价指标①；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2001》中设计出四层叠加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等等。同时，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以及深圳、苏州、昆山等市（县）也制定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本文以我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省域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估，从中着重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一　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的指标与方法

（一）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全面反映基本现代化的内涵，又要简明实用，便于对其建设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和监测②。本文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系

---

① 何传启：《现代化科学：国家发达的科学原理》，科学出版社，2010。

② 宋林飞：《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与评估》，《南京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统性、客观性、表征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并体现基本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等内在要求，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五个方面，构建由5类29项指标组成的省域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代码	单位	说明
经济现代化A	人均GDP	A1	元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A2	%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A3	%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A4	%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A5	%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A6	件	
社会现代化B	城市化水平	B1	%	
	基尼系数	B2		逆向指标
	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人口数量	B3	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B4	%	逆向指标
	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	B5	%	
民生现代化C	人均预期寿命	C1	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2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C3	元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C4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额	C5	元	
	互联网普及率	C6	%	
	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	C7	人	
	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	C8	标台	
生态现代化D	单位GDP能耗	D1	吨标准煤/万元	逆向指标
	单位GDP COD排放强度	D2	千克/万元	逆向指标
	单位GDP SO_2 排放强度	D3	千克/万元	逆向指标
	单位GDP氨氮排放强度	D4	千克/万元	逆向指标
	森林覆盖率	D5	%	
	城镇绿化覆盖率	D6	%	
文化现代化E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E1	%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	E2	%	
	农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E3	%	
	每百万人文化场馆数量	E4	个	



（1）经济现代化类指标有6项，涵盖了经济水平（人均GDP）、经济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经济增长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创新能力（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方面。

（2）社会现代化类指标有5项，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城市化水平）、社会发展均衡性（基尼系数）、社会服务水平（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口素质（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人口数量）等方面。

（3）民生现代化类指标有8项，包含了居民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生活保障（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额）、居民生活服务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等方面。

（4）生态现代化类指标有6项，涉及资源利用效率（单位GDP能耗）、环境保护水平（单位GDP COD排放强度、单位GDP SO_2 排放强度、单位GDP氨氮排放强度）、生态建设水平（森林覆盖率、城镇绿化覆盖率）等方面。

（5）文化现代化类指标有4项，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农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文化设施供给状况（每百万人文化场馆数量）等方面。

（二）评价方法

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分别对各类评价指标进行数据降维处理，提取概括性因子（主成分），以因子的信息载荷为权重对回归所得的各因子得分值进行加权求和，获得各省域的分类指标评价得分。对逆向指标进行取倒数的正向化处理。采用同样的技术路线对所有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各评价单元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综合得分①。评价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② 以及各省份的2011年统计年鉴，数据基准年份为2010年，其中城市化水平数据为2009年。港澳台因缺乏数据不作评价。

①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二　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分类评价

（一）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

经济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 1），我国省域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地域差异明显，得分值最高的是北京市，最低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且差距较大；高于平均值的省份只有 6 个，仅占 19%，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低于均值的省份则有 25 个，占 81%。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的三大核心区——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成为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区域，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经济中心，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北京的经济水平、创新能力最高，上海的经济结构水平、经济外向度和经济增长动力具有明显优势；江苏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五，稍好于浙江，但与排在前四位的省份差距明显，特别表现在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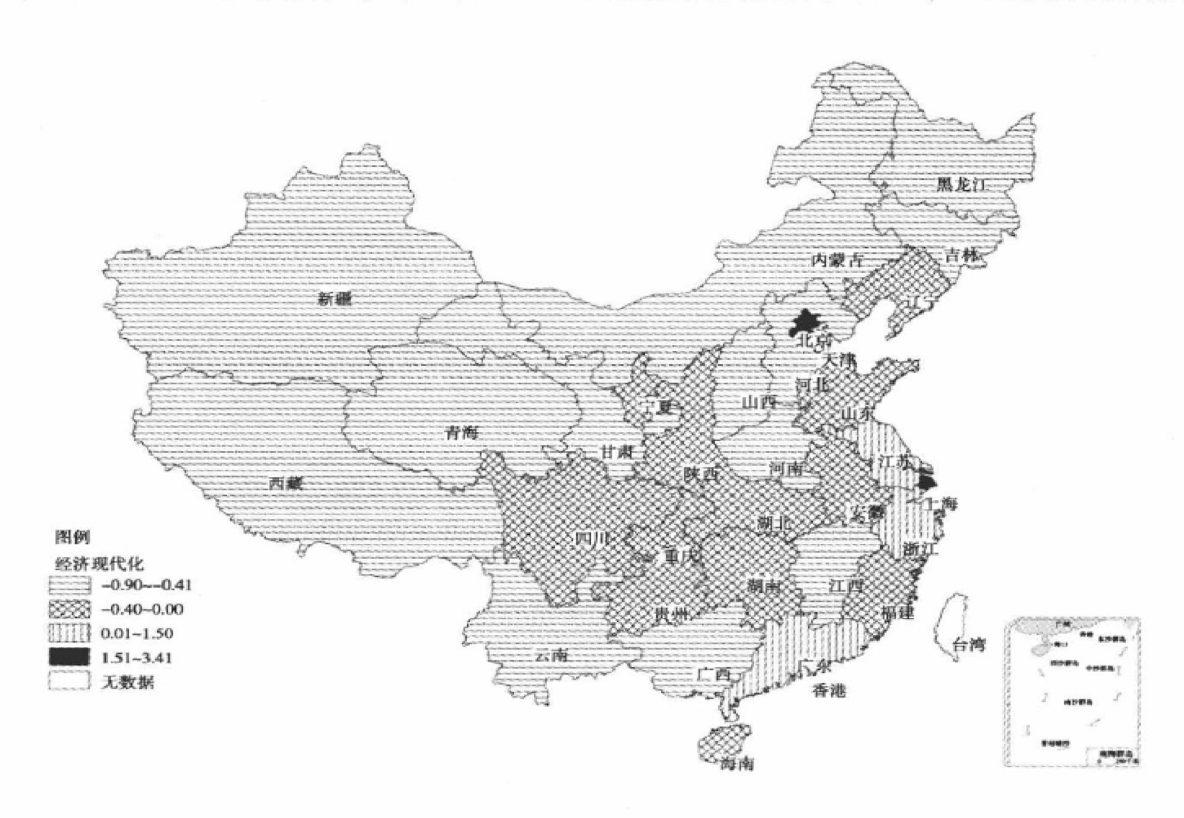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省域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分异



业占 GDP 比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上。此外，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福建和海南四省，虽然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稍低于全国平均值，但仍属于相对较好类型，该类型还包括沿长江的重庆、四川、湖北、湖南和安徽等省份；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落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如青海、西藏、广西、云南、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省份，但东部沿海的河北省、中部地区的河南和江西两省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也明显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和创新能力（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方面。

（二）社会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

社会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 2），我国省域社会现代化建设总体水平不高，且相互差距较大，但比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差距小。社会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最低的是云南省，综合得分高于平均值的省份有 8 个，占 26%，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直辖市由于很高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第一方阵。江苏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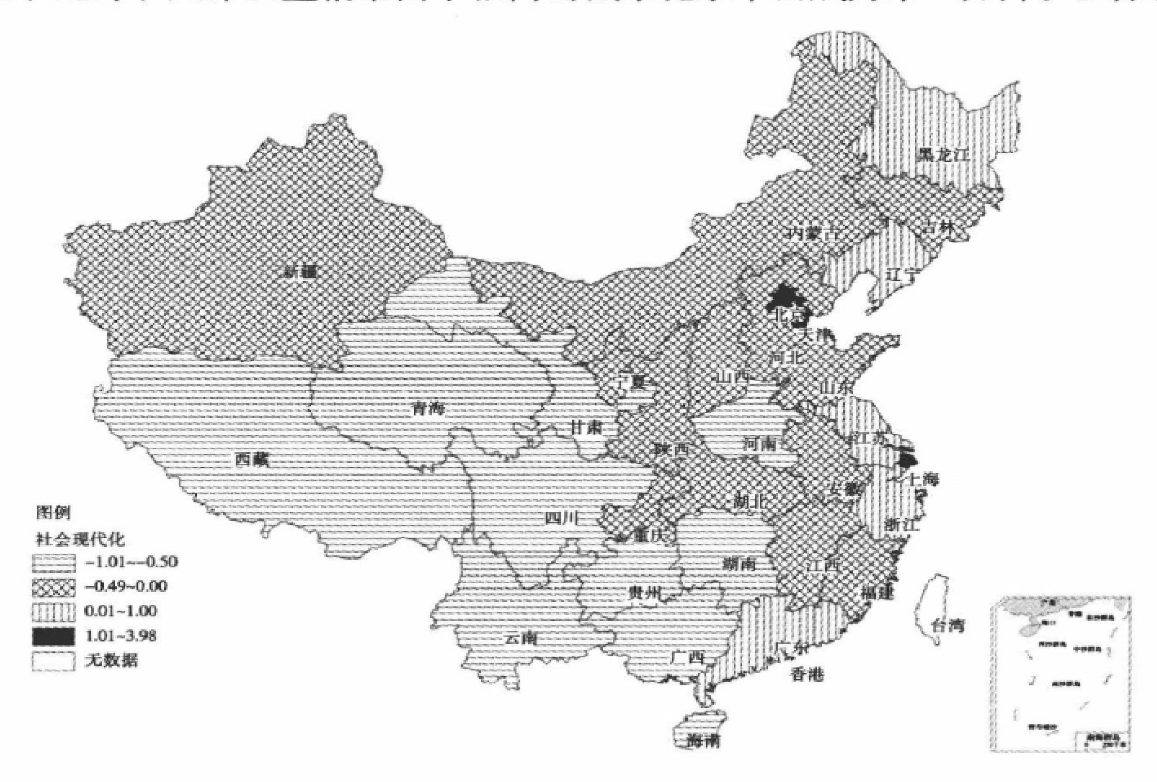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省域社会现代化建设水平分异



现代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不仅与三个直辖市有较大差距，而且也低于同在第二方阵的浙江、广东、辽宁和黑龙江等省；但其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说明社会基础服务较完善。社会现代化建设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共有 23 个，占 74%，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沿海的河北、山东、福建、海南等省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表现在人口素质和社会服务方面。

（三）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

民生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根本。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 3），我国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 10 个省份，占 32%，其中 7 个省份分布于东部地区，另外包括东北的辽宁、吉林以及西北的新疆。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民生现代化为第一方阵，特别是北京在居民生活服务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方面遥遥领先；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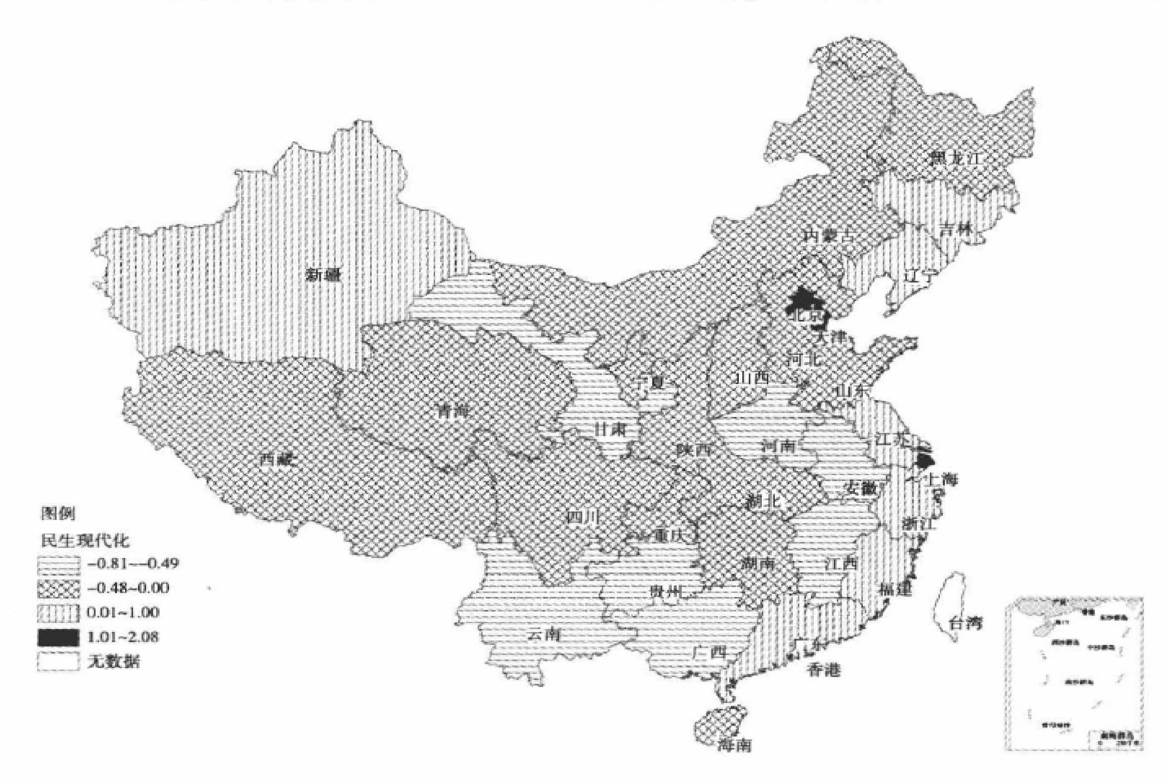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省域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分异



筹款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江苏的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六，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上相对较高，但在居民生活服务水平方面与第一方阵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特别体现在互联网普及率、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等指标上。新疆由于在居民生活保障、居民生活服务等方面相对较好，而成为中西部地区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相反，地处东部沿海的山东和河北两省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却相对较低。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落后的省份有 7 个，主要为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和江西，西南的云南、广西和贵州，以及西北的甘肃，因为其居民收入和生活服务水平都相对较低。

（四）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

生态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 4），我国省域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高于平均值的依次为北京、西藏、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天津、浙江、福建和海南 10 省份，占 32%，除西藏外，均位于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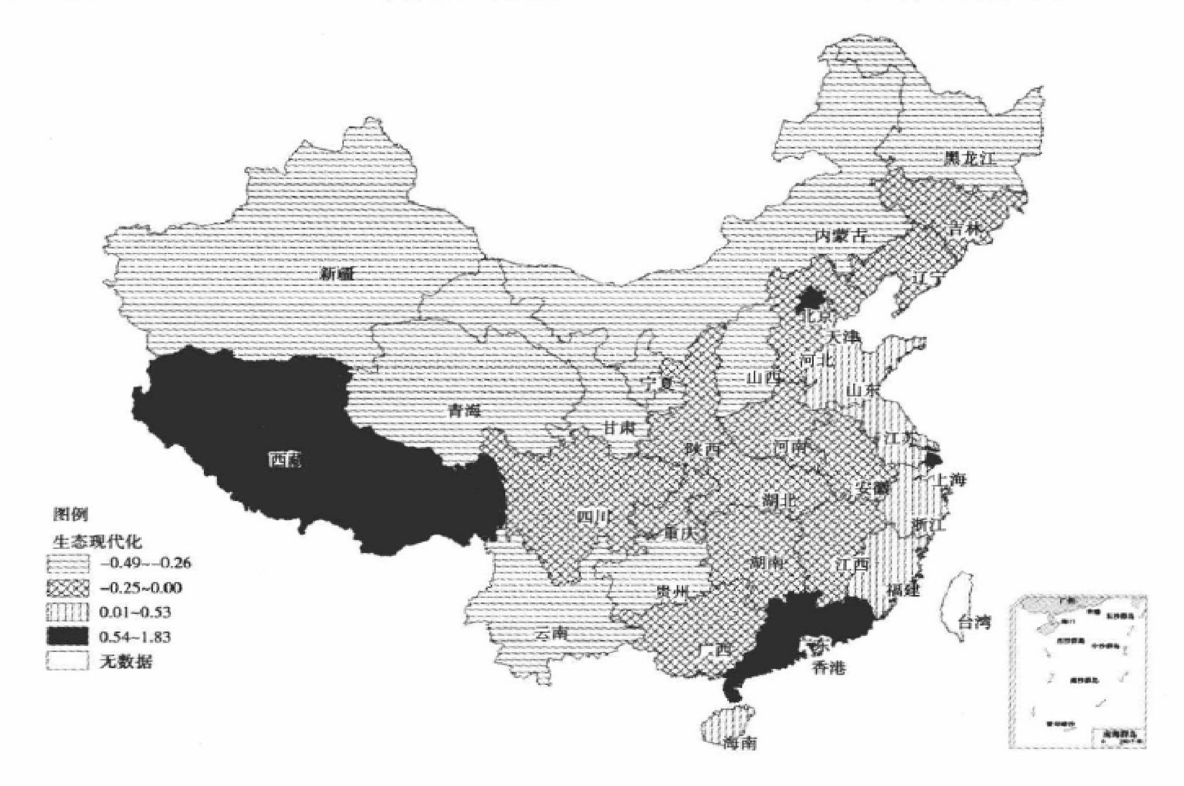


图 4　我国省域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分异

部沿海。北京由于其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而位居第一，西藏因其主要污染物排放少而名列第二。江苏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名列全国第五位，在单位 GDP 能耗、城镇绿化覆盖率指标上具有较明显优势，但其森林覆盖率偏低。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共有 21 个，占 68%，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河北因其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而成为东部沿海唯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落后的省份有 9 个，主要分布在“三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宁夏最低，主要因为其能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水平（单位 GDP SO_2 排放强度、单位 GDP 氨氮排放强度、单位 GDP COD 排放强度）普遍偏低。

（五）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价

文化现代化体现了区域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 5），我国各省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差异明显，得分最高的是北京，最低的是西藏，两者差距悬殊。高于平均值的省份共有 15 个，占 48%，其中前 5 位依次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低于均值的省份有 16 个，占 52%。从空间分布上看，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区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尤其是北京文化产业占比最高，城乡文化消费能力强，其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江苏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二，稍高于上海，远高于浙江、广东、天津，其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领先于其他省份；但与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居于首位的北京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特别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差距较大，得分仅为北京的 26.8%。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有 9 个，占 29%，主要包括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福建，东北的吉林，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安徽，西部的陕西。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落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如青海、西藏、广西、云南、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但东部沿海的河北、海南和中部的河南、江西四省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值，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农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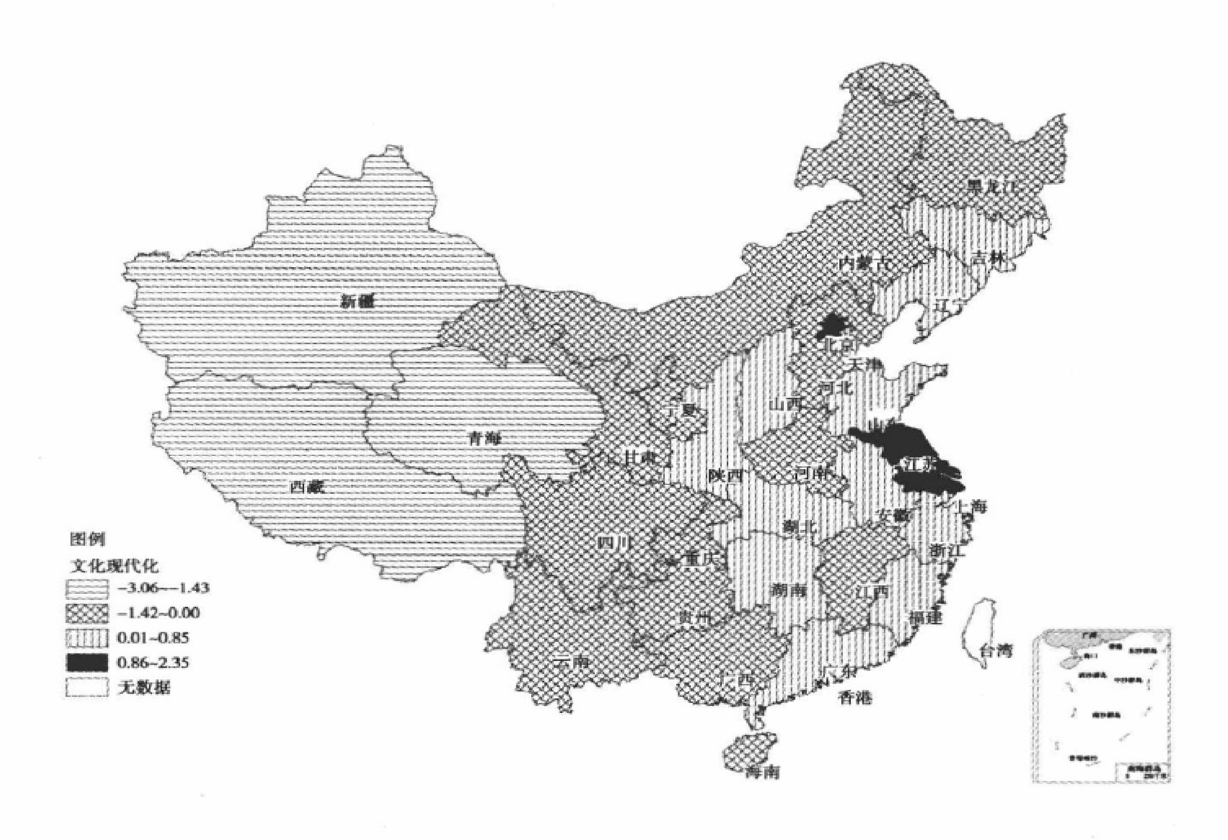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省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分异

三　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的综合评价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份的5类29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从评价得分看（参见图6），我国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总体上不高，且两极分化明显。只有9个省份的现代化建设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仅占29%；而22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值，占71%。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综合得分为排名第三位的广东省的两倍以上；而排名最后的西藏、青海两个省份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又与其他省份差距悬殊。从空间分布来看，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梯度性。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区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份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低。

基于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评价得分，采用断裂点法将31个省份划分为五种类型：高水平区域、较高水平区域、中水平区域、较低水平区域、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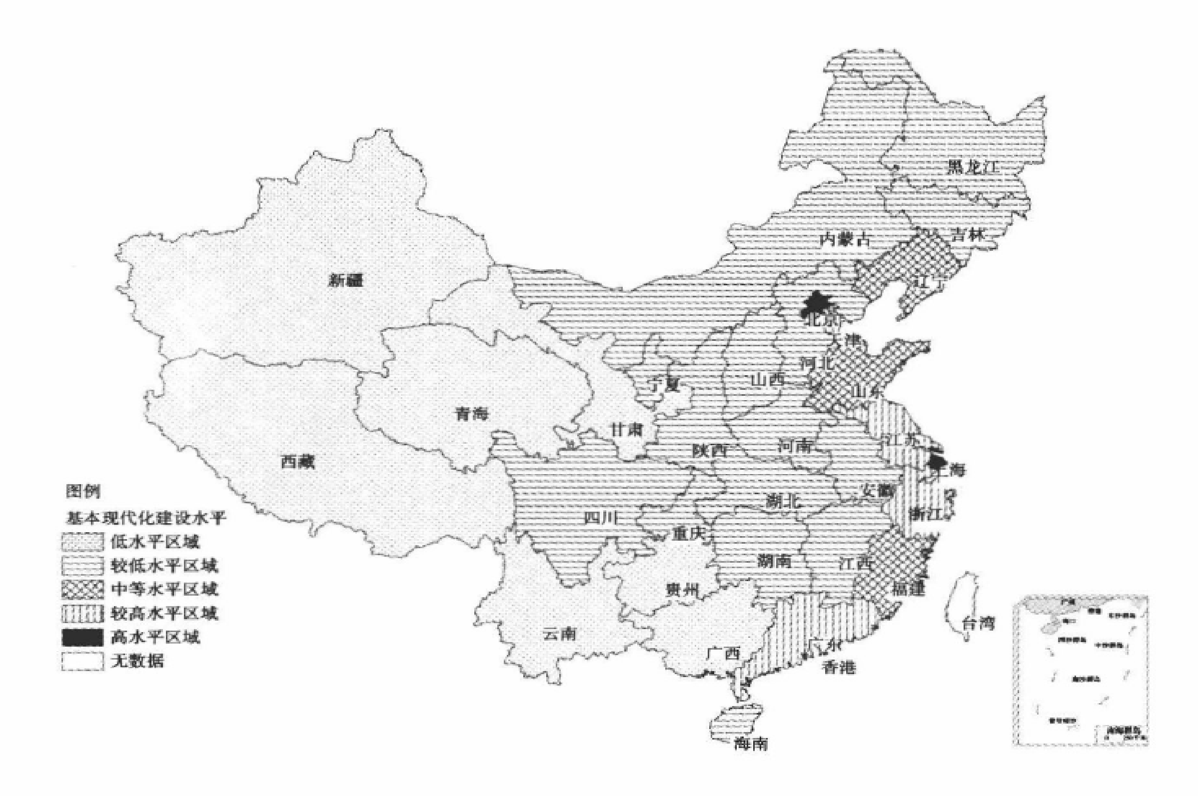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类型区划

水平区域。五种类型区域的省份数量依次为2、4、3、15和7，其比例分布近似金字塔形。

（一）高水平区域

包括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城市，也是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区域。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上均处在第一方阵，特别是北京在各类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评价中均居首位，而上海除了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位居第三外，其余各类都名列第二。该类区域是我国城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2020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较高水平区域

包括广东、浙江、天津、江苏三省一市，均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多处于第二方阵。其中，天津在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方面全



国领先；江苏的文化现代化名列前茅；广东的生态现代化进入第一方阵。该类区域是我国省、自治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2020 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中水平区域

包括山东、福建和辽宁三省，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处于中等位置，但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山东和福建在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上高于全国平均值；福建和辽宁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辽宁社会现代化建设水平处在全国第二方阵。该类区域为我国省、自治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梯队，创造条件争取 2030 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四）较低水平区域

包括河北、海南、吉林、黑龙江、湖北、安徽、江西、湖南、河南、重庆、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四川 15 个省份，除河北和海南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外，其他省份均处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总体较低。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相对较好；中部地区省份在文化现代化上特色明显。该类区域为我国省、自治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梯队，争取 2040 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五）低水平区域

包括广西、云南、新疆、贵州、甘肃、青海、西藏 7 个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低。除新疆在民生现代化、西藏在生态现代化方面有一定优势和特色外，其他省份各类现代化建设水平都很低。该类区域争取在 2050 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

表 2　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类型区划及实现时间设想

实现类型	高水平区域	东部:北京、上海
近期实现型	较高水平区域	东部:广东、浙江、天津、江苏
中期实现型	中水平区域	东部:山东、福建;东北:辽宁
中远期实现型	较低水平区域	东部:河北、海南;东北:吉林、黑龙江;中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河南;西部:重庆、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四川
远期实现型	低水平区域	西部:广西、云南、新疆、贵州、甘肃、青海、西藏

四　省域基本现代化评价结论

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省域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①大多数省份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不高，不足半数省份（15个）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不足1/3省份在其余四类现代化建设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②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梯度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区是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份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低，通过进一步细分可归纳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五种类型区域。③各类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体现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民生现代化方面，为这些省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④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之间差异也十分明显，表现为三个层次：北京、上海两直辖市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广东、浙江、天津、江苏三省一市次之；山东、福建、辽宁三省相对最低。江苏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六，但与排名第四、五位的浙江、天津相比差距甚小，属于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区域。江苏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全国领先，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民生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均处在第二方阵，但经济现代化、民生现代化建设水平排名相对靠后，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居民生活服务水平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提升。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Level of Provincial Basic Modernization

Shen Zhengping　Ma Xiaodong

Abstract: China's 31 provinces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or the research unit, by building the basic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analyze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ocial moderniz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and provincial basic modernization building level .

Key Words: Basic modernization; Building leve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Provincial basic modernization

环渤海区域



Around the Bohai Sea Region

B.4
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分析与展望

李彦军　王婷婷*

摘　要：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增长。首都经济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的建设逐步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在对河北、山东、北京、天津两省两市2012年经济发展运行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对2013年发展态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北部沿海经济区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发展　经济展望

2012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在全国经济总体

---

* 李彦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王婷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



平稳运行，增速放缓的态势下，北部沿海经济区，即河北省和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两省两市也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积极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十二五”规划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2012 年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一）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增长

2012 年前三季度北部沿海经济区国内生产总值 35348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7%。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前三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2678.1 亿元、9188.45 亿元、19581.9 亿元、36235.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7.5%、13.9%、9.3%、9.7%。除北京市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和全国持平外，其他各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天津市实现两位数增长。

北京市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经济实力依然强劲。天津市直接利用外资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吸引外商在全市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大幅提升，三资企业发展平稳，成为推动天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山东近几年经济态势发展迅猛，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GDP 在全国排名前列。在北部沿海经济区中河北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也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北部沿海经济区各省市都重视和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前三季度完成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 9839.2 亿元、4114.42 亿元、13934.6 亿元和 6431.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7.7%、12.4%、9.3% 和 8.1%，第三产业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77.6%、44.8%、38.5% 和 32.8%。

（二）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投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2012 年北部沿海经济区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上年相比有所

回落，但仍呈现高速增长之势，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1.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2012 年 1 ~ 11 月，北京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890. 1 亿元，同比增长 9. 7% ，增幅比 1 ~ 10 月提高 0. 7 个百分点，比一至三季度提高 1. 4 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1535. 3 亿元，增长 28. 3% ；完成民间投资 1893 亿元，增长 4. 3% 。天津市前 10 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7558. 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 2% 。前 11 个月，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 17857. 0 亿元，同比增长 21. 2% 。山东省 1 ~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 27334. 5 亿元，增长 20. 4% ，增幅比 1 ~ 10 月提高 0. 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小幅回升。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4251. 4 亿元，增长 15. 0% ，增幅比 1 ~ 10 月提高 1. 4 个百分点，连续 5 个月回升。

2. 投资结构改善

北京市 2012 年前 11 个月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139. 7 亿元，增长 2. 5 倍；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620. 1 亿元，下降 7. 3% ，其中工业投资 603. 2 亿元，下降 8. 7% ；第三产业（含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5130. 3 亿元，增长 10. 1% 。天津市前 10 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7. 4%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3. 1%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23. 2%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3. 2% 。2012 年前 11 个月，河北省投资结构调整改善，三次产业投资全面增长，第一、二、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45. 3% 、26. 8% 和 14. 7% 。工业投资增长 27. 1% ，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 9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33. 9% 和 23. 2%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5332. 9 亿元，增长 36. 7% ；占工业投资的 61. 7% ，同比提高 4. 3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较快增长，完成投资增长 26. 6%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76. 7% ，同比提高 3. 2 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快速增长，亿元以上在建项目 5229 个，同比增加 910 个；完成投资 9934. 9 亿元，增长 39. 9% 。

2012 年 1 ~ 11 月，山东省服务业投资加速。完成投资 13587. 1 亿元，增长 19. 4% ，增幅比 1 ~ 10 月提高 1. 7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 2. 3∶48. 0∶49. 7。技改投资增势良好。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6595. 6 亿元，增长 24. 4% ，比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提高 4. 0 个百分点，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



24.1%。民间投资保持较强支撑。完成投资21885.8亿元，增长22.1%，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80.1%，贡献率达85.5%。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刚性需求稳中有升

2012年1~11月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前11个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6944.5亿元、3253.5亿元、6365.2亿元和17278.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6%、15.4%、15.0%和15.0%。

1~11月，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吃类、穿类、用类和烧类商品分别增长7.9%、7.8%、14.7%和5.1%。11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84.8亿元，增长11.5%，增幅高于10月0.4个百分点。

天津市1~10月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17114.33亿元，同比增长19.4%。其中批发业销售额17099.12亿元，增长20.5%；零售业零售额3324.92亿元，增长15.1%。

河北省前11个月，全省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2250.6亿元，增长18.1%，比前10个月提高0.1个百分点。

1~11月，山东省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9107.0亿元，增长18.0%，增幅比1~10月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业零售额8393.0亿元，增长17.9%；住宿餐饮业零售额714.0亿元，增长19.6%。从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看，生活必需品保持较快增势，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19.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19.8%，日用品类增长19.7%。家装类商品持续旺销，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36.4%，家具类增长25.3%。汽车销售小幅回升，汽车类增长9.7%，比1~10月提高0.3个百分点。

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县以下市场零售额增长有所加快，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长快于批发零售贸易业，私营个体经济及其他经济零售额增长较快。

（四）对外贸易增速回落，外需持续低迷

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前11个月进出口贸易总额虽然有着较快增长，但增速在持续下滑。

北京市前三季度实现进出口总值3041.6亿美元，同比增长6.6%，比上半年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值2601.7亿美元，增长7.2%，比上半年回落6.6个百分点；出口总值439.9亿美元，增长3.2%，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天津市2012年前10个月完成进出口总值2677.52亿美元。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1707.83亿美元，累计增长5.6%，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口岸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外贸进出口总额969.69亿美元，累计增长15.8%，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10.5个百分点。其中进口562.45亿美元，累计增长18.5%；出口407.24亿美元，累计增长12.2%。

河北省前三个季度进出口总额完成38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7%，其中出口222.9亿美元，增长6.1%；进口157.1亿美元，下降14.8%。

1~11月，山东省进出口总额2214.7亿美元，增长3.3%，比1~10月增幅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2.2%，比1~10月增幅提高0.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4.7%，比1~10月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

（五）财政收入增速提高，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北京市1~11月，全市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92.9亿元，同比增长10.4%，增幅比1~10月提高0.7个百分点。从主要税种看，增值税增长21.5%，营业税增长8.9%，企业所得税增长10.1%，个人所得税增长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328元，增长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7844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

天津市前11个月共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477.78亿元，累计增长23.5%。从四大税种看，增值税增长6.6%、营业税增长13.6%、企业所得税增长5.8%、个人所得税减少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5.65元，增长10.2%。

河北省前三个季度全部财政收入累计完成2699.8亿元，同比增长13.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07.6元，增长12.7%，增幅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431元，增长16.4%，增幅高于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7个百分点。

山东省1~11月，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44.2亿元，增长18.3%，比1~10月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2757.8亿元，增长13.9%，比1~10月增幅提高1.7个百分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3.7%，比重比1~10月提高0.7个百分点。从四大税种看，增值税增长3.0%，与1~10月增幅持平；营业税增长14.7%，企业所得税增长10.3%，分别比1~10月增幅提高1.6个和0.2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下降3.1%，降幅比1~10月收窄1.7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902.4亿元，增长22.0%，增幅比1~10月回落0.8个百分点。重点支出保障有力。教育支出增长29.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4.2%，农林水事务增长23.9%，交通运输支出增长23.6%。

二　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入新阶段

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进入轨道，并且不断深化。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纳入“十二五”规划，成为“十二五”期间国家实施区域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首都经济圈版图进一步扩大

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2012年首都经济圈规划版图进一步扩大，包括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保定及北京到石家庄沿线各其他县市等都在争取纳入首都经济圈范围之内。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版图扩大已经列入发改委2012年区域规划审批计划，对于该规划发改委已于2011年开始着手启动相关工作，2012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发改委2012年区域规划审批计划中，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居首。

（二）河北省规划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河北省于2012年1月将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写入“十二五”规划纲

要，提出“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借势北京、服务首都，在这两个基础上发展河北”。上述战略涉及河北省环绕首都的14个紧挨北京的县市，这些地方被分为京东、京南和京北三大新区，要进行“4区6基地”建设。所谓“4区6基地”，指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科技成果孵化、新兴产业示范、现代物流4类园区，发展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6大基地。

（三）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逐步深化

2012年3月，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在北京发布，重点围绕“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将要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打造首都经济圈、北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河北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国外首都圈的经验启示等。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现实基础，区域一体化正蓄势待发。

（四）山东半岛致力打造“蓝黄”两色经济区

2012年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两周年、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进行了中期评估，山东省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全国海洋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规划建设青岛蓝色硅谷海洋科技自主创新示范区”。蓝色硅谷建设对进一步提升青岛城市竞争力、提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水平、引领全国海洋科技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确定在全国率先对黄三角建设开展中期评估试点，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期评估创造经验。2012年10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工作会议在济南举行，黄三角规划中期评估工作由此启动。

然而，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北部沿海四省市区域发展仍存在一定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亟待解决。二是缺乏有竞争力和辐射力的次级中心城市，城市体系不完善。三是产业关联弱、融合度低，产业链断裂。四是市场配置作用弱，



行政影响较强。五是区域合作关系复杂，缺乏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六是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重。国家“十二五”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河北沿海地区规划的密集出台实施，是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差别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三　北部沿海经济区 2013 年经济运行态势展望

2012 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总体上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发展，缩小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区域的差距。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在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基本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目标的促使下，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经济运行态势在 2013 年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北部沿海四省市将在 2013 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会略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十八大召开后，北部沿海四省市进一步加快发展脚步，在投资项目建设周期叠加利好环境的推动下，投资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但要警惕投资过热所带来的负效应。随着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的发展，预计与买房活动密切相关的家具、家电、装修材料销售活跃的情况将继续保持，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形成积极推动。综合来看，未来北部沿海经济区消费增长将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

（二）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

随着首都经济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东半岛蓝黄经济区以及京津冀

区域一体化等区域合作的发展，北部沿海经济区四省市的区域经济合作在2013年将会实现以下转变：①由外延发展向内涵转变，提升都市圈的软实力日益重要；②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趋势；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与途径；④区域发展酝酿整体突破。

（三）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对外经济增速仍将减缓

受欧洲经济平稳、美国温和复苏等因素影响，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加快至2.5%，全球经济复苏力度有所增强。世界经济虽然在逐步复苏，但是速度缓慢，外部不确定性依然较多，发展环境会更为复杂，内需尤其是消费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包括2013年在内的未来若干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北部沿海经济区投资将在外需向内需转变、工业化驱动向城镇化驱动转变的大背景中求得新的增长动力。

河北、山东、北京、天津四省市在充分评估和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将继续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宏观调控，积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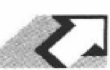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周立群：《创新、整合与协调——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前沿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魏后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发展国内区域合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03年第1期。

栾贵勤、吕博：《环首都经济圈建设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3期。

余静文、王春超：《城市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Coastal Economic Zone

Li Yanjun　Wang Tingting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2012, facing complex economic situation, the economy of northern coastal economic area maintained a rapid and steady growth. With the building deepened progressively of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lue Shandong Peninsula Economic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as moving into a new stage. In this paper, summariz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ear of 2012 and looking ahead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2013 of Hebei province, Shandong province, Beijing and Tianjin.

Key Words: Northern coastal economic are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prospect

𝔹.5
北京市空间紧凑度测度及分异特征*

王德利**

摘　要：

本文在界定"紧凑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城市紧凑度空间演变规律，构建城市紧凑度三维目标空间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对北京市规模紧凑度、功能紧凑度、形态紧凑度及空间综合紧凑度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空间利用紧凑度与地形分布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空间紧凑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呈正相关。

关键词：

紧凑度　演变规律　空间分异　北京

一　引言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每年在以 1.4% 的速度增长，城市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以及人多地少的现状决定了我国今后和未来都必将面对城市用地扩展与耕地保护这一愈演愈烈的尖锐矛盾①。城市用地无序蔓延，用地配置不合理，导致利用效率低下，环境问题显现，在这种背景下，"紧凑城市"成为城市空间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明智选择②。国外提出紧凑度测度模型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从城市密度、城市交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87）。

** 王德利，北京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市规划。

① 洪敏：《基于紧凑型城市理论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0。

② 陈秉钊：《城市，紧凑而生态》，《城市发展研究》2008 年第 1 期。



通、城市规模、城市环境、能源消耗、生活质量、市场因素、运行效率等方面形成城市紧凑或分散的相关理论并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及内涵，归纳起来包括城市紧凑论、城市分散论和折中论三种①。在紧凑城市测度模型方面主要包括单指标测度法、多指标综合测度法以及借助 Arc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Richardson、Gibbs 以及 Cole 等分别基于城市形态采用单指标测度法对城市空间紧凑度进行度量分析，Burton 利用综合测度方法对城市空间紧凑度进行计量分析②，Nguyen xuan Thijh 等提出了一种依靠 GIS 光栅分析技术的万有引力模型③。国内对紧凑度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方创琳④等认为紧凑度是指在城市形成与发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城市（城镇）、产业、资源、资金、交通、技术、人才等物质实体按照一定的经济技术联系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包括城市产业紧凑度、城市空间紧凑度和城市交通紧凑度等类型。祁巍峰⑤将紧凑型城市定义为以防止城市蔓延、实现土地与能源的节约，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为目的，具有要素集聚、形态紧凑、功能混用等空间特征，是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发展模式和策略手段。在城市紧凑度测度模型方面武进⑥采用 Richardson 公式和网络拓扑分析法，得出紧凑度与城市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论。方创琳⑦等构建城市群丰度指数来反映中国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集聚程度。王新生⑧等采用 Boyce-Clark 形状指数法计算了 1990 年和 2000 年全国 31 个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主要建成区紧凑度。

---

① Mike Jenks, Elizabeth Burton, Katie Williams. *The 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London: E & FN Spon, 1996. pp. 13 – 22.

② Burton E. "Measuring urban compactness in UK towns and c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2, 29. pp. 219 – 250.

③ Nguyen Xuan Thinh, Gunter Arlt, Bernd Heber *et al.* "Evaluation of urban land-use structures with a view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2, 22. pp. 475 – 492.

④ 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地理学报》2008 年第 10 期，第 1011 ~ 1021 页。

⑤ 祁巍锋：《紧凑城市的综合测度与调控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⑥ 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第 197 ~ 202 页。

⑦ 方创琳、宋吉涛、张蔷等：《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⑧ 王新生、刘纪远：《中国城市形状的时空变化》，《资源科学》2005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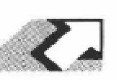
综观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城市紧凑度的研究，可得出目前对城市紧凑度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上。以往研究从多元视角诠释“紧凑城市”的内涵，但尚未形成对“紧凑城市”的共识；测度城市紧凑度的方法模型多种多样，但公认的方法模型有待开发。本研究试图抓住这一薄弱研究环节，通过紧凑城市测度模型的构建，分析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建设现状及空间分异特征，为北京市未来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二　城市空间紧凑度演变规律分析

本研究认为，“紧凑城市”是指以防止城市蔓延、实现土地与能源的节约利用、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为目的，具有高居住密度、少依赖机动车、土地混合利用等特征的城市空间建设模式。紧凑城市的内涵体现在高密度、功能混用、形态紧凑和提高城市效率，因此对城市空间紧凑度演变规律的分析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①高密度是紧凑城市的首要特征，主要包括高人口密度、高就业密度、高投资密度和高容积率、高经济密度等，高密度在增强城市空间利用效率的同时，提高城市功能混用，进而能提升城市空间紧凑度；反映在城市空间结构上，距离市中心距离越近，城市密度越高，紧凑度越高，反之越低。②功能混用将居住、就业、休闲等各类城市用地进行有机结合，使居民日常活动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完成，减小因工作、购物等带来的交通压力，减小对环境等的污染；反映在城市空间结构上，距离市中心距离越近，城市用地功能混合性越高，紧凑度越高，反之越低。③城市形态的紧凑程度随着城市周期性的扩展而变化，当城市处于迅速扩展的发展阶段时，紧凑度下降；当城市转化为内部填充、改造发展阶段时，紧凑度明显上升；所以说城市扩展直接作用于城市外部形态，改变了城市外部形态的完整性，一般来说，城市扩展导致城市趋圆性增强，则形态紧凑度增加，反之则下降[①]。④经济发展使得城市投资强度、基本建设、产业结构及其升级等变化，推动城市形态的改变，在紧凑性上

---

① 祁巍锋：《紧凑城市的综合测度与调控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9。



亦可以得到体现：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紧凑度指数趋向下降，经济衰退时期，紧凑度指数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城市空间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存在关系，在经济扩张阶段，城市空间处于向外扩展阶段，距离市中心越远，紧凑性可能下降；在经济收缩与稳定阶段，城市空间处于内部调整阶段，市中心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度化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作用，而原有产业的迁移也势必影响城市空间的拓展①，从而使得紧凑性增加。

以上是对单中心城市空间紧凑度演变规律的分析，基本特征是单中心的城市形态结构导致城市中心高度集聚，空间紧凑度较高，随着到城市中心距离的扩大，城市空间紧凑度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来说，在主城控制边界以外还有相对独立的城郊新城，新城的开发引导城市人口及经济密度的新一轮集聚，同时能提供职住平衡的功能混用的发展空间，城市紧凑度在城市边缘的新城地区出现新一轮波动态势（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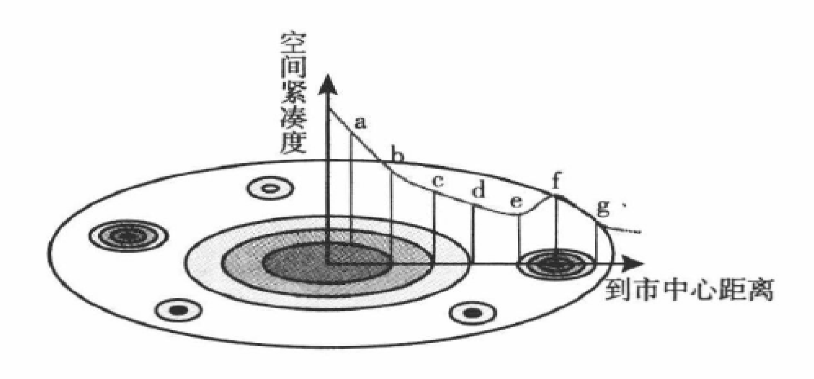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空间紧凑度演变规律分析

三　北京市空间紧凑度测度模型构建

（一）“紧凑城市”综合测度的三维目标空间指标体系

根据紧凑城市的内涵，得出土地高强度功能混合利用是紧凑型城市土地利用的首要条件。综合考虑以往学者关于城市紧凑度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按照

① 张忠国、吕斌：《东京空间政策中的成长管理策略研究及其借鉴》，《城市规划》2006 年第 6 期。

可比、可量、可获和可行的原则，本研究构建包括规模紧凑度指数（*SCI*）、功能紧凑度指数（*FCI*）和形态紧凑度指数（*LCI*）3 大类要素共 9 个指数组成的紧凑城市三维目标空间综合测度指标球。规模紧凑度指数由人口密度指数（*PDI*）、建设用地密度指数（*BDI*）、经济密度指数（*EDI*）3 个指标来体现；功能紧凑度指数由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LUI*）、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FAI*）、交通可达性指数（*TAI*）3 个指标来体现；形态紧凑度指数由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FI*）、土地利用形态指数（*LSI*）、路网密度指数（*RNDI*）3 个指标来体现。以上每一项指标由若干个具体的原始指标通过相关计算得到指数值（图 2、表 1）。

图 2　“紧凑城市”综合测度的三维目标空间指标体系



表1 “紧凑城市”三维目标空间指标体系量化解释

准则层Ⅰ	准则层Ⅱ	计算公式	量化解释
规模维度（SCI）	PDI	$PDI = P_i / A_i$	PDI 代表人口密度指数，P_i 代表测度单元内的常住人口数，A_i 测度单元土地总面积。
	BDI	$BDI = Mb_i / M_i$	BDI 代表建设密度指数，Mb_i 代表研究区域内建设用地像元数，M_i 代表研究区域内总像元数。
	EDI	$EDI = E_i / A_i$	EDI 代表经济密度指数，E_i代表 i 单元的经济总量，A_i代表 i 研究单元土地总面积。
功能维度（FCI）	LUI	$LUI = -\sum_{i=1}^{m}(c_i \times Lnc_i)$	LUI 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c_i为属于 i 类型城市用地占城市总用地比重；m 为城市用地类型总数。当 $LUI \geqslant 0$ 时，无上限；$LUI = 0$ 时，表示只有一种用地类型；LUI 值越大，则城市用地多样性越高，各种城市用地功能混合度也就越大。
	FAI	$FAI = \sum(G_i + H_i + M_i + N_i)$ $G_i = g/g'$ $H_i = h/h'$ $M_i = m/m'$ $N_i = n/n'$	FAI 为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G_i、H_i、M_i、N_i 分别为卫生医疗设施便捷度指数、商业娱乐设施便捷度指数、绿地景点便捷度指数以及教育设施便捷度指数；g、h、m、n 分别为对应设施数目，g'、h'、m'、n'分别为研究单元对应社会服务设施数目。
	TAI	$TAI = \sum_{i=1}^{m} C_i \times p_i$	TAI 为交通可达性指数，C_i为通过区域 i 的交通状况指标，p_i为该区域 i 的人口比重，m 为评价单元的数量。
形态维度（LCI）	FI	$FI = [(N-1)/C] \times 100\%$	FI 为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N 为用地中各类斑块总数，C 为研究范围内用地总面积与最小用地面积的比值。FI 值越大，用地的破碎程度越大。
	LSI	$LSI = 0.25E/\sqrt{A}$	LSI 为土地利用形态指数，E 为所有建设用地斑块边界的总长度，A 为建设用地单元总面积。当建设用地斑块形状不规则时，LSI 增大。该值在 0～1 之间，其值越大，越接近于 1，形态越接近于圆形，也就越具有紧凑性；反之，形态紧凑性越低。
	RNDI	$RNDI = L_i / A_i$	RNDI 为路网密度指数，L_i 为通过区域 i 的道路干线长度，A_i 为区域 i 的土地利用总面积。

（二）“紧凑城市”综合测度模型构建

利用 α、β、γ 分别代表规模紧凑度指数（SCI）、功能紧凑度指数（FCI）和形态紧凑度指数（LCI）的加权影响系数，则城市紧凑度指数 CCI 的计算公式为：

$$CCI = SCI \times \alpha + FCI \times \beta + LCI \times \gamma = \sum_{i=1}^{3}(SCI_i)\alpha_i + \sum_{j=1}^{3}(FCI_j)\beta_j + \sum_{k=1}^{3}(LCI_k)\gamma_k$$

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 AHP 模型计算二、三级指标加权影响系数，熵技术支持下的 AHP 模型的原理是将要识别的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由专家和决策者对所列指标通过两两进行比较重要度，构造判断矩阵，通过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它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到每一层次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次目标的权重值（即层次单排序，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而一旦确定了低层指标对较高层次指标的权重后，可以根据递阶赋权定律确定最低层指标相对于最高层指标的权重（层次总排序）。但由于 AHP 法识别问题采用专家咨询方式时，容易产生循环而不满足传递性公理，导致标度把握不准和丢失部分信息等问题出现，因此可用熵技术对 AHP 法确定的权系数进行修正，其计算公式为：

$$a_j = \frac{v_j p_j}{\sum_{j=1}^{n} v_j p_j}, v_j = \frac{d_j}{\sum_{j=1}^{n} d_j}, d_j = 1 - \lambda, \lambda_j = -(\ln n)^{-1}\sum_{i=1}^{n} r_{ij}\ln r_{ij}$$

式中，a_j 为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 AHP 法求出的指标权重，p_j 为采用 AHP 法求出的指标权重，v_j 为指标的信息权重，d_j 为指标输出的熵值，r_{ij} 为采用 AHP 法构造的判断矩阵经归一化处理后的标准矩阵值。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各指标赋权结果信息量增大，可信度提高[①]。各指标权重详见表 2。

表 2　城市空间紧凑度测度指标及权重确定

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备注
规模维度（*SCI*）	*PDI*	人口密度指数	0.14	正向指标
	BDI	建设用地密度指数	0.14	正向指标
	EDI	经济密度指数	0.06	正向指标
功能维度（*FCI*）	*LUI*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0.14	正向指标
	FAI	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	0.08	正向指标
	TAI	交通可达性指数	0.08	正向指标
形态维度（*LCI*）	*FI*	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	0.14	逆向指标
	LSI	土地利用形态指数	0.14	逆向指标
	RNDI	路网密度指数	0.08	正向指标

① 方创琳：《区域发展规划论》，科学出版社，2000。



四　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分异特征分析

（一）北京市空间紧凑度总体分异特征

基于 ArcGIS 中的分位数分类研究方法，将北京市空间紧凑度测度结果划分为四个等级，包括低紧凑度地区、中下紧凑度地区、中上紧凑度地区、高紧凑度地区。基于对北京市空间利用紧凑度的综合测度结果及空间分异分析，得出目前北京市城市紧凑度呈现以下特征。

（1）北京市空间利用紧凑度分布与地形分布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将北京市以街区为单元的空间紧凑度分异特征分析图与北京市高程地形分析图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空间紧凑度与高程正好相反，地势高的地区空间利用紧凑度反而小，高程低的地区空间利用紧凑度反而大。高紧凑度的乡镇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而低紧凑度的乡镇大部分位于山地地区。

（2）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呈现“中心－外围”递减特征。北京市空间利用紧凑度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以及中心邻近性，以中心的西城区和东城区为中心，空间紧凑度最高；外围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以及丰台区空间紧凑度逐渐递减，处于高紧凑度和中上紧凑度混合的状态；与以上四个地区相邻的其他地区的乡镇空间紧凑度亦较高，大多处于中下紧凑度状态；其他外围郊区空间紧凑度最低，多是低紧凑度地区。

（3）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呈现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的特征。由于地形原因，造成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呈现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特征，东部的通州区处于高紧凑度、中上紧凑度及中下紧凑度态势，与西部相比不包括低紧凑度地区；南部的大兴区及房山区大多处于高紧凑度、中上紧凑度及中下紧凑度态势，而北部的密云县、怀柔区及延庆县大多处于低紧凑度态势。

（4）北京市空间紧凑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呈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通过总体空间紧凑度空间分异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密度、建设用低密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比分析，得出北京市空间紧凑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呈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较高

的东城区、西城区及与其相邻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部分乡镇空间紧凑度均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较低的西部与西北部地区空间紧凑度亦较低。

（二）北京市空间紧凑度分要素分异特征

1. 规模紧凑度空间分异特征

城市规模紧凑度空间分异特征分析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利用 GIS 平台获取各研究单元（按用地功能划分）的质心，得到各地块点集数据；二是利用 ArcGIS10.0 软件中的密度分析功能，采用反距离权重法及插值法，创建各类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的面积密度栅格图；三是采用 natural break 分类法，对用地面积栅格图进行分类显示，以确定用地空间的紧凑程度变化。基于以上研究方法，得出北京市人口密度集聚差异性比较明显，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为 1961.2 万人，土地面积为 16410.54km^2，常住人口密度约为 1195 人/km^2；从功能分区类型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以及生态涵养发展区常住人口密度分别为 23407 人/km^2、7488 人/km^2、958 人/km^2 和 213 人/km^2；在核心区以及城市功能拓展区外围的昌平区的城北街道、城南街道，密云镇地区，房山的东风街道、向阳街道、迎风街道、城关街道、大兴的黄村镇地区、通州新城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其余地区的人口密度均较低（图 3）。城市建设用地密度指数呈现环状递减趋势，2010 年北京市平均建设用地密度指数为 0.206，东城区和西城区建设用地密度指数分别达到 1，外围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建设用地密度指数略有递减，平均建设用地密度指数分别为 0.679、0.665、0.586、0.532，门头沟区、怀柔区、延庆县平均建设用地密度指数最低，分别为 0.066、0.063、0.072；这种中心－外围的密度空间结构主要是因为北京市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主城连片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主要集中在市区周边，与主城区连片扩展（图 4）。北京市 GDP 和全市面积计算北京市地均 GDP 数据表明，北京市地均 GDP 呈现不断上升趋势，1986 年地均 GDP 是 171 万元/km^2，2010 年达到 8600 万元/km^2，2010 年是 1986 年的 50 多倍，这表明北京市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高，经济紧凑度逐渐提高；由于数据缺失，本研究



采用区县数据反映北京市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经济密度指数呈现东城区、西城区最高，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次之，其他外围郊区最低的态势（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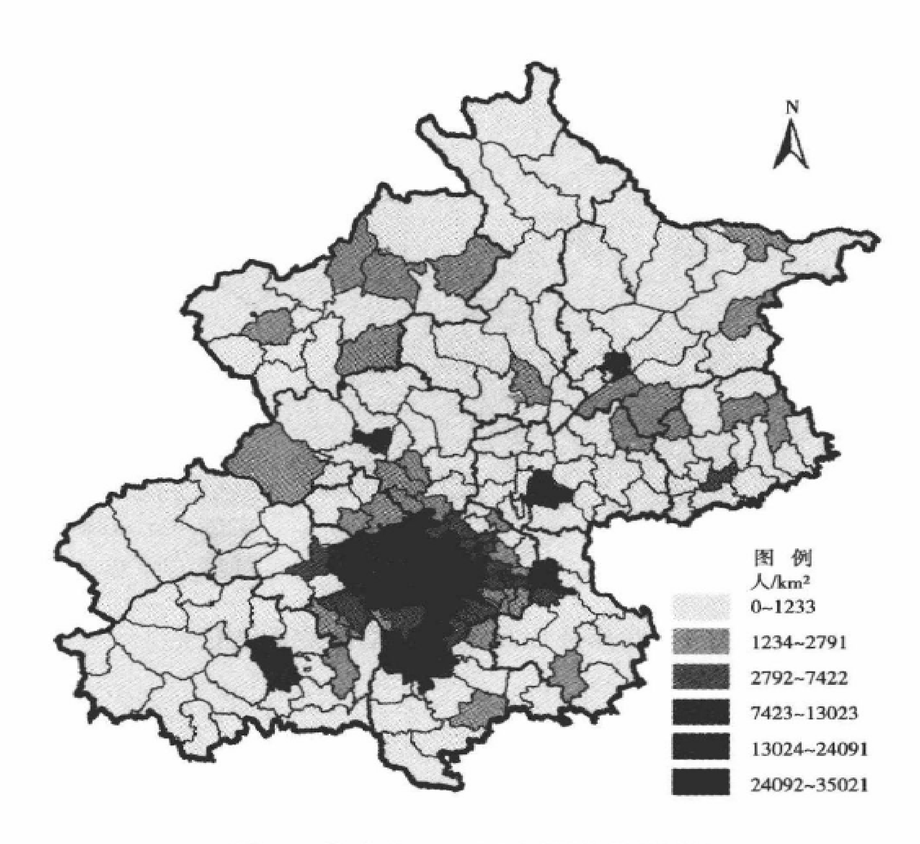


图3　北京人口密度空间分异特征

2. 功能紧凑度空间分异特征

采用20m×20m格网对城市各类用地进行栅格转换并计算多样性指数，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0.453，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呈现出中心城区较高，外围地区逐渐递减的态势；东城区及西城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0.914，近郊四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为0.766，其他外围郊区区县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为0.354；外围怀柔、延庆、门头沟三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最低，除了区（县）政府所在的乡镇及街道外，其他乡镇的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均在0.250以下（图6）。选用商业娱乐、卫生医疗设施、教育设施以及绿地旅游景点等设施来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异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北京市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具有较高的集聚性，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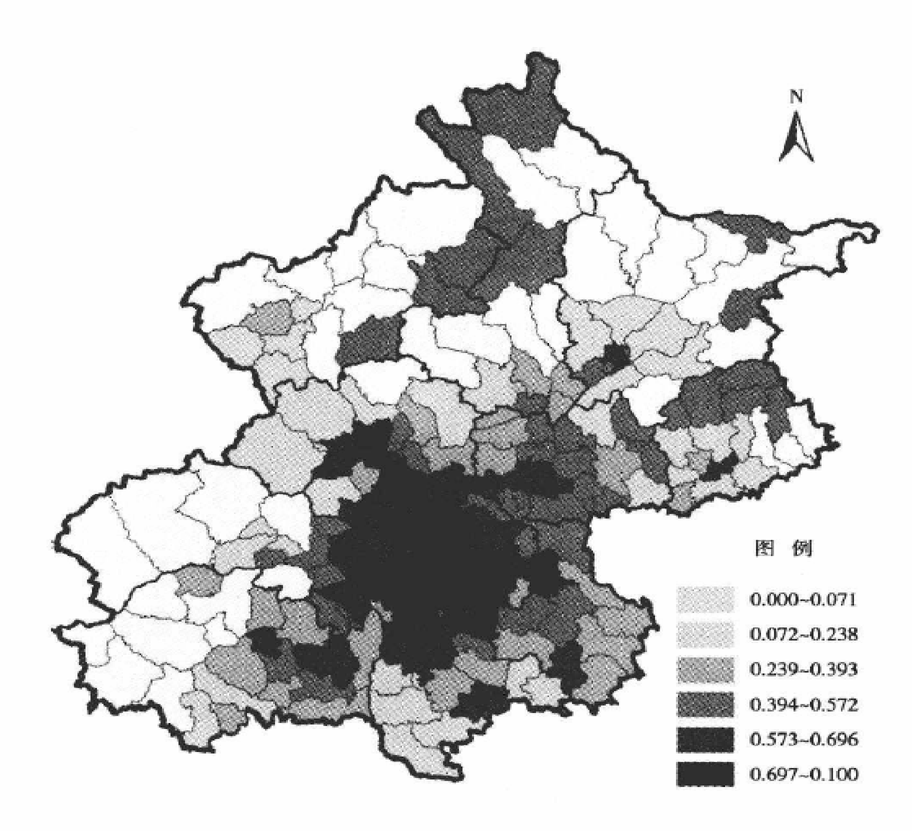


图 4　北京建设用地密度指数空间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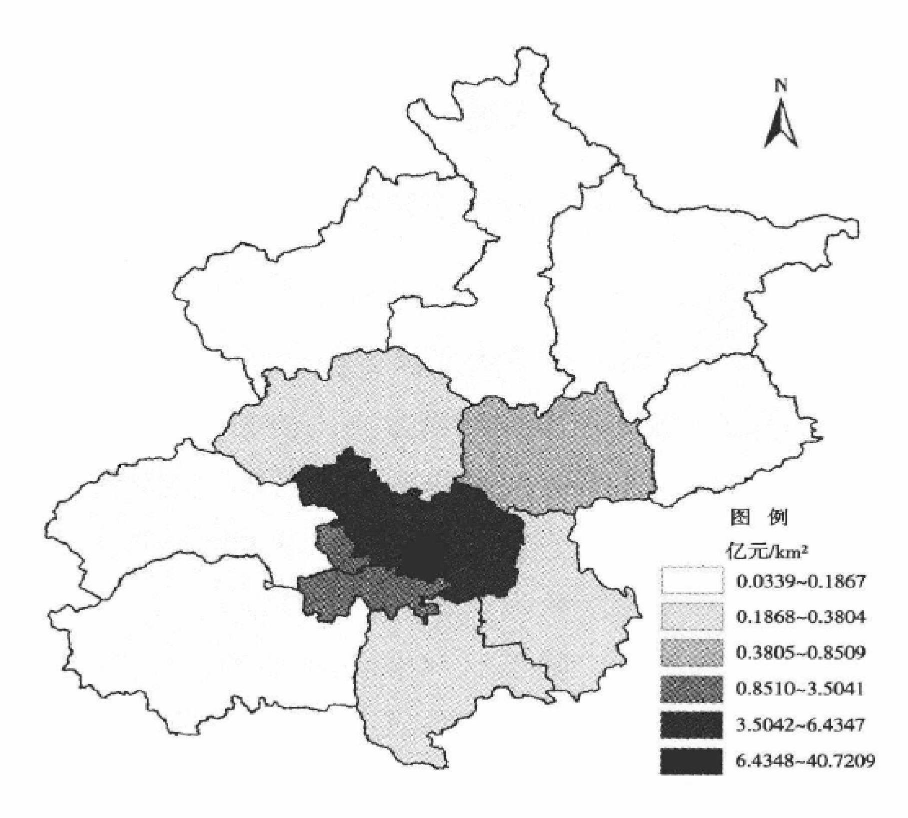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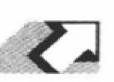


图 5　北京经济密度空间分异特征



以上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集中在六环线以内；东城区和西城区服务设施便捷度均在 0.40 以上，朝阳区及海淀区也有部分区域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位于 0.40 以上，但与郊区相邻的部分乡镇包括苏家坨镇、上庄镇、西北旺镇以及朝阳区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在 0.35 以下；大兴、房山、顺义、通州等郊区除了区（县）政府所在地的服务设施便捷度指数较高外，其他区域均在 0.01 以下（图 7）。基于加权欧式距离法来计算交通可达性指数，即该区域距离各种交通设施越近且人口比重较大，其交通可达性高；研究发现，北京市交通可达性指数平均值为 0.348，东城区及西城区交通可达性指数最高，分别为 0.9802、0.9433，外围四区包括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交通可达性指数急剧递减，外围郊区地区除了区（县）政府所在乡镇的交通可达性位于 0.10 以上外，其他地区的交通可达性指数均在 0～0.0035 之间（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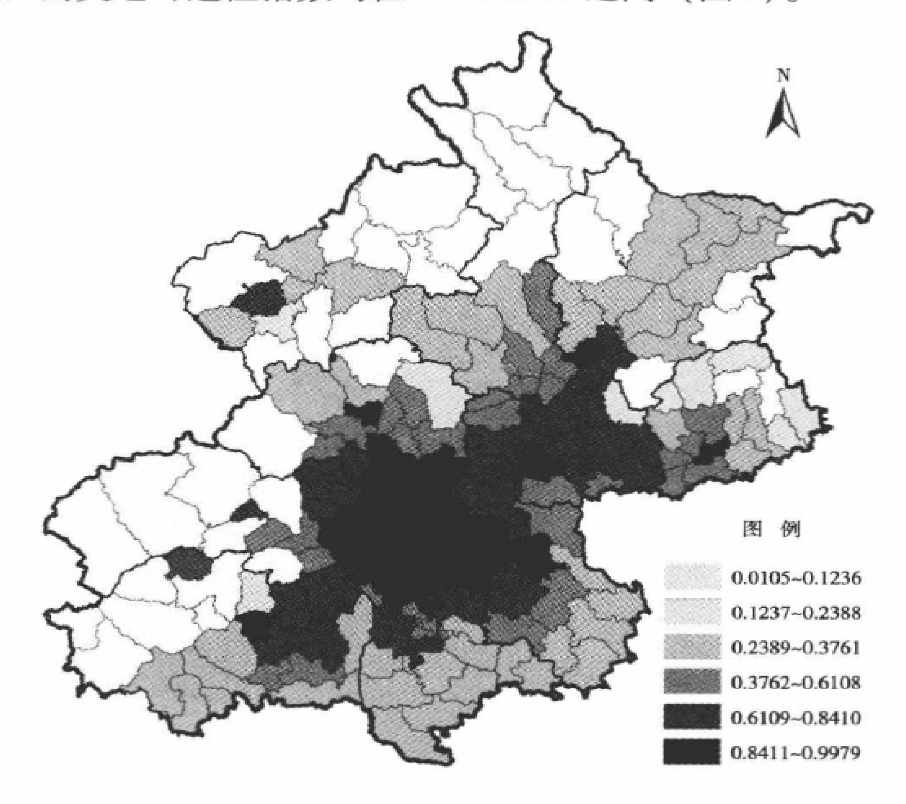


图 6　北京土地利用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

3. 形态紧凑度空间分异特征

2010 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破碎度呈现郊区高于城区，西部高于东部的态势，西部包括延庆、怀柔、门头沟等在内的生态涵养区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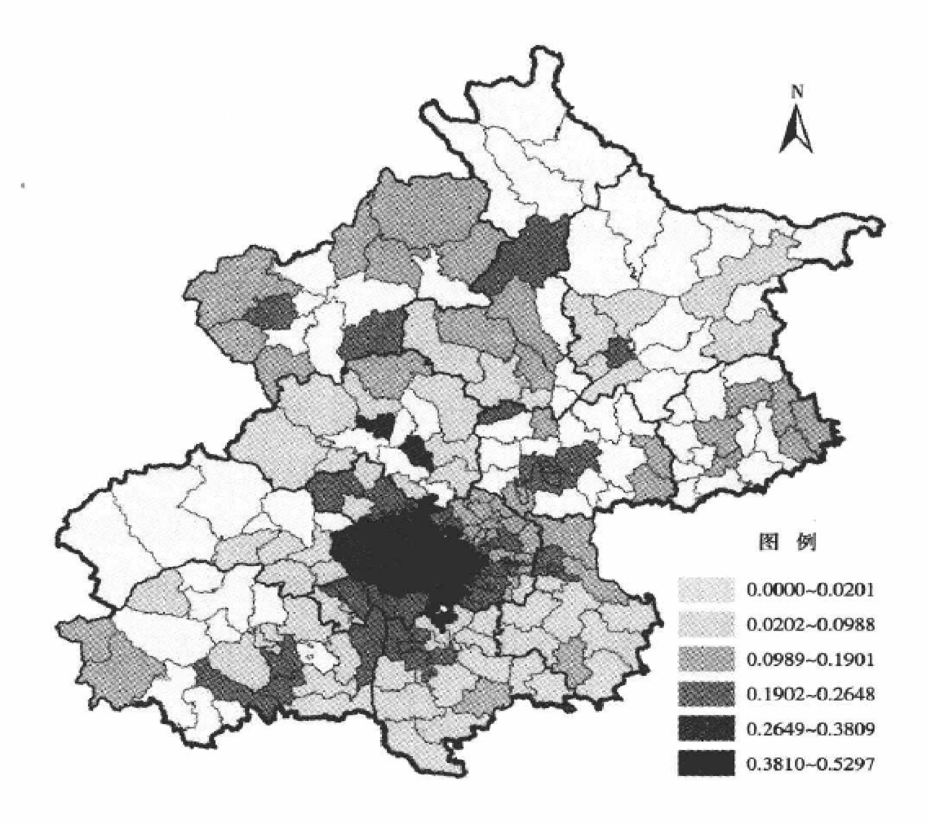


图 7　北京服务设施便捷度空间分异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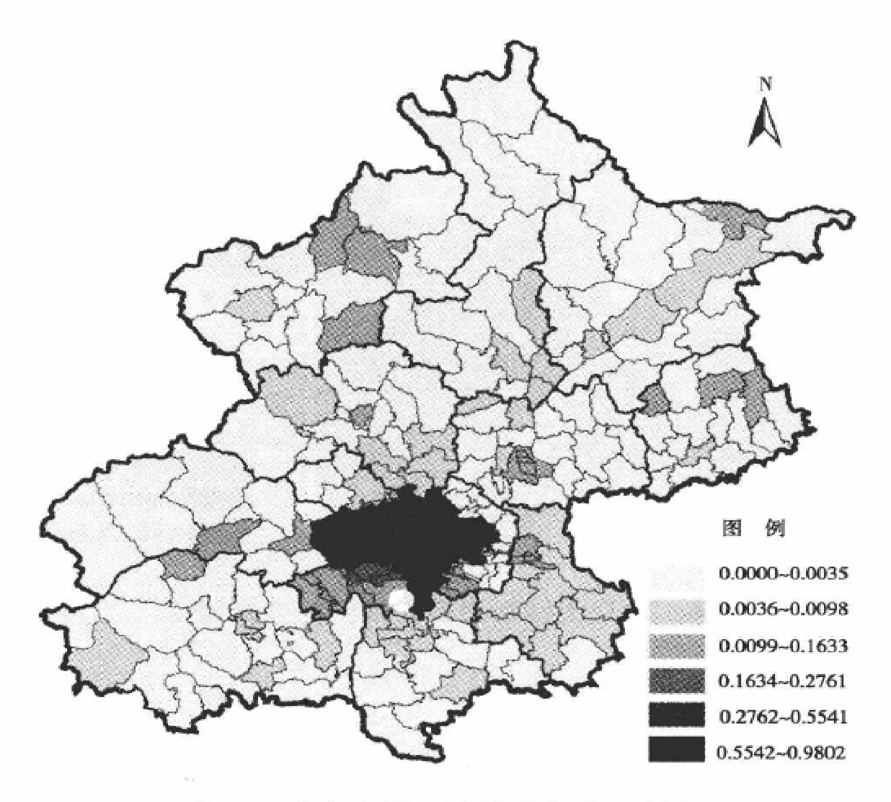


图 8　北京交通可达性空间分异特征



破碎度指数均在0.4301以上；中部的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以及房山区的部分乡镇土地利用破碎度较低，破碎度指数在0.0051～0.0922之间；东部包括密云、顺义、通州以及大兴在内的几个区域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处在中等水平，在0.0923～0.2973之间（图9）。土地利用形态指数与其他形态紧凑度测度指标的空间分异特征差异较大，空间分异不明显；东城区及西城区土地利用形态指数较低，分别为3.435、1.023；外围区县包括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及丰台区土地利用形态指数均较高，其中朝阳区略低，处于6.322～12.629之间，其余郊区县（区）土地利用形态指数较低的城镇呈现点状分布（图10）。通过对北京市现状路网结构的空间化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市平均路网密度为1.21km/km²，全市53%的乡镇路网密度低于平均路网密度，约60%的路网密度位于0～0.44km/km²之间；高于全市路网密度平均值的乡镇占47%，处于1.21～5.14km/km²之间；北京市路网密度呈现明显的圈层特征，中心四区平均路网密度为5.12km/km²，近郊四区平均路网密度为3.01km/km²，其他郊区区县平均路网密度为0.89km/km²（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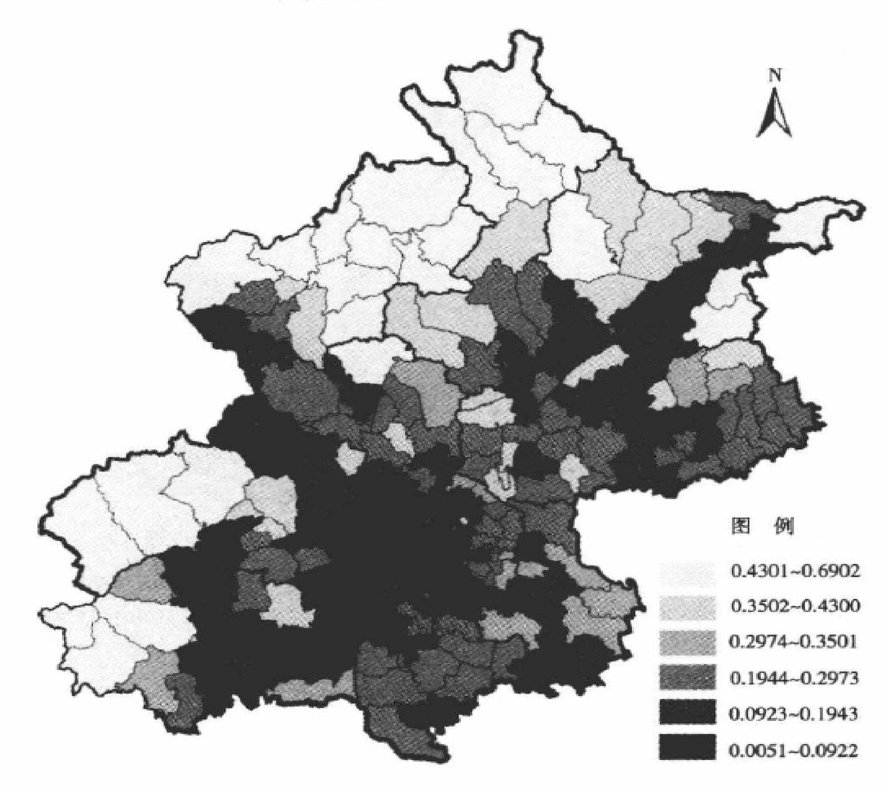


图9　北京土地利用破碎度空间分异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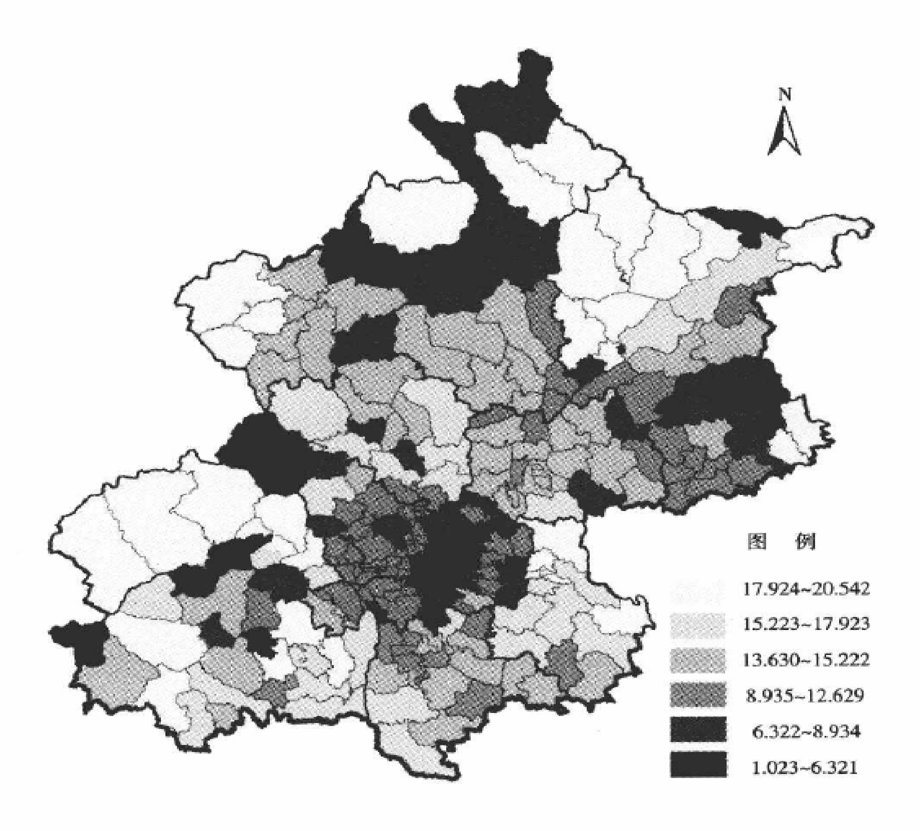


图 10　北京土地利用形态空间分异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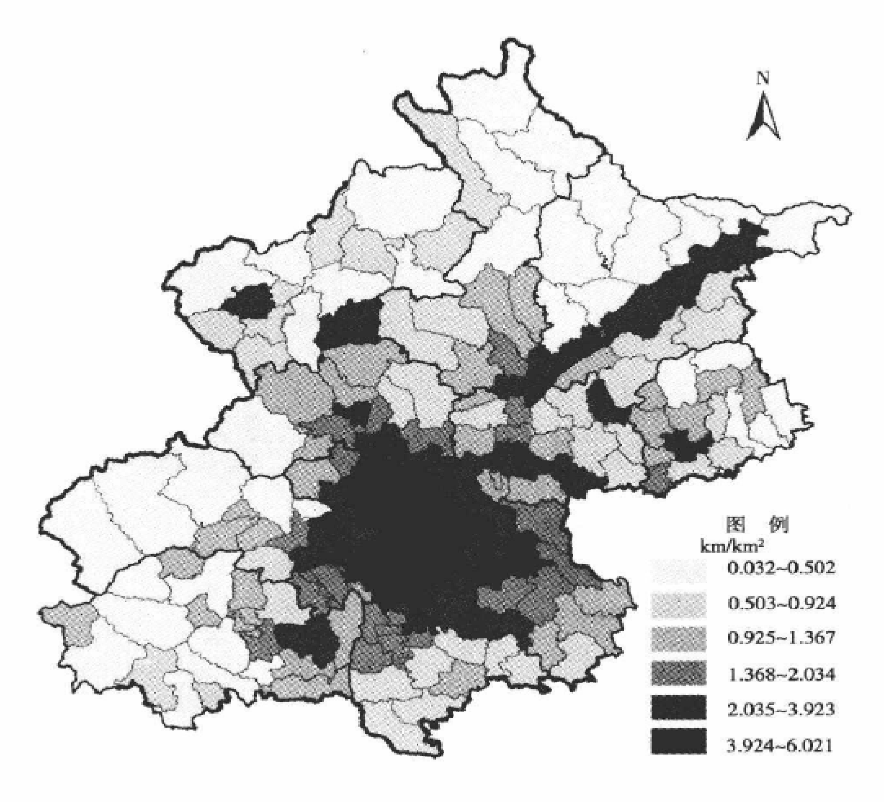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路网密度空间分异特征



五　结论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以及人多地少的现状决定了我国今后和未来都必将面对着城市用地扩展与耕地保护这一愈演愈烈的尖锐矛盾。在这种背景下，“紧凑城市”成为城市空间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新视角。本研究在界定“紧凑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城市紧凑度空间演变规律，构建城市紧凑度三维目标空间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对北京市规模紧凑度、功能紧凑度、形态紧凑度及空间综合紧凑度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空间利用紧凑度与地形分布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高紧凑度的单元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而低紧凑度的乡镇大部分位于山地地区；空间紧凑度呈现“中心－外围”递减特征，以西城区和东城区为中心，空间紧凑度最高，外围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以及丰台区空间紧凑度逐渐递减，其他郊区（郊县）空间紧凑度最低；东部地区空间紧凑度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空间紧凑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密度呈正相关。

Measures and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Space Compactness

Wang Deli

Abstract: “Compact city” i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preventing spread of city, saving utilization land and energy, improving urban efficiency with high residential density of less dependent on motor vehicle and land mixed use. Base on the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 of “compact city”, we explore the city compactness space evolution rule. We proposes 3D index of comprehensive measures of compact degree and analysis scale compact degree, form compact degree, function compactness degree and space integrated compact degree. Studies show that compact degree and topographic distribution has obvious correlation. High degree of compact

unit most of these are located in the plain area and low compact degree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most i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 area. Space compactness present "center-peripheral" dec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center of Xicheng district and Dongcheng district are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pact space and Chaoyang district, Haidian district, Shijingshan and Fengtai space compactness gradually decreasing. Other suburbs are the lowest degree. The space compact degrees of eastern region higher than the west, south higher than the north. Space compact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s obvious correlation.

Key Words: Compact degree; Evolution iaw; Space differentiation; Beijing

B.6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与展望

任建兰　徐成龙*

摘　要：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成为带动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本文总结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的发展成就、研究成果以及制度创新，并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半岛蓝色经济区　发展展望　国家战略

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式落地山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强省建设提供了强力引擎，开启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9大核心区，分为主体区和核心区。其中，主体区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两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核心区为9个集中集约用海区，分别是丁字湾海上新城、潍坊海上新城、海州湾重化工业集聚区、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总人口为3341.5万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395.1亿元，占全省的47.1%。

---

* 任建兰，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徐成龙，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一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成就

（一）海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011 年，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财政收入 1480 亿元，增长 25%，占全省的 43%。2012 年一季度，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 5047.6 亿元，增长 9.9%，高于全省 0.2 个百分点。2011 年，全省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8231 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海洋渔业、海洋化工、海洋工程、海洋服务业、新兴海洋产业等领域增长均在 15% 以上。烟台市实现渔业产值 57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水产品总产量 185.8 万吨，产值 203.1 亿元；青岛市远洋渔船建设速度加快，建成 1000 马力远洋渔船 4 艘、在建 8 艘。青岛、烟台、威海已经成为海洋装备、造船产业的出口基地，年出口船舶超过 400 万载重吨。海洋交通物流业再上新台阶，2011 年青岛市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外贸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 3.78 亿吨、2.66 亿吨和 1300 万标箱，居全国第五、第三和第五位；新开通航线 2 条，新增船舶 7 艘，合计 50.2 万载重吨。烟台市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新能源、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实现产值 11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6%。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2.8 万亿元，其中 70% 来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2012 年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山东省投资最热的地区，固定资产投入占整个山东的 51.5%，内外贸易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2011 年山东城市化达到 50%，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 6 个城市则达到了 60%。资金是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保障，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0 亿元集中扶持了 170 个重点项目。总规模 300 亿元的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获批筹建，基金管理公司挂牌成立，2011 年蓝色经济区新增贷款 2466.2 亿元，占全省新增贷款的 54.8%，比上年提高了 3.8 个百分点。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推进了 37 个具有规模优势和海洋产业特色的园区，以及“三区三园”和烟台东部高技术海洋经济新区建设。此外，包括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日照港岚山港区 30 万吨级矿石码头项目等在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取得重大突破，胶州湾大桥、海底隧道、快速路三期竣工通车，世园会园区道路、综合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

（二）引进外资显著增加

2011 年以来，外资投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积极性显著增强，且高端高质外资项目明显增多。2011 年 1 ~7 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共引进合同外资 58.9 亿美元，占全省的 63.8%。据山东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这 7 个月里新引进 111 个总投资 3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合同外资 33.7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70% 和 56%。其中，过亿美元项目 10 个，合同外资 9.8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83.3% 和 37.2%。2011 年，青岛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490 个，合同利用外资 37.8 亿美元，增长 17.9%；到账过千万美元项目 69 个，实际到账外资增长 120%。2011 年 11 月 10 ~12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的首届中国海洋经济投资洽谈会（简称“海洽会”）中，省发改委、省蓝办精心筛选了 160 个有代表性的海洋产业重点项目在这次海洽会上推介招商，总投资达 6100 亿元。山东省沿海 7 市蓝办负责人和部分涉海大中型企业代表参会参展，通过积极开展投资洽谈寻找商机。其中，17 家企业在现代水产养殖业、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等许多领域达成合作意向，为山东省海洋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搭建

山东海洋资源丰富，科研实力居全国首位，在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海洋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拥有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一批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中高级海洋科研人员占全国的 60% 以上。其中，涉海两院院士 23 名，占全国的 70% 以上。此外，海洋科技创新体系较为完备，有近 60 个国家和省属涉海科研、教学事业单位，29 个省部级海洋重点实验室，20 多艘各类海洋科学考察船，10 个国家级科技兴海示范基地，23 个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山东科研部门和单位承担了国家海洋领域“973”“863”等计划项目 500 多项，在研的海洋科技项目 170 多项。海洋灾害监测预报、海洋防腐等关键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海洋药物技术保持国内领先水平。2011 年，半岛海洋蓝色经济

区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不断增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的18个海洋科技国家级创新平台，有15个取得较大进展。青岛“蓝色硅谷”建设扎实推进，国家深海基地规划获得批复，争取国家批准设立了海产贝类和海洋腐蚀保护两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省海洋领域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达5家，居全国第一位。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建造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在同类平台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生态建设初见成效

完善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随着《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在健全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征收的制度、规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征收制度的基础上，对30余个用海项目征收生态损失补偿费7000万元。海岛保护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2011年，海岛开发保护管理工作顺利推进，海岛地名普查圆满完成，首次由省政府对山东省田横岛等140个海岛设置了名称标志，省财政厅和省海洋与渔业厅联合出台了《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无居民海岛使用进入实质性申请审批管理阶段。2012年5月，首家生态智能园落户青岛，坐落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德生态园项目正式在青岛环保局网站公布首次环评公示。根据最新的公示内容，中德生态园规划总用地面积11.56平方公里，规划区将采用“一心、两带、三区”的规划布局模式，园区建成后将涵盖高端产业、商务金融、国际居住及生态景观功能。

二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政策完善与制度创新

（一）区域政策完善

1. 投资融资政策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改革现有海洋产业投融资制度，实施金融创新，募集社会资本投资于蓝色经济区内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以及基础设施是开



发建设蓝色经济区的必要之举。2011 年 9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蓝色产业基金的成立不仅集合了社会资本搭建高效资本平台，加大了蓝色经济区内企业的直接融资力度，而且还有效优化了蓝色经济区内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动区域就业、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2012 年 3 月 1 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与日照市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资源配置平台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成立。蓝色产权交易中心努力构建统一、规范、高效、有序的资源配置平台，为产权交易、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海域使用权依法有序流转等提供服务；同时，还将以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为重点，以金融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打造一个区域性投融资平台，探索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托管与交易、投融资服务等功能，适应区域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要求，实现产权的顺畅流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蓝色产权旨在配合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和改革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促进山东半岛区位优势和各种资源优势转化。

2. 区域战略合作协议

山东省政协明确提出“整体融合、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合力竞争、共生共荣”的蓝色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出台了《关于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议案》。建议案提出，要建立完善以共建经济合作区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城市间的财税均衡和利益分享机制，设立区域合作发展协调委员会，及时解决一体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推进区域年票互认、公交一卡通和电信一号通等政策和机制；抓紧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对建设中日韩经贸合作试验区、国际碳排放交易所等重大事项要敢于突破；加快调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区划，设立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整合环莱州湾地区，使之成为山东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完善一体化资本运作体系，组建山东半岛蓝色发展银行，运作经济园区资产上市；建立蓝色经济区考核体系，以管理方式的转变加快蓝色经济区发展。根据建议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地市相继提出了许多政策和制度以解决弥补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以青、日、潍一体化带动“蓝区”一体化发展。处于“蓝区”建设核心地位的青岛市同毗邻的日照市、潍坊市已经开始实践探索一体化发展之路，并

且有了一定的进展。在青岛市的积极呼应和倡导下，日照市制定了“融入半岛、接轨青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围绕“推进一体发展、共赢同城时代”的目标，与青岛市签订了《关于加快推进青岛日照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备忘录》，共同研究制定了推进两市发展规划、市场体系、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建设和传媒、社会管理九个方面的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开启了两市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潍坊市也推出了积极接轨青岛、加快青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建立了两市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在共同举办大型经贸活动、承接青岛产业项目等方面开展了许多实质性的合作。2012 年 11 月 4 日，潍坊与青岛签署了加快推进全面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调整行政区划

2012 年 12 月 2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山东省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决定对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实施调整。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撤销青岛市市北区、四方区，设立新的青岛市市北区，以原市北区、四方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市北区的行政区域。市北区人民政府驻敦化路街道延吉路 80 号。撤销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设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以原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的行政区域为新的黄岛区的行政区域。黄岛区人民政府驻隐珠街道深圳路 181 号。本次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必然要求，是顺应青岛发展大趋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中心城区优化空间布局和其他要素配置，进一步增强集聚、辐射功能，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和综合竞争力。

（二）制度创新

加强合作监管力度。2011 年，山东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的成立对满足转变海洋与渔业执法方式、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的迫切要求，对于进一步发展壮大山东省海上执法力量、提升海洋与渔业执法水平、助推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2011 年 1 月 19 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合作宣言》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正式成立。



《宣言》强调了区域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确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合作与积极协调原则、依法行政原则、人才与信息共享原则；明确了7市在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等八大重点领域内的六个重点合作事项；提出了各项合作的具体保障措施，包括建立蓝色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办公会议制度、建立联络员制度、建立专题工作小组制度等。2012年国内旅交会期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自由游”互惠旅游联盟每个首批加盟的县市区免费赠送了2000张“自由游”互惠旅游卡，免费卡向居民发放完毕后，以后每张统一售价20元，广大游客可持互惠卡购买联盟企业提供的优惠产品，互惠旅游联盟的成立对加盟的县区之间提高旅游知名度、扩大客源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未来发展展望

（一）提高财政金融政策扶持力度

蓝色经济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但是目前国家对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相对较少，金融没有先行先试权利，财政缺乏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深海可燃冰、铁路网络建设等投资大、带动强的项目，国家并未明确规定要予以倾斜。作为“蓝区”发展重要支撑，“十二五”期间，“蓝区”资金缺口达到11873亿元，这将严重阻碍“蓝区”发展进程。因此，山东省亟待在“十二五”期间建立起能够适应高风险产业发展的金融保障体系，支持“蓝区”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比照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等适当给予青岛一定的财政政策优惠，将蓝色经济区纳入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在金融政策方面，应给予蓝色经济区金融政策先行先试权利，开展各类金融改革试点；在差别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信贷政策工具运用上适度向蓝色经济区倾斜；在短期外债指标、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指标上对涉蓝企业和金融机构适当予以倾斜。

（二）加强蓝色科技成果转化

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海洋专业人才的聚集地，海洋科技优势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作为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的青岛市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只有1/5，大量的海洋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有的只能在外地转化。主要原因一是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动力不足；二是科技成果本身市场化针对性不足，实用性不强，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潜力不足；三是与海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金融创新进展缓慢，海域使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在确权、评估、转让机制建设方面不完善、不发达，导致银行信贷跟进困难，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偏慢。因此，应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扶持和风险补贴力度，推进众多海洋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应用，并引导海洋科技研发进一步增强市场化潜力；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结合蓝色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需求，加大专利权质押融资等创新金融产品的开发推广力度；充分利用作为区域集优债务融资试点城市的机遇，协调市政府出台鼓励措施，对成功发债的企业给予适当奖励，推动更多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获得融资。

（三）建设港口配套基础设施

2012年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报告》指出，山东港口业发展存在条块分割严重，结构不合理，竞争无序等问题。报告建议，建立以省政府牵头的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弱化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恢复建立山东港航集团，对港口进行整合，形成合理的集装箱、煤炭、原油、铁矿石和粮食运输布局，打造以青岛港为核心和龙头的现代跨国港口集团，提升山东港口整体竞争力。其中，在港口配套基础设施方面，大力推动港口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港口对腹地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青岛港是我国沿海地区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港口自然条件优越。但目前青岛港特别是董家口港区的铁路、高速公路以及空港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还不完善，与内陆相连的铁路干线胶济线和胶新线运能有限，使青岛港、董家口港的港口吞吐能力无法有效释放，与上海港、天津港、大连港等港口周边密集的铁路、水路运输网相比有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港口对腹地经济的辐射作用。因此，应在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建设



等方面争取国家加大对青岛的项目和资金扶持力度，扩大青岛港的腹地辐射带动力。

（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未来应将继续突出“蓝色”、高端和新兴等特色，既培育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又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在海洋第一产业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渔业、现代海洋养殖，向远海和深海延伸。在海洋第二产业方面，应着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洋新能源等优质高端产业，使其成为海洋第二产业的支柱。同时，还应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工作，努力维护一个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张华：《山东省蓝色经济区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郑贵斌：《打造、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大战略指导——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大战略部署的体会》，《山东经济》2010 年第 2 期。

韩立民、于会娟：《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海洋产业发展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方妍、李文兴：《完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综合运输体系法制建设的对策》，《经济纵横》2012 年第 9 期。

姜旭朝、张继华、林强：《蓝色经济研究动态》，《山东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宋军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陆海统筹发展对策研究》，《东岳论丛》2011 年第 12 期。

宋炳海：《主体功能区视角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机制探析》，《中国渔业经济》2012 年第 2 期。

谭晓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东岳论丛》2012 年第 7 期。

张玉香、刘德华：《促进山东蓝色经济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宏观经济管理》2009 年第 10 期。

王宝运、冯怡：《金融支持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山东社会科学》2010 年第 7 期。

郭先登：《关于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水平思考》，《山东经济》2011 年第 1 期。

房成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开发建设策略探析》，《企业导报》2011 年第 12 期。

李福柱、孙明艳、历梦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异质性演进及路径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1 年第 3 期。

王宝德、李会勋：《蓝色经济区文化产业建设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Ren Jianlan　Xu Chenglong

Abstract: CX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rose to national strategies, which became the engine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research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from 2011.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outlook; National strategy

B.7
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研究

张　智*

摘　要：

本文在对滨海新区进行区域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海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

滨海新区　京津冀　区域合作

2007～2012年的六年间，天津滨海新区以持续、快速和高效的发展业绩，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率先科学发展的一面旗帜，这表明，2006年国家确立的加速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一　天津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比较

天津滨海新区的称谓始于1994年，其雏形是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形成的“三区一港”（天津经济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园区和天津港）。在没有获得国家定位之前，滨海新区杠自兀立10多年，始终处于全国最佳经济开发区位置。在获得国家战略支持之后，对滨海新区能否担当起“第三极”的重任，人们普遍心存疑虑。前有深圳、浦东，后有国务院陆续批准的9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和20余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在这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新时代，天津市

* 张智，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能否把握区域发展的战略机遇，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1. 发展规模最大

在全国2853个区县级行政单位中，天津滨海新区GDP排名雄居榜首，表1给出了2011年前20名的排序情况。排名第二的上海浦东新区GDP相当于滨海新区的88%，而排名二到十位的区市县GDP均值（2985亿元），不足滨海新区的一半。

表1　2011年全国GDP排名前20名区市县增速和人均GDP排序

单位：亿元，%

区市县	GDP及排名		区市县	GDP增速及排名		区市县	人均GDP及排名	
天津滨海新区	6206.9	1	天津滨海新区	23.8	1	广州萝岗区	4200000	1
上海浦东新区	5484.4	2	重庆两江新区	16.4	2	天津滨海新区	244683	2
深圳宝安区	3269.5	3	深圳宝安区	14.5	3	深圳南山区	223000	3
北京朝阳区	3193.3	4	广州萝岗区	14	4	佛山南海区	172115	4
北京海淀区	3145.8	5	北京朝阳区	13.9	5	广州越秀区	162265	5
深圳南山区	2441.8	6	北京海淀区	13.5	6	深圳福田区	158700	6
苏州昆山市	2432.0	7	佛山顺德区	12.4	7	北京西城区	152918	7
无锡江阴市	2335.9	8	苏州常熟市	12.2	8	广州天河区	149030	8
北京西城区	2302.0	9	苏州昆山市	12	9	苏州张家港	148727	9
佛山顺德区	2263.9	10	无锡江阴市	12	10	苏州昆山市	147186	10
广州天河区	2138.7	11	广州天河区	12	11	无锡江阴市	145456	11
深圳福田区	2098.6	12	北京西城区	11.9	12	上海浦东新区	113454	12
佛山南海区	2080.4	13	深圳南山区	11.6	13	苏州常熟市	113133	13
深圳龙岗区	1881.3	14	苏州张家港	11.6	14	北京海淀区	95879	14
广州越秀区	1864.3	15	深圳龙岗区	11.5	15	深圳龙岗区	92808	15
苏州张家港	1860.3	16	佛山南海区	11.2	16	佛山顺德区	91531	16
苏州常熟市	1710.5	17	上海浦东新区	11.1	17	北京朝阳区	90855	17
广州萝岗区	1602.9	18	广州越秀区	9.5	18	深圳宝安区	72227	18
重庆两江新区	1587.4	19	上海闵行区	8.7	19	上海闵行区	59705	19
上海闵行区	1483.1	20	深圳福田区	8.5	20	重庆两江新区	55423	20

资料来源：各区市县2011年统计公报，其中江苏省的区市县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12》，深圳宝安区含光明新区，深圳龙岗区不含坪山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为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合计数。



2. 发展增速最快

按照经济增长一般规律，规模与速度是难以兼顾的一对矛盾。而滨海新区却有效地实现了规模与速度同步并进。滨海新区2011年的增速排名第一，高出排名第二的两江新区7.4个百分点，超出排名二到十位区市县GDP增速均值（13.4%）10.4个百分点。

3. 发展水平最高

在经济规模、速度及结构差异较大的条件下比较区域发展水平，通常采用人均GDP指标。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2011年全市R&D占GDP比重达2.6%，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保持全国第三位。使得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的质量不断提高。表1第三栏显示，滨海新区人均GDP依然名列前茅，分别是浦东新区的2.1倍和两江新区的4.4倍。排名第一的广州萝岗区类似于天津塘沽区，以广州开发区为主体，与滨海新区缺乏直接的可比性。

二　滨海新区崛起对天津经济起飞的战略贡献

天津作为全国第三大直辖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曾仅在上海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北京超过，90年代又被广州、深圳和苏州陆续赶超。天津市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多元和复杂，一直得不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扶持，不啻是一个主因。在加速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战略之后，这一局势有了显著改观。滨海新区的对于天津经济起飞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滨海新区充分拉高了全市增速

从1997年到2011年的15年间，滨海新区GDP年均增长20%，高出天津全市年均增速（12.8%）7.2个百分点，滨海新区GDP占全市比重不断提高，从1997年的31%提高到2011年的63.4%，翻了一番。“十一五”时期，天津GDP年均增速达到16.1%，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第二，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发展时期。伴随2010年、2011年GDP增速连续排名第一，天津GDP全国占比由2007年的1.97%升至2011年的2.37%，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滨海新区具有极高的贡献率

反映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增长贡献率和拉动增长幅度。从图 1 可见，1994 年滨海新区对全市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40.2%，至 2011 年贡献率高达 86.4%，有超过 4/5 的新增 GDP 来自滨海新区。1998 年滨海新区的拉动幅度为 4.3 个百分点，不及其他区县，2011 年全市 GDP 增幅 16.4 个百分点中有 14.2 个由滨海新区拉动，远超其他区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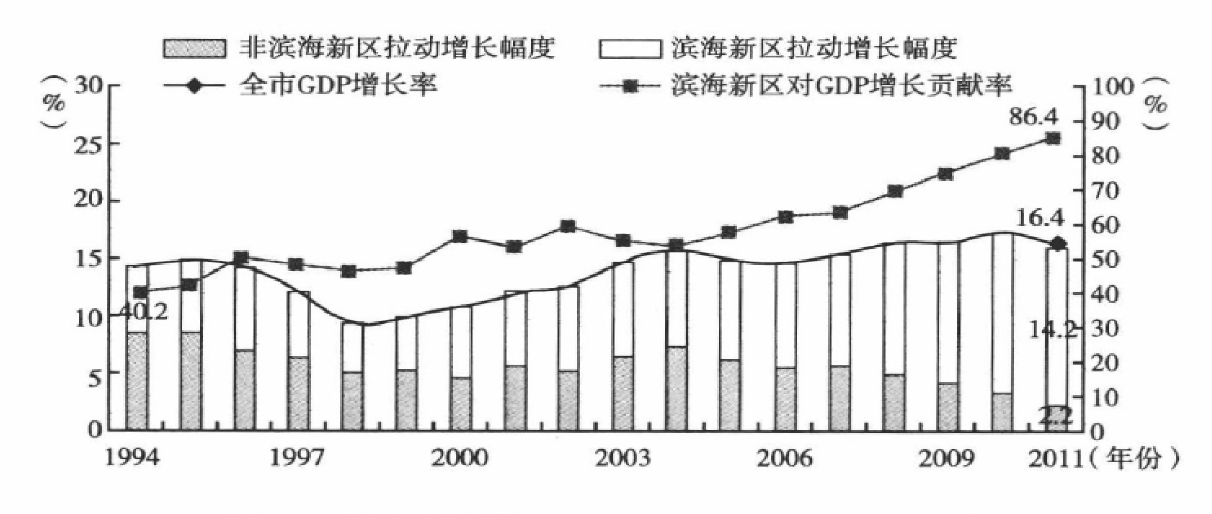


图 1　1994 年以来滨海新区对全市 GDP 增长的贡献率

3. 滨海新区提升了天津的后发优势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形成的三个区域增长极，也是改革开放历程三个阶段的发展标志。表 2 数据显示，深圳在发展最快的十年间，其 GDP 年均增速达 38.5%，但实际 GDP 十年累计仅为 175 亿元；浦东新区在增长最快的十年中，虽然 GDP 年均增速仅为 20.5%，但实际 GDP 为深圳当年的 5 倍；而滨海新区在增长最快的十年中，GDP 年均增速达 21.6%，实际 GDP 是深圳的 9.6 倍，是浦东新区的 1.9 倍。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持续的下行震荡，并未抑制滨海新区的高速发展。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测，至 2016 年天津的 GDP 年均增速可达 13%，以滨海新区高于天津全市增速 7 个百分点的速率测算，滨海新区未来 5 年的平均增速仍将维持在 20% 左右。根据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2011 ~ 2020 年，天津市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 12% 的平均增速。在滨海新区的强力推动下，天津的经济腾飞已站在了新起点，正走向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表2　深圳、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增长高峰期GDP及其增速比较

单位：%，亿元

区　域	GDP增长最快的五年	GDP年均增速	名义GDP五年合计	1978年价格GDP合计	GDP增长最快的十年	GDP年均增速	名义GDP十年合计	1978年价格GDP合计
深　圳	1980～1984年	58.6	53	35	1980～1980年	38.5	392	175
浦东新区	1992～1996年	24.4	1468	307	1992～2001年	20.5	5593	883
滨海新区	2007～2011年	23.2	20812	1080	2002～2011年	21.6	27661	1684

4. 为天津经济搭建了走向世界的基础平台

滨海新区不仅使天津成为中国快速崛起中的新星，也使天津成为世界经济低迷版图上的突出亮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3月公布了“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报告，在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天津位居榜首——当前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反映“新领军者”动向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津多次举办，凝聚了全球政商高层宏观治理思路，更离不开滨海新区的卓越表现和典型示范意义。

5. 成为天津经济转型和再度振兴的历史转折点

天津作为北方老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滨海新区快速兴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总量拉升和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滨海新区的创新实践，极大地增强了天津广大干部群众加速经济起飞、重回发展高点的时代责任和历史自信，为有效落实国家对滨海新区和天津市的功能定位，探索了可行的发展路径和运行模式，开创了协调快速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三　滨海新区2012年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势

1. 滨海新区继续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龙头作用

初步统计，2012年天津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度增速可达14%，有可能延续排名全国各省市之首。2012年天津市实现生产总值总预计为12756亿～13000亿元，继2011年超过苏州之后，极有可能在2012年超越深圳，逼近广州，实现在全国经济实力排名“第四城”的夙愿。这为天津市在2015年重回全国经济实力“第三城”的排名，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年滨海新区实际经济增速

达到21.8%，2012年规划的预期目标为20%。就当前的进度分析，全市生产总值实现14%的预期目标几成定局。这意味着，在天津2012年实现的经济总量中，滨海新区依然负担60%以上的份额，仍保持了与超过全市6～7个百分点的有效增速。客观而言，在全球经济下行，国内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长普遍收缩的大环境下，滨海新区仍能傲视群雄，独领风骚，保持强大的发展速度和惯性，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天津决策者超前的战略眼光、注重实体经济的科学判断、抢抓机遇、真抓实干的一系列创新政策和举措。就2013年的外部环境看，尽管国际形势依然严峻，但美国经济复苏明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依然胶着，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成功实现软着陆，扩大消费对稳经济的拉动愈趋明显，特别是各国领导人换届的普遍完成，对于中国和天津经济的稳定发展都是利好因素。在坚持科学发展旗帜下，天津滨海新区会继续保持一定高发展速度和后继冲力，依然可待可期。

2. 技术进步和产业链集成带动正在成为新区发展的新动力

2008年以来，滨海新区积极建立和不断完善与科技部等国家部委的合作会商制度，加强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的合作共建，迄今已有21家国家科技系统的大院大所、115多家央企的150个大项目落户滨海新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成为国家“863计划”首个产业化伙伴城区试点。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50个在天津落户，聚集了10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同时，天津市自2010年推出的“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在滨海新区取得显著成效。至目前，滨海新区被认定的科技型企业达到1087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525家，2012年新增科技企业4210家，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259家。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科技企业占比约90%。科技型中小企业当年总收入预计超过4200亿元。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滨海新区在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将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集聚和培育年销售收入百亿元以上企业10家、超10亿元企业50家、超亿元企业7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达到1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000家，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超过1.2万亿元，全市占比保持在80%以上，年均增速达到30%。



3. 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呈加速扩充的新态势

滨海新区已连续四年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千亿元”增长，在坚持先进制造业为带动战略的同时，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发展。2012 年全年，滨海新区共建成中际装备、钜宝电子、西子电梯等 71 个工业重大项目，同时积极实施了 334 个重大服务业项目，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新引进卡梅隆集团、搜狐视频、华夏人寿等 37 个总部项目，使总部企业超过 200 家；有 64 座楼宇投入使用。全年旅游接待量达到 1500 万人次。前些年颇受危机影响的天津港自 5 月份实现正增长，2012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4.76 亿吨、集装箱 1230 万标箱，分别增长 5.3%、2.6%，再创历史新高。2012 年天津港新增集装箱航线 15 条，提升航运服务，拓展航线网络，促成 4 家船公司新开环渤海内支线，使当年运量同比增长 30%。2013 年滨海新区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构筑现代农业新优势。以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入融合为着力点，依托六大总部经济聚集区，全年新增总部项目 40 个以上，培育 10 个亿元楼宇。进一步完善港口功能，引进和培育航运龙头企业。

四　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视角分析，滨海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大体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周期性发展问题，二是结构性问题，三是合作契机和整体环境问题。就周期性问题而言，天津市和全国经济宏观经济运行所处的周期不尽一致。天津市作为后发资源充裕的沿海中心城市，由于前期得益于国家赋予的政策红利，自身的资源优势又得以充分释放，至今仍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处在上行发展峰值期。但同在危机之下，由于外需收缩、出口和投资失速，一些先发省市的经济运行普遍进入至下行调整期，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成为经济运行的重中之重。客观而言，由于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建设发展，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注重大项目的投资带动，一定程度上有效摆脱投资失速和出口缩减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但兼顾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只是相对而言，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发展，虽然不存在严重的周期性问题，但必须直面自身的结构

性问题。从天津的实际出发，虽然一再强调“三高”的招商方针，很难完全规避那些非高端、缺乏自主创新内核的项目和企业，特别是在新区以外其他区县工业招商工作中，这势必为将来的二次调整留下隐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观察，天津全市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能源结构和人才结构，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发展粗放、质量低下等问题，有些正不断与先发省市拉大差距。第三个问题表明，无论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是河北省推动“环首都绿色城市带”，抑或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都有一个合作契机与条件是否成立的环境要求。可以说，自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建成之后，京津冀区域合作长期不见实质性交集，区域规划一再难产，莫不与此相关。

2013年是滨海新区实施国家战略的第6年，如何使滨海新区尽快融入和促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实现中央对滨海新区建成区域发展增长极的定位和期许，需要首先在如下两方面有所认识，有所突破。

五　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对策

1. 京冀两省市需要正视滨海新区已经确立的发展优势

过去五年，天津市依据国家定位，摆脱了单纯建设功能区的思路，特别强调将滨海新区作为中心城市的规划建设，不仅利用国家的政策红利积极推进新区机制体制的“十大改革”，更加快推动兼顾经济功能区和城市功能区建设的“十大战役”。应该说，这“十大战役”是在全面整合天津市和滨海新区资源优势和要素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滨海新区现代化、国际化、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最高建设水平。就建设北方经济中心、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而言，滨海新区这十大功能区的定位、选址、规划建设和后期运作，无论在区域发展层面，还是在政策实验层面，普遍具有“高起点规划、高速度建设、高效能管理”的特点，更强调先行先试的区域创新意义。譬如以吹泥方式建设的东疆保税港31.9平方公里造陆工程已告竣。保税港区一期4平方公里运作良好，二期6平方公里已具备封关条件。相关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进出口加工等功能不断提升。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国际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试点已及时启动。再如，正在建设的响螺湾商务区和于家堡金融



区，累计建筑面积1300万平方米，规划超高层楼宇约160栋，大大超过浦东陆家嘴和北京朝外CBD写字楼的营运规模，目标是要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功能完善、服务健全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金融创新基地。

需要强调的是，天津市和滨海新区举全市全区之力实施十大功能区建设，绝非什么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反而是天津市积极落实中央“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实现“排头兵”重任的现实举措，是服务和促进京津冀、环渤海乃至北方区域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诚然，时间短、任务重、投资大和外部环境不理想，都会对这些重大项目建设如期落成和运营构成一定影响，但北京和河北省新一届领导必须看到，天津滨海新区未来发展正需要这些宏伟工程来支撑和运营，滨海新区的发展正在和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依靠港口、铁运空运航运等区位优势和土地、能源等要素优势，一个以现代化城市为依托、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动力的新滨海将在渤海之滨脱颖而出。一旦全球经济得以复苏，滨海新区决策者和建设者在今天付出的全部努力终将得到超值的回报。

2. 天津有待不断增强服务首都，借势而为的区域协作意识

京津冀三省市的经济协作发展程度大大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大程度是京津冀历来不能撇清首都与近畿的关系，市场制度化、经济民营化进程缓慢，更是屡屡受到官本位和国企央企从优等规则的约束。只有各省市开展经济合作的愿景足以冲破封闭发展的陋识，并满足多方的利益诉求，合作的动机和环境方能成立。在西部发展持续提速、中部顺势崛起态势下，京津冀外临的东北亚区域剑拔弩张，已经威胁到本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东部各省市或应强化协作达到“抱团取暖”的目的。

对于天津新一届领导而言，如何进一步增强依托北京、服务首都区域协同发展意识，对于如何实现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甚为重要。必须看到，尽管2006年国务院对京津各自的城市规划有了重新的分工定位，北京所具有的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功能并未转入天津。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和长袖善舞的“水塔”功能，反而因结构优化而不断增强。但是，在国家政策红利东移天津之后，央企和国家各部委以对滨海新区的大规模投资却是实实在在的。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126中央企业中的115家共在天津投资了150个项目，总规模达到4330亿元，约占全市大项目投资的20%。此外，北京70%的外贸进出口货值



是通过天津港，每年来天津旅游的北京市民和自北京中转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如果考虑到北京市人才、市场中介、科研院所、技术专利、信贷资金等要素对促进天津经济带来的乘数效应，怎样强调北京对于天津发展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故此，继续强调天津受北京“灯下黑”影响过甚的论断已不合时宜。相对，如何向首都学习，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标准和质量，需要提上日程。从现实来看，从2013年始，京津发展轴上将有一系列超级大项目启建，包括首都第二国际机场、宁河县未来智慧城等。对于北京市的“战略东进”和河北省的“环首都绿色城市带”建设，天津都缺乏相应的响应和举措，尤其是地方政府间的战略合作，要伺机加以积极有序地推动。

The Status of Binhai New Area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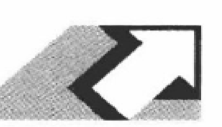
Zhang Zhi

Abstract: Based on regional comparison of the Binhai New Area,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main countermeasures the Binhai New Area should be take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Key Words: the Binhai New Area; Jing-Jin-Ji; Regional cooperation

长三角与长江流域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Around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变化研究

石忆邵　谭文垦　胡建民*

摘　要：

本研究从资源的供给与需求角度，选取代表性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0～2009年间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以及典型城市上海的城市综合承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承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交通以及环境承载力，发展的瓶颈为科技承载力；长三角城市群承载力呈上升趋势，群内城市承载能力差异在缩小；上海的城市承载数值一直处于扩大趋势，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土地及环境承载力，发展的短板为科技承载力。

关键词：

长三角城市群　城市综合承载力　指标体系

* 石忆邵，博士，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及城市发展、土地利用；谭文垦，博士，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地理信息工程。E-mail：archonimp@126.com。

城市综合承载力，是指城市在不产生任何破坏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即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城市综合承载力是一个具有“能力”内涵的概念。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研究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省的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浙江省的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等 16 个城市及其所辖的 74 个县市。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密度高，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 11.01 万 km^2，2009 年总人口 8450.7 万人①，以占全国 1.1%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6.3% 的人口（不含外来人口，实际应接近 10%），集聚了 49.2% 的国际资本，创造了 18.6% 的 GDP、21.1% 的财政收入和 37% 的外贸出口。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更加剧了城市群有序发展的压力。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短缺已成为困扰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②，而交通压力、环境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亦是长三角城市群直接面临的城市发展难题。作为长三角首位城市的上海，由于其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及辅助服务设施，因此各种城市发展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迫切需要进行区域层面城市承载能力评价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提出部分可借鉴的有效措施，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实现城市的合理与可持续发展。

一　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见表 1），进行区域尺度的

① 《中国统计年鉴 2010》，人口数据为年末数据。

② 顾朝林、张敏、张成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 年第 15 期。



城市承载力研究，以探求区域尺度下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动态变化规律。并以上海为典型城市样本，剖析单个城市在区域背景下的承载发展状况及原因。

表1　长三角城市群样本（按省级分类）

省　份	个数	包含城市
上海市	1	上海
江　苏	8	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
浙　江	7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舟山、湖州、台州

2. 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0），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水资源公报》（2001～2004）、《中国建设年鉴》（2002～2006）、《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长江及珠江三角洲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①（2003～2009）和《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 1～No. 6）的数据，对于部分明显不合理数据，采用各地统计年鉴与各部门统计年鉴进行了调整（例如，2002年部分城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超过100%等，做了相应调整。碍于篇幅，本研究不再一一罗列）。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中城市承载力包括要素系统承载力和城市综合承载力。其中要素承载力具有“阈值”的含义，即如果超越该阈值将导致环境严重甚至不可逆转的破坏，进而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城市发展中的要素短板。

将单个城市作为一个分析样本，从区域层面出发，进行城市承载能力的时空分析。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不同时点的平面数据表整合成统一的立体时序数据表，同时取得各指标的权重，依据一定的规则计算综合承载能力得分。通过对结果的时序比较以及空间变异的分析完成城市综合承载力在长三角范围内的变化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方法及结果，分析典型城市——上海承载能力总体及各分系

① 2008年后，改名称为《长江及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台统计年鉴》。

统的现状，其相对于其他城市所存在的问题。

上述分析结果将从宏观的角度为后续有效的承载力提升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尤其为主体功能区划分、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三）主要研究方法

经典主成分分析只针对由样本和指标构成的平面数据表，并未加入时间序列。如果对每张平面数据表进行经典的主成分分析，由于不同的数据表具有不同的主平面，无法对同一样本不同时点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为了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可比性，需要将不同时点的平面数据表整合成统一的立体时序数据表，然后用经典主成分方法进行分析。这种加入时间序列的主成分分析即为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Generalized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城市综合承载力是具有显著动态特性的多维复杂系统。在资源耗用、污染物排放、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等自然作用和人为干预下，城市综合承载力随时间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表征数据按时间顺序形成平面数据表序列，构成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数据集，称为立体时序数据表。若对序列内每一张平面数据表进行单表主成分分析，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简化空间，无法保证时序区间内分析结论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得到统一的简化子空间，便于迅速提取立体数据表中的重要信息，把握城市综合承载力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规律。

GPCA 主要解决了长时间序列数据不同年份间的可比问题，其带有 PCA 方法固然的缺陷，如需要进行指标正态标准化；当主成分的因子负荷的符号有正有负时，综合评价函数意义就不明确，命名清晰性低；当指标间线性相关程度不高时，累积贡献率较小，需考虑其他非线性手段予以改进。

二　指标体系构建

（一）选取原则

本研究认为，选择城市承载力的评价指标，指标筛选必须达到如下目标，



即指标体系能够完整准确地反映城市承载力的状态，能够提供现状代表性的特点；又能对各个子系统的承载状态和人类资源利用的方式进行监测，寻求自然、人为压力与承载力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探求承载力系统问题存在的原因；同时还能定期地为政府决策、科研以及公众要求提供城市承载力系统承载现状、变化及趋势的统计分析和解释报告。为此，其筛选指标应遵循如下五个原则：目的性原则、本质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根据上述原则，本研究重点对城市承载力的核心要素：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交通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科技承载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设计。

（二）指标选取

基于以上分析，在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表征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如表 2 所示。

按照相关研究成果分析的城市综合承载力构成，结合数据可获取性，建立层次结构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共分三层。

第一层为目标层，即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

第二层为准则层，由构成综合承载力指数的土地承载能力指数、水资源承载能力指数、交通承载能力指数、环境承载能力指数和科技承载能力指数构成；

第三层为指标层，由表征准则层的具体指标构成，依据上述指标确定原则，通过甄选及专家意见咨询，确定 18 个具体指标作为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指标。

土地承载力评价的内容：土地承载力的客观评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供给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建成区与耕地面积指标。二是地上承载物（如人口、经济等）对土地的需求，选取地均 GDP、非农业人口比重作为指标。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的内容：选取供水总量和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作为供水能力和用水需求的指标。

交通承载力评价的内容：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道路面积比作为供给指标，年末实有公交营运车辆数、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作为需求指标。

表 2　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城市综合承载力	土地承载能力	0.2190	建成区面积(km^2)	0.0538(+)
			年末耕地总面积(kha)	0.0137(+)
			地均 GDP *(万元/km^2)	0.0871(+)
			非农业人口比重(%)	0.0644(+)
	水资源承载能力	0.1204	供水总量(万 m^3)	0.0504(+)
			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m^3/人)	0.0700(-)
	交通承载能力	0.2675	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万 m^2)	0.0720(+)
			年末实有公交营运车辆数(辆)	0.0573(+)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辆)	0.0549(+)
			道路面积比 *(%)	0.0833(+)
	环境承载能力	0.2647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0.0567(-)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0.0430(+)
			园林绿地面积(ha)	0.027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467(+)
			全年用电量(万 kwh)	0.0674(+)
			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kwh/人)	0.0235(-)
	科技承载能力	0.1284	科研从业人员数(人/万人)	0.0518(+)
			专利批准量(件)	0.0766(+)

注：①指标数据除带星号数据外，均来直接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07）、中国建设年鉴（2002～2006）、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0～2001）、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No.6）等相关统计资料。带星号指标为计算所得。其中，地均 GDP = 全市 GPD/行政区土地面积，道路面积比 = 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面积。

②采用主成分分析，指标层的指标个数，对准则层权重的影响不大（有影响是肯定的，但是相对于均方差分析等其他客观赋值方法，影响相对较小）。通过主成分赋权，各指标权重见表第 5 栏。

③研究中将评价指标分为“效益型”和“成本型”两大类，“效益型”指标是指属性值与承载力正相关的指标，“成本型”指标是指属性值与承载力负相关的指标，“+”为效益型指标，“-”为成本型指标。

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内容：能源方面，全年用电量作为能源供应指标衡量，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作为消耗指标；环境方面，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消耗指标，园林绿地面积作为供应指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结构指标。

科技承载力评价的内容：选取万人科研从业人员数和专利批准量作为科技供应能力和科技创新需求的指标。



三　结果分析之一——长三角城市群

（一）城市群承载力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各单项指标的权重（见表2），在指标层权重中，地均 GDP 权重0.0871，值最大，其次为道路面积比权重0.0833，专利批准量权重0.0766。这表明在2000～2009年这10年中，地均 GDP 是对城市综合承载力最具有影响力的指标，其次是道路面积比和专利批准量这两个指标。说明经济实力以及土地生产率高低对城市综合承载力影响显著，交通系统中的道路供给比例和科技承载系统中的科技成果需求亦对城市承载力有较大影响。

从各要素承载力（准则层）的权重分析，交通承载力对城市综合承载力影响最大，权重0.2675，环境承载力次之，权重0.2647。土地承载力（0.219）、科技承载力（0.1284）、水资源承载力（0.1204）影响力较弱。由此可见，在2000～2009年这10年中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的主要要素是交通承载力及环境承载力。这说明现有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满足长三角城市群现已产生的较大出行需求，而且这种承载的矛盾已成为影响城市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未及时跟进，导致历史欠账，同时对于经济发展后旺盛的用车需求缺乏引导管理。环境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伴生大问题，尤其是在长三角这一全国最大区域，虽然目前已引起各界的重视，但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因此其对综合承载结果亦有较大影响力。

水资源承载力影响最弱，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地处江南，水资源总量及潜在可利用量较国内其他城市群（如中原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等）丰富。在人均需求全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水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一个良性承载的状态，因此对最终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影响较弱。

（二）城市群要素承载力时序分析

从近10年的要素承载力数值变化分析（见图1），长三角城市群各要素承

载力都有所提高，虽然交通承载力在2005年、环境承载力在2007年开始降低，但都难改总体提高的趋势。这说明随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城市群扩大了资源环境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转化了部分承载潜力，提高了利用效率，通过对城市内部的建设促使了城市容纳增大，最终导致城市承载各要素承载力的提高。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及管理的原因有所反复，但扩大的整体趋势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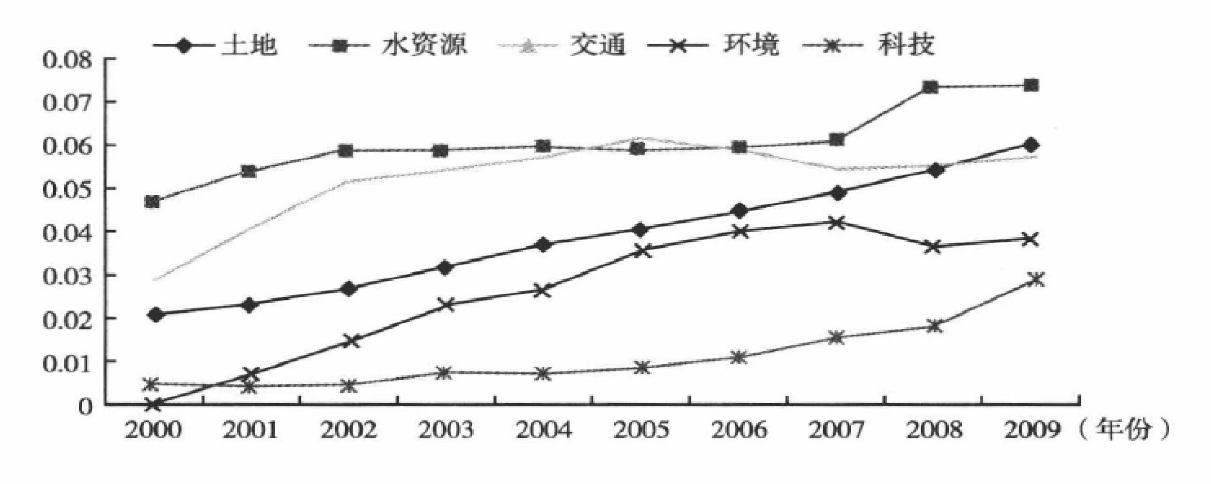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09年要素承载力数值变化

技术革新引致的生产方式革新带来的产品供给扩张与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动态变化可能会引发资源环境供给的相对短缺，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压缩承载力。虽然有些要素可以从城市以外的区域调入，但是随着资源稀缺性的不断加强，城市花费的成本将会不断攀升，当到达一定限度之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会受到威胁。时序的变化显示这种动态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一直存在，但是否已达到警戒水平尚缺乏明显的证据。

从近10年的要素承载力比例变化分析（见图2），长三角城市群各要素承载力比例有趋同的趋势，水资源承载力、交通承载力比例一直在降低，而环境承载力比例2007年后亦开始降低，土地及科技承载力比例则一直在增加。这说明长三角城市发展已经开始从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科技承载力对整体承载力的贡献在逐年加大，2005年后这种贡献率增加更快。城市扩张的压力使土地资源对城市发展的软约束（原来建设用地指标宽松）正在转变为城市发展的硬约束（建设用地指标稀缺），因此土地承载力的比例在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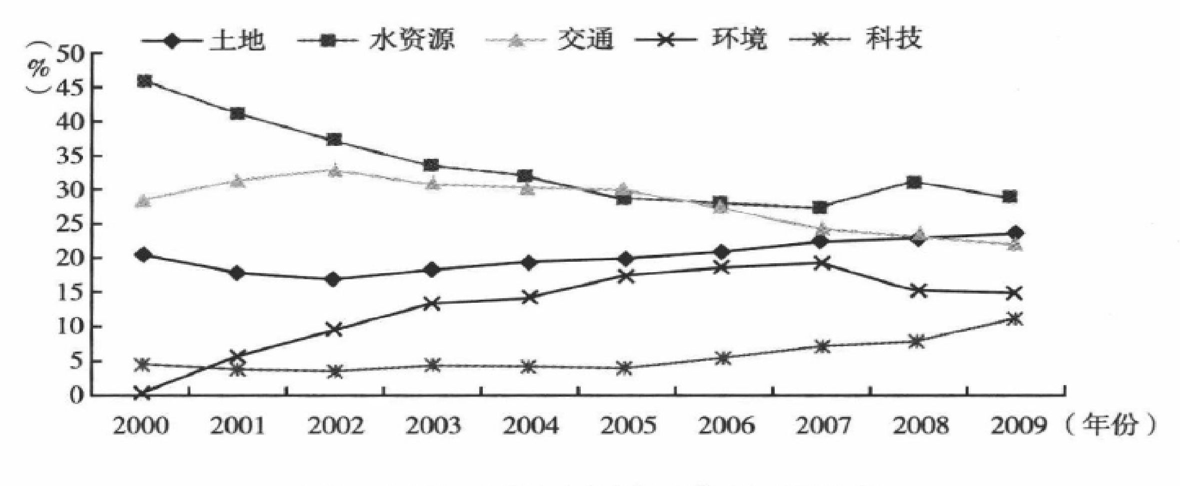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09 年要素承载力比例变化

从单个要素承载的发展分析，除 2000 年外，科技承载力一直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其次为环境承载力。

科技创新是城市承载力具有动态特征的表现，不仅体现为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同样包括管理理念、资源配置方法的改进。技术进步能带来城市承载力供给方面的增大，一方面潜在的资源环境将会变成现实的存量，加大承载力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得单位产出的能耗、水耗降低，从质的方面加大承载力的供给能力。长三角城市群 2000～2009 年的发展基本以资源能源等要素驱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 等技术驱动城市发展的概念均是 2010 年世博会后提出的。技术进步滞后导致现阶段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如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比国际水平高 40%，火电煤耗高于国际水平 30%，万元 GDP 耗水比国际水平高 5 倍，能耗高于国际水平 3 倍，而城市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又只及国外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种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科技承载力成为瓶颈的原因。

同时，长三角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堪忧。长三角城市群水资源总量丰富，但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水质性缺水”。长江口、杭州湾及附近海域是我国近岸海域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上海、苏锡常地区、杭嘉湖地区因地下水超采，形成大面积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危及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从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来看，常州、泰州、杭州、嘉兴、绍兴 5 个地市的万元工业总产值 COD 排放量高于全国重点城市的平均水平。城镇生活污水的处理

水平仍然偏低，南通、扬州、泰州、宁波、台州 5 个城市的生活污水处理率甚至低于重点城市 46% 的平均水平，在该地区人口逐年快速增长的情形下，生活污水处理水平若不及时提高将加重地区水环境的压力。大气污染突出，工业二氧化硫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上海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最大，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74%，其次是苏州和宁波两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98%。

（三）城市群承载力的空间变异分析

变异系数又称“标准差率”，是衡量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当进行两个或多个资料的变异程度时，采用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相对值）来比较，即为变异系数，记为 Cv，计算公式为：

$$Cv = \frac{S}{x} \times 100\%$$

利用变异系数（Cv）进行区域差异的评估显示（见图 3）。近 10 年里，长三角城市群的差异在逐年减小，但目前差异仍较大（2009 年，Cv 为 5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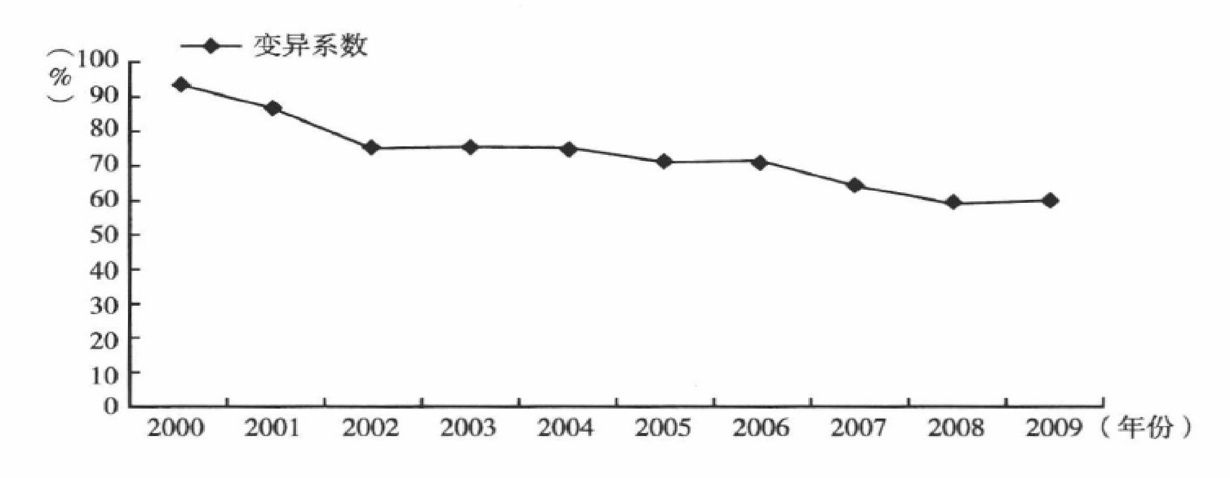


图 3　长三角城市群 2000 ~ 2009 年城市综合承载力区域差异变化

以上结果说明：长三角区域内省、市行政区划分割明显。就目前的 16 个城市而言，被江、浙、沪两省一市的行政区界一分为三，这在其他城市群是不多见的。由此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区域内各城市间正常的交流和合作以及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也间接造成了城市间承载能



力较少相互影响，基本为独立发展的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上海率先提出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倡议并逐步成为各城市政府的共识。开始是区域协作，随后是区域联动，并由此而建立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议制度，由口号而逐步具体化为实际的推进行动，在商贸联动、旅游联动等少数领域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这些直接导致了城市间承载能力差异的缩小，但就总体而言，经过十数年的努力，长三角一体化还是坐而论道多于实际行动，动力不足而阻力不小，在产业发展、市场建设、生态保护等许多重要领域依然是各自为政状态。

因此，近 10 年虽然长三角一体化等措施使差异化有减少的趋势，但是长三角城市群承载力总体空间差异仍很大。

四　结果分析之二——典型城市上海

（一）城市承载力数值总体呈扩大趋势

从上海市自身发展的角度分析，2000～2009 年上海城市承载力数值总体呈现扩大态势，综合承载力数值由 2000 年的 0.4425 增长到 2009 年 0.7576，年均增长 7.12%。同时与长三角各城市承载力均值偏离增大（见图 4），2000 年偏离值为 0.3396，扩大到 2009 年的 0.5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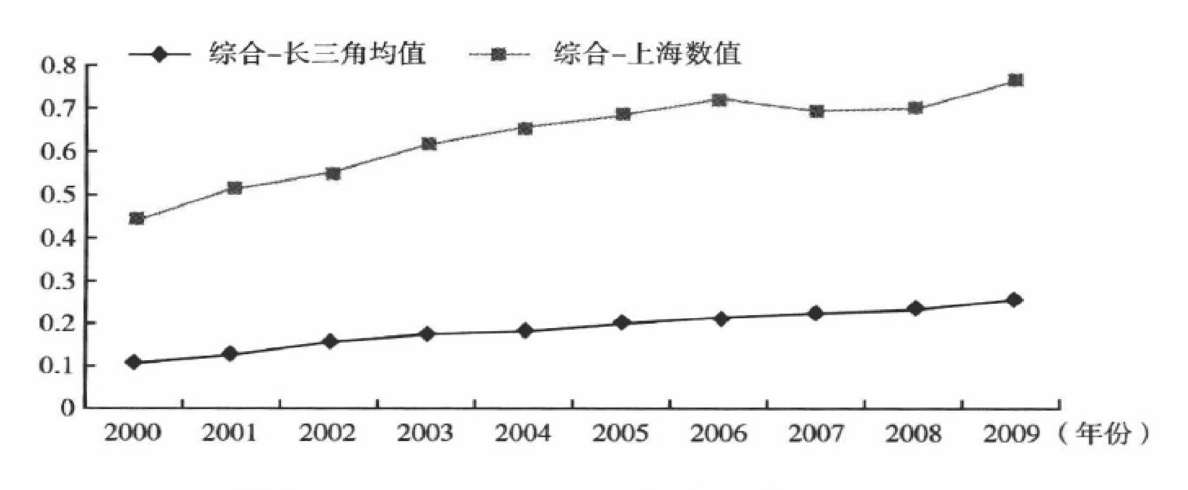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09 年上海与长三角承载力均值比较

这说明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上海整体的城市容量仍在持续扩大，而且这种容量扩张的速度快于长三角城市的平均扩张速度。显示上海强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区域资源能源获取能力，以及内部城市建设能力。

（二）各要素系统承载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从上海各要素系统承载力及其发展情况来看（图5、图6），无论是数值还是比例，均存在以下几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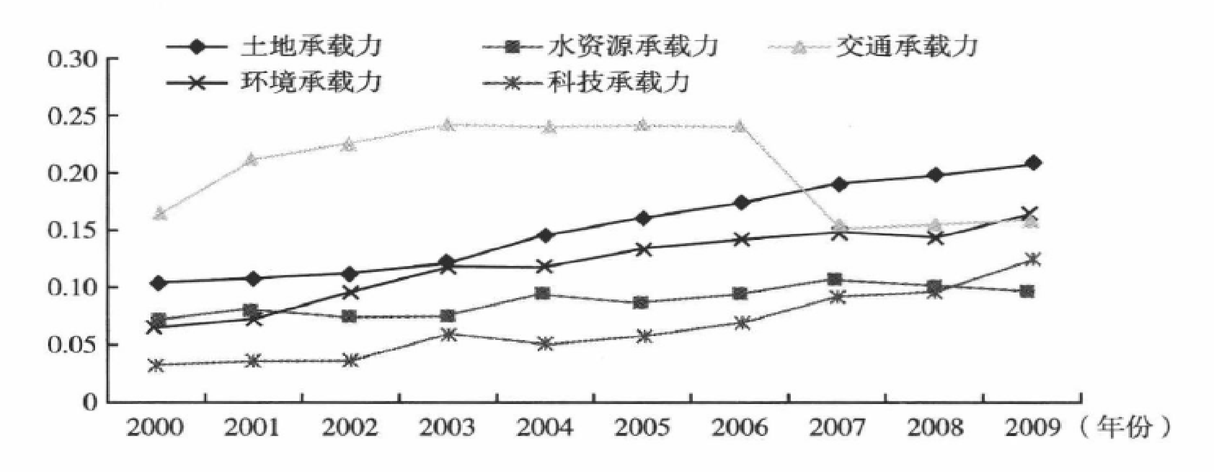


图5　上海市2000～2009年要素承载力数值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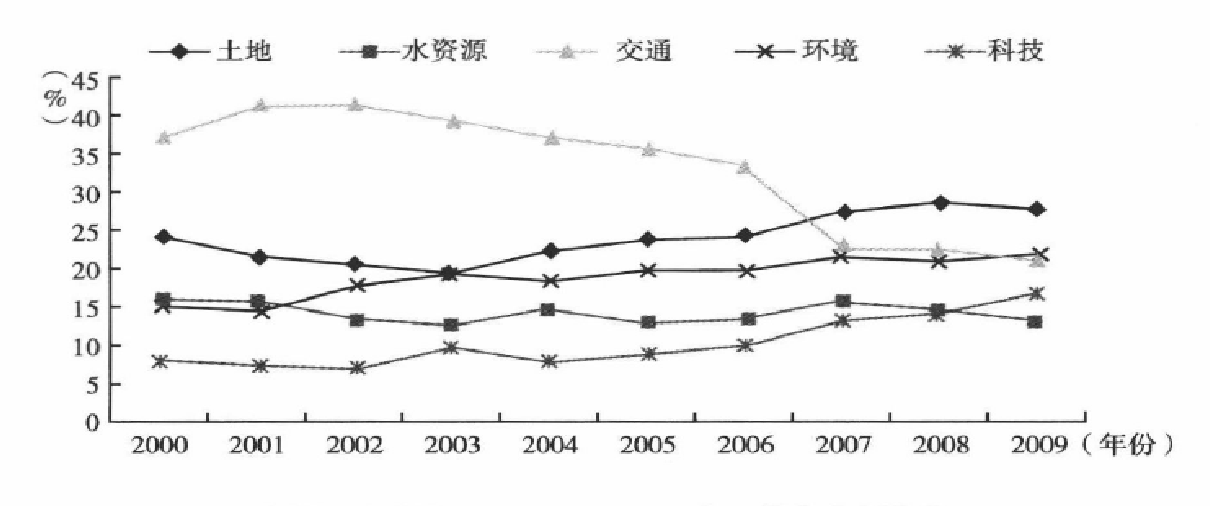


图6　上海市2000～2009年要素承载力比例变化

2001年前：以交通和土地承载力对总体承载的影响最大，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影响相差无几，科技承载力是短板。这说明1990年开始的经济起飞阶段，



主要受城市扩张的土地资源影响，以及内部滞后的交通设施建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以资源能源消耗的要素扩张为主，科技贡献薄弱。

2001～2002 年：这一阶段显著特点是环境承载力对总体承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几乎达到和土地承载力一样的影响能力。这说明从 1980 年代经济转型开始的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积累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开始引起重视。

2003～2007 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交通承载力的影响力在持续一段时间的稳定影响后，2007 年开始弱化；土地、环境、科技承载力影响稳步上升；水资源承载力影响平稳波动。这说明经过一段时间轨道交通的发展，城市交通状况已有质的改善。土地、环境、科技承载状况依旧未有显著改观，受发展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约束进一步强化。

2007 年以后，科技承载力影响力显著上升，已经取代水资源，成为排名第四的影响因素。环境承载力影响力上升，超越交通承载，成为排名第二的影响因素。土地承载力成为最主要影响因素，且影响力持续上升，交通承载力基本不变，而水资源承载力略有下降，且已经成为承载的短板。这说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告别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发展战略转变。

五　对策与建议

为使城市总体承载状况得到改善，要素承载能力得到均衡发展，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需从城市承载力监测评估体系建立、实施主体确立、加强部门之间协作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典型城市上海的分析结果建议需根据承载情况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并对土地利用以及科技创新等能力进一步挖潜。以保障城市承载力有效提升，城市各类活动有序进行。

（一）对策措施

1. 建立承载力监测评估体系，增强评估的科学性

科学的承载力监测评估体系，是科学评价城市承载力的根本前提。针对现

有承载力评估体系的缺失，结合我国城市的地域特点，根据城市承载力各要素的实际情况，从尺度和效用两方面建立城市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GIS技术建立分析评估平台。首先，详细分析不同尺度下的影响因素，力求对承载力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深度剖析。其次选取各要素子系统中反映要素承压两方面的指标表示承载力，并利用主观和客观的方法选择指标，建立初步的指标体系及监测评估系统。运用初步的成果对典型城市进行承载力评价和管治示范，并与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校核指标体系。最后，在全国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承载力评估，进一步优化承载力评估体系，最终确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平台以及监测预警机制，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

2. 构建承载力评估机构，确立实施主体

明确的实施主体，是保障承载力空间管治的关键，也是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的重要保障。城市空间管治的实施主体是城市政府。空间管治的实施必须以权威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建议作为依据。评估采取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评估的方式。承载力的评估机构分为组织机构、评估机构、实施机构。组织机构由城市政府组织，或者委托当地科协组织评估。评估机构应由国土、水利、交通、建设、环境、科技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承载力的测评与发布。实施机构则由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组成，具体落实城市空间管理、规划实施后评价、提升承载力策略，等等。

3. 加强部门之间协作，保障实施途径顺畅

城市承载力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城市能力指标。评价分析的内容分布与各个城市分系统中，每个分系统又对应不同的管理部门。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联动机制，把个体的力量转化为整体的力量，从而发挥整体的最大优势。加强政府各个分系统管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在专门的承载力管理机构中进行经验交流，提高城市承载力管理的效率。建立非政府组织及市民参与的承载管理社会网络，使公众需求能得到畅通的表达，动员全体市民参与承载管理，建立政府与市民及民间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建立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准确掌握信息、增加管理透明度、稳定局势，等等。加强城市政府与承载力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进行城市承载力管理经验的咨询。



（二）对典型城市发展的建议

1. 对城市规模以及性质的发展建议

从前文分析得出的结论看，上海城市承载力发展水平远远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且发展相对独立，同时城市的承载状况并不良好。因此首先需要适当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同时彻底改变单中心集聚的发展模式，建立郊区新城，分散中心城区的庞大人口和需求，改善城市的承载状况。其次，由于承载力发展水平远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因此上海城市性质不应局限于做长三角龙头，应该放眼世界，应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关键结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最后，需要切实落实长三角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与区域城市在金融、能源、技术等全方位的合作，将自身发展经验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共享，共同促进区域城市群的发展。

2. 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利用以及科技创新潜力

就上海自身的发展情况而言，需要充分挖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地节约建设用地资源，适当限制城市建成区的年际扩张速度。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关键是提高地均 GDP 的产出能力。应以发达国家标准为参照，转变现在的粗放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改造等措施提升企业实力，同时淘汰部分落后企业，对引进企业设立规模、技术以及环境保护等相关要求。

“十二五”时期上海的发展战略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体现了对于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相比较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需要从培训科技人员、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方面进行努力。

六　结语

在长三角城市群层面，承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交通以及环境承载力，发展的瓶颈为科技承载力；时序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承载力呈上升趋势，各要素承载力都有所提高，但路径略有不同；同时长三角城市群承载能力差异在缩小。

对典型城市上海的分析表明：上海的城市承载数值一直处于扩大趋势；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土地及环境承载力，发展的短板为科技承载力，交通承载力趋于改善，而水资源承载力变化较小；其主要的要素承载力存在巨大的潜力和改善空间。

本研究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理解与判断尚是初步的，如何给予定性分析、定量的度量，并给出评估的指标体系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部分。同时城市跨区域的资源占用能力往往使现有的承载力分析研究实际操作意义受到损害。例如：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购买、跨区域调水等。只要城市具有足够的资金和迫切的需求，跨区域的资源占用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常态。

参考文献

傅鸿源等：《城市综合承载力研究综述》，《城市问题》2009 年第 5 期。

吕斌、孙莉、谭文垦：《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年第 5 期。

谭文垦、石忆邵、孙莉：《关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年第 1 期。

王书华、毛汉英：《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设计及评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案例研究》，《自然资源学报》2001 年第 3 期。

王丹、陈爽等：《城市承载力空间差异分析方法——以常州为例》，《生态学报》2011 年第 5 期。

张继承、潘新春：《基于 RS/GIS 和 AHP-GPCA 模型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变迁综合评价》，《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11 年第 4 期。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the Overall Corrying Capacity of the Yangtze Delta Cities

Shi Yishao　Tan Wenken　Hu Jianmin

Abstract: Focus on the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and established the index system. Using the generaliz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t evaluated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UCC) of 16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00 – 200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key impact factor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UCC were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bottleneck 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UCC showed upward trend and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UCC differences were narrowing; UCC value of Shanghai had been in widening, it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land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short board of development is technology capacity.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city group;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Guideline system

B.9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研究

彭智敏　周睿全*

摘　要：

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产业合作，因为涉及经济利益等问题，虽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但是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多。本文在对该区域产业合作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的三种途径。

关键词：

长江中游城市群　产业合作　比较优势　合作路径　重点突破

产业合作既是实现产业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区域合作实现的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因此有效推进产业合作，实现区域产业的合理分工和空间优化布局，成为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的重要一环。

然而，由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地理位置毗邻，自然资源状况、历史文化、经济结构、产品种类甚至发展重点都存在着很高相似性，因此，传统产业合作理论很难解释其合作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但是，这个区域的合作不仅有内生动力，而且存在周边经济区合作的挤压，形成了一种合作的“倒逼机制”。

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的现状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源远流长，100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具有

* 彭智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流域开发。参加本课题研究的还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静、汤鹏飞、白洁、韩红亮等。



托拉斯性质的企业汉冶萍公司就诞生在湖北和江西两省。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省的经济合作逐步拓宽，目前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产业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十一五”以来，湖南省实施与湖北的内联合作项目达1000多项，实际到位资金608.79亿元，占全省实际到位内资总额的6.3%。2011年，湖北省企业在湖南投资项目283个，总投资424.0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18.3亿元，同比增长28.6%，占全省比重的5.7%，远远高于中部其他四省（河南1%，山西0.4%，江西3.6%，安徽1.1%）。作为经贸合作的重要成果，湖北省湖南商会和湖南省湖北商会分别于2007年5月和2010年9月正式成立，企业会员分别达到430家和158家，经营涉及房地产、机械、建材、科技产业、文化传媒等行业。

江西引进内资的重点集中在长珠闽地区，比重达到70%以上，但湖北和湖南两省也是重要来源之一。2012年1~7月，湖北、湖南在赣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分别达到29个和57个，占引进省外项目个数的2.93%和5.75%，实际到位资金56.84亿元和90.19亿元，占比为3.16%和5.01%。湖北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绿色食品、新能源、电子信息等行业；湖南投资的重点在矿山开发、机械制造、新型建材等行业。目前，江西省已成立了湖南商会，湖北商会还在筹备之中。

对三省政府部门和企业发放的55份调查表显示，三省签署框架协议的有20个，占总数的36.36%；建立协调机构的有16个，占总数的29.09%；进行具体项目合作的有19个，占总数的34.55%（如图1）。通过图表分析可知，目前三省市政府对口部门之间合作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过签署框架协议和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的，而建立协调机构的相对较少。

（二）合作区域呈现毗邻地区与中心城市齐头并进的局面

湖北的咸宁、黄冈、洪湖等市与相邻的湖南岳阳和江西九江两市由于地理上相邻，长江一水相连，历史和现在都有比较多的联系，存在着众多的人员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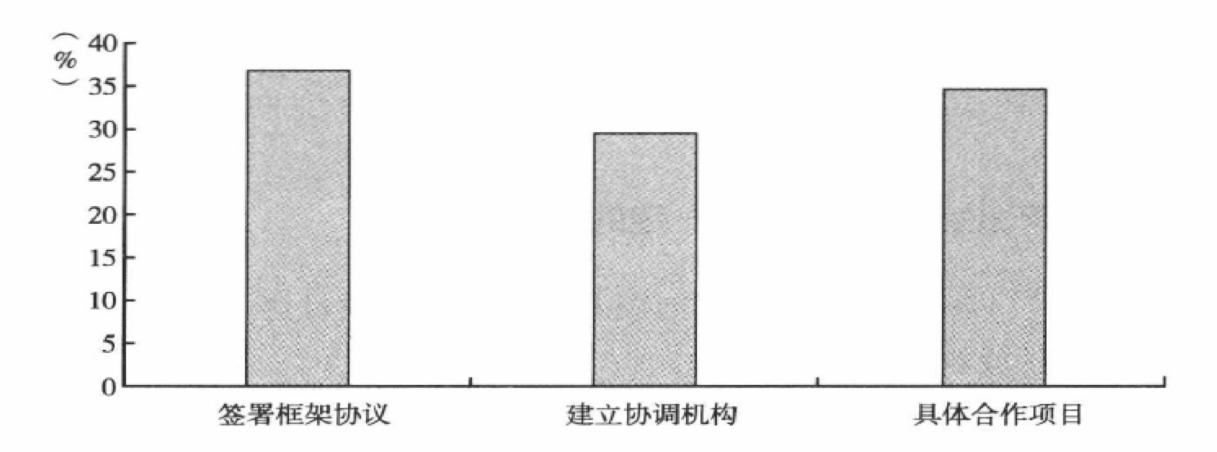


图1　湘鄂赣三省部门合作的主要形式

动和经贸往来，彼此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一直就存在。不过规模不大，发展的速度不快。但2012年以来，以三省高层会商会为契机，加快了合作步伐，2012年4月19日，岳阳市、九江市、咸宁市签订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和区域旅游合作协议，提出着力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先行区、示范区。同年6月，三市签署交通运输发展框架协议，着力构建“小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湖北则因势利导，提出把地处鄂、赣、皖交界处的黄梅县小池镇从“九江的菜篮子”（最高时市场份额占到50%以上，目前还占约1/3）打造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示范区”和“跨江跨区合作试验区”。

另外，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凭借大企业多、人才多、信息便捷等优势，跨省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如武汉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在南昌投资13亿元建设饮料系列产品，欧亚达集团在武汉成功做大后又到南昌、长沙开设了多家卖场。三一重工、远大住工、中联重科、湘电集团等湖南大企业在鄂设立了省级分公司。

（三）部分产业合作已见雏形

近些年，总部设在湖北黄石的华新水泥公司先后在湖南株洲、娄底、郴州、永州、岳阳等地建设十余个生产基地；武汉凯迪控股在湖南省张家界、永州、常德、株洲等地投资生物质能源项目；葛洲坝集团投资南山风电，参与湘江航电枢纽建设；两年前，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针对武汉市轨道交



通1号线高架线的特点，打造了我国首款静音型地铁车辆，2012年该公司再次为武汉地铁2号线量身定制地铁车辆。

咸宁的钒产业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一，其主要原料五氧化二钒除了来自咸宁本地外，岳阳和九江的县市也是其主要的原料供给地，在咸岳九“小三角”内已经形成了原料供应、产品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此外，咸宁的油茶加工业的原料供应也主要来源于岳阳和九江，湖北洪湖的船舶维修行业主要服务于长江对岸的岳阳；而且在能源产业方面，武汉、荆州、岳阳、九江、宜都市等城市正在共同打造能源储备基地。

（四）产业合作的愿望很高

就走访调研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若干城市来看，这些地区参与产业合作都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特别是三省沿江交界的咸宁、黄冈、洪湖、岳阳和九江这几个城市，这种愿望表现得更加强烈。目前洪湖就有好几个项目正在积极筹划与一江之隔的岳阳进行产业对接。例如打造石化设备产业集群积极参与岳阳石化产业分工与协作，在特色水产业领域与岳阳洞庭湖区实现错位发展、市场共享。同时，借助岳阳城陵矶省级“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建设和临港产业新区建设的东风，积极承接湖南机械、食品加工等产业转移。

二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明显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如果存在明显的梯度差，那么互补性就比较明显，产业合作也比较容易展开。由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分工、区域毗邻以及资源接近等原因，总体来说，鄂湘赣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同处于一个阶段，产业布局上偏于重工业，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趋同特征，三省产业相似度达80%～90%，即从产业同构的角度分析，湘鄂赣三省的产业竞争远大于合作。

表 1　2011 年湘鄂赣三省千亿产业

地　区	千亿产业
湖北省	汽车、钢铁、石化、电子信息、食品、纺织、机械、建材
湖南省	机械、石化、食品、有色金属、轻工、冶金、建材、电子信息
江西省	有色金属、钢铁、石化、食品、纺织

资料来源：《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2012）、《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2012）、《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2012）。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在千亿支柱产业类别上，省际有近半重合。而且三省具备的优势也近乎雷同——人力资源、区域环境和市场消费等，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中也表现出明显的趋同与竞争，承接的项目多为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建材等产业。而且都还追求大而全，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还比较少，没有形成合理分工、错位发展。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推出的 2012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湖北省有 15 家企业入围，位居中部第一位，江西省有 12 家，湖南省 8 家。东风汽车公司排在第三位，在三省中排名最高。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排名第 28 位；湖南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53 位。在入围的企业当中，以钢铁、汽车、化工、烟草等行业的居多，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不高。

表 2　2012 年湘鄂赣三省入围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数量

湘鄂赣三省	湖北	湖南	江西
入围企业总数	15	8	12
排名 1～100 企业数量	4	4	1
排名 101～200 企业数量	1	1	3
排名 201～300 企业数量	2	1	1
排名 301～400 企业数量	5	1	5
排名 401～500 企业数量	3	1	2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的 2012 年中国 500 强企业名单。

然而，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观察，以集群化发展为方向的产业，不仅能有效避免同业竞争，而且会不断地延伸产业链条和细分市场，使整个产业能够更加有效发展。当前，湘鄂赣三省的主要支柱产业大致相似，发展根本策略也是强



化产业集群化方向。以撑起三省经济脊梁的千亿产业为例，2011 年在湖北，汽车、钢铁、石化、食品、机械、电子信息、纺织、电力、建材“九大金钢”，相继上榜。在湖南，机械、食品、石化、有色、轻工、建材、冶金和电子信息制造“八大支柱”，相继挺起。在江西，有色、钢铁、石化、食品、纺织“五朵金花”，相继绽放（见表 3）。

表 3　2011 年湘鄂赣三省千亿支柱产业的重合度

支柱产业类别＼省份	湖北	湖南	江西
汽　　车	有	有	无
钢　　铁	有	有	有
石　　化	有	有	有
机　　械	有	有	无
食　　品	有	有	有
纺　　织	有	无	有
电子信息	有	有	无
电　　力	有	无	无
建　　材	有	有	无
有　　色	无	有	有

注：“有”代表具有该千亿产业；“无”代表没有该千亿产业。

表 3 显示，三省 2011 年度的千亿支柱产业中，除了电力是湖北独有的支柱产业，汽车、钢铁、机械、纺织、电子信息、建材、有色等产业是两省共有，石化、食品则是三省共有的，因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在千亿支柱产业类别上，省际有近半重合。在市场机制作用和政策利导的双重作用下，健康的集群化发展有利于三省产业的融合。

（二）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双欠缺

目前，三省产业合作虽然已经积极展开，但区域有限、规模不大。就现有产业合作的形式来看，大多属于原料供应、产品加工这类比较初级的合作，还没有形成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等产业分工协作形式，而且从产业合作的领域来看，只是在某些特殊细分的行业中存在着产业合作的形式，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三）产业转移中的顾虑

岳阳和九江两市是湘赣两省“两型”社会建设及绿色崛起的突破口和门户重地。岳阳、九江作为湘赣两省重要的临江城市，同时也是湘赣两省重要的能源聚散地，能源化工产业非常发达。由于各地区执行环保标准的力度不同，咸宁、黄冈、洪湖等地就反映了岳阳临湘、云溪以及九江瑞昌等地化工企业的乱排放问题。因此这些区域担心如果产业合作全面展开，岳阳、九江两地势必有较强污染性的企业，如化工企业会迁入进来，造成当地的自然生态的破坏。

（四）行政区划的阻碍

目前，由于三大城市群隶属不同的行政主体，在产业一体化过程中很难避免因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生的冲突。从《武汉城市圈“十二五”发展规划》《湖南省“十二五”长株潭（3+5）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和《环鄱阳湖经济圈规划（2006~2010）》来看，其产业政策重点并未充分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大环境，地区产业布局单打独斗色彩较浓。即使渊源较深的三省相邻地区优先考虑的也是对接各自省域内的产业发展规划，参与省域内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跨省域的产业分工目前尚未有实质性的展开。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城市功能定位相近因素的有22个，占统计结果的17.32%；认为行政分割因素的有33个，占统计结果的25.98%；认为产业同质化竞争因素的有29个，占统计结果的22.83%；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因素的有13个，占统计结果的10.24%；认为区域合作机制不健全因素的有30个，占统计结果的23.62%（如图2所示）。

三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的推进策略

（一）规划对接、机制共建、加强引导

首先，政府层面（特别是省级政府和三省毗邻区域的政府）要积极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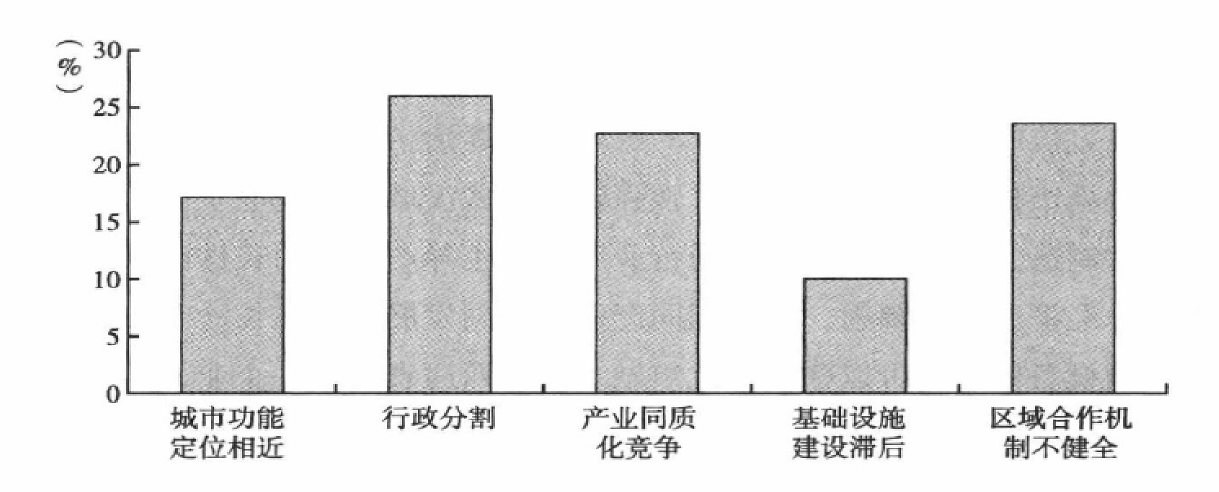


图2　产业合作中的主要制约因素

产业规划的对接事宜，摆脱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一些共有竞争性的产业项目，力争做到细分和整合，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如依托武汉石化、九江石化、长岭炼化、巴陵石化等企业，合理改善项目布局，加强分工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建设沿江石化产业带，构建石化产业新优势。其次，按照“市场主导、优势互补、相互开放、互相合作、共谋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分工协作对接机制，优化“中三角”内的产业布局，逐步实现主导产业和主打产品的错位发展，并注重产业链各个环节在不同区域的有效协作，尽快形成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最后，共同建立产业转移承接机制。依托“中三角”优越的区位条件，在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争取国家政策，共同加大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力度，提升“中三角”产业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二）重点区域，率先示范，由点及面

产业合作的区域扩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咸岳九“小三角”以及洪湖、黄梅小池等三省毗邻地区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的重点示范区域。鼓励这些区域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发、勇于探索，先行先试，总结出产业合作的先进经验和教训，力争形成具有广泛意义的产业合作模式。其次，深入推进以武汉、长沙、南昌三大中心之间的产业合作，发挥三大中心的聚散

与辐射功能，推进三大中心及其腹地的优势产业对接。最后，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逐渐扩展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三大城市群的全方位的产业对接，将合作的区域范围逐渐扩展到三省的其他区域。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武汉城市群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配件制造、生物工程与新医药行业等五大主导产业，向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积极辐射，带动相同产业的共同发展。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业可以联合和重组湖北、江西两省的相关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江西的航空制造、石化等制造业，可以辐射周边。三省的汽车工业，可形成战略联盟，实现融合发展。

（三）重点产业，重点突破，由易渐难

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项目，由于涉及产业空间布局和区域利益分配差异，其合作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应该将鄂湘赣三省有着强烈共同利益诉求的产业作为突破口，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全面合作。从鄂湘赣三省调研区域收集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到，旅游、能源、林特是目前最容易实现突破的产业。首先，旅游业是最容易实现共赢的产业，三省可以共同研究制定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战略，打造若干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区域旅游联合体，促进旅游资源共建共享；其次，能源产业合作空间潜力巨大，作为能源贫乏的省份，三省在核能的开发利用以及石化能源方面具有广泛合作前景，在能源基地的布局和港口共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最后，林特产业合作前景光明，在幕阜山、武陵山等山区的连片扶贫开发中，可以有效发挥各地山林资源优势，联合开发楠竹、油茶、桑蚕、苎麻等林特产业，实现生态的有效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共同实施产业扶贫，这正是三省共同利益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2011。

秦尊文：《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建立与发展》，《江汉论坛》2003 年第 12 期。



魏后凯：《大都市区新型产业分工与冲突管理——基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 年第 2 期。

彭智敏、汤鹏飞：《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看加快构建“中三角”》，《政策》2012 年第 10 期。

谭洪安、郑光辉：《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梦“第四极”》，2011 年 1 月 29 日《中国经营报》。

Industrial Cooperation Research of the City Group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Peng Zhimin　Zhou Ruiquan

Abstract: At present,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it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specially industrial cooperation. Related to economic interests, although these cities have the strong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substantial progress is not significantly. In this paper, proposing three ways to accelerat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dustry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Key Word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ity group;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operation path;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B.10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现状评估、发展困境与对策建议

徐春华*

摘　要：

2009 年《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江苏沿海地区综合经济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相对于江苏省内其他地区和其他省区市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还存在急需化解的五大矛盾，因此，江苏沿海地区要实现洼地崛起，必须坚持走“五个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江苏沿海地区　洼地崛起　海洋经济

江苏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包括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处于我国沿海、沿江和沿陇海兰新线型发展轴交汇区域，兼有东部“黄金海岸”与长江“黄金水道”双重区位优势，开发基础和条件极好。近年特别是 2009 年《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在陆海联动、江海联动和南北联动等“三个联动”战略的推动下，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发展中也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　现状评估：“洼地崛起”缓慢

根据沿海 11 省份 2012 年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2011》数据，

---

* 徐春华，经济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关系。



本文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层面，分别对江苏沿海地区发展在江苏省内位置的变化和与其他沿海省份沿海地区的发展情况对比进行分析，客观评价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发展的情况。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来看，江苏沿海地区近几年发展纵向良好、横向滞缓。GDP 由 2009 年的 5730.93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8262.07 亿元，增长了 44.2%，但占全省 GDP 的比重只由 16.63% 提高到 16.82%；人均 GDP 虽然由 2009 年的 30015 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43650 元，但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仍由 14238 元扩大到 18640 元。与全国 11 个沿海省区市相比，情况也不容乐观，从表 1 可以看出，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 GDP 在 11 个沿海省区中的排名由 2009 年的倒数第三（仅高于海南和广西）超越河北爬升到倒数第四，仅占全国沿海城市 GDP 的 4.5%；与 GDP 情况相同，江苏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也都列倒数第四，工业欠发达，服务业欠发展；就人均 GDP 而言，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为 43650 元，只相当于同期全国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的 72.08%，仅高于广西和海南，在全国 11 个沿海省份中列倒数第三，分别相当于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的 52.87%、63.34%、57.5%、90.01% 和 89.29%。

表 1　2011 年中国 11 个省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总体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元

地　区	GDP	人均 GDP	地　区	GDP	人均 GDP
辽　宁	11150.86	62438.31	浙　江	26073.58	75914.57
天　津	11190.99	82615.94	福　建	14295.52	48492.27
河　北	3878.99	80396.67	广　东	44097.95	48883.67
山　东	22883.22	68912.6	广　西	1557	33471.33
江　苏	8262.07	43650	海　南	1028.476	38787
上　海	19195.69	82560			

资料来源：根据 11 省区市 2012 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产业构成上，江苏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规模和比重均严重偏低。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10.99∶50.62∶38.39，而同期江苏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6.3∶51.5∶42.2，全国沿海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平均为5.05∶49.59∶45.36，显然，江苏沿海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不仅要劣于江苏省平均水平，更劣于全国沿海城市平均水平。2011年，江苏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仍高达近11%，而天津为1.4%、河北为3.25%、广东为3.95%、浙江为4.52%、福建为7.43%，在11个省份沿海地区中仅低于广西，比最低的上海高10.29个百分点。2011年江苏沿海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62%，虽高于全国沿海城市平均水平，但低于东部省份沿海城市如浙江（52.16%）、山东（55.19%）、河北（52.5%）、天津（52.5%），也低于同期江苏省51.5%的平均水平；江苏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欠发达也在第三产业中体现出来，2011年江苏沿海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3171.9亿元，总量低于周边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占比为38.89%，仅高于山东、辽宁和广西，比上海市低近20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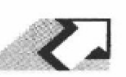
表2　2011年中国11个省份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

地　区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三次产业结构
辽　宁	958.4177	5963.32	4229.127	8.6∶53.48∶37.93
天　津	159.09	5878.02	5153.88	1.4∶52.5∶46.1
河　北	126.16	2195.49	1557.34	3.25∶56.6∶40.15
山　东	1587.599	12630.13	8665.493	6.94∶55.19∶37.87
江　苏	908.15	4182.02	3171.9	10.99∶50.62∶38.39
上　海	124.94	7929.89	11142.86	0.7∶41.3∶58
浙　江	1179.72	13598.77	11295.11	4.52∶52.16∶43.32
福　建	1062.3	7556	5677.23	7.43∶52.86∶39.71
广　东	1741.011	20236.85	22120.09	3.95∶45.89∶50.16
广　西	329.25	715.75	512.01	21.15∶45.97∶32.88
海　南	95.3565	245.76	687.36	9.27∶23.9∶66.83
合　计	8271.9942	81132	74212.4	5.05∶49.59∶45.36

资料来源：根据11省份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地方财政收入、社会资本投入较其他省份沿海地区明显偏低。2011年江苏省沿海地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822.80亿元，相比2009年416.03亿元增长了近1倍，但与其他省份相比（见表3），仅相当于山东的一半，不到



广东的1/4，也明显低于浙江和福建的水平。从表3还可以得出，2011年江苏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008.52亿元，在6省市沿海城市中最少，比上海少758.57亿元，分别是同期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38.7%、46.9%、68.4%和40.2%。

表3 2011年中国部分省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指标对比

地　区	财政收入(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山　东	1594.2192	12934.9339	—
江　苏	822.80	5008.52	44.64
上　海	3429.83	5767.09	126.01
浙　江	2456.26	10669.32	104.0997
福　建	1172.9431	7325.8245	58.5354
广　东	3613.75	12453.52	176.2054

注：表中山东、广东、江苏三省沿海地区财政收入数字为一般预算收入，其他为财政收入数字。
资料来源：根据部分省份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对外开放程度仍然不高。2007年以来江苏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呈稳步增长态势，如图1所示，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44.64亿美元，但同期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26.01亿美元，为江苏沿海城市的近3倍，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104.1亿美元、58.5亿美元和176.2亿美元，分别是江苏沿海地区的2.33倍、1.31倍和3.9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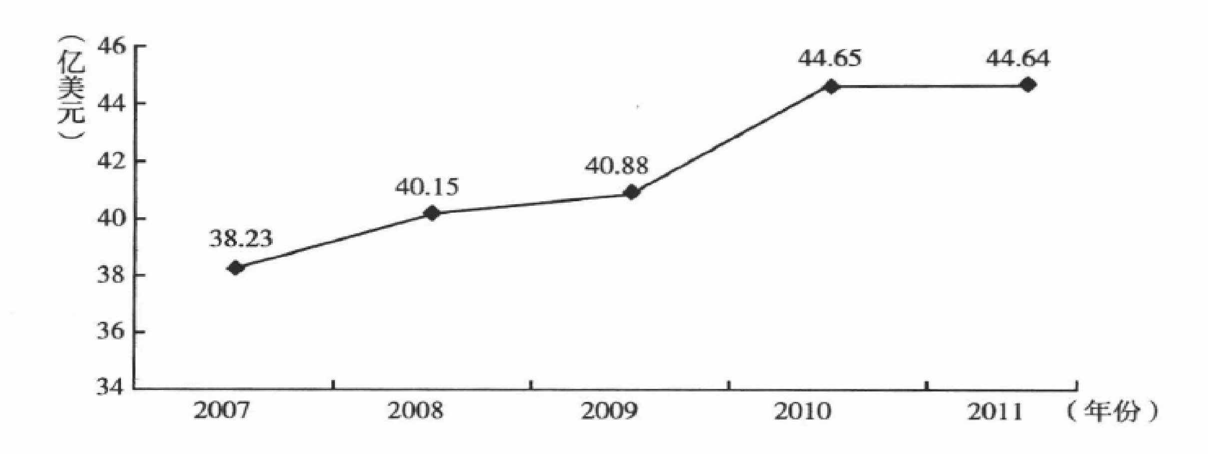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1年江苏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相对较低。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97 元，仅高于河北、广西和海南沿海城市，相当于上海的 57.95%、浙江的 65.53%、山东的 72.87%、广东的 88.07%。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225 元，略低于浙江、广东、辽宁三省沿海城市。就居民消费水平而言，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88.6 亿元，人均年消费 13816 元，相当于同期上海的 47.6%、天津的 55.12% 和浙江的 60.14%。

表 4　2011 年中国 11 省份沿海地区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指标对比

地　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辽　宁	21148.16	10615.46	3410.63
天　津	26921	—	3395.06
河　北	18292.63	7119.69	1017.18
山　东	28814.76	—	7192.89
江　苏	20997	10225	2888.6
上　海	36230	—	6814.8
浙　江	32040.43	10729	9674.26
福　建	25102	9760.5	5386.99
广　东	23840.17	10927.08	17134.54
广　西	19208.63	6306.13	392.72
海　南	20101	7387	473.191

资料来源：根据 11 省份 2012 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城市化水平还较低。按照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城市化率，2011 年江苏沿海地区城市化率为 49.92%，排在苏浙鲁粤闽五省沿海地区的末位，农业人口仍然超过半壁江山，而同期浙江沿海地区城市化率达到 65.86%，比江苏高 15.94 个百分点，山东、广东和福建城市化率分别为 55.05%、57.58% 和 60.22%，也分别高出江苏 5.13 个百分点、7.66 个百分点和 10.3 个百分点。显然，江苏沿海区仍属于农业人口比重较高、三产结构层次较低的我国沿海城市中的欠发达地区（表 5）。



表 5　2011 年中国部分省份沿海地区主要城市化水平指标对比

单位：万人，%

地　区	年末总人口	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	城市化率
山　东	3392. 27	1867. 39037	1524. 88	55. 05
江　苏	2090. 75	1043. 79	1046. 96	49. 92
浙　江	3537. 31	2329. 67	1207. 65	65. 86
福　建	2948	1775. 2	1172. 8	60. 22
广　东	5918. 85	3407. 83	2511. 02	57. 58

资料来源：根据五省 2012 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江苏沿海地区有陆域面积 3. 25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954 公里、沿海滩涂面积 5100 多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的 5. 3% 和 25%，沿海附近油气风资源丰富，海洋资源的综合指数居全国第四位。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江苏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海洋船舶修造、滨海旅游、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等优势产业，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等海洋新兴产业逐渐成长，海洋经济不断壮大。

从发展规模来看，2010 年江苏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3550. 9 亿元，排在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福建之后，列 11 省份沿海地区第六位；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8. 6%，低于全国沿海城市 16. 1% 的平均水平，仅高于广西，分别比天津（32. 8%）、上海（30. 4%）、海南（27. 1%）、福建（25%）、山东（18. 1%）、广东（17. 9%）低 24. 2 个百分点、21. 8 个百分点、18. 5 个百分点、16. 4 个百分点、9. 5 个百分点和 9. 3 个百分点。

就海洋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0 年江苏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为 4. 6∶54. 3∶41. 2，劣于全国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见表 6）。第一产业增加值 162. 6 亿元，占比低于山东、浙江、福建而高于广东、河北，第二产业增加值 1927. 1 亿元，占比仅低于河北，第三产业增加值 1461. 2 亿元，占比仅高于广西、河北和天津。

从涉海就业人员情况看，2010 年江苏沿海地区涉海就业人员 185. 9 万人，比 2009 年增加 4. 5 万人，但在全国 11 个沿海省区中仅高于河北、天津、海南

和广西；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就业总人数的3.9%，排在沿海11省区的倒数第二位，仅高于河北，低于占比最高的天津28.6个百分点，分别比全国（10.1%）、浙江（10.2%）、上海（21.9%）、山东（9.0%）和广东（13.9%）低6.2个百分点、6.3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5.1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总体评价，江苏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体量不大、质量不高。

表6　2010年中国11省份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主要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

地　区	海洋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辽　宁	2619.6	12.1	43.4	44.5	14.2
天　津	3021.5	0.2	65.5	34.3	32.8
河　北	1152.9	4.1	56.7	39.2	5.7
山　东	7074.5	6.3	50.2	43.5	18.1
江　苏	3550.9	4.6	54.3	41.2	8.6
上　海	5224.5	0.1	39.4	60.5	30.4
浙　江	3883.5	7.4	45.4	47.2	14
福　建	3682.9	8.6	43.5	47.9	25
广　东	8253.7	2.4	47.5	50.2	17.9
广　西	548.7	18.3	40.7	41	5.7
海　南	560	23.2	20.8	56	27.1
合　计	39572.7	5.1	47.8	47.1	16.1

资料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1》，第52页。

从内部四大优势产业发展情况看，可谓“一喜三忧”。喜的是海洋船舶修造业颇具竞争优势，忧的是海洋运输业、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全面落后。海洋船舶修造业是江苏沿海地区发展最好、最具竞争力的海洋产业，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完成修船量564艘，在11省份沿海地区中排在上海、浙江、福建、山东之后；造船完工量624艘，合2300.3万综合吨，造船数量排在浙江的837艘之后，造船吨位排名11省份沿海地区第一，占全国造船吨位6397.41万综合吨的35.96%。

海洋运输业规模不大，无论是在长三角地区、华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沿海，货物吞吐量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相对较小，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3847万吨，仅高于海南，是广东的13.15%、浙江的17.56%、



山东的16.02%、上海的24.59%；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810万吨，仅高于河北、广西、海南，是广东的10.18%、上海的13.61%、山东的25.08%和浙江的31.04%。

海洋渔业发展水平不高，2010年海洋捕捞产量为570354吨、远洋捕捞产量为8941吨、海水养殖产量为785173吨，分列11省份倒数第三位、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四位；海洋捕捞产量只占全国的4.74%，为浙江的20.22%、山东的24.26%、福建的29.89%、广东的39.90%，远洋捕捞产量为福建的4.95%、浙江的5.4%、辽宁的5.1%、山东的5.97%和广东的9.4%，海水养殖产量为山东的19.8%、福建的25.84%、广东的31.52%和浙江的95.09%。

滨海旅游业发展境况不容乐观，2010年江苏沿海地区南通、连云港两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71796人次，不及同期大连1166020人次、杭州2757147人次、厦门1551865人次、青岛1080511人次，更比不上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入境游客人数；旅游外汇收入方面，2010年江苏南通、连云港两市共赚取外汇46813万美元，而同期大连为80386万美元、宁波59066万美元、厦门108552万美元、青岛60103万美元，分别为大连的58.24%、宁波的79.26%、厦门的43.12%和青岛的77.89%。

表7　2010年中国11省份沿海地区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指标对比

地区	海洋船舶修造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渔业		
	修船完工量(艘)	造船完工量(艘)	造船完工量(万综合吨)	货物吞吐量(万吨)	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吨)	海洋捕捞产量(吨)	远洋捕捞产量(吨)	海水养殖产量(吨)
辽宁	234	99	942	67790	15666	1007398	175274	2314694
天津	187	20	20.77	41325	10916	15754	9020	14212
河北	321	6	19	60344	997	253292	—	329308
山东	790	75	404.19	86421	15189	2350888	149814	3962643
江苏	564	624	2300.3	13847	3810	570354	8941	785173
上海	1308	134	1212.6	56320	27992	21531	99933	—
浙江	4393	837	1029.19	78846	12276	2821000	165602	825730
福建	1715	342	133.56	32687	10743	1908468	180524	3038990
广东	444	61	332	105299	37413	1429592	94752	2490688
广西	72	123	3.13	11923	926	662954	4119	877408
海南	38	65	0.67	9662	1147	994715	—	18416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1》第64页、72页、75页、77页整理。



综合江苏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可知，纵向看，江苏沿海地区得益于2009年以来的国家战略实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横向比较，无论是总体经济发展还是海洋经济发展，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还处在下游水平，仍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经济规模不大不强、海洋经济相对传统和弱小仍是当前主要特征，实现“洼地崛起”仍然任重道远。

二　发展困境：“五大矛盾”凸显

江苏沿海地区作为江苏沿海开发的实施载体，其区位价值在交通条件改善、长三角北拓等因素影响下大大提升，战略价值在江苏“四沿”开发战略和国家沿海开发战略的双重指引下日益凸显，但江苏沿海地区近几年的发展却并非突飞猛进，虽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江苏沿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发展本身存在“五大矛盾”。

（一）发展模式相对落后与实现快速崛起的矛盾

发展模式落后是导致江苏沿海地区崛起较慢的首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比较低，如2011年沿海三市农业机械化水平[①]除连云港为71%外，盐城为36%、南通为39%，三市平均水平为44.12%，均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52.31%。二是工业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产业升级不快，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科技投入对工业发展的带动不大，工业化水平整体不高。三是港口经济仍以粗放型为主，装卸、驳运、仓储等传统产业仍占主导，港口发展还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模扩张的初级阶段，大进大出的新兴港口加工、贸易等产业在欧美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备受打击。四是海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海洋经济优势，201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仅为8.6%，为我国沿海省份平均水平的53.42%，围垦造田、开发滩涂、海水养殖等海洋

①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2》中数据可得性，定义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等以只取数值方式做无量纲化处理。



农业仍停留在高成本、高消耗发展阶段，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等海洋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滨海旅游多依靠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等资源支撑发展，差异化、高层次、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欠缺。

（二）区域协作意识不强与城市联动发展的矛盾

江苏沿海地区三市同为沿海开发战略中的利益共同体，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间“和而不同”、相互协作、联动发展应为常态，但目前江苏沿海地区三市区域协作意识还不够强，区内合作不够充分，表现在各市发展各行其是，联而不动或联动积极性不高。一是各市经济都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竞争过度。二是三市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严重，主要优势产业基本雷同（见表8）。三是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规划欠缺统筹考虑，港口多而小，港口之间分工不明确，导致三市港口发展相互掣肘，此消彼长甚至两败俱伤。四是三市对话协作机制匮乏，信息共享机制、产业协作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尚未完善。

表8　江苏沿海三市“十二五”时期产业发展定位情况

城　市	优势产业	支柱产业	新兴产业
南　通	海洋工程、新能源、新材料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精细化工	生物和新医药、智能装备、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
盐　城	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海洋生物产业	汽车、纺织、机械装备、化工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电网、海水淡化及利用
连云港	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重化工、钢铁、船舶修造	生物技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

资料来源：根据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整理。

（三）中心城市不强与带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矛盾

2011年南通、盐城、连云港的市区GDP分别为1594.08亿元、778.38亿元和507.23亿元，三市市区经济总量为2879.69亿元，仅比常州市区稍多，为无锡市区的80.8%，苏州市区的70.9%；三市市区人均GDP在江苏全省13个地级市中分列第8、第12和第11，排名比较靠后；市区GDP占全市GDP比

重分别为39.07%、28.09%和35.96%，远远低于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市区平均水平，分别比无锡市区低12.73个百分点、23.71个百分点和15.84个百分点。从市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看，沿海三市中南通最高，2011年达到187.74亿元，但仅为同年苏州的42.9%、无锡的48.1%和常州的64.6%。可见，江苏沿海地区三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实力还很小，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对腹地的扩散效应不强，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差距较大（表9）。

表9 2011年部分江苏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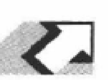
单位：亿元，%

城　市	GDP		市区GDP占全市GDP比重	市区人均GDP		市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市区GDP	全市GDP		数值	在全省排名	数值	在全省排名
南　通	1594.08	4080.22	39.07	69703	8	187.74	6
盐　城	778.38	2771.33	28.09	48207	12	94.87	10
连云港	507.23	1410.52	35.96	48149	11	88.94	12
苏　州	4061.64	10716.99	37.90	99331	2	437.56	2
无　锡	3563.89	6880.15	51.80	100159	1	390.43	3
常　州	2715.04	3580.99	75.82	81897	4	290.68	4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2012》。

（四）港口发展滞后与实施以港兴城战略的矛盾

港口是江苏沿海三市发展的优势，也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多年来江苏沿海三市均大力实施以港兴城、港城联动战略，但港口、产业、城市三者的融合度还不高，港口还不足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虽然有三市沿海不靠海，港口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三市港口发展相对战略实施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港口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沿海三市10多个港口建设无视开发条件及区位条件差异，导致港口建设资金分散与投入不足共存、港口分布过多与重复建设共存、大港少与小港多共存，港口发展定位缺乏有机整合，发展相互掣肘，港口群有名无实。二是港口功能单一，临港工业发展缓慢。由于江苏能源紧缺，所以沿海港口起先都以煤炭运输为主，例如连云港主要承担华北煤炭运输、射阳港主要为盐城转运山西煤炭；此外，



由于港口与母城相距较远，港口发展无法利用母城配套服务，导致港口发展缓慢，以港兴城也只能望港兴叹。

（五）人才资源短缺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矛盾

江苏科教资源基本集中在宁镇扬及苏锡常等苏南地区，沿海地区高等院校只有4所，而全省有126所，科研机构更是寥寥无几，科研实力在全省排名靠后，2011年江苏沿海三市专利申请受理量70477件，占全省的20.3%，专利申请授权量199806件，占全省的18.32%。此外，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加之城市建设相对落后，导致一方面沿海三市人才外流情况严重，大量人才流向苏南及长三角地区，另一方面对外地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也非常有限。由于人才短缺，企业创新乏力，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不多，江苏沿海地区才资源短缺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地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效果，2011年江苏沿海三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5027.99亿元，仅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13.1%，其中盐城为908.46亿元、连云港为868.7亿元，分列全省13市的倒数第三和倒数第四。

三　对策建议：坚持“五个发展”

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正视目前崛起较慢的现实，积极化解发展中遇到的五大矛盾，用发展解决崛起中遇到的问题，做到加快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统筹港口规划共同发展、依托海洋资源快速发展、集聚高端要素创新发展、联动区域内外协同发展。

（一）加快中心城市优先发展

推动江苏沿海地区这样一个欠发达区域快速崛起，必须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个中心城市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快速崛起，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重点建设这三个城市，不断壮大城市规模，使之成为江苏沿海地区崛起的核心增长极，从而更好地发挥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南通要紧抓区位条件根本性改善的机遇，依托沿江及沿海两

条产业带，继续做好海洋工程、船舶及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强化与上海、苏州的联动发展，努力成为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城市和具备江海交汇风情的旅游城市；盐城要依托汽车、新能源、机械装备等优势产业，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湿地生态旅游城市；连云港要重点依托国家级新材料、新医药产业基地，利用其良好港口条件和岸线资源，发展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上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滨海旅游城市。

（二）统筹港口规划共同发展

按照“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原则统筹规划沿海三市港口建设，以港口群模式实现共同发展。一是明确各大港口发展定位，做到主次分明、定位明晰。以连云港和南通港为主要港口，充分发挥连云港深水良港的先天优势，打造成国际性、综合性远洋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港，南通港则作为沟通江海的枢纽，打造成多功能综合性近洋枢纽港，盐城港则建设成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港口。二是把港口发展与临港工业、产业园区、城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港口为依托，统筹规划临港工业和产业园区，努力提高港口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发展临海重要工业城镇，推进港口、产业、城镇联动发展，以港口发展提升中心城市能级，使港口真正成为推动江苏沿海地区跨越发展的引爆点和支撑点。

（三）依托海洋资源快速发展

江苏沿海地区最大的优势资源是海洋资源，要化海洋资源优势为海洋经济优势，使海洋经济成为沿海地区“洼地崛起”的亮点。一是发展战略上要“陆海协调、江海联动”。借助江苏沿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海洋经济为纽带，坚持陆海、江海的资源联动开发、产业联动发展、交通联动建设，构建沿海和沿江地区“L”形联动发展带。二是在发展动力上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兴海。以促进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深度融合为目标，以推动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为载体，整合科教资源，集聚创新要素，在海洋生物工程、海洋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资产为纽带、产学研相



结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三是发展方式上要优二兴三，走特色发展、绿色发展的路子。不断优化提升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船舶修造、滨海旅游、海洋渔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大进大出的化工、钢铁、装备制造、海洋精细化工等临港先进制造业，着力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方面有新突破，在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文化创意产业、涉海中介服务业等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四）集聚高端要素创新发展

专业化人才、科研机构以及专业化的软硬件设施等高端要素是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江苏沿海地区科研力量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发展一方面要整合自身科技资源、加大科研投入力量外，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创造环境和条件吸引并集聚一大批高端要素为我所用。一是要打造面向国际、国内高端专业化人才的绿色通道，尤其是沿海地区发展海洋产业、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人才引进、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二是面向上海、南京等院校科研机构密集地，积极建立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培养企业创新人才队伍以及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建设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基地，促进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人才对接和流动。

（五）联动区域内外协同发展

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竞合是主旋律，因此需要注重内部的统筹协调、错位发展，还必须处理好与江苏省内沿江地区、沿京沪线、沿东陇海线的协同发展，必须放在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谋划，甚至是放眼整个东部沿海城市带去考虑。在区域内，沿海三市需要在城市定位、产业选择、港口功能上实现协同，共同提升江苏沿海板块的整体竞争力，努力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中继宁镇扬之后的第三极。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要凸显江苏沿海地区作为“长三角北翼沿海发展轴”的特色功能，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发展、经济开发开放上与苏南（沿江）、苏中（内陆）等地的陆海联动、江海联动，实现沿海、内陆、沿江协同发展；要充分接轨上海，积极融入长三角

城市圈，吸纳长三角发达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溢出效应，主动与之实现产业承接、技术嫁接、人才对接，充分享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红利。

参考文献

包宗顺：《江苏沿海开发：落差、机遇、发展思路》，《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凌申：《非均衡视域下江苏沿海“三极一带多节点”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蔡雨、徐厚泽：《江苏沿海经济区发展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第9期。

常玉苗：《沿海欠发达地区经济联动开发模式研究——以江苏沿海开发为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4期。

徐海贤：《国家战略视角下新兴增长区域空间发展研究》，《规划师》201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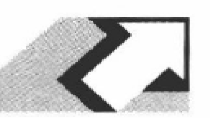
Jiangsu Coastal Development: the Statu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Plight and Countermeasures

Xu Chunhua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Jiangsu coastal area promoted to national strategies in 2009, Jiangsu coastal are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integrated economic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but contrast to other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other coastal areas of other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su coastal area is relatively stagnant, and there are five contradictions during development need to resolve urgently, to rise from an low-lying land, Jiangsu coastal areas must adhere to the “five development” way.

Key Words: Jiangsu coastal area; Rising from an low-lying land; Marine economy

珠三角与南部沿海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Southern COAST

B.11 珠三角经济形势：2012年分析与2013年展望

何满雄　杨海深*

摘　要：

面对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压力，珠三角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主线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深入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取得显著成绩，经济发展保持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效，产业转型升级有新进展，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取得新突破，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关键词：

珠三角　科学发展　发展方式　转型升级　展望

---

* 何满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科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杨海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信息中心）数图分析师，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定量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2012 年，珠三角面临着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压力。这种压力既与全球经济处在低增长、较高通胀的滞胀状态有关，又与国内经济进入全面转型调整的次高速增长时期有关，本质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波动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反映。近年来，广东为应对这种形势，在国家“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也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突出表现在深入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以下简称《珠三角规划纲要》），顺利完成珠三角“四年大发展”各项任务，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效果明显，总体上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一　2012 年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珠三角经济运行特征

1. 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较大，但已显止跌回温态势，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受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和中国经济复苏受阻的影响，珠三角九市经济增速较上年降幅较大，仍然处在中速运行的区间。数据显示，2012 年第一季度珠三角经济同比增长 6.3%，较上年下降 5.3 个百分点，但是到第四季度增速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说明珠三角经济增速正在回升，但仍低于 2010 年全年水平。惠州、肇庆和中山全年经济增长分别为 12.6%、11% 和 11%，领先于珠三角各市，说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带动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际成效。综合图 1 展示的数据和图形看，珠三角经济增速下滑后出现小幅回升，回升势头也基本稳定。

从投资来看（见图 2），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先大幅下降后缓慢回升的态势，波动比 2011 年要大。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974.24 亿元，增长 12.3%，增幅比前三季度提升 0.3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7 个百分点，其中珠海、肇庆、惠州和中山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超过 15%，从而引领珠三角投资增长处在较高水平。同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 2011 年的重要原因在于，广东为确保珠三角“四年大发展”战略各项目标圆满实现，加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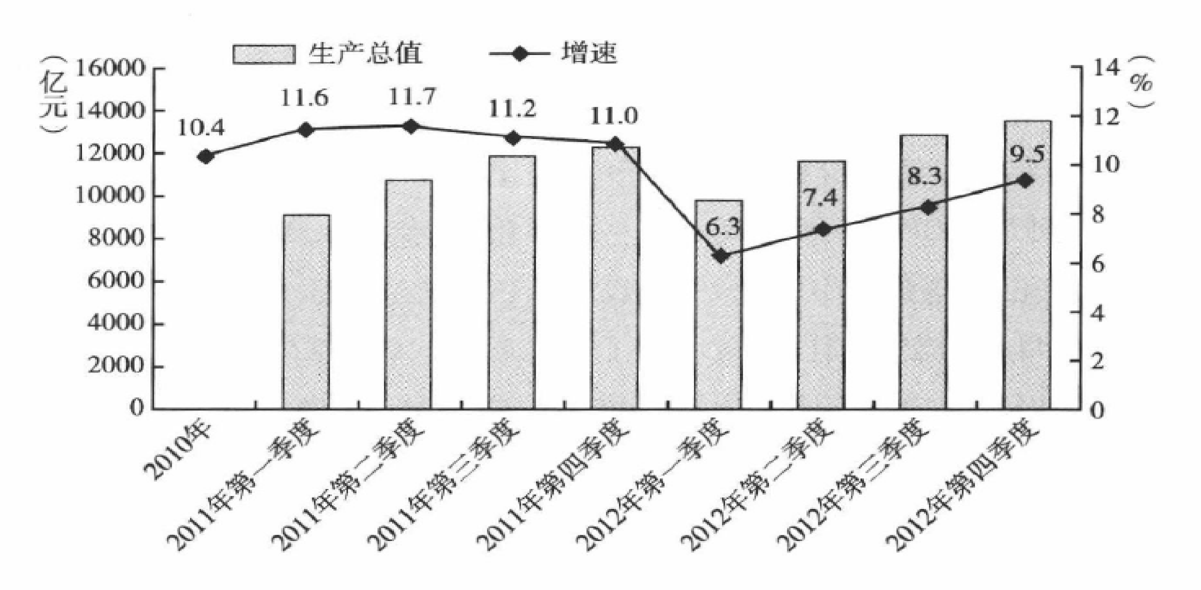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2 年珠三角分季度生产总值及同比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江门市统计信息网。

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虽然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压力，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是珠三角经济增速回升的支柱力量。另外，2012 年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广东 72.4%，占全国的 3.8%，表明珠三角仍然是广东投资的主要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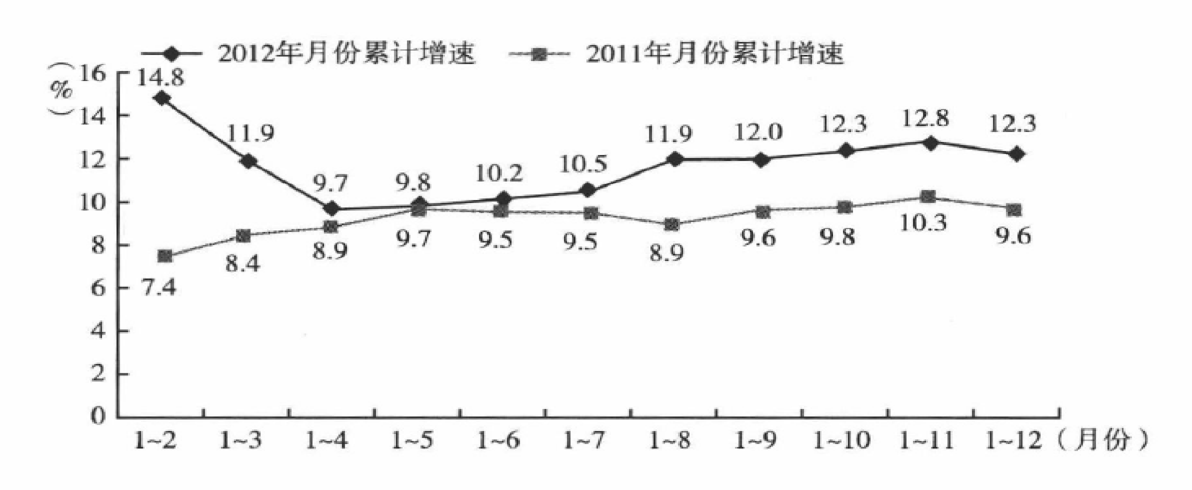


图 2　2011～2012 年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月份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江门市统计信息网，广东统计信息网。

从消费来看，2012 年珠三角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799.41 亿元，增长 14%，增幅同比回落 3.3 个百分点。其中深圳、惠州和广州分别增

长16.5%、15.5%和15.2%，增幅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2.7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导致这种回落的关键原因在于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大，201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从图3来看，2012年以来CPI持续回落，1～2月份回落至4.0%，上半年回落到3.6%，年底已回落到2010年水平，表明珠三角的通胀压力持续释放，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CPI涨幅大幅回落同时得益于国际国内以及省内三方面的因素，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大幅回落，农副产品、石油以及矿产资源的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都出现大幅下跌；国内粮食价格基本稳定，特别是猪肉价格明显走低，虽然蔬菜价格仍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工业品中的汽油、柴油、钢材、煤炭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都低于上年同期。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伴随着消费品价格指数直线回落。2012年珠三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广东的74.1%，占全国的8.1%，表明珠三角是全国消费重要经济区的地位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没有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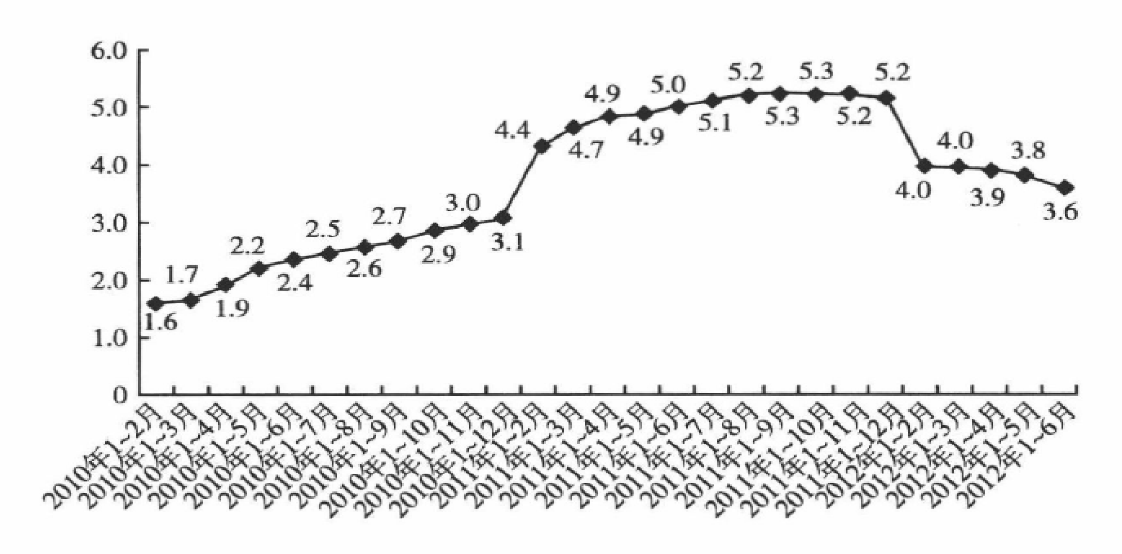


图3　2010～2012上半年珠三角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江门市统计信息网。

从出口看，2012年珠三角全年实现出口额5477.21亿美元，同比增长8.5%，增幅较2011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其中惠州、肇庆出口增幅分别为26.3%、14.3%，位于珠三角首位；深圳（10.5%）、东莞（8.6%）、江门（5.9%）和广州（4.3%）位于第二层次；佛山（2.7%）、中山（0.4%）和



珠海（-9.8%）位于第三层次。另外从图 4 可以看出，出口额同比增速自 2011 年持续下降以来，到 2012 年 1～2 月回落至最低点 1.6%，然后基本稳定在 7% 附近，表明珠三角受到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的严重影响，外贸经济仍处在低位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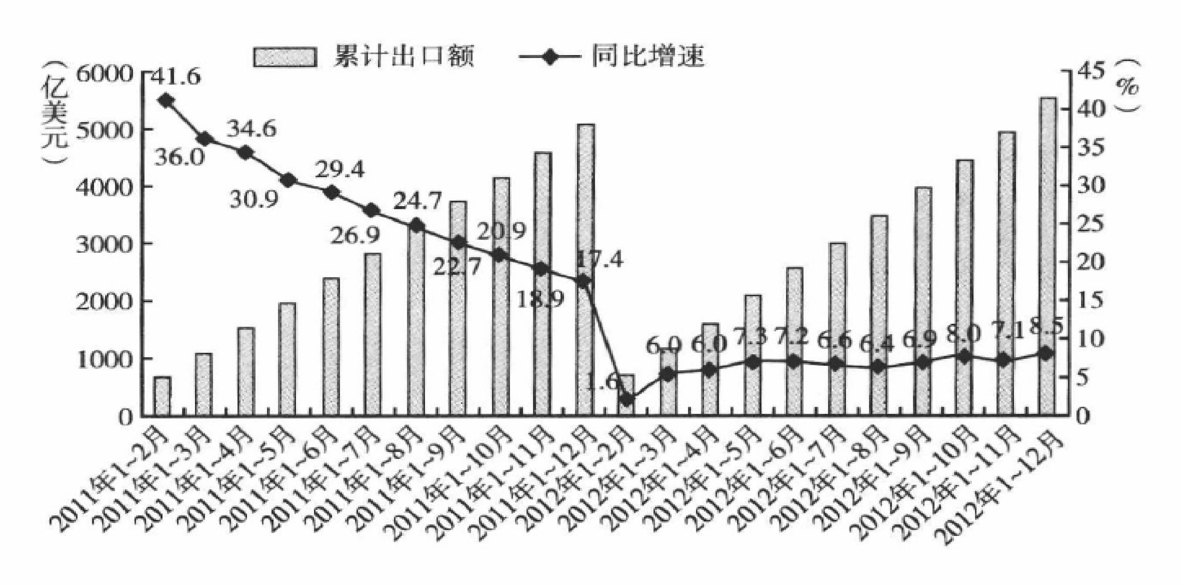


图 4　2011～2012 年珠三角分月份累计出口额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江门市统计信息网。

2. 工业仍面临低位运行压力，第三产业增长势头明显，但稳定性还有待观察

2012 年以来，受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投资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重困难因素叠加的影响，珠三角工业经济低位运行压力仍然较大。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增长 6.9%，比第一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长 10.5%，比上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呈加速回升态势，但仍低于 2011 年 3.4 个百分点（图 5）。珠三角九市上半年，肇庆同比增长达 16.8%，居珠三角首位；惠州（16.6%）、中山（11.7%）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高出珠三角平均水平 9.7 个百分点、4.8 个百分点，居第二、三位；佛山（9.8%）、江门（7.9%）、广州（7.6%）略高于珠三角平均水平；珠海（6.3%）、深圳（4.4%）、东莞（0.9%）低速增长。

从工业企业的赢利状况来看，2012 年 1～10 月，珠三角规模以上工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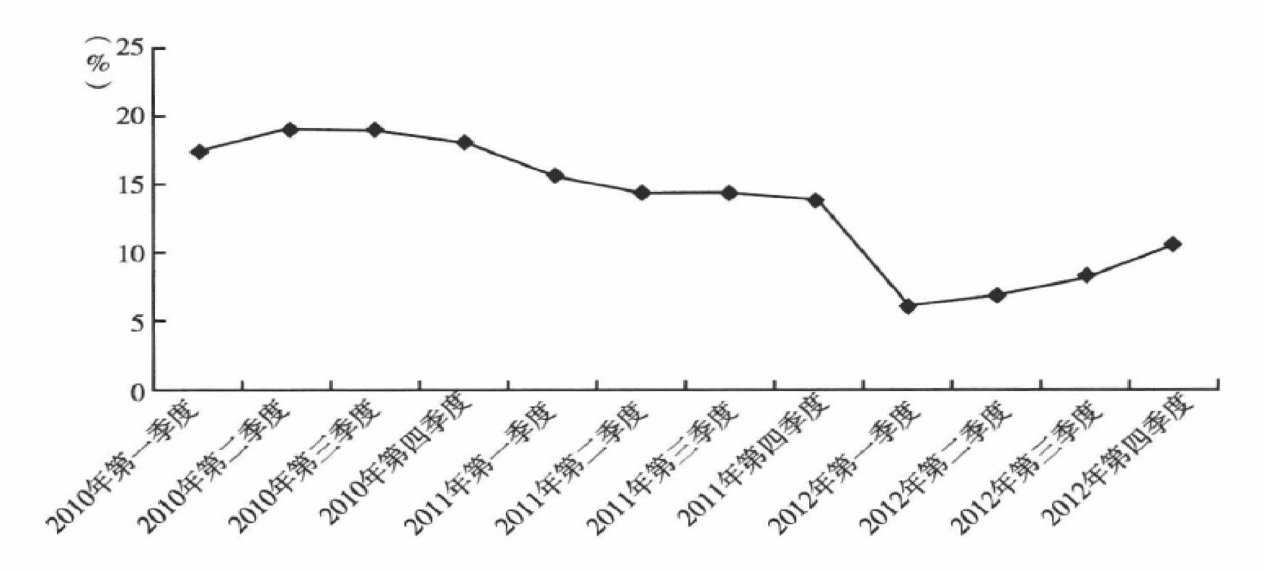


图 5　2010～2012 年珠三角分季度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

现利润同期下降 5.1%，下降幅度居广东四个经济区域之首，表明工业企业赢利状况不容乐观。

同工业相比，第三产业发展相对平稳，但增长势头明显。2012 年第三季度珠三角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高出 2.7 个和 2.5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图 6 来看，珠三角自 2007 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处在回落态势，一直到 2012 年第一季度回落至最低点，然后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未来增长势头可期，但是运行的稳定性还有待观察。

3.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继续稳定增长，但同比增速滑落较大

受经济低迷和营改增税制改革双重影响，珠三角 2012 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虽有小幅增长，但同比增速下滑较大。数据显示，2012 年全年财政预算收入 4128.93 亿元，增长 12.4%，增幅同比下降 9.5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下降 12.1 个百分点。从珠三角九市看，惠州（23.4%）公共财政收入增速领跑珠三角，东莞（13.8%）、江门（13.3%）、珠海（13.4%）位于第二层次，肇庆（12.6%）、广州（12.5%）、佛山（12.4%）、深圳（10.6%）、中山（10.2%）位于第三层次，可见受产业转移的影响，珠三角非核心区的财政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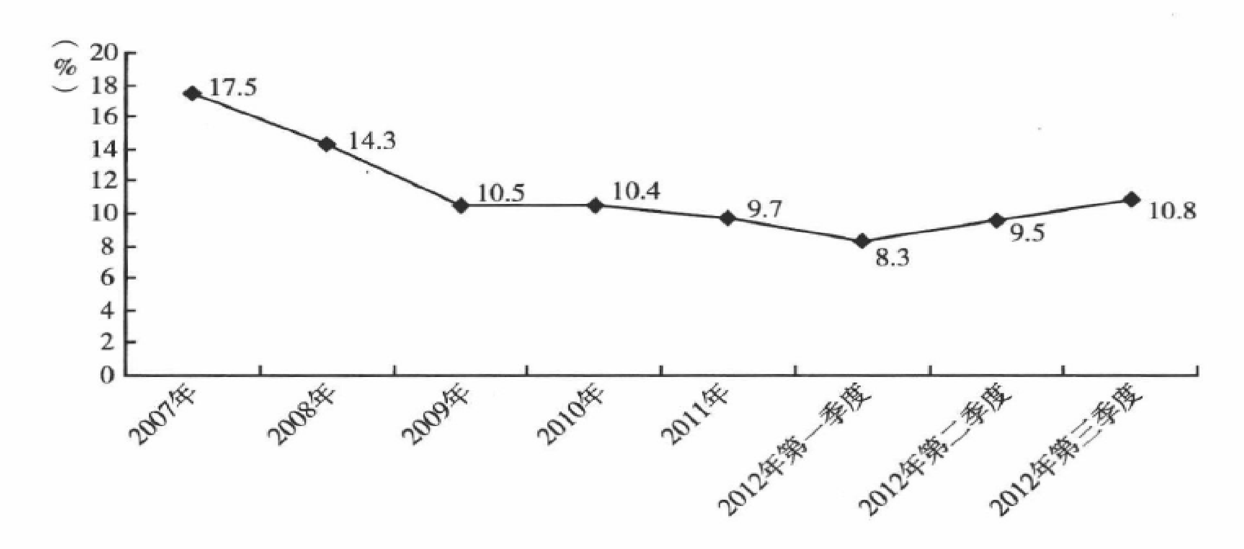


图 6　近年来珠三角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12》，广东统计信息网。

入增速较快。从占全省比重看，珠三角 2012 年占比 66.3%，与 2011 年、2010 年相比分别下降 0.3 个百分点、2 个百分点，说明珠三角虽然仍占广东绝对优势，但其地位正在下滑，同时也表明广东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成效。从图 7 来看，近年来，珠三角地区财政预算收入波动较大，其中 2011 年处在先下后上再下的走势，2012 年下滑明显，自 4 月以来有稳定上升趋势，与图 1 曲线基本一致，表明财政预算收入与经济的同起伏的关系，客观上说明要提高财政预算收入，依靠经济增长是必行之路。

（二）《珠三角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2012 年是广东落实《珠三角规划纲要》实现“四年大发展”① 收官之年。四年来，珠三角取得各项任务目标的圆满实现，为下一步实施“九年大跨越”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表 1 看，“四年大发展”主要任务中“民生和社会事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三项任务位于第一层次，平均增长幅度达到 84.8%，“创新体制机制”和“开放合作新格局”任务位

① 《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实现“四年大发展”工作方案》（粤办发〔2010〕28 号）是广东为深入落实《珠三角规划纲要》阶段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七大任务”和“十项工程”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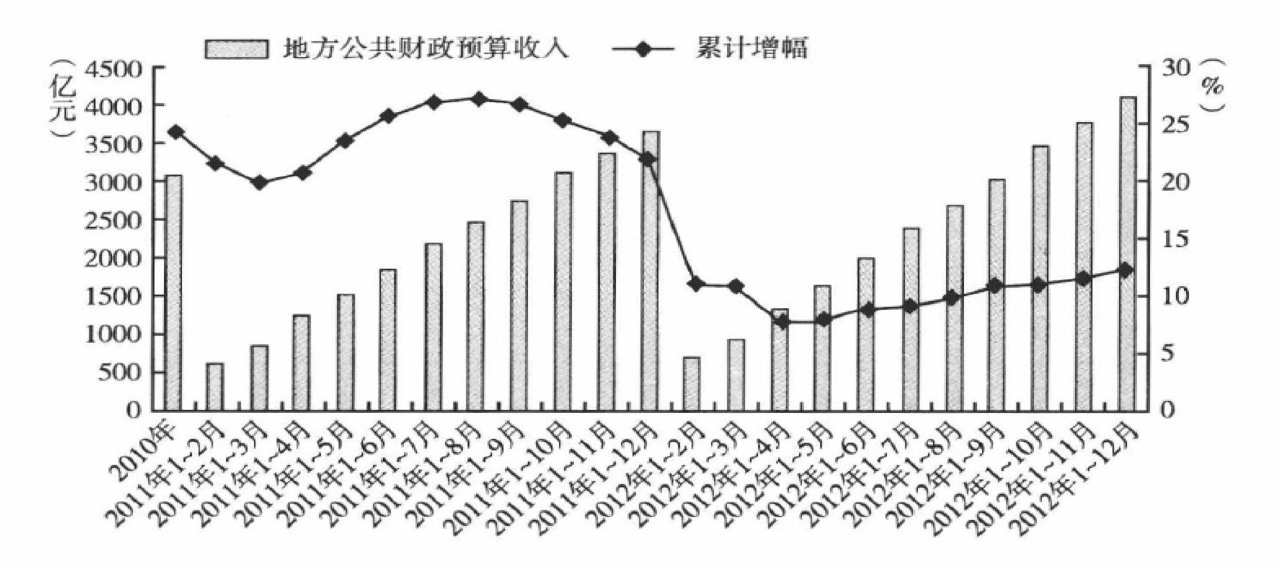


图7　2010～2012年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增幅走势

资料来源：广东省财政厅网站。

于第二层次，平均增长幅度达到47.5%，“建设文化强省”任务位于第三层次，增长幅度为21.5%，可见“四年大发展”提出的各项任务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民生和社会事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三项任务成效最为显著，亮点纷呈。

表1　“四年大发展”主要任务的综合进步指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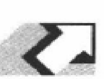
分任务	CI_{2008}	CI_{2011}	CI_{2012}	综合指数涨幅 $CI_{2012}-CI_{2008}$	涨幅排名	层次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00	174.2	182.0	82	2	一
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	100	148.0	181.6	81.6	3	一
建设文化强省	100	110.7	121.5	21.5	6	三
创新体制机制	100	137.6	153.6	53.6	4	二
民生和社会事业	100	187.7	190.9	90.9	1	一
开放合作新格局	100	131.1	141.4	41.4	5	二

注：2008年为基期，未列出2009年、2010年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广东科学发展报告2012》《珠三角地区落实规划纲要进展定量评估研究（2011～2012）》（待出版）。

1. 经济发展惠及民生福祉，推动幸福指数大提升

四年来，珠三角地区始终坚持保民生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



民生十件实事为重点工作，扎实解决“基本民生”“底线民生”“热点民生”问题，大力推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双到新模式，幸福广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民生和社会事业的历史旧账得以初步弥补，初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具体来看，珠三角九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创下新高，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一大亮点；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2.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实效，带动经济大发展

四年来，“四年大发展”工作方案的实施，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趋势明显、结构效益不断提高，初步建成了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了传统产业，自主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进而带动了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具体来看，珠三角地区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形成“双轮驱动”的局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新突破；自主创新的各项指标成效显著；GDP 能耗、电耗下降到新低水平。

3. 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稳步推进，区域一体化实现大破局

四年来，珠三角地区以五个一体化规划为实施方案，以粤港澳合作和三个经济圈合作建设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突破口，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大破局，初步构建起世界级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一小时生活圈”已经形成；省立－城市两级绿道有机衔接网络系统已初步构建，大大方便了市民出行和休闲；“岭南通”实现珠三角地区全覆盖，年票实现珠三角地区互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金融改革取得先发优势。

二　目前制约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区域一体化程度不够，仍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因素

自 2008 年《珠三角规划纲要》实施以来，珠三角一体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之间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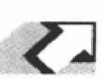
新格局。但整体来看，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地方行政体制壁垒依然严重，思想难以统一；地区利益难以协调，补偿机制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经济圈合作协议约束力不强，部分工作未按时推进；珠三角经济圈交界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各领域进展不均衡，薄弱环节突出；产业互补性不足；等等。主要原因是广东着力阶段性地推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一体化，珠三角整体一体化推动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

（二）经济结构上依赖外源经济，发展后劲动力面临重大挑战

珠三角地区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在外需下滑和内需难启的环境下，发展的后劲与动力面临重大挑战。首先，传统的以低成本为导向的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加上国际市场需求不足，从而导致长期依赖的外需拉动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其次，在全球经济通胀的背景下，企业生产成本上涨，企业经营压力明显加大，许多企业难以为继，生存比较困难，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再次，由于过分依赖外源经济，珠三角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尚未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偏弱，“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合力作用并不明显。最后，与国内兄弟省份相比，广东发展近30年走在全国前列所主要依靠的“政策红利”“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已逐步消耗殆尽，发展后劲乏力问题日益显现。

（三）尚未形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转型升级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化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珠三角规划纲要》确定的未来九大新任务之首，而且要建设“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珠三角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产业发展总体上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与现代化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与经济发展规模不相适应；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不足，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出现停滞；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格局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出现产



业结构重型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情况。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业园区建设配套设施不完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三个方面。

（四）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珠三角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珠三角城区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多年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二是珠三角区域内“广佛肇经济圈”“深莞惠经济圈”“珠中江经济圈”发展不平衡。珠中江经济圈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其他两个经济圈，金融资金、人力资源相对不足，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三是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发展差异巨大。长期以来，珠三角 9 个地市以不足全省 1/3 的面积创造了全省 80% 以上的 GDP。

三　2013 年珠三角经济发展展望

展望 2013 年，珠三角主要面对以下三个挑战：一是世界经济仍将维持低增长、较高通胀的格局，二是国内经济发展继续面临着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三是珠三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面对以上三个挑战，珠三角必须遵循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变动新趋势，加快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加强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深化粤港澳合作，继续发挥珠三角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一）2013 年珠三角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整体经济增速可能保持在 9% 左右的适度区间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广东省 2013 年生产总值预期目标是增长 8%，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在目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迹象不明显，外需、内需的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预计 2013 年珠三角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略有下调，但高于广东平均水平，处于 9% 左右，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左右。这种平稳增长，既是世

界经济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珠三角一体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主动转型升级的结果。

（二）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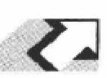
一方面，为了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改变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广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同时，为了提高出口与投资的质量，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与投资转型升级的措施，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主动调整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市场结构，促进发展转型。这些政策措施的成效日益显现。另一方面，随着广东两会的召开与政府换届工作的完成，新一轮经济措施也将在2013年陆续出台，在出口短期内难以有较大突破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将成为重点。预计2013年珠三角的产业转升级进一步深入推进，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将进一步增强，消费、投资、出口各自的内部结构也会进一步优化，内部协调性也将增强。

（三）民生支出保持大幅增长，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2012年，在财政收入减速的情况下，珠三角各市贯彻落实《珠三角规划纲要》，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各项措施，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民生支出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未来几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珠三角一体化进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珠三角各市用于民生事业发展和一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还将保持大幅增长态势，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008 年 12 月。

朱小丹：《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13 年 1 月。

刘品安、陈再奇等：《顺势而为稳增长，抓住机会求发展——2012 ~ 2013 年广东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与建议》，《广东科学发展报告 2012》，2013 年 1 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集智创新实验室：《珠三角地区落实〈规划纲要〉进展定量评估研究（2011 ~ 2012）》，2012 年 12 月。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进公众评价民意调查报告》，2012 年 4 月。

The PRD Economic Situation: 2012 Analysis and 2013 Outlook

He Manxiong　Yang Haishen

Abstract: Facing the dual pressures of steady growth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closely around the them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main line of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core task of happiness Guangdong construc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eply carried out "Pearl River Delta Planning Outline",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intained steady growth.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has obtained actual effec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pgrade has new progress.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achieved new breakthrough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undertakings has made new achievements.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mode; Model-transfer upgrading; Forecast

B.12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现状分析

游霭琼*

摘　要：

2009年以来，以三个“经济圈”建设为抓手的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工作取得了突破，区域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但要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目标，还需靠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突破一系列制约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

珠三角　区域一体化　现状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动态、渐进、复杂的过程。经过近四年的努力，以“三个经济圈”为单位推进的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已成功破题，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制约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得到根本突破，实现区域一体化仍任重而道远。

一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现状

近年来，珠三角九市和省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按照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完善协调联动机制，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为突破口，以广佛同城化为引领，深入推进“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建设和合作，基本实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制定的“到

---

* 游霭琼，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主要研究区域经济、金融等。



2012 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初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为下一轮工作的推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1.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实现

5 年来，广东编制了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际轨道交通等规划，“慢”、“快”相结合的珠三角城际交通轨道、绿道——“双道”建设突飞猛进，广佛地铁、广珠城轨等轨道交通线及一批干线高速路相继建成通车，区域相邻城市间的 90 多条跨市公交线路陆续开通，短途客运公交化和年票互通顺利实现，“粤通卡”使用率提高，区域公路收费站快速通行能力提升，16 条线路、总计 1478 公里的城际轨道交通构建成“三环八射”的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率先突破，把珠三角区域内分散的城市“网”成一个整体，实现无缝连接，既强化了城市群之间的联系与分工，又增强了城市之间的配套能力，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引发沿线居民住、行、工作观念的深刻变化，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同城化发展新格局。

2. 建立了规划一体化体系，重大利益协调机制开始建立

规划体系、规划制度实现了一体化，区域体制机制层面的合作框架逐步完善，建立了重大利益协调机制。

一是省政府编制系列规划，出台了“四年大发展”工作方案。2009 年 4 月 10 日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的决定》，提出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加快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战略目标；2010 年，又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和“五个一体化”专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为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描绘了长远蓝图，明晰了具体路径。

二是珠三角各市根据构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要求，先后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区域要素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自主流动、配置，推动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共享和一体化发展。如广州、佛山继

2009 年 3 月签订《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后，又进一步签订了《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协议》《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城市规划合作协议》《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产业协作协议》等；深圳、惠州、东莞三市签订了《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深入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警务紧密协作备忘录》和《深圳惠州东莞三市工商部门构建珠江口东岸地区统一市场监管体系框架协议》；珠海、中山、江门三市签订了《推进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协议的签订，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珠三角 9 市也签署了一批协议，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应急管理合作协议》《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珠江三角洲九市反走私紧密合作协议》《公积金异地互贷协议》（深圳除外）《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 TOD 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以及创业公共服务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等，2011 年 7 月，珠三角联合港澳有关部门开展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在粤港暨粤澳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会议原则通过。

规划一体化体系的构建，促进了珠三角城市规划管理水平的提升，城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推进，使得珠三角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融合，初步形成了多中心、集约化的城市发展格局。

3. 建立了有效的省、市、都市圈三级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

一是成立了市际合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通常由协议成员方的市委书记、市长组成，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协调。二是成立了重要合作事项专责小组，负责区域相关领域合作衔接协调，落实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确定的有关工作事项，对接制定三年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细化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举措，协调推进落实。三是建立了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办高层联席会议，通报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情况，对重大合作事项进行协商和决策。四是成立了日常办公机构和各市部门间协调机制。在各市的发展改革部门设立了市长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具体事项的落实。五是成立了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共同谋划区域合作规划、合作重点、发展方向等。六是形成城市间干部相互学习、交流机制。省政府以召开落实《规划纲要》现场会形式，推动珠三角各市工作交流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发展理念融合和体制机制创新。



4. 建立了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机制

一是初步建立了环保环治区域一体化机制。三个经济圈在环保规划对接、行政磋商、行政互认、行政协调方面建立了制度性的机制，建立起对跨界流域断面和圈内空气质量的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全了流域、区域空气、水污染治理联防联治机制。二是跨界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2011 年明确了珠三角不再新建、扩建燃煤燃油电厂，促使中科炼化一体化等重大项目调整选址，引导大型石化基地向粤东、粤西等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布局。到 2012 年底，完成空气污染整治项目 2527 项，淘汰和治理锅炉 1279 台，完成了全部油气回收治理。珠三角 61 个空气监测自动站和 29 个水质监测自动站全部实现联网，2012 年 3 月珠三角率先开展并实时发布 PM2. 5 检测结果，跨界水污染治理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珠三角区域整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获得公众认可。

5. 产业布局一体化迈开大步

一是随着“三规”约束力度的强化，行政分割给生产要素区域自由流动带来的阻隔在日趋削减，行政对资源配置的束缚逐渐弱化；牵引性大项目由省统筹布局，有效解决了各市对项目的无序竞争，有利于推动产业区域布局逐渐趋于合理化。二是以“双转移”为导向的产业区域转移进展良好。按照省委、省政府“双转移”战略部署和《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 年)》精神，最早遭遇资源环境约束的珠三角各市在明晰各自主体功能定位基础上，积极拓展经济圈产业协作，珠三角产业布局一体化进展更是迅猛。如广佛肇三市结合各自产业化比较优势，积极引导广州、佛山产业向肇庆转移，目前在肇庆投资的广佛企业已占肇庆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 70% 以上；东莞和惠州也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转移的产业规模每年达到 400 亿～500 亿元。而从区域分布来看，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优势突出，“深莞惠”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上升到 78. 3%，珠江西岸电气机械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广佛肇”汽车产业总产值占全省比重上升到 85. 9%。东西两岸进一步凸显了错位发展。

6.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有重大突破

近年来，广东省和珠三角各市不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完善推动基本



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地区间标准（底线标准）逐渐统一，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促进公共教育均衡发展、公积金互贷、养老社保无障碍转移、医保异地互刷、取消长途漫游费等方面取得成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探索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服务以及纳入积分制管理，基本实现区域内公共就业服务待遇顺畅流转，得到社会公众的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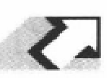
二　当前制约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问题

1. 突破难点的力度不够

一是重点建设项目受征地、拆迁推进缓慢的影响。二是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受历史债务影响。三是受国家相关调控政策影响，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产业项目不能按计划如期推进。如受铁道部变更设计标准，以及调整铁路发展思路造成资金未及时到位的影响，珠三角城际轨道 7 个项目及南广铁路、西路沿海铁路建设放缓，未能完成原定的年度进度要求。四是受国家审批立项影响，中海油惠州炼化厂扩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等 6 个项目因尚未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或批复而未启动，东江水资源水量、水质监控系统等由于在省内立项环节耗费时间较长，导致整体建设滞后。

2. 一体化推进的激励约束不够

财政体制激励不足。先发国家有专门的财政预算、跨区域基础设施专项经费作为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经费保障，但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没有由省财政提供的专项经费。加上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在行政区划体制下，GDP 仍是政绩考核、地方利益的关键指标；在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地方利益代表者，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是其基本价值取向。这几年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行政、地方利益分割现象有了一定程度打破，但行政区划分割导致的行政资源配置“碎片化”和地方利益分割仍是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它不仅将大市场分割成一个个行政区划市场，抑制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优化配置，导致市场失灵，而且“切块”管理使区域性基础设施、交通信息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不能得到充分的共享和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跨界性问题，如河流污染治理、工业污染治理、大气质量治理等难以有效解决；也难以对区域间信息不



对称以及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有效预防与控制。

规划协议机制约束力不足。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把地方跨区域、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合作协议纳入约束范畴，不论是省或“三个经济圈”市际签署的合作协议容易停留于纸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下，协调内容“落地”艰难。从目前珠三角地区市际区域合作协议条款中的权利义务逻辑结构看，协议的条款内容具有原则性、政策性和宣言性特点，欠缺责任条款和权利义务约束力。因此，出现争端往往要依靠政治权力或领导者意志协调解决，缺乏长效法制保障。尤其是在处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等涉及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担等实质性问题时，目前的合作机制作用有限。目前的合作机制缺乏来自省级层面的强有力的协调机构，缺少完善的制度化、程序化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反馈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及各种有效的区域利益协商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政绩考评机制，使诸如“领导小组”“市长联系会议”“专责小组”等合作机制作用大打折扣。

3. 宣传力度和社会参与度不够，社会共识尚待加强

社会公众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工作认知度和关注度不够高，推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仍主要是政府主唱，百姓在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还没有生成。

三　加快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和国内外未来发展大趋势，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广东特色社会主义区域一体化模式，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破除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一体化，创造一个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的制度环境，使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突破行政区划约束，更自由、更顺畅、更有序地流动和更合理、更科学、更有效地配置，全面提升珠三角区域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带动环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并密切与港澳合作，共建世界级城市群。

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珠三角改革开放前30年竞争背景下形成的“诸侯经济”在现行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得以强化，地方政府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与手段，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等行为成为阻碍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实现地方利益与区域整体利益均衡将是推动珠三角一体化的首要任务。

一是进一步加快省与市政府职能的共同转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在继续加大经济管理职能向市级政府和企业让渡力度的同时，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实施国有资产管理、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管理社会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的职能，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区域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市级政府应尽可能从经济领域退出，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向企业让渡的权力全部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成为真正的资源配置主体，政府则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市场环境。

二是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规范化与法制化。区域一体化需要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与服务市场体系，需要实现对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这些都涉及了地方利益的让渡与博弈。加快政府职能的规范化与法律化，明确省、市政府的职权和关系，以立法的形式将改革所形成的省、市政府各自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明确下来，并重新界定市级政府的“事权”及“财权”，对地方税的种类、项目、用途等作重新确定。

三是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建立对阻碍区域一体化的相关地方保护惩罚机制，探索制定《区域关系法》《反限制竞争法》。通过法律体系，明确省级政府对市级政府阻碍区域一体化及区域合作的行为监管权力，加快整个区域一体化进程。

2. 加快区域性统一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完善，夯实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安全可靠”的原则，进一步将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作为珠三角各经济圈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规划建设、制度规范、运输服务、科技信息化和支持保障体系



等方面全面推进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形成网络完善、布局合理、运行高效、与港澳及环珠三角紧密相连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使珠三角成为亚太地区最开放、最便捷、最高效、最安全的客流和物流中心”。

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一体化规划。制订区域统一的管理制度及标准规范，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和执法处罚标准，建立与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完善一体化的管理运营制度，形成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全区域运输市场。建立完善区域性统一高效的综合交通设施体系。重点加快建设完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及公路网，进一步加快连接相邻城市边界的断头路；加强毗邻城市下属乡镇、街道次级空间单元的连通，搞好不同城市间公交线路的接驳，逐步推进城际巴士公交化。以推进第四方物流为导向，全面整合物流运输体系，提高区域交通信息化水平，实现区域交通运输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区域交通运输资源的科学配置、利用，全面提高管理效能，降低运营成本。

3. 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多领域、多层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共建共享。以产业园区和创业服务中心为载体，强化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珠三角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围绕重点产业领域、重大关键技术和公用技术，打造以重点行业和公共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技术支撑平台；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信息基础网络和公共信息数据库，搭建现代化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珠三角人才和劳务市场，继续推动职业资格互认、劳动力市场跨市合作，建立统一高效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平台；以广州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为载体，建立统一的技术和产权联合交易市场，搭建面向珠三角的技术和产权交易平台；等等。

4. 以保障底线均等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在承认区域差异化的同时，由省建立标准，保障公共服务的底线均等化、一体化，底线标准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保障社会福利关系的跨市转移，为人员流动提供便利，地方政府之间可建立合作机制，在后台解决财政支付问题；在义务教育上首先实现均等化。

5. 以加快优质生活圈建设为目标，狠抓环境治理与保护一体化

环境治理与保护一体化是破解珠三角可持续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区域“稳中求进”改革基调的重要保障。下一步珠三角各市及省直部门应着力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大气和水污染治理。要重点加强广州、深圳的水污染治理，把珠江广州河段作为衡量珠三角水污染治理的标尺，全面普查污染源，务实推进整治工作。二是加强省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统筹管理。地方政府将部分管理权限与相应的财税利益让渡给省级政府，由省政府提供基本的区域环治环保服务，以及督促各市对各种环治环保协议的执行和政策落实。

6. 以强化规划刚性约束为目标，进一步推动区域城市规划一体化

规划一体化是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先决条件和保障。针对当前存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不力、城市布局特别是边界之间协调不足、专项规划之间缺乏衔接等问题，今后珠三角区域城市规划一体化应着重做好：一是进一步理顺规划编制与执行体制，在省级层面建立科学的有利于区域统筹协调的规划编制、审核体制和监督执行机制，保证规划得到贯彻落实。二是进一步强化规划对接。“三大经济圈”要进一步细化圈内的一体化规划，落实合作项目，推动经济更加紧密联系。广州、深圳、珠海市要继续发挥好牵头作用，加强圈内各市的沟通协调。

7. 创新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形成加快一体化发展合力

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在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率先实现新突破。一是转变社会管理观念，从管理社会走向培育社会、服务社会，从行政管控走向依法监管，从包揽公共服务转向制定规则、掌握方向、做好规划，让市场、社会参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二是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治理要求，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政放权，向下放权，向市场、社会放权，最大限度把政府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向市场和社会释放，构建与推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相适应的政府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共治的组织网络机制。三是重点推进社会组织制度改革。珠三角特别要在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方面先行一步，重点培育以城市为单位的社会组织。



四　加快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1. 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在解决区域一体化难点问题上实现新突破

珠三角九市、省有关部门要按照《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现“四年大发展”工作方案》的要求，对一些进度滞后的重大项目，加强协调、沟通、衔接，落实责任，着力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规划纲要》实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按计划完成任务。一方面，加强省市沟通协调，形成合力。由省牵头的项目，相关市要从全局出发，大力支持，做好服务。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家部门沟通。涉及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核或批复的项目，省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做好内部协调，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衔接，积极争取支持。

2. 不断丰富“五个一体化”内涵

一是明晰“五个一体化规划”的内在联系，找准各个“一体化规划”的着重点、关键点及推进的具体思路。二是分清轻重缓急，确定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的阶段性目标。如对“五个一体化规划”中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疏理，确定哪些方面可先突破、哪些可暂缓等。三是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调整“五个一体化”内涵。四是根据区域一体化深化进程，调整一体化的侧重点。要淡化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领域一体化的政府干预，强化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的一体化领域，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与管理、社会治理与行政公共服务、市场经济规则程序安排和监督、基础资源配置与共享、人口管理与社会保障等。

3. 以信息化推进区域一体化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与社会化“双融合”，积极推动珠三角地区在数字商务、数字政务、数字社会、数字城市等方面建设并率先取得突破。特别是要加快数字政务、数字社会发展，改变数字政务、数字社会滞后于数字商务发展的局面。



4. 深化粤港澳合作和环珠三角区域合作

在取得“三大经济圈”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必须扩大范围、提高水平，放大一体化效益，要围绕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深化与港澳合作，建设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提升珠三角对环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环珠三角地区加快发展，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5. 创新体制机制，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区域一体化发展，市场是动力，政府是关键，制度是核心。珠三角区域一体化要“化”出广东特色、“化”出重大成效，必须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省市联手。要尊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地位，凡是应由市场、社会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的领域和事项，区域一体化的重点是破除行政区划束缚，让市场规律和社会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扮演着四种角色：市场秩序建立者、社会管理责任者、公共服务供给者或组织者、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组织管理者。同时，政府在推进区域体制一体化中处于关键位置。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保持改革锐气，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着力在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改变运作规则上下功夫。一是建立政府间合作的约束机制。二是建立、完善利益协调、补偿、共享机制。三是建立民间力量推动一体化的机制。四是探索建立行政托管机制。五是设立半刚性协调机构“珠三角区域委员会”（现在的“纲要办”为其办事机构），着重统筹需要在整个区域协调规范的事项。六是深化粤港澳一体化联动制度。

6. 完善区域一体化法律法规，强化法规的刚性约束

突出区域一体化制度（法规）建设。循序渐进，凡较成熟、稳定的一体化事项，尽快转化为常规化法制建设，固化一体化发展成果，依靠刚性法律法规手段整合区域资源，约束和调控政府行为，鼓励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消除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土壤，保证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具有均衡性和连续性，使区域一体化依制运行。由此，逐步把区域一体化建设转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建设。可制定一个区域一体化制度（法规）建设规划，系统有序推进区域一体化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08年12月。

广东省政府：《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决定》，2009年4月10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2009年6月10日。

广东省政府：《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珠江三角洲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10年8月12日。

广东省委、省政府：《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实现"四年大发展"工作方案》，2010年10月24日。

The PR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alysis

You Aiqiong

Abstract: Since 2009,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three economic circles, has made great breakthrough.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has been shaped. However, to further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 still need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system mechanism, resolving the deep-rooted problems that hinder i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Present situation

B.13
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市场示范研究

任志宏*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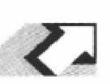
2012 年 6 月，《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历史的机遇不容错过，顺势而为才能更有作为，广东金融改革与发展如何服从和服务于推动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并在金融改革发展进程中加快由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变显得极为关键。

关键词：

珠三角　金融改革创新　金融强省

"大"而不"强"一直是困扰广东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2008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把金融产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为新时期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2012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以科学发展、先行先试为主线，进一步细化了《规划纲要》"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思路和目标，具体明确了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的任务和措施。广东必须准确把握国际金融变动和人民币国际化新趋势，以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点，做好金融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将

* 任志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



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工作的重心从微观层次的金融“改革”转向宏观层次的金融“发展”上来，让金融改革与发展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推动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并在金融改革发展进程中加快由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的转变。

一　广东金融改革发展的基础

“十一五”时期，广东金融业开始步入科学发展轨道，建设金融强省迈上新台阶，经济金融良性互动，金融领域已成为广东经济发展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

1. 广东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发展金融产业一系列谋划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十一五”期间，随着思想不断解放，认识不断深化，经济金融发展深刻变化，广东金融工作指导思想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从片面求大求多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由注重发展规模、速度向追求规模、速度与效率相协调的转变；二是从惧怕风险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由注重防范风险向防范风险与注重科学发展并重的转变；三是从把金融仅仅作为投融资工具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由注重融资行为向发展金融产业的实质性转变。省委、省政府形成了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建设金融强省发展的战略，确立了将金融产业发展成为广东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成功争取到将广东提出发展金融产业的构想与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和完善了金融工作新的体制机制。

2. 金融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一五”期间，广东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上升。金融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93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177.98亿元，年均增长32.6%，金融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实现大发展，各金融市场总量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3. 地方金融体系实力明显增强

首先，地方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不断完善。一是地方金融机构全面甩掉历史包袱，发展进入快车道。二是多元化地方中小银行体系逐步形成。广州银行、珠海市商业银行、东莞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逐步做大做强，已成为区域性乃

表1　广东金融强省"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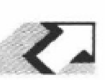
指　　标		2005年	2009年实际数	"十一五"规划目标
金融业产业地位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3.01	5.6	>5.0
	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	6.99	12.2	>11.0
银行业	银行业总资产(亿元)	42460	93000.0	80000.0
	银行业总资产年增长率(%)	12.72	32.8	14
	存款余额年增长率(%)	14.07	24.2	12
	贷款余额年增长率(%)	9.99	31.9	12
	地方银行资本充足率(%)	<0	>9	>8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12.57	1.68	<10
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数(家)	163	250	300
	直接融资比例(%)	0.82	10.9	30
保险市场	保险业机构资产总额(亿元)	1090.12	2605.12	>2200
	保险主体		70	61
	保险分支机构(家)		>5000	5000
	保费收入(亿元)	499.24	1231	1200
	保险深度(%)	2.3	3.15	3
	保险密度(元/人)	543.58	1277	1200
区域金融中心地位	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3.7	6.07	7
	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	6.5	9.98	14
	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6.24	14	10
	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	13.15	26.31	25

注：除农信社外的地方银行业机构资本充足率都已达到8%。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12》《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等资料整理而成。

至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广州、东莞、顺德等4家农信社已成功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三是全省融资性担保体系初步建立。四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稳步推进。五是新型金融机构日益丰富。其次，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不断完善。目前全省共有省级产权交易机构1家，地级市产权交易机构17家，还有若干县区级产权交易机构。交易品种不断丰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建设也取得可喜成绩，影响力日渐增强。

4. 深化金融改革创新，金融服务经济能力有效增强

在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范围内，开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合作以及统筹城乡金融协调发展等全方位的改革创新试验，金融



服务经济能力不断增强。“十一五”期间，广东金融界围绕“三促进一保持”，着力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构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促进广东经济“保增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5. 积极推进金融合作与开放

一是粤港澳金融合作实现新跨越。“十一五”时期，广东以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为重点，明确了“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金融资源和服务为支撑的具有更大空间和更强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域”的粤港金融合作定位，建立了粤港金融合作更加紧密的长效工作机制，形成共同向中央争取扩大金融合作开放先行先试的合力，金融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二是粤台、广东－东盟金融合作正稳步推进。随着两岸经贸合作加深，以及《海峡两岸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粤台金融合作速度加快。东盟金融机构积极在粤设立分支机构，目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大华银行，泰国的泰华农民银行、盘谷银行等在广州、深圳、东莞等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三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进迅速。广州、深圳、珠海、东莞 4 个城市成为首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广东省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累计 1.7 万亿元，占全国结算总量超过三成，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

6. 逐步推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一是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错位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二是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和公共服务环境日益改善。三是区域金融中心聚集、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四是珠三角金融业一体化步伐加快。珠三角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积极开展金融一体化合作，金融机构互设和市场融合在不断推进。五是粤东西北地区金融改革发展大有起色。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为突破口，支持欠发达地区结合当地实际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实践，促进欠发达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粤东、西、北地区企业上市工作逐见起色，汕头、梅州等地上市公司数量取得历史性突破；加快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中小金融服务机构，对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村镇银行筹建、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整顿等工作，实行对欠

发达地区的倾斜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7. 金融生态环境明显优化，广东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历史遗留金融风险已妥善解决，增量风险有效控制。一是 1998 年停业整顿的 175 家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已全部进入退出市场的程序。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未发生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现代支付结算系统不断完善。三是征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四是金融债权司法保护有所提升，金融犯罪活动有效控制。

二 广东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 金融服务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对实体经济支持尚存不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金融体系结构转变要求愈加明显。在后工业化时期，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将导致金融等各种资源向落后产业、落后地区、传统领域堆积，持续制造过剩产能，就不能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和断裂。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首先必须实现金融体系的战略性调整。同时，金融业自身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金融业自身发展也是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要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广东在这方面仍有发展差距。一方面，广东金融资源大量闲置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领域融资困难的情况并存，存贷比仅为 6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 1 万亿元可贷资金闲置于银行体系内部。另一方面，广东“三农”、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未能有效缓解，金融对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支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建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结构不够合理。

2. 金融竞争力相对减弱，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国内金融改革创新的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发展金融产业不再是某一两个经济发达地区的专利，各地发展金融产业的意识纷纷苏醒，金融改革创新竞争激烈，金融资源的争夺明显，具体表现如广州中英、中意人寿总部迁往北京，十余个省市都在争做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各地纷纷争取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落户本地，等等。第二，以金融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关键举措的成效已被实践证明，金融被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基础作用有所弱化。如天津、重庆两地都是金融后发城市，通过金融改革创新，不仅成为金融先进城市，而且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成为金融改革创新大出实效的成功典型。第三，上海已被国家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集聚了国家绝大部分金融平台，获得国家政策绝对支持，其他省市争取重大金融平台创新难度不断增加。国内各省市加快发展金融业、对金融资源的争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化等都增加了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紧迫感，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广东金融关键指标领先优势越来越小，在部分指标上有被其他省市超过之忧。

3. 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农村金融仍是广东金融发展薄弱地带

虽然目前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第一，但省内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和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珠三角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广东区域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健全，金融资源在区域和城乡分布不平衡程度更甚于经济不平衡程度，粤东西北地区存贷比例相对偏低。珠三角地区在CDP和存贷款总量上绝对领先，加上在增长速度上又明显高于东西两翼和山区，同时各类金融机构又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态势还将继续，并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势必影响广东经济的整体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金融问题是当前和“十二五”期间制约广东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一方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要求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以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另一方面，可缓和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的矛盾，解决农民就业、收入、消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突出问题，也需要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而农村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和农村金融体系收缩的矛盾相互交织，使广东农村经济和金融难以进入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轨道。目前广东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单一，信息化程度低，结算手段落后，90%以上是现金结算，农民可享受的金融服务依旧十分有限。

4. 直接融资有待进一步发展，民间金融急须规范和引导

2011年广东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约为15%，离“十二五”30%的

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发达的落后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债券融资依旧是广东融资结构短板，企业债券规模总体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2011 年只发行了 70 多亿元企业债，与发达省、市的差距继续拉大。

广东民间资本雄厚，但缺乏规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渠道不通畅。我国加入 WTO 已逾 10 年，外资银行早就结束 5 年的过渡期并且享受了国民待遇，可大量的民间资本却仍不能享受国民待遇。一边是民间资金多却投资难，另一边是小微企业多而融资难，这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管制壁垒森严、金融市场开放不够，尤其是没有建立起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体系直接相关。

三　广东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1. 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和规则面临重新调整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十分复杂，挑战重重。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虽然较年前预期要好，许多指标有所改善，但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酵和传递，全球资本流动更加无序，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经济复苏的步伐将持续放缓且充满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将继续。广东是我国外向度最高的省份，一方面，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国际化将为广东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如人民币国际化促进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崛起，为广东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融机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和金融体系与国际融合度最高，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影响也首当其冲，应对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对区域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降低，全面强化金融监管导致金融资本新一轮国际转移。广东如何创造合适的政策环境，加速承接发达国家金融业的转移，成为金融超越式增长的新机遇。但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带来国家金融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尤其是广东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必须提升金融竞争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同时，广东以传统、中低端、高碳、外向型为主的制造业将会在承受被排挤压缩的外在强大压力同时，面临承接高端服务业转型的有利机遇，因此，目前以服务传统产业为主的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也面临着更为重要的变革，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

2. 国内金融改革创新的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十二五”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和开放步伐加快。广东应对外配合中国崛起战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努力提高中国在世界金融格局的地位和影响力。国家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步伐为广东抢先一步、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体系、推动金融体系转型升级、深化粤港澳合作等金融强省建设战略举措创造了良机，但利率自由化、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监管日益严格等趋势也给广东金融改革发展带来了一定压力。

同时，兄弟省市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加快给广东金融发展带来压力。这需要我们真正树起金融改革促发展的大旗，但其他省市发展金融的成功经验也为广东发展金融产业提供良好借鉴，促进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动从金融大省到金融强省转变。

3. 金融创新已经成为顺应广东经济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

一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金融体系结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要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首先必须实现金融体系的战略性调整。同时，金融业自身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金融业自身发展也是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和创新型广东建设的加快对金融的配置资源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三是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绿色广东的要求必须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四是金融开放和合作不仅是加快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开放水平全方位提升的重要引领力量。五是促进社会建设的整体性推进和和谐广东建设要求不断丰富和拓展金融体系功能。

四　未来珠三角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

“十二五”时期广东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金融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新突破，使金融产业发展成为广东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全面提升广东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金融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为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强大推动力；全面建设具有广东特

色的地方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和“三农”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域和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全面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维护金融安全；全面建立完善金融改革发展激励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全面推进金融合作与开放，建设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与构建广东开放型经济体系进程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实现上述目标，未来广东必须在以下方面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1. 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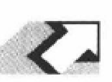
紧紧围绕广东发展新阶段的总体需求，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坚持先行先试，大胆探索金融科学发展的新路径，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机制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方式创新，争创金融发展新优势，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为全国的金融改革创新提供经验。一是全面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二是全面推进梅州市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三是全面推进湛江市统筹城乡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四是加快推进珠海横琴新区金融创新。五是全面推进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六是在中山开展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

2. 加强金融服务和招商，大力引进和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来粤发展

广东要继续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源的规模优势，优化环境，加强政策扶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到广东设立总部和区域总部以及分支机构，以此引进管理经验和金融人才，增强竞争，丰富市场功能，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推动促进整个金融产业做大做强，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力量之一。一是继续支持中央和全国性驻粤金融机构改革发展。二是加快全国性金融后援服务基地建设。三是努力承接发达国家金融业的转移。

3. 全面建设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金融体系

建设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金融体系是“十一五”以来广东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工作任务，其目的在于增强广东金融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打造一批在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金融品牌；加强对广东金融资源的调控能力，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核心工作任务是发展和做大做强广东地方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广东地方金融要素市场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建设具



有广东地方特色的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建设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建设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4. 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任务，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机制、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产品与服务等全方位的改革创新，发挥金融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引领作用，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核动力。一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经济结构。二是优化创新创业投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支持自主创新水平。三是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四是有效扩大社会需求，促进消费，提高经济发展内源性动力。五是发展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5. 统筹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开创金融合作开放新格局

加大区域内金融资源的整合，互补、错位发展，提升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辐射带动能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珠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增强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辐射带动能力，大力提升粤东西北地区金融服务水平。

促进粤港澳金融更紧密合作，在 CEPA 框架下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加快推进粤台金融合作，提升金融服务粤台经贸发展能力，创新与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新模式。深化与东盟金融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家战略实施。

参考文献

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2012 年 9 月 1 日。

广东省金融办：《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 年 12 月 1 日。

国务院：《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2012 年 6 月。

新华网：《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 年 6 月 29 日。

新华网：《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 年 7 月 2 日。

广东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广东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The Market Demonstration Study on the PRD Financial Feform and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Ren Zhihong

Abstract: In June, 2012, "The Overall Scheme of Guangdong Province Constru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Overall Scheme" as abbreviation) was ratifie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appeared in the track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rogress of provincial financial reform should serve and follow the mode of economic and the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of economic condition, with the purpos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inancial big province to a powerful financial province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reform.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powerful financial province

B.14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发展研究

伍长南*

摘　要：

福建是海洋大省，发展海峡蓝色经济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海洋资源优势。建设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开发利用海峡、海湾、海岛资源为重点，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思路，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海洋经济　蓝色经济试验区　海湾　海岛

一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发展现状

（一）海洋经济实力持续提升

2011 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 4419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25.4%，“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 19.7%，位居全国第五位。海洋经济已成为福建省经济的主要增长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由 2005 年的 22.8% 提升到 2011 年的 25.4%。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海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全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6 年的 9.7∶40.2∶50.1 调整到 2011 年的 8.1∶44.3∶47.5[①]，呈现海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的良好趋势，

---

* 伍长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① 2012 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情况汇报》。

但相较于全国5.1∶47.9∶47的平均水平，海洋经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较高，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

表1 “十一五”期间福建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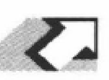
单位：亿元，%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十一五”年均增长
海洋生产总值	1743.1	2290.4	2688.2	2989	3440	18.52
其中：第一产业	169.2	222.2	252	284.6	327.83	17.98
第二产业	701.3	909.3	1097.7	1227.3	1415.56	19.19
第三产业	872.6	1158.9	1338.5	1477.1	1696.61	18.08

在全省海洋产业中，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与仓储、滨海旅游、船舶修造、海洋工程建筑等五大海洋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2011年实现产业增加值1423.6亿元，占全省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的72.4%。海洋生物医药、邮轮游艇、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快。2012年上半年海洋渔业（不含远洋）实现产量260.62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4.7%；滨海旅游业累计接待游客7445.84万人次，同比增长15.3%，旅游收入820.31亿元，同比增长15.2%。

（二）海洋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2011年全省沿海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深水泊位129个，货物吞吐量3.7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969万标箱，沿海地区铁路、公路、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百个渔港建设、千里岸线减灾、万艘渔船安全应急指挥系统”为重点的海洋“百千万工程”建设有序开展，重点港区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航道建设和疏港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厦门、福州、泉州、莆田等港口的重点港区的疏港大道均与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相连，形成覆盖沿海、近海、远海的三层立体交通网络。2012年1～9月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3.02亿吨，同比增长9.4%，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8.8%，内贸货物吞吐量1.81亿吨，同比增长9.9%，沿海港口作为周边省份的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2012年前三个季度，内陆省份



经由福建省口岸进出货物达 1199.54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49.2%。其中，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继续增长，2012 年前三个季度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 1.26 亿吨，同比增长 7.44%；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成 512.8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7%[①]。

（三）闽台海洋经济合作持续拓展

闽台渔业合作已涵盖苗种繁育、水产养殖、远洋渔业、渔工劳务合作及渔业科技合作等领域，并在东山、霞浦、连江等地规划建设两岸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覆盖沿海六个设区市的 8 个港口率先开通对台海上直航，率先开通对台海上直航客滚航线，率先实现两岸双向旅游，两门、两马等“小三通”航线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通道。2012 年前三个季度对台货物吞吐量呈平稳增长之势，全省港口对台货物吞吐量完成 1607.03 万吨，同比增长 3.1%。

（四）海洋新兴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海洋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福建海洋渔业已从海洋捕捞、养殖和加工，向食品加工、饲料、船舶修造、海洋生化、海洋药物和休闲渔业等行业延伸。水产品加工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海洋运输业发展带动了船舶修造业、物资、仓储、港口贸易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领域。特别是近年来，海洋生物医药业、游艇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信息服务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如厦门市游艇经济发展迅速，已拥有一批产能大、品牌响、外向度高的游艇制造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现有游艇企业 47 家，游艇制造产值 5.4 亿元，出口 3246 万美元，约占全国出口份额的 18%；海水利用也取得初步成效，海岛、船舶专用小型海水淡化整装设备通过设计定型，已投入批量生产；实现年电厂冷却利用海水 6.98 亿立方米，海水脱硫达每小时 4.3 吨，烟气脱硫效率达 90% 以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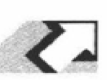
①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我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 3 亿吨》，2012 年 10 月 18 日。

（五）海岛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有序推进

福建省共有海岛2214个，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1/4，总面积约1400km²，其中，无居民海岛2115个，有居民海岛99个。在有居民海岛中，建制乡镇以上海岛14个（不含厦门、大嶝、鼓浪屿、大金门、小金门及马祖列岛等岛屿），包括平潭、东山两个县级海岛和琅岐、江阴、东庠、大练、屿头、草屿、南日、湄洲、浒茂、三都、西洋、大嵛山等12个建制乡镇海岛，有52个行政村海岛和33个自然村海岛。近年来，全省加大海岛资源保护与开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强化海岛重点工程保护，开展领海基点海岛保护工程，严格保护领海基点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生态系统，保持领海基点海岛地形地貌的稳定，禁止任何破坏领海基点海岛的开发活动。推进典型海岛资源保护，以维护海岛典型生态特性和基本功能为主要目标，加强典型海岛特别保护区的保护，维护海岛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如连江县粗芦岛屿实施海岛典型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保护工程，取得较好的成效。完成了海岛地名普查登记和名称标准化工作及首批87个海岛名称标志设置工作。在连江黄湾岛、长乐人屿岛等典型海岛，建立“无居民海岛生态特别保护区”，连江县洋屿滨海综合旅游用岛项目已获审批，成为全省首个进行旅游开发的无居民海岛。

（六）推动“三群”联动发展

2012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港口群促进“三群”联动的若干意见》，重点推动港口、产业、城市联动发展。在港口方面，针对沿海港湾众多，港口资源丰富，经多年探索，已开始整合为南、中、北部三大港口群，其中，厦门港已完成港口资源整合，深化同港同策，包括税费、补贴、口岸通关等优惠政策延伸所有港区；海关、海事、检验检疫一体化管理，通关效率显著提高，已跻身亿吨港、全国八大集装箱干线港之一。湄洲湾港实现湾内整合，港区、作业区功能正加速整合；福州（福州－宁德）港口整合也在加快推进。到“十二五”期末，全省将形成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海西港口群，其中，厦门港建成2亿吨大港，成为东南沿海国际航运中心；福州港建成亿吨国际航运枢纽港，湄洲湾港建成2亿吨的主枢纽港。在产业方面，引导沿海产业



集聚，如沿海福厦光电、泉港石化、泉州纺服、长乐纺织、泉州鞋业、厦漳农产品加工、泉州机械装备集群产值发展，形成了一批区域品牌，提升了集群内企业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城市方面，初步形成了以福州、厦门、泉州等特大城市为龙头，漳州、莆田、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城市为骨干的城镇体系，目前，福建省已明确建设厦漳泉、福州大都市区，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

二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发展特征

（一）海洋产业结构欠合理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低于全国水平，缺乏有规模的海洋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基础弱，起点低，规模小，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较低。特别是近年来，临港、临海工业布局不尽合理，重大产业项目基本布局在沿海的主要海湾和港口周边区域。各地受行政分割体制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影响，从局部和短期利益出发，在项目招商引资中，各地竞相洽谈或准备上马的石化、冶金等重化项目，形成无序或过度竞争。

（二）海洋生态保护任务艰巨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的沿海投资和建设热潮兴起，给海洋资源环境带来了双重压力。海洋灾害频发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海湾资源与围填海需求矛盾突出。沿海各地大规模填海造地，最近10年共填海250多平方公里；根据各地需求，2011～2020年，各地新提出在海湾内围填海规划面积达381平方公里。但海湾、岸线等重要海洋资源开发布局上还比较分散和无序，资源集约利用程度较低，港口码头建设分散，港区、作业区功能雷同，缺乏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主导开发建设。海湾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大。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岸海域海洋环境总体污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航道淤浅、码头港池的淤积加剧；局部区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损害；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海上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薄弱。

（三）临港产业发展受到环境容量制约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渔船油污及港口其他船舶油污等流入海洋，造成部分海域不同程度的污染，海洋环境污染问题较突出，出现海水富营养化、贝类产品微生物超标、围海使沿海滩涂湿地面积减少，对海洋资源深度开发、综合利用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由于涉海部门、行业较多，各自为政、盲目开发状况尚未能得到根本扭转，今后随着临港产业的发展，与水产养殖业的矛盾将不可避免。

（四）海洋综合管理协调机制尚待完善

虽然全省海洋研发力量较雄厚，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海洋经济发展面临人才制约问题凸显，难以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海洋经济管理机制具有海洋综合管理、海洋行业管理并存特点，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和使用权划分不清，资源开发利用中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各行业各自为政、无序开发的状况仍然存在；港口岸线开发与后方陆域开发衔接乏力，港口规划尚未与主体功能规划、国土规划、城市规划有机融合，影响海洋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

（五）海岛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海岛开发利用强度总体较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较为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水平较低；环境保护设施落后，生态环境压力较大，与周边陆域地区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特别是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开发面临以下问题：①海岛生态破坏严重。无居民海岛大多处在无人管理状态，有的海岛开采花岗岩外卖或作为本地建筑材料，对海岛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如个别海岛炸岛炸礁、填海连岛、采石挖砂、乱围乱垦等活动，改变海岛地形、地貌，甚至造成部分海岛灭失；在海岛上倾倒垃圾和有害废物，采挖珊瑚礁，砍伐红树林，滥捕、滥采海岛珍稀生物资源等活动，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②海岛开发秩序混乱。目前，除少部分海岛通过正常途径审批为旅游用地外，多数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管理，导致



开发利用活动无序无度；一些单位和个人随意占有、使用、买卖和出让无居民海岛，造成国有资源性资产流失；在一些地方，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登岛受到阻挠，影响正常的科学调查、研究、监测和执法管理活动行为。

（六）港口、产业、城市联动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港口方面，一是港口岸线资源利用欠合理，一些岸线后方陆域无序开发，资源利用不够充分；二是港口内部结构欠合理，货主码头多，公共码头少，影响了港口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三是泊位小而散，港口集疏运条件有待提高。产业方面，产业规模、总量偏小；产业发展层次低，以传统产业、劳动密集产业为主，企业研发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集群效应不明显，专业分工协作水平低，产业链短，配套能力弱等。此外，目前各地确定优先发展产业方向过多，不利于实现区域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城市方面，一是缺少能发挥龙头作用的核心城市，沿海城市规模小、吸引人口集聚能力弱，三大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导向和支撑作用不强。二是港城互动效应不明显，“大港小城”不对称，造成港城良性互动机制缺乏，制约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城市与港口内在联动机制、港城综合竞争力有待提升。

三　加快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发展的建议

（一）统筹蓝色海湾发展布局

以沿海环三都澳、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东山湾六大港湾产业带为重点，建成布局合理、特色明显、重点突出、分工协作，对全省产业发展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临港产业基地。

（1）环三都澳蓝色产业带。拥有城澳、关厝埕、漳湾等20万～50万吨级深水岸线资源。要科学推进岸线开发和港口建设，打造溪南、赛江、漳湾、沙埕等临港工业片区，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油气储备等临海产业，培育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专用设备等海洋新兴产业，推进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发展。

（2）闽江口蓝色产业带。包括闽江口、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北岸区域，加快推进以罗源湾、江阴半岛为重点的临港产业基地建设，发展壮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端临海产业，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邮轮游艇、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专用设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建成连接两岸、辐射内陆的现代物流中心。

（3）湄洲湾蓝色产业带。包括湄洲湾、平海湾、兴化湾南岸等区域。深化岸线资源整合，推进湄洲湾南北岸合理布局和协调开发，依托港口加快发展高端临海产业，重点推进泉港、泉惠、石门澳、东吴等临港工业区建设，建成现代化的临海高端制造业基地、能源基地、浆纸及木材加工基地。加快湄洲湾港口建设，促进港口物流业加快发展。

（4）泉州湾蓝色产业带。包括泉州湾、围头湾等区域，统筹产业、港口、城市发展，发展壮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高端临海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游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文化创意、海洋信息服务等海洋服务业，提升现代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港口物流业，促进海洋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5）厦门湾蓝色产业带。包括九龙江口（内港）和外港区，发挥经济特区、保税港区政策优势，加快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邮轮游艇、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滨海旅游、港口物流、金融服务、海洋文化创意、海洋环保、海洋信息服务等海洋服务业，提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高端临海产业发展水平。

（6）东山湾蓝色产业带。包括东山湾、诏安湾等区域，集聚发展高端临海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游艇制造等海洋新兴产业，提升滨海旅游、港口物流等海洋服务业和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水平。

（二）统筹蓝色海岛发展布局

结合国家、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着力实施“两个并重”（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发挥海岛特色优势，以旅游、渔业、清洁能源发展为重点，壮大海岛特色产业规模，优化海岛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



岛生产生活环境，提高海岛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陆域经济与海岛经济联动发展；利用近台优势，加强与台湾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在拓展两岸交流合作方面发挥前沿作用。

（1）坚持陆岛联动，统筹海岛发展。加强陆岛交通、能源、社会事业等统筹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陆地拓展为海岛发展提供基础和腹地，以海岛开发为陆地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发挥陆地对海岛的带动作用，把海岛的资源优势和陆地市场、资金、科技、人才等优势紧密结合，促进陆岛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境联动，实现海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2）坚持保护为主，促进适度开发。保护海岛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坚持因地制宜，从海岛实际出发，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海岛开发秩序，适度发展海岛港口、旅游、渔业及海洋能源等优势产业，促进海岛经济发展与旅游业、临港工业、物流业的联动发展，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提供有效支撑，把海岛区域建成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海上明珠”。

（3）坚持发挥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把握中央支持海峡西岸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的机遇，充分发挥各海岛独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对台经贸合作比较优势，突出抓好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做大做优海岛渔业、海岛旅游业、海岛运输业等，鼓励发展海岛生物医药、能源产业，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海岛产业体系，增强海岛区域发展后劲。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海岛建设，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海岛基础设施、度假旅游、产品加工、物流配送、船舶修理等产业领域投资，推动海岛经济社会发展。

（三）创新海洋产业发展机制

结合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实际，着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工作，突出先行先试和海洋特色，争取国家部委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推动海洋经济的跨越发展。要瞄准产业起点高、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的项目进行招商，增强“存量招商”“龙头”项目招商观念，实现投资项目的滚动发展。抓住沿海产业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强化集约项目招商，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与效益。要创新项目招商机制，建立重点项目库和招商引资项目库，全面实



施项目滚动发展和跟踪落实政策，采取专题招商、以商招商、网上招商等多种方式招商。要发挥福建省对台“五缘”优势，推动闽台产业深度对接，主动承接台湾石化、船舶、机械、冶金等产业转移，积极推进产业配套，打造海峡两岸产业互动合作新局面。

（四）引导蓝色产业集聚升级

强化产业链研究，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业基地”发展思路，着力培育与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对主导产业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临港产业项目。要结合各临港产业发展区域，培育相应的产业集群，发挥重点项目对延伸产业链、推动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带动周边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功能，提高工业园区产业规模；要精心组织临港投资项目的实施，科学谋划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做好项目的跟踪、分析、协调、服务；要创新项目带动机制，建立健全包括科学决策机制、项目目标责任制、项目生成和推介机制、项目监督制约机制等，提高临港工业投资项目履约率。

（五）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加大海洋科技投入，针对当前海洋经济在生产、研发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开展科技攻关与研发；强化海洋科技项目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在较高的起点上推进海洋能源开发与利用，推进风能规模化开发；鼓励和引导海水综合利用，建立新型海水利用循环经济；积极建设海洋科技中试基地及研发平台，推动建立国家南方海洋科研中心，加大力度投入海洋药品和保健食品、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高科技行业研发，推进相应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港口、产业协调发展。

（六）推动港口、产业、城市联动发展

按照港口发展规划，科学、合理、节约、有序开发利用港口岸线，严格按照重点开发、适度开发、预留开发的规划港区，有序推进港区开发、保护，引导、吸引具有码头建设与管理经验的大型港口经营企业投资建设公共码头，以



福州、厦门、泉州市为龙头，加快铁路、高速公路，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辐射，带动沿线地区发展，拓展西向即福州－宁德－南平－鹰潭－上饶发展轴、厦门－漳州－龙岩－赣州发展轴、泉州－莆田－三明－抚州发展轴，做大沿海港口群。强化产业梳理，明确沿海地区发展重点，站在产业发展前沿、站在区域发展高度，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谋划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路径，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要求，引导产业向重点园区和专业园区集聚。加快建设滨海都市带，依托沿海综合交通走廊和沿海湾区，形成北至宁德福鼎、南至漳州诏安的滨海城镇聚合区域，包括三大中心城市、25 个市县和若干个乡镇，建成对接台湾的前沿平台、沿海城镇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推动福州、厦漳泉大都市区建设，福州大都市区要发挥省会中心城市龙头带动、平潭先行先试优势，建成海西区重要的省会中心城市、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区。强化中心城市职能和国际化服务职能，推动区域整体升级，共同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高地。

The Fujian Straits Blue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Research

Wu Changnan

Abstract: Fujian is a coastal province,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location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s in resources to develop the blue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 Economic Zone,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cience, the Gulf, Strait Island Resources as the focu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ocean development, control, management ability, promote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coast.

Key Words: Marine economy; Blue Economic Zone; Gulf; Island

B.15
珠三角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制造业“再工业化”途径

路 平*

摘 要：

产业集群（专业镇）是广东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而且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在新形势下，专业镇（产业集群）面临转型升级重任，本文就珠三角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暨制造业“再工业化”途径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珠三角 产业集群 制造业 再工业化

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2012 年预计地方生产总值将超过 5.7 万亿元，紧随其后的江苏，2012 年地方生产总值也超过 5 万亿元，再后是山东和浙江；广东和江苏、山东又是全国制造业大省，产值都超过 10 万亿元。但从广东的产业布局来看，60% 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80% 以上的制造业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核心区的深圳、佛山、广州三市的制造业产值都在 1 万～1.5 万亿元之间，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 40% 左右。而产业集群（专业镇）则是广东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据中共广东省委政研室、省科技厅 2012 年 7 月公布的《推动专业镇进入转型升级快车道——广东省专业镇研究报告》，2011 年，广东专业镇地区生产总值 1.64 万亿元，占全省 31.1%，制造业总产值 9491 亿元。全省超千亿元制造业的专业镇 5 个在佛山，1 个在江门。超百亿元的专业镇 103 个，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腹

---

* 路平，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顾问、广东专业镇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



地几个市；专业镇规模以上企业2.5万家，专业镇平均企业集聚度为1130个/镇，珠三角地区的集聚度为2286个/镇；全省专业镇名牌、名标总数2905个，其中省级以上驰名商标1609个，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集中在专业镇的研发（R&D）人员20.2万人，通过产、学、研合作建立创新机构2686个，2011年专利申请81361件，其中发明授权2403件，占全省的一半；科技投入122.7亿元（见表1）。专业镇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在全区131个专业镇中，制造业产值超千亿元的6个，超百亿元的82个，佛山、东莞、中山三市的专业镇95%以上制造业产值都超过百亿元，超500亿元的12个。

表1　2011年珠三角8市专业镇科技主要指标

市　别	专业镇数(个)	研发人员(人)	科技投入数(万元)	科技人员数(人)	公共创新平台数(个)
广　州	5	8142	17026	15565	5
佛　山	37	67373	544329	248428	34
中　山	15	14887	250606	67745	15
东　莞	18	36770	215666	197106	16
珠　海	5	10940	11900	28851	5
满　门	20	28413	157857	51298	18
惠　州	13	4386	18476	37518	13
肇　庆	18	3268	11208	19977	18
总　计	131	174179	1227068	666488	124

一　外部环境对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影响

产业集群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生产组织形式，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发达国家的美、欧还是中国东部地区从北部环渤海地区经江浙到珠三角地区的凸起地带，都越来越凸显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国际最负盛名的产业集群研究学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柯尔·波特在新世纪初为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所作的研究报告：《集群创新：美国竞争力的区域基础》列举出12个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产业集群，西雅图周围的航空业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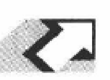
旧金山湾包括硅谷在内的信息业产业集群、洛杉矶地区的文化产业集群以及圣迭戈、丹佛、芝加哥、匹兹堡、波士顿、亚特兰太、休斯敦等不同产业内容的地区产业集群都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牵引力。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推行的以重塑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争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为主要内容的“再工业化”，其实质也是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它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复杂的技术簇群，有人归纳为三个方面：以 3D 打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制造快速成形；新材料复合化、纳米化；生产系统数字化、智能化。这些特点反映了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新趋势：产业边界模糊化，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关系，同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的主要形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物流、市场营销等，“微笑曲线”将成为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结合的主要形式；产业组织网络化。

二　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紧迫性

珠三角地区怎样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 年成为创新型的地区？关键是实现制造业及其载体产业集群（专业镇）的转型升级。按省委、省政府《关于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决定》（2012 年 7 月 19 日），“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按照‘市场引领，创新支撑，平台提升，品牌带动，园区承载，集群发展’的原则，加快推进专业镇转型升级，促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使专业镇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成为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珠三角制造业及其载体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紧迫性，突出表现在它的产业基础和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珠三角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饥不择食接受境外（初期主要是香港的几万家轻型产业）产业的转移和 OEM 型外资引进方式，这就造成产业结构主要是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投入大、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已使珠三角有限的资源很难承受了。这在深圳、东莞和佛山东部三区表现尤为突出。上述两市三区几乎已用尽了土地资源，土地的人口承载数量差不多已到极



限。根据统计资料，深圳常住人口 4329 人/km^2，东莞 2262 人/km^2。至于污染，珠三角已成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期虽还没有出现京津冀豫那样空气质量 AQI 五级以上重度污染，但雾霾不断也是有目共睹的。

从产业结构来看，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流。珠三角 8 市 131 个省级专业镇中，除 22 个农业专业镇、14 个服务业专业镇，在制造业专业镇中，纺织、服装、制鞋类专业镇 19 个，五金、塑料制品类专业镇 16 个，家具及木工制造类专业镇 7 个，珠宝及制砚类专业镇 3 个，陶瓷类专业镇 2 个，食品类专业镇 4 个，灯饰照明类专业镇 4 个，建材类专业镇 1 个，合计 56 个。而技术含量较高的通信设备、电气机械、通用及专用设备、光伏产业、交运设备、生物医药等产业的专业镇合共不到 30 个。这样的产业结构同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同以创新、知识、技术、智力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表 2　珠三角地区 6 个制造业产值超千亿元的专业镇一览

单位：万元

专业镇名称	特色产业	制造业产值	地区生产总值	特色产业产值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汽配	18881900	5200000	1100000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家电	17110000	3390000	13730000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	高端信息家电	13987557	3759057	9000000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	塑胶材料	13200000	3085042	881111
佛山市禅城张槎街道	针织	10260000	2700000	2320000
江门市蓬江区	摩托车配件	11995200	4308500	2479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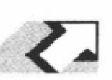
解决广东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低端化以及不掌握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的问题，都必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目前，影响广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是四个问题：一是各级领导包括企业领导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一点认识并不深刻。长期以来广东实行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做法就是重资金、项目的引进，轻技术、人才的引进；重引进硬件，轻引进软件；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把结构调整理解为上项目、铺摊子，追求 GDP 数量增加。不理解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自主创新，不论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吸收消化再创新，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陌生

的，还要投入资金、人力、物力，做艰苦、细致、踏实的工作，风险很大，失败的几率也大。这个认识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二是相对于广东5.7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广东研究开发投入仍不足。2012年，广东R&D投入虽然超过千亿元，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但仍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江苏几个省市，而且发展不平衡，去除深圳、佛山，广东的研究投入同上述几个省市差距更大了。企业投入方面更是如此。三是自主创新发展不平衡，广东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广州，而恰恰是广州，自主创新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深圳，这一点广州市负责人也是承认的。四是缺乏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

我们还应当看到，东部沿海绵延万里的集群经济凸起带对广东集群经济形成的挑战。还在2005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中就提出：集群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龙脉”，从环渤海、山东半岛、长三角、海峡西岸到珠三角，由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城镇集群、经济集群，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产生一个万里绵延的经济隆起带。从那以后，七年过去了，这个隆起带上的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度过的。不能不承认，长三角的江苏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浙江在产业集群（块状经济）提高、壮大方面，都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前面。最近，广东人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浙江的块状经济是一群狼，广东珠三角只发展了几只虎，几只虎是斗不过一群狼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反映了三地的差距。统计材料显示：浙江每一个县都有1~2个著名的块状经济集结，如：慈溪长毛绒集群、绍兴纺织集群、乐清电器集群、瑞安摩托汽配集群、永康五金集群、嵊州领带集群、奉化服饰集群、苍南标识工艺集群，等等。绍兴纺织集群同南海西樵纺织集群差不多同时起步，但现在不论规模和多样化，都远非西樵可比。由3000多家企业组成嵊州领带集群，还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列为可以和硅谷比美的产业集群之一。这一形势对珠三角产业集群来讲，都是严峻的挑战。

三　珠三角制造业“再工业化”的途径

应当承认，不论是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保罗·麦基里关于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的系列文章还是美国、西欧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的



“再工业化”，其根据和出发点都是从发达国家出发的。这些国家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现代化进程已经历了两三百年，早已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和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任务。从国际竞争力的硬、软件来看，它们积累了雄厚的知识存量，包括发明创造、知识产权、高素质的企业员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吸引了众多的知识精英、技术人才；有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政策措施、创新意识；等等。这些都是数百年积累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同中国现实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发展比较快的珠三角地区，也不过是进入工业化的后期，现在在转型升级中碰到的问题，仍然是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因此，现在讲按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和思路推进珠三角“再工业化”，必须从珠三角的实际出发，按照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思想、体制、机制，解决珠三角发展中最迫切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提出六点建议。

1. “再工业化”不是“工业化”，是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同高端生产服务业的融合

“再工业化”是美欧发达国家近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虚拟化，鼓励实体经济回归而提出的新概念，它不同于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工业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即在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占大头。2012 年，广东三次产业比重为 5.0∶48.8∶46.2，二产比重仍然大于三产，说明广东仍未进入三产主导的时期。按照西方媒体和智库的解释，美欧“再工业化”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通过政府帮助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实现新兴部门的增长。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更清楚，就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制高点，保持美国制造业的龙头和老大地位。我们当然没有条件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我们不过是借用“再工业化”这个词汇，就其实质来说，如同保罗·麦基里所说，是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高端生产服务的整合。在从工业经济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过渡中，推进新型工业化，占领产业链的高端。

2. 产业链创新转型—创新型产业集群壮大—创建创新型城市

创新是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没有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环境创新，等等），就不可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任务。创新是有层次的。基础是产业链创新和完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立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求，其内涵是新兴产业的建立；而建立创新城市则把产业和环境，发展和城市化直接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佛山市是思路明确、层次分明、步骤稳健的。佛山市制造业产值接近2万亿元，是仅次于深圳的广东第二制造业大市（见表3）；全市有37个专业镇，千亿以上产值的有5个，全市80%制造业产值都以专业镇为载体。但佛山市制造业的产业链并不完整，也不强健。2012年3月，佛山市提出产业链招商计划，提出了建链、强链、补链的具体措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作为产业链创新转型重点。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提出把创新同城市化结合起来，靠人才不靠汗水；家具、陶瓷集研发、创意、设计于一体留在佛山，生产环节迁出去；发展路径不靠政府规划，靠科技、人才、创新服务、环境；实行渐进式城市化，每年吸收10万农村人口进城。

表3　珠三角各市制造业产值100亿元以上专业镇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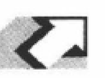
单位：个

市　别	100亿元以上规模专业镇数	200亿元以上规模专业镇数	300亿元以上规模专业镇数	500亿元以上规模专业镇数	800亿元以上规模专业镇数
佛山市	2	6	11	3	3
东莞市	7	1	4	3	
中山市	5	4	5		
江门市	4	2	2		
广州市	1				1
珠海市		2		1	
惠州市	3	1		1	

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广东科技》杂志社，《广东专业镇专刊（2012年）》。

3. 把制造业及其载体产业链的建设和高端服务业建设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东莞）一直把“三来一补”作为工业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产业链中，满足于低端的加工、装配，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外商是不会发善心，更不会转让核心技术的。2012年10月，新华社对中国最大家电器出口产品手机进行调查，预计2012年中国手机出口量



将达10亿部。但95%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赚去，约5%归富士康、诺基亚，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只能赚得1%。要改变这种可悲的状况，必须占据高端产业链，下大力气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并与高端生产服务业结合，掌握核心技术。对微笑曲线，不能只掌握加工、组装、制造一段，还要掌握上端的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下端的品牌创造、营销展览、售后服务、渠道管理、金融等。

从珠三角的实际出发，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也是关键环节和有效手段，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由大变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这方面，珠三角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深圳集中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业设计人员，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设计之都”，顺德北滘建立了广东工业设计院，东莞虎门镇也领先集聚了几千服装设计人员，他们在品牌创造、工艺创新等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4.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体制机制”。既要引导、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骨干企业集中，又要积极支持、扶植创新型、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对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创新最敏感，只有企业主导技术创新，才能取得成效。企业是不同的。实践证明，最没有创新积极性的是垄断性国有企业。深圳、顺德的经验说明，最有创新积极性的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和创新型、科技型的中小微企业，珠三角应当学习德国的做法，大力培育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使之成为创新主力。

以企业为主体，并不是说企业可以包打天下。一般来说，珠三角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都缺乏科技人才、创新力量，应当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逐步发展成区域创新体系。佛山提出的创建创新型城市战略，到2012年，全面构建一流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流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流的科技服务体系，一流的创新人才体系，一流的行政支撑体系。

5. 智力、技术、创新、人才决定未来的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发展思路，产业选择，运行体制机制对现行的生产方式是颠覆性的，它将颠覆大规模的流水作业方式，颠覆依靠资源、廉价劳动

力的生产方式。它依靠的是智力、技术、创新和高素质的人才，新的管理模式，加大创新和创意人才的培养和集聚。不仅要建立高层次人才团队、工程技术和设计团队，还要加大实践性人才的培养，建立多层次的创新激励机制。与此相适应，是对教育和培训的高度重视。

The Way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Lu Ping

Abstract: Industrial cluster (Industrial town) is the mai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Guangd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new situation, Industrial town (industrial cluster) is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ask. This paper is try to analysis the wa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PRD industrial clusters (industrial town).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dustrial cluster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industrialization

B.16

广西就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白玉华　陈 婷*

摘　要：

就业结构对衡量一国或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广西就业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演变分析，发现广西就业结构仍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水平；为剖析影响就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构建了VAR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因素对其影响最大。

关键词：

广西　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　影响因素

一　引言

就业结构已成为反映就业整体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它已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广西处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海陆接合部，是东北亚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等亚洲三大经济圈的交会区域，具有泛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接壤的沿边优势、陆地口岸和海洋通道优势，地缘战略意义重大。近十年来广西政府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借力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和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3%，尤其是广西工业增速明显，年平均增速达到16.5%。本文以就业结构的演进和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考察广西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

* 白玉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广西财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陈婷，广西财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二　广西就业结构现状

（一）就业的产业结构

就业的产业结构是指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情况。其基本数据是广西1990～2011年的三产产值和三产就业人数，这段时期广西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明显，且统计手段也日臻完善，数据质量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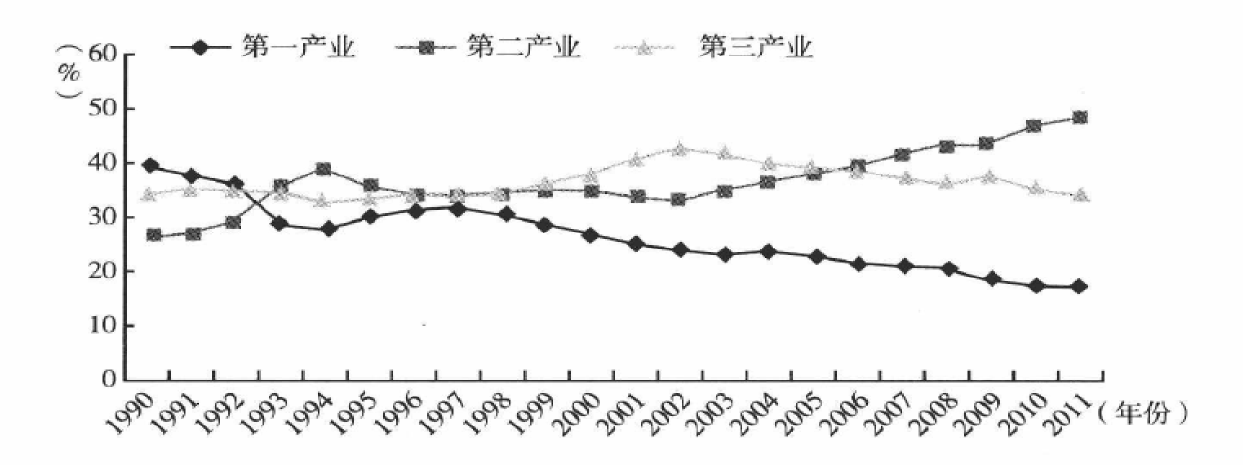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1年广西产业结构演进轨迹

资料来源：《2012年广西统计年鉴》。

图1折线显示：1990～2011年间广西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产业产值不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不断提升，尤其是2007年以来第二产业出现了比较强势的提升，这与广西的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广西确定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战略方针，2007年广西将承接东部地区的衰退产业作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建立产业园区、设置各级财政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产业转移项目。2010年1月19日，广西出台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我区工业的决定》，提出未来十年要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包括食品、汽车、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电子信息、医药制造、纺织服装与皮革、生物、修造船及海洋工程装备等）以推动北部湾经济



建设，这 14 个千亿元产业规划项目的实施对广西的产业结构影响很大。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也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产值比重小幅波动，基本上徘徊于 36% 的水平。总体上看，广西产业结构还处于比较低水平的“二三一”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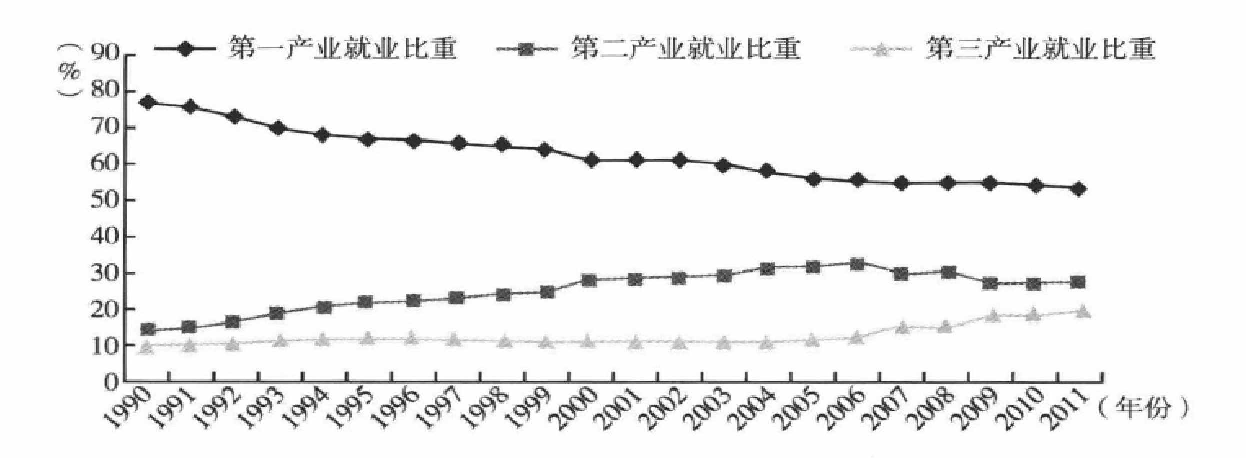


图 2　1990～2011 年广西就业结构演进轨迹

图 2 显示，1990～2011 年广西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比重超过 50% 仍处于高位水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平稳，长期维持在 10% 左右，这说明广西的第二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就业弹性）比较弱，只在 2005 年始出现较大的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直高于第二产业，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 2007 年始又出现下降的趋势。整体上看就业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变，仍旧是“一三二”型。而同期全国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为 34.8∶29.5∶35.7，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全部从业人员的 1/3 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最高，就业结构呈现“三一二”型，明显优于广西就业结构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广西的就业产业结构水平更低，差距明显。据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国别比较数据，2009 年，38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继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之后位居第五；同期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等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不足 5%。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就业的产业结构标准为 15.6∶36.8∶47.6，而 2011 年广西的就业结构依次为 53.3∶19.1∶27.6，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才能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正面推动作用，目前的研究一般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是否协调。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间的偏差，另外还可以用就业结构总偏离系数衡量整体经济与就业偏离程度。公式为：

$$\sigma_i = \frac{GDP_i/GDP}{LAB_i/LAB} - 1 \qquad \eta = \sum |\sigma_i|$$

σ_i 和 η 分别表示就业结构偏离度和总偏离系数。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由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在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各产业的生产率最终将趋于一致，从而使各产业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趋于一致。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两者发展的协同度越低；反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展的协同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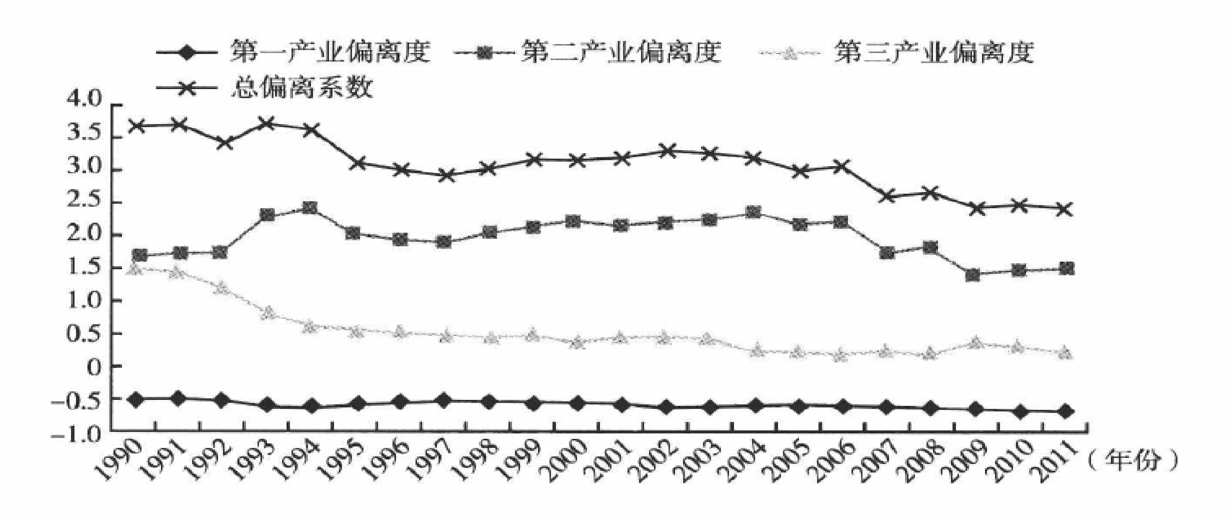


图 3　1990 ~ 2011 年广西就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

图 3 折线显示，1990 ~ 2011 年间广西第一产业偏离度一直小于 0，徘徊于 -0.57 左右，而近五年来有扩大趋势。这说明广西第一产业与其就业之间不仅存在着非协同因素，有隐性失业情况，且这种隐性失业程度在加大，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产业偏离度为正，在三大产业中的偏离度最大，说明存在较高的劳动力迁入压力，意味着第二产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未能充分吸收。但 2007 年以来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出现了逐年下降趋势，表明第二产业正逐步优化，劳动力迁入压力逐步减小。第三产业偏离度不断下降，正缓慢接近于 0，说明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协同度较高，而且还在逐年优化。图 3 还显示产业总偏离度呈现短暂性回升但总体向下



的运行趋势，表明在1990～2011年广西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程度在不断提高，近五年接近2.5，经济结构优化显著，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2008年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偏离度为0.28，2010年江苏省的产业总偏离系数为1。

（二）就业的城乡结构

就业的城乡结构是指劳动力在城市与乡村的分布构成情况，受数据局限，表1列出了近期若干年广西从业人员的城乡分布情况。从数据可以看出，广西的劳动力转移趋势明显，农村从业人员比重逐年降低，而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近四年来，广西就业的城乡结构趋于稳态。2011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比重为47%，农村从业人口比重为53%，对比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尚有很大差距。学术界普遍认为，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率应在60%以上，很显然，广西的城市化长期滞后，说明广西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初期，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比较弱。

表1　广西城乡就业人数

年份	从业人员（万人）	城镇人员		农村人员	
		人数（万人）	比重（%）	人数（万人）	比重（%）
1995	2370.00	405.00	17	1965.00	83
2000	2566.00	421.00	16	2145.00	84
2005	3060.00	785.00	26	2275.00	74
2006	3132.00	821.00	26	2311.00	74
2007	3175.00	889.00	28	2286.00	72
2008	3274.00	968.00	30	2306.00	70
2009	3367.00	1026.00	30	2341.00	70
2010	3390.00	1003.00	30	2387.00	70
2011	3442.00	1035.00	30	2407.00	70

资料来源：历年《广西统计年鉴》。

（三）就业的行业结构

受数据局限，表2只列出了2005～2011年广西分行业就业数据。表中包括

七大行业，其从业人员占全部当年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超过85%。农林牧渔业的就业比重最高，虽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占比仍然超过50%，这说明传统行业份额下降与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的总趋势是一致的，是就业结构改善和优化的反映。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阶段。2005年、2006年广西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不足1%，2011年末猛增至11.02%，说明这一时期广西的产业承接、千亿元产业项目等政策开始发挥明显的效应。建筑业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2009年出现了就业比重的小高峰，之后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而回落，但仍高于2005年之前的水平。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业就业占比稍重，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餐饮、金融等其他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一、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70%。表2中列举的七大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就业比重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15%左右。

表2　2005～2011年广西分行业就业结构

单位：%

年份	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馆业	金融业	合计比重
2005	56.19	0.75	5.87	4.88	4.04	9.76	4.85	86
2006	55.11	0.77	5.87	5.03	4.15	10.03	4.98	86
2007	54.93	1.20	7.69	5.73	3.84	9.21	5.32	88
2008	55.58	1.19	7.85	5.83	3.90	9.65	5.50	90
2009	54.80	1.18	10.33	6.05	2.83	7.81	3.11	86
2010	54.12	10.72	6.23	2.83	7.80	3.16	0.49	85
2011	53.31	11.02	6.31	2.87	7.86	3.24	0.50	85

资料来源：历年《广西统计年鉴》。

（四）就业的教育结构

2010年广西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81.3%，高于全国76.1%的平均水平；高中学历广西比重为11.4%，低于全国13.9%的平均水平；大专学历广西的比重为4.7%，低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本科以上学历广西的比重为2.68%，低于全国4.09%的平均水平。广西低学历的从业人员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学历的从业人员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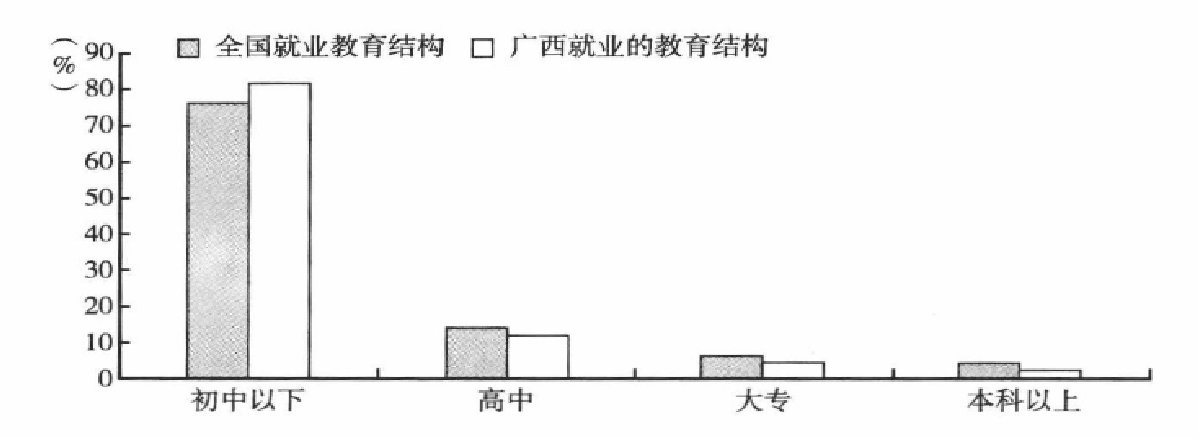


图 4　广西就业的教育结构

资料来源：《201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三　广西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

国内学术界对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产业结构、工资等因素对就业结构影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最根本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都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而间接改变了对劳动的需求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就业结构水平，考察自 1990 年以来广西的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及其原因。选取以下指标为解释变量，并进行建模实证分析。

1. 固定资产投资

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反映产业转移与承接效应的指标。广西将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因此伴随东部地区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广西的产业规模尤其是制造业规模呈现扩张之势，直接表现为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由此拉动了区域就业规模，改变了就业结构。

2.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

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这一指标来测量对外开放度对广西就业结

构的影响。广西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又是泛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成员，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迅速，外资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广西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贸易往来，东盟与广西双边贸易年均增长达41.8%，“十一五”时期引进合同外资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85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量比“十五”时期翻一番。

3. 出口占GDP比重

对外贸易中，出口产业部门获得更有利的成长机遇，导致该产业部门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需求量增加，间接影响了就业结构，因此选取出口占GDP比重作为就业结构变动的测度指标是符合广西的经济发展特点的。

4.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是为第一、二产业和为居民消费服务的产业部门集合，它的长期发展态势可以反映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所以采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来代表产业结构异动。

（二）模型说明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和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VAR模型是一种经典的非结构化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而建立的模型。该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进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并用于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VAR模型公式为：

$$y_t = A_t y_{t-1} + A_2 y_{t-2} + \cdots A_p y_{1-p}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y_t = LAB23_t$，$LGDZC_t$，$WSTZ_t$，CK_t，SC_t，εt为随机扰动项，Ap为参数矩阵。$p = 1, 2, 3\cdots$，$t = 1, 2, 3\cdots$，LAB23指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LGDZC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WSTZ为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CK为当年出口额占GDP比重，SC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了使数据更为平滑，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和消除数据序列的异方差的影响，对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取自然对数。



在进行 VAR 模型分析前，需要先对变量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如果序列不平稳需要进行差分，当进行到第 i 次差分时序列平稳，则说明原变量序列服从 i 阶单整。当所有检验序列均服从同阶单整，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然后构造 VAR 模型；在建立 VAR 模型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1. ADF 检验

我们首先使用 EVIEWS 软件对 LAB23、LGDZC、WSTZ、CK、SC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临界值	P 值	结论	D. W. 值
原始变量	LAB23	-1.61874	-3.261452	0.7503	不平稳	1.61
	LGDZC	-0.75851	-3.261452	0.9539	不平稳	1.159855
	WSTZ	-1.05202	-3.297799	0.9077	不平稳	2.42998
	CK	-3.06209	-3.286909	0.144	不平稳	2.07964
	SC	-0.47171	-3.261452	0.9765	不平稳	1.350524
一阶差分变量	D(LAB23)	-3.82328	-3.658446	0.0368	平稳	1.833086
	D(LGDZC)	-2.7665	-3.658446	0.2238	不平稳	1.819454
	D(WSTZ)	-4.27082	-3.673616	0.0165	平稳	1.442962
	D(CK)	-1.55493	-3.286909	0.7701	不平稳	1.578339
	D(SC)	-3.04923	-3.268973	0.1443	不平稳	1.958419
二阶差分变量	D(LGDZC,2)	-5.02483	-4.532598	0.0039	平稳	2.122556
	D(CK,2)	-7.71326	-4.571559	0	平稳	1.724674
	D(SC,2)	-2.47067	-3.324976	0.3349	不平稳	1.948797
三阶差分变量	D(SC,3)	-5.1671	-4.667883	0.0043	平稳	1.745346

检验结果显示，这五个变量的原始序列是非平稳的，LAB23、LGDZC、WSTZ 的一阶差分变量通过了单位根检验，LGDZC、CK 的二阶差分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SC 的三阶差分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

2. 建立 VAR 模型，对 VAR 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为确定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采用四项评价指标——FPE 准则、AIC 准则、SC 准则、似然比检验法，结果均显示应选择滞后期为 2，所以建立 VAR（2）模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第三产业对就业结

构的 VAR 方程表达式如下：

$$
\begin{aligned}
DLAB23 = {} & 0.181673251872 * DLAB23(-1) + 0.0766621819859 * DLAB23(-2) + \\
& 0.0447609688481 * DLGDZC2(-1) + 0.0265411883271 * DLGDZC2(-2) - \\
& 0.934872075942 * DWSTZ(-1) + 0.466985636393 * DWSTZ(-2) - \\
& 0.196427040784 * DCK2(-1) - 0.270609641091 * DCK2(-2) - \\
& 0.00102184166233 * DSC3(-1) - 0.00265953545934 * DSC3(-2) + \\
& 0.00426280126184 \qquad (2)
\end{aligne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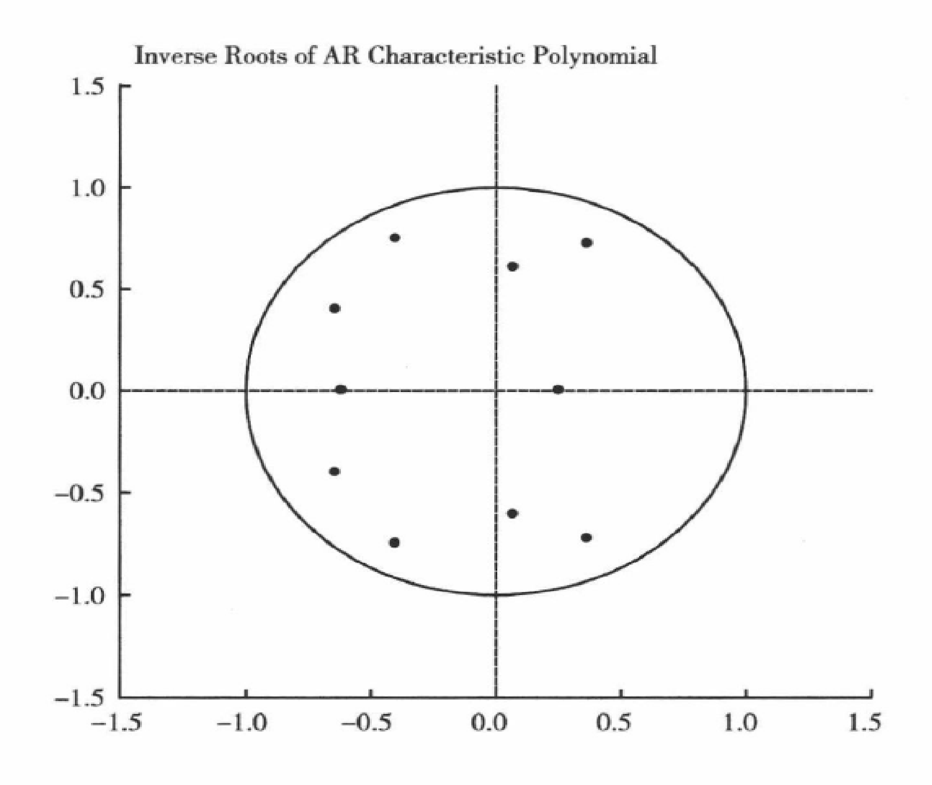


图 5　VAR（2）的 AR 特征根多项式逆根

通过计算模型的 AR 特征根多项式，借助单位圆图示，我们可以发现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这表明所建立的 VAR（2）模型是稳定的。这意味着当模型中某个变量发生变化时会对其他变量造成冲击，但这种冲击（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消失。就研究对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影响就业结构的因素很多，整体来看由就业结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产业结构这五个变量所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3. 格兰杰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在 VAR 模型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VAR 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DLAB23			
解释变量	卡方统计量	解释变量个数	P 值
DLGDZC2	6.501929	2	0.0387
DWSTZ	6.854871	2	0.0325
DCK2	10.54269	2	0.0051
DSC3	6.439978	2	0.04
所有解释变量	25.00135	8	0.0016

表 4 数据显示，所有检验结果的 P 值均小于 0.05，很显然，固定资产投资的二阶差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差分变量、出口额占 GDP 比重的一阶差分变量、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三阶差分变量这四个解释变量及其整体联合构成被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产业结构是就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4. 脉冲响应

以上通过 VAR（2）模型分析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产业结构波动对广西就业结构的影响。为了确定就业结构与其四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

图 6 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月），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A 图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正负兼有：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到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时，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先增加，增加期内依次经历递增、递减再递增然后递减的态势，第四期之后开始出现就业比重的下降，第五期后又迅速回升，之后再递减、递增交替而行。对此的解释是当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时，短期内带来就业的增加，但投资完成后，投资期间的劳动用工会减少。但由于劳动力需求是引致需求，随着时间推移，新工厂、机器设备依次投入使用，用工需求也会出现增加的趋势。先进机器设备的投入还会挤压用工需求，就业需求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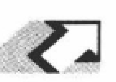
A: Response of DLAB23 to DLGDZC2

B: Response of DLAB23 to DWSTZ

C: Response of DLAB23 to DCK2

D: Response of DLAB23 to DSC3

图 6　解释变量对就业结构的脉冲响应图组



而又出现下跌情况。图 B、C、D 的脉冲响应图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正影响、负影响。与 A 图不同的是，是随滞后期数值先减少再增加。此图很难反映四个解释变量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大小，需要进一步进行方差分解分析（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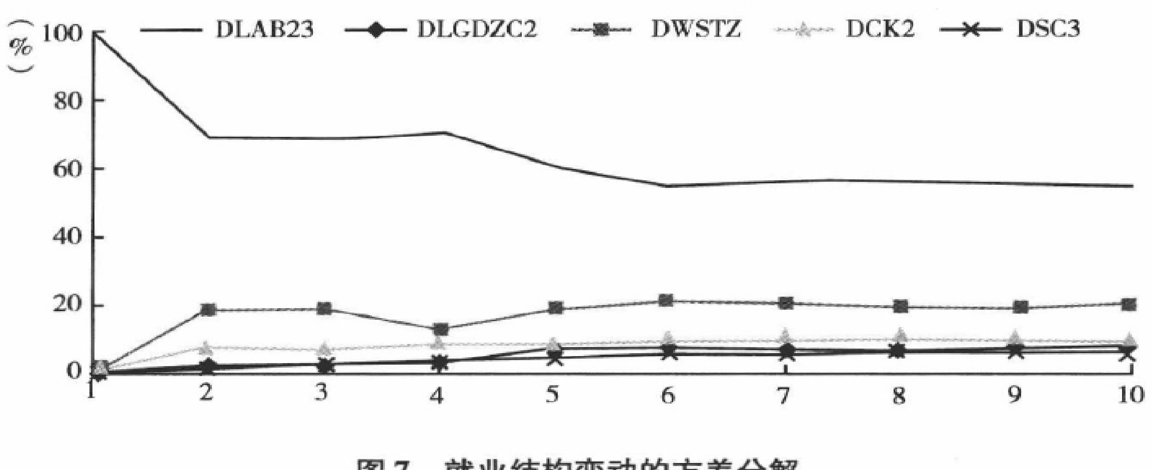


图 7　就业结构变动的方差分解

图 7 折线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贡献率最大（约为 20%），其他依次为出口、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我们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前文已经述及广西近年来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成绩显著，通过对外开放度影响就业结构是目前广西就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点。

四　结论

宏观上看，广西的就业结构演变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广西的就业结构都是趋于优化的，但这种优化只是相对数据，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是低水平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由于发展比较滞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第三产业不发达，就业人员多从事传统服务行业，就业层次不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接近饱和，这说明广西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其中广西就业的教育结构不合理，这种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滞后会严重制约广西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广西就业结构的变动受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影响比较显著，这反映了广西在对外开放力度方面成效显著，但就业结构的优化主要还是依赖于

内源式的产业结构升级，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会增加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出口为例，《广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广西出口商品结构还存在较明显的低级化问题，高科技出口产品比例小，出口市场非常集中。这种出口结构反映出目前广西主要是依靠本地的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种单纯依靠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来确定贸易结构的战略可能使自身落入比较利益陷阱，阻滞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广西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历年。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陈万明、石丽：《江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分析》，《商业研究》2012 年第 5 期。

夏海清：《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在中国的实证检验》，《经济问题》2012 年第 1 期。

袁霓：《论当前中国的就业结构及其调整》，《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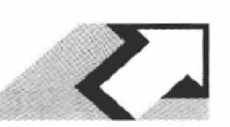
Analysis of Guangxi Employment Structure Chang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i Yuhua　Chen Ting

Abstract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a country or region. In this paper, with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Guangxi employment,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structure, we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Guangxi is still in a low lev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VAR model to dissect the factors who affect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orts and other factor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Key Words: Guangxi; Employ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luence factor

中西部区域



The Mid-western Region

B.17 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肖春梅*

摘　要：

2012年，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需持续萎缩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在此大环境中，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逆势上扬，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添加了新的动力。本文简要分析了2012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评析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和空间结构变化的新格局，并对未来中西部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产业转移　增长极　中西部地区

* 肖春梅，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规划。

一　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一）总体看，中西部地区呈现逆势上行发展趋势[①]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呈现先逐季回落后略有回升的态势。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快，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呈现“西快东慢”、中西部地区逆势上扬的局面。第一至三季度，中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均在10%以上，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添加了新的动力。

1. 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普遍较快，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表现略有差异

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中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506亿元，占全国的25.6%，比2011年提升0.41个百分点。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256亿元，占全国的12.67%。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整体增长较快，增速均在10%以上，其中陕西增速最高为12.7%，内蒙古增长11.6%，山西和河南增长10%。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250亿元，占全国的12.92%。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整体也增长较快，增速均在10.6%及以上，其中安徽最高达12%，湖北、湖南均增长11.2%，江西增长10.6%。

2. 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快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西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7219亿元，占全国的14.15%，比2011年上升0.08个百分点。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总体上增速快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091亿元，占全国的11.15%。其中

---

① 全国各地区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2011年数据来自《2012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原因，第一至三季度31个省市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合计数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数不相等；截稿时部分省市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未公布，故本文用第一至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分析。



贵州和重庆增速达 13.8%，位居全国第二，仅比排在全国第一位的天津低 0.1 个百分点。云南和四川增速均在 12% 以上，分别达到 12.6% 和 12.8%，广西在大西南经济区最低为 11.2%。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2012 年第一至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128 亿元，占全国的 3%。其中甘肃和青海增长最快，增速均为 12.3%。

（二）中西部地区三大需求增长较快，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①

1. 中部地区三大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出口增长较快

2012 年前 11 个月，中部地区三大需求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716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060.3 亿元，同比增长 15.54%。出口 11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2%。虽然出口比 2011 年 44.75% 的增幅有明显回落，但与全国出口 7.4% 的增幅相比，仍显强劲。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117 亿元，同比增长 23.95%；其中陕西增速最高达 2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271.2 亿元，同比增长 15.52%。其中河南省增长较快，达 16.1%。出口 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其中河南出口增势最为强劲，在 2011 年增长 82.7% 的基础上同比增长 58.3%。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9044 亿元，同比增长 26.5%；其中江西投资增速最高达 3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789.1 亿元，同比增长 15.55%。出口 7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2%；其中安徽出口增长最快，达 62.3%。

2. 西部地区出口增势强劲，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出口增长快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2012 年 1~11 月，西部地区三大需求在 2011 年高速增长基础上依然呈现

①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为 1~10 月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局网站；出口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

快速增长态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6015 亿元，同比增长 25.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844.1 亿元，同比增长 15.57%。出口 12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5%。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1980 亿元，同比增长 23.3%；其中贵州增速最高达 3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461.8 亿元，同比增长 15.56%。出口 9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5%；其中重庆市出口总值达 357.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 倍，增幅位列全国第二。贵州和四川出口增势也较好，分别同比增长 57.3% 和 34.8%，而云南仅增长 2.3%。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034 亿元，同比增长 30.7%。其中新疆、西藏增幅较高，均在 31%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82.3 亿元，同比增长 15.38%[①]。出口 25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其中西藏增幅为 2.1 倍，位列全国第一；甘肃出口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72.9%。

（三）中西部地区工业成为拉动我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2 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缓中企稳。进入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积极变化进一步增多，工业增速逐月回升，企稳态势日益明显。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 11.6%，第二季度增长 9.5%，第三季度增长 9.1%，第四季度增速接近 10%[②]。

1～11 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中，除天津、河北、江苏、福建、山东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11% 以上外，大部分省市均低于 10%，其中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长 6.8%，上海增长 2.7%，浙江增长 6.8%，广东增长 8.1%，海南增长 8.3%。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大多数在 14% 以上，其中陕西工业增长 16.6%，列全国首位。安徽、重庆、四川、贵州增速均在 16% 以上；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省区均在 14% 以上[③]。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成为带动我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

① 由于缺西藏数据，故该指标不含西藏。

② 《2012 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报告：总体企稳回升》，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 年 12 月 29 日。

③ 工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特征

（一）产业转移指导性文件出台

继 2010 年 8 月国家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之后，2012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目录》在产业种类上，涉及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能源、交通、化工、建材、钢铁、生产性服务业共 15 个传统行业。《目录》明确提出，中部地区将着力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加快承接国际和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西部地区则着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重点承接东中部转出的相关产业，建设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和产业集聚区。

（二）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势头强劲

安徽皖江城市带是中国首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立近 3 年来，皖江城市带发展十分迅猛。示范区从 2010 年成立之初至 2011 年底，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83.3 亿美元、省外境内资金 7776.8 亿元，年利用境内外资金规模是示范区 2009 年的 1.5 倍左右，超过中部其他省份同期全省规模；沪苏浙向示范区转移产业 5000 亿元以上，区域分工与协作进一步加强[①]。2012 年 1 ~ 10 月，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51.3 亿美元，增长 23.4%；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3068 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2962.2 亿元，增长 17%，占全省的 66.3%，其中新建亿元以上项目 1222 个[②]。平板显示、LED 光电照明、动漫创意、生物医药、新型高端装备制造、三网融合等一大批新兴产业“落地生根”。[③]

---

① 《皖江建设：三年巨变超越梦想——专访安徽省皖江办专职副主任华克思》，人民网 - 安徽频道，2012 年 11 月 12 日。

② 《1 ~ 10 月份皖江示范区经济运行情况》，皖江战略网，2012 年 12 月 4 日。

③ 何聪、钱伟：《协力共舞长江龙》，2012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桂东四市（贵港、玉林、梧州、贺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毗邻珠三角的区位优势，在承接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方面势头尤为强劲，一大批东部沿海企业和项目到桂东四市投资落户，承接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2010～2012 年上半年，四市共引进外来项目 4000 多个，投资额达 3500 多亿元，其中 2012 年 1～6 月，桂东四市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合同总额达 1417.66 亿元①。

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于 2011 年 2 月获批。示范区包括涪陵、巴南、九龙坡、璧山、永川、双桥、荣昌 7 个区县，计划高起点、有选择地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近年来重庆市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与承接产业转移规模逐年扩大密切相关。2012 年 1～10 月重庆市出口额同比成倍增长，主要与近年来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大力发展 IT 产业，提高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能力有很大关系。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于 2011 年 10 月获批。示范区包括衡阳、郴州、永州三市。从 2009 年至 2012 年 8 月，湘南 3 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3350 多个，占全省总量的 1/3 以上。2012 年上半年，湘南 3 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579 个，占全省的 38.1%，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特别是 3 市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 6.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5.9%，呈现成倍增长的态势②。

2012 年 3 月初，荆州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成为继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湘南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荆州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建成后，将重点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湖北将在产业发展、财政金融、土地政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规划 6 个方面给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可以说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

① 《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两年半引资 3500 亿》，2012 年 8 月 17 日《广西日报》。

② 朱章安、邓明、张新国、白培生、唐善理：《湘南承接产业示范区以开放促承接、以承接促发展纪实》，2012 年 10 月 31 日《湖南日报》。



的缩影，不仅是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而且成为中西部省区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极，也将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力量。

河南省作为中原经济大省，近年来着力打造内陆开放经济体系，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富士康、日产汽车、伟世通、格力电器、海马汽车等一大批名企纷纷落户。2011 年全省实际利用内外资分别达 4016 亿元和 101 亿美元，居中部地区前列。2012 年第一至三季度，河南省合同利用省外资金 11374. 4 亿元，同比增长 46%；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3826. 5 亿元，增长 27%[①]。2012 年预计将分别达 5000 亿元和 120 亿美元[②]。

甘肃省利用资源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取得重大进展。截至 2012 年 8 月底，全省续建、新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773 项，项目总投资 3362. 58 亿元；1 ~ 8 月引进资金到位额 931. 65 亿元。其中：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及电力项目 34 项、冶金有色 10 项、煤炭 8 项、装备制造 6 项、煤化工 5 项、现代物流 4 项、建材 3 项、轻工 3 项、石油天然气开采 1 项、信息软件 1 项。其中，总投资 50 亿元以上项目 9 项。[③]

新疆在全国援疆背景下，依托 19 省市对口支援的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平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利用差别性产业政策，加快推进承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突破。2012 年新疆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是非石油工业首次超过石油工业，改变了以往工业主要依赖石油产业的局面（石油工业增加值占新疆工业的 60% ~70%）。2012 年 1 ~ 11 月，非石油工业完成增加值 1251. 8 亿元，增长 21. 4%，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51. 8%，工业结构调整实现突破。装备制造业规模突破 300 亿元，大众汽车、三一重工等先进装备制造企业落户新疆，新能源装备、输变电装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起步，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 195 万千瓦、20 万千瓦。[④]

---

① 《河南省直管试点县（市）利用省外资金快速增长》，商务部网站，2012 年 10 月 17 日。

② 《河南省“重拳”强化招商引资工作》，重庆市发改委网站，2012 年 6 月 17 日。

③ 《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 年 10 月 25 日。

④ 《新疆确定：2013 年全区工业增速目标为 15%》，天山网，2012 年 12 月 29 日。

（三）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资源型产业转移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的资源能源战略基地。因此，东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所占的比重较大，将强化中西部地区对资源能源产业的依赖。二是承接产业转移与出口联动发展。向西开放促进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随着中西部地区沿边、沿江开放的扩大，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除了为寻求丰富廉价的资源外，更与开拓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市场密切相关。三是劳动力优势在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从承接的产业来看，西部地区承接的主要以资源型、重化工产业为主，如煤电煤化工、电解铝、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这些产业都是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而且有些地区劳动力成本并不具有优势，中部和东部地区企业看重的主要是丰富而价廉的自然资源而非劳动力。以新疆为例，通过调研了解到，新疆的劳动力工资比中部和东部地区都要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大约比中部和东部地区高30%～40%）。

当前我国产业转移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跨省产业转移受现行体制制约还存在一些障碍；东部地区“腾笼换鸟”的意愿减弱，产业转出动力不足；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出现无序竞争，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东部部分低端生产能力转移到西部发展①。

三　中西部地区“多极”支撑的空间格局浮出水面

2008年以来，在我国批复的21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区规划、12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4个新区中，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占一半。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庆两江新区、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国家级经济区之后，2012年中西部地区新增了黔中经济区、兰州新区、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中原经济区等

① 乔盛、段树军：《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2012年8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



3 个国家级经济区和 1 个国家级新区，并且出台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上国家级经济区的建设将逐渐改变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中西部地区“多极”支撑的空间格局浮出水面。

表 1　2008 年以来批复的区域规划、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新区

区域	区域规划	个数
东部	《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海浦东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	区域规划 11 个，综改区 6 个，新区 4 个
东北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区域规划 2 个，综改区 1 个
中部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原经济区规划》；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区域规划 5 个，综改区 3 个
西部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6～2010）》《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规划》；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	区域规划 5 个，综改区 2 个，新区 2 个

注：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一）黔中经济区：贵州新的增长极

2012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黔中经济区位于西南地区腹心地带，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重点经济区。经济区范围包括贵州省贵阳市及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遵义县、绥阳县、仁怀市，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县等在内共计 33 个县（市、区）。区域国土面积 53802 平方公里，占贵州省的 31%；2011 年常住人口 1571 万，占贵州省的 45%。按照规划，黔中经济区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深加工、特色轻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装



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家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全国山地新型城镇化试验区；东西互动合作示范区；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①]

（二）兰州新区：西部区域复兴的重要增长极

2012年8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兰州新区建设指导意见》。兰州新区位于兰州市北部，处于兰州市和白银市接合部的秦王川盆地，涉及永登县中川、秦川、上川、树屏和皋兰县西岔、水阜6个乡镇，距兰州市主城区38.5公里，距白银市区79公里，行政区划面积806平方公里。建设兰州新区，对进一步完善兰州城市功能和规划布局，探索西北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和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新模式，增强兰州作为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扩大向西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兰州新区确定了四大战略定位：一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二是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三是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四是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②]

（三）天山北坡经济带：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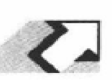
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规划》。此规划的获批，将从多方面推动北疆地区的快速发展。[③] 天山北坡经济带东起哈密，西至伊宁，该区域东西相距一千多公里，分布着新疆的三个大型煤田和两个大型油气田，聚集了新疆60%左右的经济总量，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国家对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功能定位是——我国面向中亚、西亚地区对外开放的陆路交通枢纽和重要门户，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我国进口资源的国际大通道，西北地区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物流中心和对外合作加工基地，石油天然气化工、煤电、煤化工、机电工业及纺织工业基地。作为新疆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域，天山北坡经济区将成为

---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复》（发改西部〔2012〕2446号），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年8月12日。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兰州新区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西部〔2012〕2786号），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年8月31日。

③ 《国务院正式批复天山北坡经济发展规划》，新疆发改委网站，2012年11月20日。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与此同时，2012 年国务院批准新疆新设立了 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至此，新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 19 家。①

（四）中原经济区：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

2012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43 号），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 ~ 2020）》。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全国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将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规划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 28.9 万平方公里，包括 5 省 30 个省辖市和 3 个县（区），2011 年末总人口 1.79 亿，地区生产总值 4.2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3%、13.3% 和 9%。中原经济区确定了五大战略定位：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形成“一核四轴两带”放射状网格化空间格局。②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城市群之间的区域合作也日益紧密。如 2012 年 3 月中部地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政府已共同签署《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组合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若干城市③，由此湘鄂赣三省携手，共筑“中三角”，打造我国未来“第四经济增长极”。

---

① 《国务院批准新疆新设立 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发改委网站，2012 年 10 月 23 日。

② 《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 ~ 2020）》，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 年 12 月 3 日。

③ 如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逐步成为我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湘鄂赣三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引擎。其中，2012 年武汉城市圈以湖北 52.4% 的人口，贡献了全省 62% 的 GDP，成为湖北经济实力最强的核心区；长株潭城市群三个主导城市堪称湖南“金三角”，占全省经济比重提高到目前的 4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江西 30%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省近 50% 的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省 60% 以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涵盖了长江中游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精华地带。《加快发展长江中游城市集群》，2012 年 3 月 6 日《经济日报》。



四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较强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数据可以看出，2012 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拉动，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强。2012 年国家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 22 项，投资总规模为 5778 亿元。2000～2012 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 187 项，投资总规模 3.68 万亿元。[①] 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当经济增速下行时，很容易出现产能的大幅过剩，投资效率和项目赢利能力下降。而且由于投资多由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将明显加大。2012 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由于基数较小增长也较快，但是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平缓。中西部地区未来发展要将扩大内需和扩大外需相结合，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减少对资源开发的过度依赖，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加之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资源可持续问题更加凸显，与资源开发相伴随的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仍比较严峻，西部地区节能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各地区 2012 年 1～10 月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对照各地“十二五”年均节能目标，1～10 月，海南、云南、青海、新疆等 4 个地区预警等级为一级，节能形势十分严峻；广西、贵州、甘肃等 3 个地区预警等级为二级，节能形势比较严峻。[②] 中西部地区尤其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必须提高环保门槛，注重引进先进的设备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注重环境保护，避免东部地区的高消耗和高污染项目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

① 《2012 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 22 项重点工程》，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 年 12 月 20 日。

② 《各地区 2012 年 1～10 月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国家发改委网站，2012 年 12 月 14 日。



（三）地区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侯云春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同构化、趋同化。不仅表现在省与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的现象非常严重。[①] 中西部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资源和市场有一定的相似性，加之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受目前财税体制影响，各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难免形成无序竞争，很可能造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产业同构与趋同的结果。

Analysis on Midwes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Xiao Chunmei

Abstract: In 2012, the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was lack of power, overseas market demand continuous atrophy,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e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Midwest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ontrarian up which added a new power for china's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Midwest regional economic operation, comments the new trend of the Midwest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new pattern of spatial structure change of Midwest region. The main problems facing in the Midwest are analyzed.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Growth pole; Midwest region

① 《国务院智囊建议严禁各地零地价拉项目》，2012 年 11 月 18 日《新京报》。

B.18

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SWOT分析*

张国芝 孙久文**

摘 要：

本文利用SWOT方法，分析了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劣势、挑战与面临的压力。通过分析，得出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SO战略。内蒙古应充分发挥在中蒙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优势力量，快速形成内蒙古与蒙古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框架，提升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在CAREC（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

中亚 中蒙 区域经济合作

中蒙两国之间具有4676.9公里的共同边界。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内蒙古对蒙古国拥有11个口岸对接。内蒙古在中蒙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尤其是中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增进，以及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对蒙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中亚

* 本文得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中蒙区域经济合作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NJZZ11012）与内蒙古大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1106－14）联合资助。

** 张国芝，经济学博士，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区域产业发展；孙久文，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规划。



区域经济合作（CAREC）中，内蒙古对蒙古国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其他区域难以复制的“叠加优势”。只有深入分析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才能够不断提高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　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

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存在地缘区位、人文历史、资源禀赋物质基础、CAREC 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国与中亚长期友好、中蒙贸易快速增长及其互补性、中国向北开放政策和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等合作基础优势。

（一）地缘区位优势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地域辽阔，横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拥有长达 4261 公里的边境线，约占中国陆地边境线的 1/5。蒙古国与内蒙古接壤的有 6 个省份，包括东方省、科布多省、戈壁阿尔泰省、东戈壁省、苏赫巴托省与南戈壁省。

内蒙古是中国多口岸省区之一，口岸基础设施完善，形成了公路口岸（14 个）、铁路口岸（2 个）、航空口岸（3 个）等多种运输方式的全方位口岸开放格局。其中，对蒙古国开放口岸 11 个。其地缘区位优势为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其他国家和区域难以复制的独特基础。

（二）人文历史优势

内蒙古与蒙古国同属蒙古民族繁衍生息，发展经济、文化的地域。内蒙古是中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行政区域，蒙古族人口 2010 年为 422.61 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 17.11%。而蒙古国主体民族亦为蒙古族，与内蒙古在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等方面相似。蒙古族人同根同源，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传统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婚礼与饮

食文化体现蒙古游牧民族的独特魅力。蒙古族人同根同源、息息相通的关系不仅是维系中蒙两国边境地区居民与相邻国家居民友好往来的动力，而且同宗同族的深厚友谊亦利于内蒙古对蒙古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沟通与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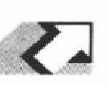
（三）相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优势

内蒙古与蒙古国及中亚都是自然资源富集区，尤其是地质资源分布属于同一个矿产带。双方都具有丰富的土地、森林、草原、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等。相同的自然资源类型与品种有利于内蒙古参与 CAREC 框架下中蒙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形成。

（四）CAREC 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优势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的使命在于通过促进在交通、能源、贸易和其他共同关心的关键领域的区域合作，促进中亚发展，加速区域经济合作和减少贫困。以此，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确立了知识/能力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网络；贸易、投资和商业发展；区域公共产品等四个行动支柱，并将“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作为 CAREC 计划的长期愿景。CAREC 采取“两个结构层次”的活动来扩大和深化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第一个层次的活动包括与运输、贸易和能源等核心领域相关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活动是新领域，如人力发展、农业、环境和旅游。CAREC 战略框架的一个特点是大力增加对区域合作的财力支持。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新型的不断发展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基本宗旨和任务就是发展多领域合作，鼓励开展政治、经贸、国防、执法、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信贷及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的有效区域合作，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安全与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两个重点合作领域。其中，经济合作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有效使用交通运输领域内的现有基础设施，



挖掘成员国的过境潜力，发展能源体系。上海合作组织的突出特点是它具有自己的灵魂——“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为内蒙古对蒙古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提供良好的区域合作国际组织背景条件，有力地保障了内蒙古对蒙古国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顺利开展与深化，成为内蒙古对蒙古国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势之一。

（五）中蒙贸易快速发展且互补性较强优势

2004～2008年间中蒙贸易增长率均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负增长，2008～2009年中蒙贸易增长率亦出现了下降趋势。2010年中蒙两国均逐步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蒙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增长率达到了63.6%，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如图1所示）。中蒙贸易的快速增长为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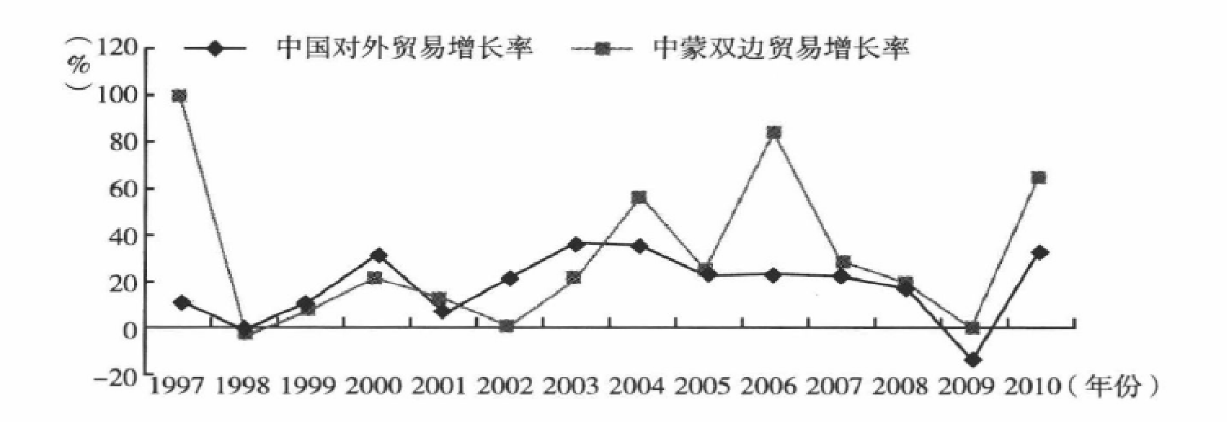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与中蒙双边贸易增长率

中蒙贸易快速发展不仅对我国拓展国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为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潜力。尤为重要的是，中蒙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为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是衡量中蒙贸易互补性的

重要指标[①]。表1表明中蒙与蒙中TCI指数均大于1，这说明中蒙之间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尤其是以中国作为出口国、蒙古国作为进口国所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更大。这说明中国对蒙古国的市场依赖性强于蒙古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表1 中蒙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

	中蒙 TCI 指数								
以中国为出口国（蒙古国为进口国）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数值	2.22	2.28	1.86	3.22	3.42	3.00	3.19	3.54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值	3.68	3.86	3.92	3.9	—	—	—	
	蒙中 TCI 指数								
以蒙古国为出口国（中国为进口国）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数值	1.89	2.03	1.90	1.97	2.14	2.09	1.51	1.45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值	1.68	1.79	2.16	2.59	—	—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http：//comtrade.un.org/db。

中蒙之间不仅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而且中蒙双方产业内贸易水平亦较高。如表2所示，中蒙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②]表明，中蒙两国在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SITC2）、动物油脂（SITC4）类产品以及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的G－L指数均小于0.5，且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这

① TCI指数根据公式 $TCI_{ij}=\sum_k\left[(RCA_{xi}^k\times RCA_{mj}^k)\times\frac{W_k}{W}\right]$ 计算得到。其中：$RCA_{xi}^k=\frac{(X_i^k/X_i)}{(W^k/W)}$，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k$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_{mj}^k=\frac{(M_j^k/M_j)}{(W^k/W)}$，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k$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M_j^k$表示$j$国$k$类商品的进口总额；$W^k$表示$k$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表示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

G－L指数是根据 $B_i=1-\frac{|X_i-M_i|}{(X_i+M_i)}$ 公式计算得到。其中B_i表示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L指数；X_i和M_i分别表示i类产品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② G－L指数是根据 $B_i=1-\frac{|X_i-M_i|}{(X_i+M_i)}$ 公式计算得到。其中B_i表示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L指数；X_i和M_i分别表示i类产品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些类别的产品在中蒙贸易中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反映了中蒙在此类产品贸易上一方以出口为主，而另一方则以进口为主。与此对比，轻纺、橡胶及制品（SITC6）、杂项制品（SITC8）类产品的 G－L 指数一度超过 0.5 的界限，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近年来其 G－L 指数有所回落，在 2007 年分别达到 0.26、0.03。这说明中蒙在此类产品上已从产业内贸易过渡到产业间贸易。这为内蒙古对蒙古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产业合作空间。

表 2　中蒙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年份	中蒙 G－L 指数												
	初级产品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0	1	2	3	4	综合	6	8	综合	5	7	9	综合
1996	0.09	0.071	0.006	0.00	0.47	0.13	0.34	0.10	0.22	0.33	0.015	—	—
1997	0.06	0.050	0.004	0.00	0.00	0.02	0.45	0.11	0.28	0.00	0.026	—	—
1998	0.29	0.529	0.011	0.43	0.00	0.25	0.24	0.70	0.47	0.31	0.006	0.000	0.10
1999	0.44	0.698	0.005	0.57	0.00	0.34	0.30	0.35	0.32	0.01	0.001	—	—
2000	0.05	0.084	0.007	0.41	0.06	0.12	0.36	0.62	0.49	0.02	0.000	—	—
2001	0.20	0.100	0.014	0.34	0.25	0.18	0.66	0.57	0.61	0.00	0.001	0.000	0.00
2002	0.49	0.142	0.009	0.52	0.00	0.23	0.40	0.38	0.39	0.06	0.029	0.000	0.03
2003	0.24	0.072	0.013	0.98	0.00	0.26	0.49	0.42	0.45	0.06	0.006	0.000	0.02
2004	0.51	0.012	0.004	0.80	0.00	0.26	0.36	0.65	0.51	0.06	0.007	0.000	0.02
2005	0.08	0.003	0.008	0.67	0.10	0.17	0.26	0.12	0.19	0.05	0.000	0.188	0.08
2006	0.59	0.009	0.003	0.35	0.00	0.19	0.16	0.06	0.11	0.03	0.000	0.001	0.01
2007	0.20	0.017	0.003	0.31	0.00	0.11	0.26	0.03	0.15	0.03	0.001	0.000	0.01

注：表中的“综合”指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http：//comtrade. un. org/db。

（六）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周边带动优势

伴随内蒙古自治区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内蒙古的经济实力大幅提高，经济自主发展机制逐步趋向成熟，社会建设全面进步。从而，为内蒙古自治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对实现内蒙古对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战略追求——“实现经济、产业和技术的一体化”形成了另一优势。

1. 内蒙古经济总体实力大幅提升

2000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2～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长增速连续8年位居中国之首。内蒙古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857.0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72.00亿元，是1995年的13.62倍；财政总收入由2005年的43.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738.14亿元，是1995年的39.77倍，经济总量和财政实力由中国后列迈进中列。尤其是2000年以来，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年均环比增长速度达到了21.66%，财政收入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30.87%；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中国平均水平，2010年达到47347元，进入中国前列（如图2、图3）。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971.63亿元，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为24.7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7亿元；进出口总额2388.75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69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530元。内蒙古经济总体实力的提升为推进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件。一方面蒙古国可以借鉴并充分利用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经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内蒙古有实力参与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利于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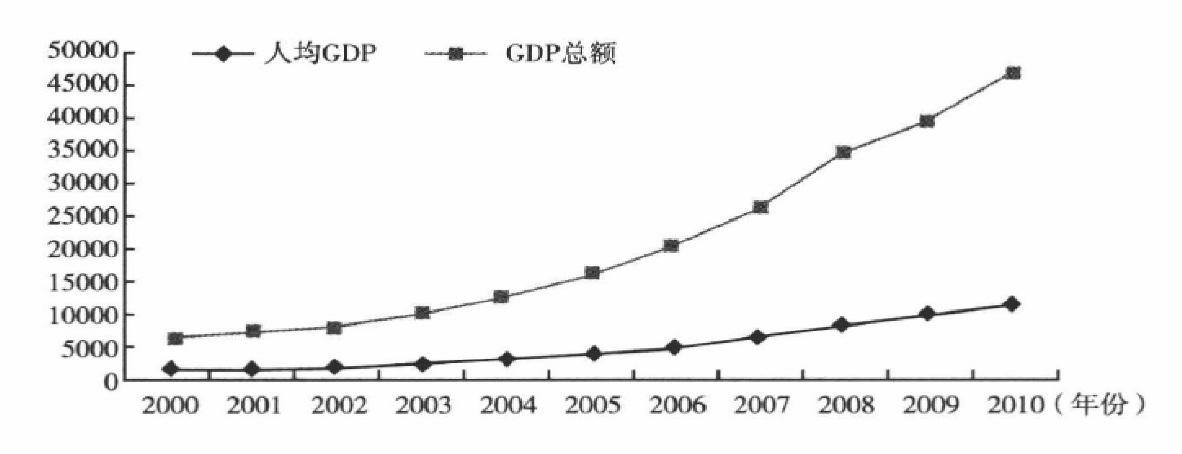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10年内蒙古GDP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2011）》。

2. 内蒙古经济自主发展机制趋向成熟，社会建设全面进步

2003～2007年内蒙古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270.68亿元，年均增长34.169%。投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发展环境优化，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建成了贯通内蒙古东西的高等级公路、铁路和电力通道，如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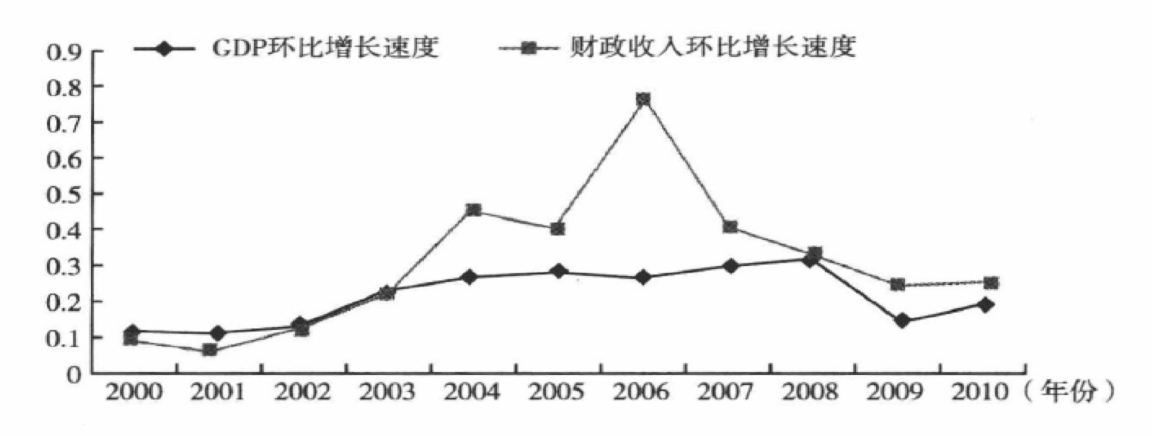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10年内蒙古GDP与财政收入环比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得到。

了通往京、津、唐和东北地区以及蒙古国的电力外送通道。同时，法治、服务、诚信等软环境明显改善；城乡居民衣食住行和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9137元增加到2010年的1769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989元增加到2010年的5530元，在中国的位次明显前移。城乡居民衣食住行和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鉴于内蒙古与蒙古国地缘区位、人文历史与自然资源等共性特征，蒙古国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制内蒙古的发展机制。这为中蒙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经济发展机制基础，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全面进步为积极推动中蒙在教育、卫生、体育、文化、旅游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社会基础，有利于拓展中蒙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七）内蒙古向北开放政策优势

在中国建立了对蒙矿能资源开发利用部际协调机制的背景下，内蒙古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制定了一系列向北开放的政策法规。鼓励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明确了对外合作的范围，即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推进境外投资办厂，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拓展对外工程承包，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高对外劳务合作水平；促进境外农业合作开发；利用境外科技、智力资源；运用跨国并购等投资方式；推动服务业走出去；建立经济、安全、可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通道。

同时，明确境外投资项目鼓励、允许、禁止三类的界限，对鼓励类项目，国家在宏观调控、多双边贸易政策、外交、财政、税收、外汇、海关、资源信息、信贷、保险、外事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向北开放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在内蒙古企业参与蒙古国经济社会建设同时，全面提升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富民强国的最终目标，从而为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参与 CAREC 奠定了政策基础。

二　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劣势

内蒙古参与蒙古国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一定的现实问题，构成目前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劣势。尤其是，内蒙古进入 CAREC 较晚、内蒙古边境贸易与经济合作结构单一、对外投资合作门槛较低等方面的劣势表现突出。

（一）CAREC 区域合作有待深化

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一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合作的深化。中亚五国对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存在不同期望，哈、吉、塔三国对贸易投资便利化期望很高，主要想吸引中国投资，联合开发资源性产品，实现“能源富国”战略。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西方国家。中亚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同期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向宽领域、深层次发展。同时，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是能源、运输两大战略领域，合作范围领域相对较窄、层次较低。此外，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参差不齐，区域贸易依存度小，一定程度制约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全面发展。这一切决定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

（二）内蒙古参与 CAREC 较晚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亚各国独立之初，美国、日本、欧盟、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便开始进入中亚地区，属于较早参与中亚市场的国家和地区。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也先后进入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市场。这使得国际许多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参股和控股的形式参与了



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而中国内蒙古在2008年才被批准加入CAREC，而且内蒙古的企业规模相对于国外跨国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之参与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不足，形成了中国内蒙古参与中亚区域合作的一个不利条件。

（三）内蒙古与蒙古国边境贸易与产业投资结构单一

内蒙古与蒙古国及中亚边境贸易经济结构单一。内蒙古出口产品主要是粮油食品、蔬菜水果、轻纺产品、钢材、铝材、水泥、化学制品、有色金属及家用电器，多数属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内蒙古从蒙古国进口产品主要是畜产品、化肥、废钢、废铝、生铁、铜精矿砂、铜材与木材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大。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及中亚边境贸易结构相对较为单一，有待于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领域拓展，逐渐形成边境贸易结构的优化。同时，产业投资结构需要在农牧业、能矿资源深加工、生态环境治理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并不断优化与提升产业投资结构，以此奠定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向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发展。

（四）区域经济合作的门槛较低

目前，矿能资源开发与利用作为CAREC的主要合作内容之一，是中西方各国企业（集团）对蒙古国投资的重点领域。由于矿产资源与能源开发利用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进行矿能资源投资的企业具有相当的资金与技术实力，以此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内蒙古一部分对外投资企业资金规模与技术实力等方面存在相对竞争劣势，而且目前中国内蒙古企业参与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的门槛较低、竞争优势不明显。这为内蒙古参与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　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

（一）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

目前，蒙古国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较快。蒙古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发

展。从2004年到2007年，蒙古国GDP年平均增长8.6%。2008年GDP达到52.58亿美元，增长率为8.9%。2009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负增长为-1.3%。2010年蒙古国经济实现复苏，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4206.843亿图格里克，比2009年实际增长6.1%。2011年蒙古国GDP达到了108297亿图格里克，增长了17.3%。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平稳发展时期。近10年的数据显示，蒙古国通货膨胀率一度保持较稳定状态，除了200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外，平均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6%。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不仅有利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也为中国内蒙古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背景。

（二）蒙古国大力引进外资

蒙古国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大力引进外资。蒙古国政府先后颁布《外国投资法》《矿业法》《矿产资源法》与《蒙古国关税的免征、减征与返还条例》等。同时，蒙古国还加入多个国际协定和公约，主要包括:《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华盛顿《解决投资争议公约》、世界贸易组织、首尔《关于成立投资多边担保机构公约》《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双边条约、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外商在蒙古可享受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风险保险。蒙古国联盟政府1996年以后，重视吸收外资，将引资作为振兴和发展经济的战略任务，外商投资领域已由1990年的两个领域增加到目前的20多个领域。目前，蒙古国有限的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投资者所需基础设施水平。蒙古国大力引进外资为内蒙古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提升蒙古及中亚充分利用外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发展，从而推动内蒙古与蒙古国次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化。

（三）CAREC综合行动计划框架加快了中蒙区域合作进程

CAREC通过采取“两个结构层次”的方法扩大和加深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即第一层次的活动包括与运输、贸易和能源核心领域相关的问题；第二层次的活动是新领域，如人力发展、农业、环境和旅游等。2009年6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率团出访蒙古国参加中蒙建交 60 周年纪念活动，并同蒙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进一步拓展与蒙古国在经济、技术、贸易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为内蒙古参与 CAREC 提供了良好的合作框架，有利于加强成员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融合，推动各国经济发展。

四　内蒙古面向蒙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定位

蒙古国与中亚基础设施落后、体制差异以及各国对外政策限制等为内蒙古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一）蒙古国与中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蒙古国与中亚国家等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如蒙古国电力、交通、通信、房舍、口岸基础设施、矿产资源开发基础条件亟待改善。吉尔吉斯斯坦地矿资料陈旧，选矿、开采设备缺乏。哈萨克斯坦铁路运输设施老化，亟待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条件，不仅有碍于蒙古与中亚各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参与中亚区域合作，阻碍了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CAREC 成员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化

中亚各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差异化程度相对较高，区域经济合作规范性与有效的监督机制尚不够完善。政策环境与法制环境亦存在有碍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某些方面。这对内蒙古企业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了体制性差异。

（三）蒙古国与中亚各国对外政策的限制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民族工业尚需保护与发展，加之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需要，部分中亚国家采取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贸易合作发展。

同时，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亚各国不断调整对外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环境稳定性。这给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参与CAREC的各国和地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通过SWOT分析可以导出四种战略定位（见图4）。分析表明，尽管内蒙古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劣势与威胁，但是优势与机遇占主体地位。因而，在内蒙古与蒙古国次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中，内蒙古应采取发挥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遇的SO战略。

机遇与压力 / 优势与劣势 / 战略选择	机遇(O) *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 *蒙古国大力引进外资 *CAREC综合行动计划框架	压力(T) *蒙古国基础设施落后 *CAREC体制难以对接 *蒙古国对外政策限制
优势(S) *地缘区位优势 *人文历史优势 *自然资源共性优势 *CAREC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优势(中蒙贸易互补性强优势 *内蒙古经济发展优势 *中国向北开放政策优势 *中国参与CAREC基础优势)	SO战略 发挥内部优势 利用外部机遇	ST战略 依靠内部优势 回避外部威胁
劣势(W) *CAREC区域合作有待深化 *内蒙古参与CAREC较晚 *内蒙古边境贸易经济结构单一 *对外投资合作门槛较低 *内蒙古参与CAREC融资平台尚未搭建	WO战略 克服内部劣势 利用外部机遇	WT战略 克服内部劣势 回避外部威胁

图4　SWOT分析矩阵战略

紧紧抓住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这一难得的机遇期，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能力，将优势能力转化为合作行为，以优势和机遇为导向，快速形成中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框架，提升中蒙区域合作在CAREC框架内的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杜凤莲、彭秀芬、张国芝：《内蒙古自治区对俄蒙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报告》，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处，2009。

郭晓川："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PRC and Mongolia"，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司，2009。

刘兴宏：《亚洲开发银行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东南亚纵横》2010 年第 5 期。

董锐：《中蒙贸易互补性分析》，《中国商贸》2010 年第 6 期。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世界经济》2003 年第 5 期。

H. G. Grubel and P. J.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London, Macmillon, 1975.

SWOT Analysis of Inner Mongolia to Develop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Mongolia

Zhang Guozhi　Sun Jiuw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challenges and pressure of the Inner Mongolia oriente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Mongolia using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his cooper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this cooperation strategy is the SO strategy that can play internal superiority and take advantage of external opportunities. Inner Mongoli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power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What's more, Inner Mongolia also can make use of the continuously improve ability to cooperate and transformed the ability into the advantage and power, so as to form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Inner Mongolia and Mongolia rapidly and raise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within the CAREC frame.

Key Words: Central Asia; China and Mongol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19

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发展形势分析

王开玉　丁阿丽　张 旭*

摘　要：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自国务院批准以来，充分发挥了承接转移和典型示范的示范的作用。示范区双核之一的合肥利用科教优势积极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另一核心芜湖也在打造省域次中心城市。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示范区必须突破行政区划实现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加快三圈融合，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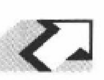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皖江城市带　承接转移　典型示范　自主创新力

近年来安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将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从区内各市产业现状、资源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考虑将其划分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格局。“一轴”是指安庆、池州、铜陵、巢湖、芜湖、马鞍山6个沿江市；“双核”是指合肥和芜湖，这是安徽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两大增长极，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两翼”是指滁州和宣城市，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示范区在工业产业化发展方

---

* 王开玉，安徽省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阶层实证、中国现代化；丁阿丽，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张旭，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



面大胆创新，产业分工，优势互补，突破行政区划形成了两个工业产业带——江北工业集中区和江南工业集中区，承接产业转移和未来工业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示范区承接转移示范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一 示范区“双核”的发展

（一）合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

安徽“十二五”战略规划把合肥定位为省域中心城市，是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近年来合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定位，加快转型，改革创新，进一步密切与示范区内各城市的联系，已成为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011 年 8 月 22 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正式撤销地级巢湖市，其所辖的一区四县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区划调整后，合肥区域面积由 7055 平方公里增加到 11433 平方公里，增加 62%；人口规模由 570.2 万人增加到 752 万人。经过国家的战略规划，合肥向区域性特大城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合肥作为示范区的核心作用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经济指标逐年升高。作为安徽发展引擎的合肥正以“合肥速度”迈向区域性特大城市：主要经济增长指标连续多年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总量位次不断前移，省会首位度逐年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不断增强。2011 年合肥 GDP 增至 3600 多亿元，在全省经济首位度达到了 24.1%。数据显示，2012 年前三季度，合肥市 GDP 为 2807.3 亿元，同比增长 13.4%，增速位居全国 26 个省会城市第五，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5.7 个和 1.4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2012 年前三季度，合肥市多项经济指标总量勇进全国省会前十名，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及工业投资，在全国 26 个省会城市中均居第五位；进出口及出口总额分居省会城市第九和第七位；地方财政收入居省会城市第十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第 11 位。此外，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如京东方 6 代线、鑫昊等离子、彩虹高世代 TFT 玻璃基板、合肥液晶显示器件 8.5 代线，赛维 LDK、海润光伏、晶澳太阳能、美国 3M、熔安重工、长安 30 万辆微型轿车一

期、海尔工业园、联想（合肥）产业基地、宝龙达电脑、中盐合肥化工基地等，呈现出投产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储备一批的模式，产业发展既有较好的结构，又有较好的可持续性。

产业结构更趋完善。合肥把握示范区的产业分工，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是完善促进政策，大力推动城市功能和新兴业态开发。2012 年在建商业大项目达到 22 个，国际金融服务业建设取得新的突破，已有 12 户金融企业落户滨湖，此外，物流、旅游、文化、会展等服务业蓬勃发展。

（二）芜湖——打造省域次中心城市

芜湖地处皖南核心区，因“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名誉华夏，有“云开看树色，江静听潮声”之美誉。今为安徽省经济、文化、交通、政治次中心城市，安徽省第二大城市，安徽省三大旅游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国务院批准的沿江重点开放城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城市、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城市。芜湖和省会合肥一样也是皖江城市带龙头城市，区位优势彰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基础较好，对打造皖江示范区新的增长极、带动并加速安徽崛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安徽“十二五”战略规划把芜湖定位为省域次中心城市，安徽要跨越式发展需要芜湖带动，芜湖的加速发展也是双核协同的关键。芜湖省域次中心发展战略不仅包括现在长江南岸的芜湖建成区及规划区和长江对岸的无为县经济开发区及江北产业集中区，还与江北产业集中区形成相互间的支撑与互补，芜湖和马鞍山、铜陵、宣城在内皖江城市带，芜湖与合肥两市双核对周边区域的涓滴效应将会超过极化效应，皖江示范区双核联动将形成极强的产业联动的协同效应，对示范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芜湖作为示范区的另一核心和合肥一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创新发展的特色也最鲜明。安徽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 年前三季度芜湖、合肥、淮北、滁州、蚌埠 GDP 增长都超过了 13%。其中芜湖市连续 11 个季度 GDP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从总量来看，芜湖达到 1323.7 亿元，位于全省第二。

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芜湖奇瑞汽车是安徽创新发展的名片，奇瑞公司成立



15年来，在内地建有芜湖、大连、开封和鄂尔多斯四大生产基地，还在海外15个国家和地区建成了16个工厂，现已拥有总投资达15亿元。截至2012年上半年，奇瑞公司累计申报各项专利7324件，累计授权专利4815件，位居中国汽车企业第一。奇瑞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公司每年也将超过销售收入7%以上的费用用于研发，全公司研发团队已超过6000人，仅在发动机研发上就有800人的队伍，奇瑞公司现已具备每年推出5~10款新车型、多款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能力。

文化产业的高地。方特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依托，打造了一条以创、研、产、销为一体的产业链。将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旅游产业融为一体，建成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两个主题公园，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游客在体验刺激的同时，也感受高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2011年，方特产出的动漫片超过12000分钟，在全国100多家电视台播出。2011年，这两大主题公园实现营业总收入5.88亿元，超越了黄山、九华山。正因为方特，芜湖成为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长三角著名的文化旅游地。

（三）"双核"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典型示范作用

合肥市依托科教资源，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计划到2015年实现总产值超过2500亿元，产值超亿元的电子信息企业80~100个。芜湖市将进一步推动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计划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0亿元，工业销售收入达800亿元。安庆、池州、铜陵、马鞍山、宣城、滁州和六安分别为石化、非金属材料、有色金属、钢铁、机械设备、家电和轻纺工业。由于布局合理，吸引了众多的企业来园区发展。2011中国企业500强里的12家皖企，有9家在这里。示范区在实际利用外资和引进省外资金基础上，到2011年皖江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14.4%，固定资产投资8495.1亿元，增长27.3%。被誉为"皖版苏州工业园"的苏滁现代产业园项目已正式落户滁州，与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的"合肥创新创业园"，投资110亿元的皖中国际商贸城项目落户铜陵，投资100亿元的数字硅谷国际产业园项目落户马鞍山，总投资近千亿元的正威半导体产业园项目在池州开始整机厂建设……据统计，目前，皖江示范区

内规划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计划投资30亿元以上的合作共建园区达30个，入园的亿元以上项目286个，总投资达1730亿元。

二 江北工业集中区和江南工业集中区

在迅速发展中，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充分发挥了承接产业转移的作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了更好地发挥示范区的承接功能，体现示范区的优势，示范区分成了江北集中区和江南集中区，对两个集中区重点发展的产业编制了《皖江城市带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区内各市培育和壮大的首位主导产业给予了明确规定。皖江城市带示范区成立两年来，新增了六家国家级开发区，分别为芜湖市高新区、合肥出口加工区、安庆、铜陵、滁州、池州经开区。新增国家级开发区速度位于全国首位。目前安徽省有国家级开发区12家，集中区效应进一步彰显。这些精心布局、创新打造、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正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质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的积聚效应。

皖江城市带的核心城市合肥自皖江示范区成立以来，在承接转移中引进了一批现代化的重点项目，如合肥京东方、鑫昊等离子、新型平板显示产业等新兴产业体系。调整产业结构，打造高新技术的产业集群，如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形成了新产业集群。在承接全球新兴产业的转移中，加强创新开发，科学规划，并确定产业重点，不断培育创新型的企业。合肥也是合肥经济圈里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充分利用科教优势，创造了城市建设的“合肥力度”和“合肥速度”。

位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的江北产业集中区招商项目300亿元，在谈重大项目500多亿元，开工建设招商项目177亿元，在建和即将开工的政府性投资工程总规模超过40亿元。2012年在江南集中区注册的外来企业超过40家，实际注册资本突破25亿元，累计签约项目21个，总投资达468亿元。其中，2012年6月份开工建设的17个项目，总投资340亿元，其中加工制造类项目14个，总投资130亿元，旅游服务类项目3个，总投资210亿元。



据统计，2011 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八市（不含六安市金安区和舒城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大关，达 10128.6 亿元，增长 14.4%，比全省高 0.9 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 70%。

三　在承接转移中提高自主创新力

（一）承接转移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增强示范提高自主创新力

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的合肥和芜湖，也是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的中心城市。经过两年的发展，合肥、芜湖、蚌埠已成为安徽的创新高地，江淮的“硅谷”。在承接转移和科技创新中相结合，在增强示范中提高了安徽创新力。

四年来，试验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高新技术企业数由 404 家增加到 940 家，研发人员数由 3 万人增加到 6 万人，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数由 85 个上升到 300 个，专利授权数由 2507 件上升到 22780 件。在试验区带动下，安徽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跃居全国前 10 位，25 家企业成为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总数居全国第一位；1617 家企业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居全国第七、中部第一位。

高新技术产业平稳增长。据统计，2012 年前三季度，合芜蚌试验区继续领跑全省，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4550.9 亿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 62.1%；实现增加值 1128.6 亿元，占全省的 61.2%。皖江示范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6176.4 亿元，占全省的 84.3%；实现增加值 1536.8 亿元，占全省的 83.3%。在合芜蚌试验区和皖江示范区带动下，安徽省部分地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较快增长，淮北、六安、淮南、宣城、池州、宿州、滁州 7 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较上年同期增幅超过 20%，其中，淮北市增幅超过 50%，六安市增幅超过 30%。合肥科技厅的领导介绍，“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了真正促进工业增长的主动力，就是说在整个工业当中，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超过了一半，在整个 GDP 当中，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22.1%”。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果显著。2012 年前三季度，安徽战略新兴产业共实现产值 3580 亿元，增长 30.5%；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6%，增幅居中部首位。试验区建设以来，合芜蚌三个市的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分别占到全省的近 60% 和 75%，其中八成左右都是由这些战略性新兴企业创造的。通过这些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仅用三年时间，合芜蚌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数达到了 500 家，在全省占了七成。与此同时，合芜蚌试验区还结合“高端引领，产业提升”的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在投资结构中，合芜蚌工业投资 64.8% 以上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起点、高投入使合芜蚌骨干工业企业主要装备水平 60% 以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80% 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产品产值率近 30%，其中一些重要骨干企业新产品产值超过 50%。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等 8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3054 家，较试验区建立前增长了 10 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试验区建立前的 14.4% 上升到 20.4%。不仅汽车、家电、水泥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得到了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同时也催生了平板显示、LED、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公共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合肥科学岛的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这种“人造太阳”技术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五大强国拥有“人造太阳”的核心技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奇瑞汽车成为我国最大的自主品牌汽车，奇瑞也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和出口企业。现已拥有总投资达 15 亿元，成为亚洲最大汽车试验技术中心，列“中国十大创新型企业”第三位，仅次于载人航天、高铁研发企业。

（二）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2004 年 11 月，国家科技部批准合肥市为全国唯一科技创新型试点市；2008 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以合肥为龙头，拓展到芜湖、蚌埠，进而带动全省创新能力提升；2010 年 1 月，为扩大试点效应，以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



委授予合肥国家创新型城市“双试点”，合肥正在一步步迈向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序列。

2012年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报告评价合肥是“二线的城市，一流的科研”，对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城市进行了基础研究实力排名，合肥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列全国第三，科研机构排名中国科技大学全国第二。据统计，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531家，占全省的32.7%，全市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总量今年突破1000户。新开发国家重点新产品59个、省级重点新产品147个、高新技术产品585个，实现产值1021亿元，增长35%，占全省的60%。

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2012年5月21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比较294个城市10年综合竞争力指数变化，合肥竞争力提升迅速，居全国第16位，中部排名第一。同时，大力进行人才投资，吸纳高层创新型人才。2009年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引进1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2010年11月，安徽省首批评选产生20名“百人计划”人选，其中创新人才16人，创业人才4人。目前，安徽省第二批“百人计划”引进人才评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四　示范区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对策

突破行政区划实现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加快三圈融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肥经济圈、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三大区域经济各有特色，要在区域合作中才能发展。安徽区域经济的发展重在合作，利在共赢，只有不断强化内部协作，才能实现安徽城市群各个城市发展有序；只有互利共赢才有强大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实现经济圈城市整体实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圈内各个城市的通力合作，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加强分工减少产业结构雷同，避免恶性竞争，推动资源共享，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利益最大化，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它们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效地提高了安徽的创新力、影响力，增强了安徽的区域综合竞争力，使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

示范区要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深化改革，示范区在承接转移的基础上还要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努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围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深化改革，要通过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建立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转化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紧紧围绕发展的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区域经济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alysis of Wanjiang City Belt Undertaking the Transfer Demonstration Area

Wang Kaiyu　Ding Ali　Zhang Xu

Abstract: Since it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wo years ago, the Transferring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Zone of the City Belt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through Anhui Province has been transferring, demonstrating,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achievements of Hefei and Wuhu as the two core cities in the Demonstration Zone. As the regional core, Hefei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uild up a Great Lake City and tries to create a highland of innovation; as a regional sub-core, Wuhu sticks to its transferring role and tries to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industrial zones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tha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Demonstration Zone should break up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to industrial division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circles; meanwhile, it should deepen reform and expand opening to develop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Transferring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Zone of the City Belt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through Anhui Province; Transferring; Demonstra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20 成渝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趋势研究

岳朝敏*

摘　要：

2012年，全球经济低迷、经济不稳定形势加剧，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内外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渝经济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极点，发展势头强劲，一体化进程加速，这对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形势和改革目标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成渝经济区　一体化　转型升级

一　成渝经济区发展态势

（一）地区经济增长强劲、居民收入平稳较快增长

2012年，成渝经济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持续提高。第一至三季度，四川国内生产总值（GDP）17536.5亿元，同比增长12.8%，同期，重庆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158亿元，同比增长13.8%，两地GDP合计25694.5亿元。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全国GDP为353480亿元，同比增长7.7%。成渝经济区GDP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3%，增速分别比全国高5.1个和6.1个百分点（见表1）。

成渝经济区工业平稳增长。2012年，四川省工业总产值达到8143.93亿元，同比增长15.5%，重庆为3797.75亿元，增长16%，两地工业总产值总

* 岳朝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开放合作。



量11941.68亿元，约占全国总业总产值（141641.5亿元）的8.4%，增速分别超过全国（7.9%）7.6个和8.1个百分点。2012年前三个季度，重庆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9621亿元，同比增长18.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二。据相关数据分析，全市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趋势比较明显；2012年1～11月，四川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1个百分点。其中，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5%，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较快增长。四川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670.9亿元，增长11.3%，重庆为3046.25亿元，增长12.2%，两地总量约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154963.5亿元）的5.6%，比重偏低，但是增速却比全国平均水平（7.9%）分别高出3.4个和4.3个百分点。

表1　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成渝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的比较

		四川	重庆	全国
GDP	总量(亿元)	17536.5	8158	353480
	增长速度(%)	12.8	13.8	7.7
	占全国比重(%)	7.3		
工业总产值	总量(亿元)	8143.93	3797.75	141641.5
	增长速度(%)	15.5	16	7.9
	占全国比重(%)	8.4		
第三产业总值	总量(亿元)	5670.9	3046.25	154963.5
	增长速度(%)	11.3	12.2	7.9
	占全国比重(%)	5.6		

资料来源：重庆、四川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成渝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川为15609元，同比增长14%，重庆为17180元，同比增长13.8%。同期，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8427元，同比增长13%。成渝经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较全国高1个百分点。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上看，重庆仍然居全国11位，四川则上升1位，列全国第16位。而同期，成渝经济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

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第一至三季度，四川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6216元，同比增长16.3%，重庆为6460元，同比增17.5%（见表2）。

表2　2012年第一至三季度成渝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四川	重庆	全国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总　额(元)	15609	17180	18427
	同比增速(%)	14	13.8	13
农村居民现金收入	总　额(元)	6216	6460	
	同比增速(%)	16.3	17.5	

资料来源：重庆、四川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立体、快速通达的交通网路促区域城市群落形成

公路方面，目前，成都和重庆两大核心城市之间有成渝高速公路和成遂渝高速公路相连，已经实现3小时通达。2010年已经动工兴建的成渝高速复线将于2014年建成通车，这条高速公路将成为成渝两市之间最短的高速公路，届时将实现公路两小时通达。

铁路方面，目前成渝间有老成渝线和成遂渝铁路，运行时间为3.5小时，客运的主通道是成遂渝铁路，和谐号动车组直达时间约为两小时，而即将于2012年底建成通车的遂渝二线将进一步缩短成渝间铁路通达时间至两小时以内，有利于进一步增强重庆和成都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对促进成渝经济区发展，拉动内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这条铁路还是沪汉渝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川渝地区与华中、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此外，2012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作为"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之一"上海至成都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开工的成渝客运专线（成渝高铁）项目，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最快将于2014年底通车。届时，成渝之间人员往来将实现1.5小时可达，成渝双城将成"同城"，大大加速成渝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提升成渝经济区的整体竞争力。

此外，最迟2013年初即将全线贯通的成渝环线高速路将成都、重庆两个



特大城市和成渝两地30多座大、中、小城市有效串联，使成渝经济区内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公路通达时间缩短至3个小时以内。另外，根据《成渝经济区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未来成渝经济区内50万以上人口的所有城市、20万~50万人口2/3的城市都有望通城际客专，形成一小时城际高铁网。轨道交通由线到网的质变是国内外城市群、经济带发展的重要经验，它能有效引导城镇化发展，优化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将加速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的形成，并进而形成“双核”带动下、大中小城市相辅相成的经济带。

成渝经济区还是黄金水道的起点，拥有重庆、泸州和宜宾三个水运港口，其中重庆的水运优势在西部罕有匹敌。以长江干线和嘉陵江、渠江、乌江、岷江等支流高等级航道为重点，干支衔接、水陆联运、功能完善的内河水运系统已经基本形成。日趋完善发达的内河水运系统不仅助推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区域重要的出海大通道的一部分，对加强区域对外交往和联系起到重要作用，对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巨大的催化作用。

（三）产业优化升级，内生增长动力进一步得到培育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产业发展模式和国际分工深刻变革，促进了国内外产业布局的新一轮重大调整，成渝经济区把握住这一难得机遇，努力在国内外现代产业分工中占据重要一席，谋求共赢发展。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同时，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1. 四川：依托产业转型，重塑经济版图

（1）壮大优势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在产业选择上，引进项目更科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引进了低消耗、高产出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先导发展，大力引进、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技术服务类企业，特别是产业带动性强和关联性强的先进制造业。这些项目对促进四川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条、集聚新兴产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四川对各类产业园区进行了规划，推出了“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也即“1525”工程园区），围绕全省“7+3”产业发展规划，依托区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条件，按照



“一园一主业、园区有特色”要求进行产业合理布局；围绕“五向发展”（即关联发展、成链发展、集聚发展、集约发展、合作发展）方向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链，构建完善产业协作配套体系和机制；形成特色突出、功能完善、成长快速、潜力较大的各类特色产业园区。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成都市八大特色优势产业完成增加值1553.36亿元，增长18.5%，总量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81.9%。其中，汽车产业为增长最快的产业，增速为41.9%；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速为28.4%；冶金、食品饮料及烟草产业、石油化学工业生产稳定，分别增长18.6%、15.5%、11.1%；建材、轻工、机械产业增长较慢，分别增长8.7%、6.2%、4.4%。

（2）垂直整合、立体打造产业高端集群。

近几年来，四川的产业层次从低向高，呈现“一增一减”的好势头：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迅速提高；而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行业比重则明显降低。不在低端抢饭吃，要在高端有作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四川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也与日俱增。目前，四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5%，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56%。[①] 产业转型升级更是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四川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平板电脑制造基地，全国最大发电设备生产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全国第六，全国电子信息新高地，汽车石化工业也正在迅速崛起。

（3）创新体制机制，政策保驾护航，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四川启动了政绩考核的系统工程，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宣布，对各市州不再考核GDP，新的评价体系中，产业转型升级所占分量大幅提升；环保一票否决，各市州对污染项目零容忍；科技进步贡献率纳入考核，地方政府更加注重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四川还要求新上项目资源就地转化率达到100%，制度“硬杠杆”促使全省能源资源集约化生产水平迅速提升。

（4）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012年1～7月，产业总产值达到2022亿元，增长21.4%，高于全省工

---

① 《四川步入工业化中期，统筹产业重塑经济版图》，http://zs.ce.cn/news/201211/02/t20121102_23811905_1.shtml。



业平均水平 4.4 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14.7%。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新能源产业蓄势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发展，新材料产业加速发展，生物产业提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异军突起。

同时，在综合考虑全省资源、基础条件和人才优势的基础上，四川选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等六个产业的 45 个重点领域、454 个重点产品、251 项关键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引进合作、联合攻关，进行重点发展。2012 年，六大战略新兴产业均发展强劲。

（5）着力推进服务业提速升级，构建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是四川经济的短板。连续 3 年，四川服务业都保持着 10% 以上的增速，但相较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四川选择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紧密贴近建设长江上游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配套需要，大力发展与先进制造业相关联的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西部现代金融城市和美食之都、会展之都。放手发展电子商务，培育服务经济新型增长点。2011 年，成都成为全国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通过深入实施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以试点区域为重点，以服务业战略功能区为载体，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为发展方向，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民生性服务业提升发展、新兴服务业跨越发展，将试点区域建设成为全国服务业改革创新示范区和现代服务业区域中心。最终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或国际区域性影响力的服务业战略功能区和产业集群，形成高能级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低碳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基本建成服务业产业功能和自然生态功能俱佳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样板区。

2. 重庆：在工业化加速进程中实现转型升级

（1）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重庆把发展工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近两年工业增速连续达到全国第一，成为重庆经济第一驱动力。2012 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9.4%，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56%。此外，重庆的工业从业人数占到城镇就业总数的 1/3。总体上看，重庆工业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到一个持续较快发展的新阶段。



（2）垂直整合，建产业集群，促产业升级。

重庆是内地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而近年中国内地进行经济转型，西部大门敞开之后众多电子科技知名企业进驻到重庆，而当地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带动内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形成产业集群。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近几年重庆引进了美国惠普、台湾宏基、华硕等世界最重要的电脑制造品牌商，同时又引进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六家世界最重要的电脑制造商，继而又进一步引来了260多个电脑零部件的制造商、供应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一年可以生产一亿多台电脑，同时80%的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制造，重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这种产业集群的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除了笔记本电脑，汽摩产业集群式发展更为卓著。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国家汽车工业重点布局的城市之一，同时作为中国第三大汽车生产基地，汽车产业链条已基本完善，带动环渝经济带城市配套产业迅速发展。产业集群化效应使重庆成为中国汽车自主创新前沿阵地和汽车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汽车制造产业转移的新热土，进而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汽车消费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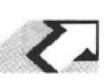
产业集群选择方面，重庆在圈定的“6+1”支柱产业体系下重点打造笔记本电脑、软件及信息服务、通信设备及物联网、乘用车、摩托车、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及医疗器械七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同时，还列出了30多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均以工业园区为载体，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战场。

（3）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扩大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

重庆实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发展，构建起品牌商、代工企业、零部件企业“5+6+600”世界级电脑产业集群，2012年1~10月，电脑产量达3454万台，单月产量最高466万台，全球每5台中有1台“重庆造”，规模电子产业销售产值增长71%，拉动工业增长8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到2012年底，电子制造业占比由过去几乎为零提高到16%，汽车、摩托车由过去1/3强调整到26%（汽车由25%调整为18%），装备10%，化工8%，材料14%，能源8%，轻纺14%，产业结构日趋合理。[①]

---

① 重庆经信委办公室，http://wjj.cq.gov.cn/zhzx/zhxx/60188.htm。



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重庆市政府2011年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12年底，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将超过4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超过13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0%，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成为重庆工业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支柱。[①]

（4）“创新”“创意”推动重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入“十二五”，重庆经济增长也进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战略转折期，重庆将推动创新实现由“重庆制造”向“重庆创造”的转变。为此。重庆在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上狠下工夫，不仅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每年保持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每年实现0.1%的增长，新产品产值率保持30%以上，稳居西部首位。具体措施包括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3家，新培育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0家以上，建立5个国际产学研战略联盟，组织实施50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50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新培育20项战略性新产品，突破20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克50项关键新工艺。2012年企业研发投入总量超过125亿元，投入强度达到0.9%，企业新产品对企业利润贡献率上升至60%。[②]

此外，重庆市创意产业发展形势良好，势头西部领先。从2007年起，重庆市政府每年设立2000万元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重庆创业发展打下基础。到2012年，重庆市建成100亿级基地1个、10亿级基地2个、5亿级基地2个，其中6个获得国家级产业基地称号。为发挥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杠杆作用，重庆市大力扶持重点项目，数据显示，五年来累计支持重点项目207个，项目总投资33.4亿元，预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0多亿元。同时，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举办了多项活动，提高了营造创意产业的发展氛围。根据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发布的消息，2011年，重庆市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420亿元，

---

① 重庆市政府网站，http：//www.cq.gov.cn/today/news/321529.htm。

② 沐华平：《重庆经济进入创新驱动新阶段》，重庆经信委网站，http：//wjj.cq.gov.cn/zhzx/mtbd/49817.htm。

同比增长20%；重庆市从事创意产业实体已达2.3万多家，同比增长24%，从业人员到达33万人，同比增长10%。文化传媒、软件设计（含动漫设计）等成为全市创意产业的主要支撑。2012年，重庆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创意产业提档升级。为完善扶持政策，重庆市成立了市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出台相关意见。[①]

二　成渝一体化约束因素

（一）产业发展呈现趋同

行政壁垒使成渝经济区内各种要素和产品无法流畅地转动起来，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配置功能没能发挥充分作用，限制了区内经济潜力的释放以及功能节点网络的形成，使产业无法进行垂直分工，形成了对大多数过热产业的趋同。比如，四川和重庆没有分家的时候，两个城市是有分工的，重庆发展汽车制造业，成都主要侧重于电子信息化产业。而分家后，成都也积极发展起汽车制造业，成为中国汽车制造“第六极”；重庆电子信息化产业也不甘落后，目前已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并形成了产业集群，成渝彼此间构成了竞争态势。

（二）行政壁垒引致市场割据

“行政壁垒”作用于市场经济之后，必然带来“市场割据”。现有的行政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下形成的区域产业，被深深地烙上了市场分割的印迹，加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得区域性的市场壁垒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虽然目前看，过去那种以政府部门名义对外地产品进入本区域设置障碍的情况已经不多见，但取而代之的是以地方政府开协调会等方式人为设置障碍限制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情况。此外，市场主体准入的门槛在川、渝两地并不完全一致，

---

① 詹遥：《重庆推动创意产业升级，支持207个项目》，http://www.cqcb.com/cbnews/gusty/2012-11-01/1851367.html。



各自推出的改革措施难以适用于成渝经济区的整个区域空间。同时，服务软环境和税费执行标准各有差异，也造成川、渝两地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存在差别。而这些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成渝经济区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三）市场建设滞后产业发展

成渝经济区的主要支柱产业同时也是本区的优势产业，但是，由于相关市场体系培育并不充分，主要产业产品就地市场化程度低，导致产业优势未能被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优势，这既不利于产业本身的发展，也是市场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比如优势十分明显的重化工产业、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产业等，这些产业有规模、有技术，其产品也是经济区内的主要商品流，在成、渝两个中心城市却并没有相应的上规模、具辐射能力的专业龙头批发市场的存在。这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经济区域产业同市场高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发达市场体系和相关服务体系相比，成渝经济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此以外，成渝经济区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还较大程度地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金融市场市场化程度较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多数企业还需要倚赖间接融资。此外，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高端人才市场发育不够，技术市场也处于起步阶段，这些要素市场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状况成为成渝经济区市场体系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薄弱环节。

（四）“城市化失衡”导致“极化效应”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高密度的城市群是成渝经济区的一大优势，但其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却严重失衡，其特点是：超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特大城市断层，大城市数量少且规模小，中小城市数量较多，但规模小且人口所占比例小。经济区内城市体系缺乏大城市，导致区域内极化效应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腹地中小城市发展滞后。事实上，在规划的成渝经济区33个城市中，除了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外，其余都是中小城市，其中19个县级市，没有一个大城市，呈典型的断层特征。这种城市体系的断层状态导致区域内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向成渝两地高度集中，极化效

应非常明显，而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集。同时，城市体系由于不连续分布的断层状态，使城市群中的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缺乏良好的传递疏导，导致超大城市超负荷运行，中、小城市的合理建设与发展受到阻碍，不能很好地发挥城市体系的整体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当成、渝的中间城市群逐渐成形，成渝经济区才可能真正形成经济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

三　推进成渝一体化政策突破方向

（一）构建区域一体的要素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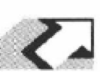
目前成渝经济区内尚无区域一体化的要素流动机制。市场对要素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失灵的。尽管成渝间的交通联络已经极为便利，“双城”如“同城”，但是无形的“行政界线”还是对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起到了阻碍作用。从人员的“身份”流动以及两地医保服务，到通信服务，再到资本、商品的流动等，诸多方面尚需要制度的一体化安排。

（二）区域一体的协调机制

在产业选择和布局、工业园区规划、对一些重大项目的预可研等阶段，应该更多一些高层的协调介入，避免或减少区域内部资源和环境竞争，合作规划布局更有利于做大做强，并带动中小城市参与形成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优势互补，扩大对外开放

目前成渝双方都将“会展”作为对外合作开放的重要方式，重庆的“渝洽会”、成都的“西博会”均已成为重要的对外交往平台。此外，四川和重庆都在积极拓展对外通道建设，双方都有优势。双方合作最有效地利用这些平台和通道，对彼此扩大加深对外开放和合作，加快国际化进程都将受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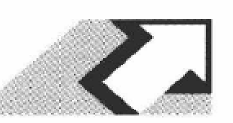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Integration Trends

Yue Chaomin

Abstract: In 2012,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ill in recession, and China's economy kept slowing down, while it is not the case in Chengdu-Chongqin economic zone, which as a new growth driver, means too much to China's gen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forming goal.

Key Words: The Chengdu-Chongqin economic zone; Economic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东北区域



The Northeast Area

B.21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评析及对策建议

丁晓燕　徐卓顺*

摘　要：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东北地区积极应对挑战，加快振兴步伐，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报告对2012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进行评析，并提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东北地区　经济发展态势　评析及对策

2012年，受欧债危机反复、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下行态势。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给东北地区振兴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也带

* 丁晓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软科学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徐卓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软科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前三季度，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活力和内生动力增强。总体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依旧充足，经济发展仍处于增长期，但增速涨幅有所回落。

一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评价

（一）地区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初步核算，2012 年东北三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060.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2.3%。分省来看，辽宁 22025.9 亿元，同比增长 12.1%；吉林 10531 亿元，同比增长 13.7%；黑龙江 12503.8 亿元，同比增长 12.2%，比上年增长 7.8%。

工业增加值略有提升。2012 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增速分别为 9.6%、14.0% 和 9.5%，辽、黑两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4 个、0.5 个百分点，吉林省高于全国 4.0 个百分点。与上半年相比，黑龙江省增速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辽宁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吉林增速没有变化。从工业运行的主要特点看：一是支柱产业实现不同程度增长。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8% 和 12.1%。列入吉林省产业跃升计划的八项重点产业累计实现增加值的增速达到 14.2%，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 0.2 个百分点，对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1.0%，比上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1.3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食品、医药三大行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超过 15%，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对吉林省工业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黑龙江省的两大支柱产业中的食品工业发展呈现“两高一低一缓”的发展态势。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酒、饮料制造业增速较快，分别完成产值 819.09 亿元和 120.48 亿元，增幅分别为 27.2% 和 27.9%，食品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02.33 亿元，同比增长 5.1%，烟草制品业增速放缓，完成产值 53.76 亿元，同比增长 14.7%。二是高耗能行业低速增长。辽宁省冶金工业和石化工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9.9%和7.5%，其中，冶金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仅仅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而化工行业的增加值增长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低了2.1个百分点。黑龙江省石化工业实现产值998.5亿元，同比增长6.8%，低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2.7个百分点。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48.9亿元，同比增长0.5%，但利税和利润有所降低，分别达到65.2亿元和-22.5亿元，同比分别减少30.9亿元和14.8亿元。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一是种植业生产顺利完成。2012年以来，东北三省立足抗灾夺丰收，提早做好了抗旱准备，奠定粮食生产的良好基础。根据各省农情统计，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20838万亩，比上年增加200万亩；吉林省农作物播种面积8698万亩，与上年持平；辽宁省春播面积4685万亩，较上年增加25万亩。目前黑龙江粮食作物一类苗占播种面积的95%，比常年高6.8个百分点；吉林、辽宁玉米一类苗比例分别达到84.7%和89.1%。二是扎实推进强农惠农政策。各省政府落实国家提高农业补贴、增加粮油生产大县奖励资金等政策，稳定种植面积，全面完成增产商品粮工程任务，建立一批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区，积极创建国家级示范区，集成优化资源配置，扩大集群集聚效应，稳固粮食生产能力。

（二）三大需求更趋协调发展

1.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0082.94亿元，同比增长29.3%。其中，辽、吉、黑三省累计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7391.6亿元、7603.4亿元和5087.94亿元，同比增长26.9%、31.0%和30.0%，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10.5个和9.5个百分点，分别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6.8%、3%和2%，高于上年同期0.4个、0.3个和0.2个百分点。与上半年相比，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增速有所回落，分别回落1.2个和0.6个百分点，吉林省的增速有所上升，上升1.1个百分点。同时，各省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有所提升，辽、吉、黑三省分别提升0.7个、1个和0.6个百分点。

从投资特点看：一是三次产业投资全面增长。其中，辽宁省第一产业完成



投资447.4亿元，同比增长17.5%；第二产业完成投资7724.3亿元，增长32.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投资9219.9亿元，增长23.3%。吉林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14.33亿元、4245.16亿元和3143.91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29.4%、33.2%和28.1%。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的稳步扩大，保证了吉林省投资的稳步增长；第三产业投资也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黑龙江省第一产业完成投资102.91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2594.54亿元，同比增长35.9%。其中工业完成投资2555.06亿元，同比增长35.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7.9%。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712.81亿元，同比增长23.3%。二是投资结构向好趋势进一步显现。黑龙江省有关民生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完成投资646.16亿元，同比增长62.7%。特别是以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电力、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改近期低速增长局面，完成投资762.36亿元，同比增长40.1%。三是民间投资比重进一步扩大。辽宁省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144.8亿元，增长20.4%；民间投资11800.7亿元，增长31.8%；港澳台及外商投资1445.9亿元，增长11.2%。吉林省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升到71.1%，较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

2. 消费需求保持旺盛势头

一是东北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快速增长。2012年上半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44.1亿元，增长15.3%。其中，城镇为4069.2亿元，增长15.8%；乡村为374.9亿元，增长10.5%。从商品销售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零售额164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前三季度，吉林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65.13亿元，同比增长15.8%，增速比上半年提升0.2个百分点，比当期全国平均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的幅度比上半年扩大0.5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402.67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上半年提升5.0个百分点，比当期全国平均增速高7.7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4.6亿元，同比增长15.6%，比上半年回升0.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13位。其中城镇市场同比增长15.6%，快于乡村市场0.5个百分点。

二是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平稳增长。其中，2012 年上半年，辽宁省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171.5 亿元，增长 19.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255.4 亿元，增长 25.5%。吉林省前三季度限额以上企业的吃、穿、用类商品销售分别同比增长 31.1%、32.4%、17.9%，化妆品、体育和娱乐用品、粮油和食品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销售分别增长 26.0%、43.7%、31.1%、36.8%、30.1%。黑龙江省前三季度生活必需品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好转。

三是汽车及其制品类和家电消费持续升温。2012 年上半年，辽宁省汽车类商品零售额 407.4 亿元，增长 13.4%；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 269.1 亿元，增长 25.9%；前三季度，吉林省石油及其制品和汽车类商品销售分别增长 15.2% 和 10.8%。受国家实施“节能环保家电补贴”政策影响，9 月份吉林省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增幅达 11.0%。

3. 进出口贸易稳步发展

2012 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外贸呈现恢复性大幅增长态势，已恢复并超过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前三季度东北三省完成进出口总值 1229.83 亿美元，其中辽、吉、黑三省分别达到 774.1 亿美元、186.83 亿美元和 268.9 亿美元，辽宁和吉林两省同比分别增长 8.0% 和 62.3%，黑龙江省同比下降了 8.6%。辽宁、吉林两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8 个和 7.6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低于全国 14.8 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贸易的特点看：一是东北三省进口贸易增长较快。2012 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进口呈现增长态势。其中，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同比分别增长了 5.3%、14.3% 和 21.6%，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5 个、9.3 个和 16.8 个百分点。二是出口贸易形势依然不乐观。前三季度，辽宁和吉林两省出口呈现小幅上升态势，而黑龙江省出口大幅下降。其中，辽宁和吉林省出口分别增长了 10.2% 和 1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 个和 5.5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出口下降了 3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4.8 个百分点。三是对新兴市场贸易快速增长，对部分发达国家贸易有所下降。截至 9 月初，辽宁省对南非、越南、伊朗和马来西亚出口分别增长 95.2%、116.4%、106.1% 和 97.1%；对美国出口 46.7 亿美元，增长 40.8%；对日本出口 67.7 亿美元，下



降6.6%。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对沙特、阿曼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5倍和55.8倍。传统主要贸易伙伴中，对俄贸易保持增长，实现进出口159.1亿美元，增长14.3%，而对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进出口分别下降52.7%、50.2%、17.7%和13.6%。

（三）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

1. 财政收入增幅明显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三省完成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4092.6亿元，同比增长20.5%，高于全国财政增速5.2个百分点。辽、吉、黑三省分别完成2406.8亿元、804.9亿元和880.9亿元，分别增长22.8%、22.1%和16.7%，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6个、6.9个和1.5个百分点。其中，各省各项税收收入均占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辽宁省上半年各项税收1218.3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2.5%，增长了18.8%。前三季度，吉林省各项税收收入589.9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3.3%。截至9月初，黑龙江省税收收入达到812.4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7.2%，增长了18.0%。同时，公共服务类财政预算支出显著增长。上半年，辽宁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87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1%。其中，科学技术支出33.2亿元，增长86.3%；医疗卫生支出88.9亿元，增长2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79亿元，增长12.5%。前三季度，吉林省财政支出合计达1598.16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科学技术支出11.08亿元，同比减少了11.6%；医疗卫生支出104.55亿元，同比增长1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到237.17亿元，同比增长6.1%。截至9月初，黑龙江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778.4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科学技术支出13.5亿元，同比增长66.8%；医疗卫生支出96.7亿元，同比增长23.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4.2亿元，同比增长22.0%。

2.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2012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378元，同比增长14.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6%，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1434元，增长1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5%，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103元，同比

增长14.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9272元，同比增长17.7%，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3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增速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黑龙江省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速略高于经济增速。

二　东北地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2012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引起关注。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调结构、保增长”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协调的产业结构将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老工业基地的特殊地位，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存在二产独大，一、三产业发展不足的产业失衡问题。前三季度，辽宁省三次产业比重为6.65∶54.70∶38.6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49%、56.48%和39.08%，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32个、5.25个和3.63个百分点。吉林省三次产业比重为5.79∶61.75∶32.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9%、67.29%和29.63%，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8个、8.14个和3.59个百分点。但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三产业而言边际产出的比较优势非常显著①，而东三省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显著高于一、三产业，第一产业投资仍然不足的症结严重制约了三次产业间的合理发展。前三季度，辽宁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447.4亿元、7724.3亿元和9219.9亿元，分别增长17.5%、32.3%和23.3%；吉林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14.33亿元、4245.16亿元和3143.91亿元，增速分别为29.4%、33.2%和28.1%；黑龙江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102.91亿元、2594.54亿元和1712.81亿元，分别增长3.7%、35.9%和35.6%。

① 李怀、高磊：《东北三省产业投资结构的协调性检验及修正路径》，《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严重失衡

当前东北三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刺激政策，即靠投资拉动，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201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经济增长 9.3%，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26.52 个百分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1.57 个百分点；吉林省经济增长 12.1%，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7.42 个百分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31.93 个百分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0.45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 9.6%，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消费拉动 GDP 增长 7.09 个百分点，投资拉动 GDP 增长 18.19 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的拉动效应依然显著，居民消费能力虽有所提升，但最终消费始终没有切实调动起来，居民消费率依然偏低、消费的城乡和区域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再加之国际贸易环境的不乐观，东北三省的出口贸易将在长期受到影响，虽然稳定出口的外贸政策会减缓出口下降幅度，但是依然无法改变贸易顺差逐步缩减的趋势。

（三）物价涨幅仍处于高位

2012 年以来，东北三省物价涨幅长期处于高位。其中，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 月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后略有降低，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仅在 0.1～0.2 个百分点之间；1～7 月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后辽宁省物价水平赶超全国平均水平。前三季度，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累计上涨 2.9%、2.7%和 3.2%。其中，辽宁和黑龙江省的物价水平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1 个和 0.5 个百分点，仅吉林省物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物价上涨意味着广大居民货币财富的缩水，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东三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是食品类价格上涨。前三季度，辽宁省食品价格同比累计上涨 3.8%，拉动 CPI 上涨 1.21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41.66%；非食品价格同比累计上涨 2.48%，拉动 CPI 上涨 1.69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58.34%。吉林省食品价格同比累计上涨 5.4%，拉动 CPI 上涨 1.72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63.58%；非食品价格同比累计上涨 1.44%，

拉动CPI上涨0.98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6.42%。黑龙江省食品价格上涨5.8%，拉动CPI上涨1.8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62%；非食品价格同比累计上涨1.99%，拉动CPI上涨1.3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2.38%。

（四）东北三省发展不平衡加剧

首先，东北三省中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2012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643.7亿元，高于黑龙江省的8391.78亿元，显著高于吉林省的7382.56亿元。其次，从各指标的增长水平看，辽宁省和吉林省相对较好，黑龙江省则普遍偏低。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低于辽宁省和吉林省0.1个和4.5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出口总值下降了37.4%，分别低于辽宁省和吉林省47.6个和50.3个百分点；黑龙江省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16.7%，分别低于辽宁省和吉林省6.1个和5.4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各指标增长率的放缓，将进一步加大其与辽宁省的经济差距。

三　加快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区发展

以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为重点，充分发挥产业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和产业集群。依托产业配套能力强和科技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汽车、电子信息、轨道客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采取资源整合、资产重组、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等举措，主动引导产业向集聚区集聚。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哈大齐工业走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等的率先发展，支持沈阳铁西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和大连“两区一带”等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发展，推进黑龙江东部煤电化基地、辽西北煤化工基地和蒙东地区能源重化工基地等专业化特色基地建设。



（二）促进农业现代化率先实现

东北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农业，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具有规模化生产的条件，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具备一定的基础。结合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实施，制定支持东北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提高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能力，促进东北国家粮食战略基地的建设。提高农产品加工生产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化链条不断延伸，创新农产品综合利用能力，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使东北地区的农业优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大力发展县域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既沿边又沿海，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较强，经济联系比较紧密，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条件。但目前，东北经济的外向度还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发展。东北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决定了必须加强与区域外市场的联系，畅通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交换的渠道。抓住全球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全面提升东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水平，注重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和效益，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升东北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层次和地位，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大力推进图们江国际区域深入合作，积极促进长吉图与国内区域联动，进而建立我国东北亚国际开发合作战略高地，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辟新的对俄合作口岸和大通道，加强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构筑起整个东北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四）发挥重点城市群带动作用

东北地区城市规模较小，区域发展缺少特大城市的拉动，但是，目前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若干重点城市群，如辽中城市群、长吉城市带、哈大齐城市带等，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些城市群的形成，对于集聚生产要

素，实现集约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今后，应依托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群，从产业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协调发展、开放合作开发、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不断做强做大，形成支撑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和集聚人口的重点区域，并带动整体地区发展。

（五）加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东北地区应依托环境资源优势，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一些对生态环境压力较小的产业，转变东北地区以原材料生产为中心的重化工高耗能工业产业结构，逐步发展具有高新技术特色的低耗能的装备制造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及软件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各类轻工业，进而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Region and Suggestions

Ding Xiaoyan　Xu Zhuoshun

Abstract: Facing the complicated and grim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Northeast region actively respond to challenges,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pace, maintain a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he report gives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in 2012, and made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theast region; Economic trend;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B.22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均衡性发展研究

李林山　杨青山*

摘　要：

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区位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的影响角度，在构建城市区位测度指标及区域均衡性测度指标基础上，对10年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县级城市区位与县域间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时空演变分析，尝试探讨二者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近年来，区域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均逐渐向长春靠近；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位偏离度总体变小，城市区位趋优。②城市群发展尚处于单中心极化阶段，区域经济要素集聚现象明显；但区域人口趋于扩散，特别是2005年以后，县域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数量的差距反而减小。③影响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状况的内在原因是城市能级的此消彼长的变化。

关键词：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　城市区位　均衡　重心模型

一　引言

区位分析是城市区域分析的基本内容①，城市与区域关系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城乡关系与宏观层面的城市体系关系②。由于自然和历史因素，城市区位具

* 李林山，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与区域规划研究；杨青山，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与区域规划研究。

① 崔功豪：《城市问题就是区域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区域观的确立和发展》，《城市规划学刊》2010年第1期。

② 姜丽丽、王士君、朱光明：《城市与区域关系演化过程及新时代特征》，《经济地理》2009年第29期。

有一定随机性。城市在区域中的位置将影响到以其为节点的一系列城镇和乡村的发展，从而出现不同的区域发展均衡状况。国内对城市区位与区域发展的定量研究成果很多，且多倾向于区域重心间的重叠与跃迁等空间演变对区域经济与人口发展差异的影响①②③④⑤⑥，对城市或城市群在区域中的位置，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讨论略显不足。

评价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关系时，需考虑城市在区域内的空间位置及其到区域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远近。理想地表下，区域重心是对区域影响的最均衡点。城市对区域各点的影响遵循距离衰减原理由城市所处位置向外均匀降低，城市靠近区域重心时，区域边缘受其影响是均衡的；距离远，说明城市偏居一隅，区域边缘受城市的作用力趋向不均衡。同样对于一个由影响力相对均衡的城市群组成的区域，其内部各主体城市分布越均衡，越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均衡，反之亦然。

本文研究范围为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以县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其中主要城市包括长春 1 座副省级城市，吉林、四平、辽源、松原 4 座地级城市以及 22 个县级城市。中心城市长春经济发展优势明显，城市空间扩展已出现郊区化现象。城市群全域总面积 92096 平方公里，2011 年人口 1947.27 万，城市化率为 42.12%，地区生产总值达 7422 亿元，农业与重化工业在吉林省所占比重较高。

二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作为探讨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性时空演变

① 徐建华、岳文泽：《近 20 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地理科学》2001 年第 5 期。

② 冯德显、王雪峰：《中原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 年第 1 期。

③ 毕其格、宝音：《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地理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④ 孟斌、王劲峰、张文忠等：《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中国区域差异研究》，《地理科学》2005 年第 4 期。

⑤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0 年第 1 期。

⑥ 钟业喜、陆玉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经济地理》2011 年第 2 期。



的主要手段，结合2001～2010年的吉林省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信息，对城市区位与区域发展进行定性与定量上的分析与讨论。

在研究城市区位状况时，引入区域重心概念，其重心坐标公式为：

$$\begin{cases} X' = \dfrac{\sum_{i=1}^{n} W_i X_i}{\sum_{i=1}^{n} W_i} \\ \\ Y' = \dfrac{\sum_{i=1}^{n} W_i Y_i}{\sum_{i=1}^{n} W_i} \end{cases} \quad (1)$$

式中，（X_i，Y_i）为区域内次级小单元的中心坐标，W_i 为各小单元对应的某种属性意义上的权重，（X'，Y'）因 W_i 属性不同，表示不同含义。当 W_i 分别为各小区域面积、人口、经济（GDP）时，则空间值（X'，Y'）表示区域几何重心、人口重心、经济重心[①]。

区域重心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平衡点[②]。城市区位相对区域重心位置的地域迁移，成为研究区域均衡性时不可忽视的要素。在测度城市区位时，进一步引入偏离度指数，公式为：

$$I_i = \frac{L_i}{\sum S_i} \quad (2)$$

式（2）中，L_i 表示i城市到区域重心的距离，S_i 表示 i 城市所在子区域面积。若区域重心采用几何重心、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则 I_i 分别表示空间偏离度、经济偏离度、人口偏离度；I_i 值越小，表明区位偏离度越小，城市区位越好。

论文在研究区域均衡性时，引入地理集中指数和集散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是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形，可反映事物的分布状况[③]。

---

① 徐建华、岳文泽：《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地理科学》2001年第5期。

② 刘卫东：《经济重心地域迁移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经济地理》1993年第2期。

③ 张鹏：《中国城市化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

$$G = \sqrt{\sum_{i=1}^{n}\left(\frac{X_i}{T}\right)^2} \times 100\% \tag{3}$$

（3）式中 G 表示地理集中指数，X_i 为区域各县市人口或生产总值，T 为区域总人口或总的生产总值，根据属性数据的不同，得出人口集中指数或经济集中指数。G 越接近 100，人口或经济越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反之，G 越小，分布越分散。

集散度：反映区域内人口集聚和分布状态的空间结构指标，是指人口与劳动力集中在城市中或分散于较小的非城市地区的程度①。

$$D_i = \left(1 - \frac{\sum S_i}{S}\right) \times 100\% \tag{4}$$

其中，D_i 为集散度；S_i 为区域各县级及以上城市人口规模；S 为该区域总人口。D_i 值越大，说明人口分布越趋于分散于广大农村地域，区域内的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小，城市化率越低；D_i 值越小，说明人口分布越趋于集中分布在一个特别大的首位城市或是集中分布在多个中心城市内。

三　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分析

（一）区域重心的时空演变

根据公式（1）输入十年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面积、人口、经济数据，计算得出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几何重心及 2001 ~ 2010 年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时空演变（表 1）。

（1）吉林省中部城市群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距离几何重心偏离均较小，经济重心偏南分布，人口重心略偏离于北部，表明区域人口与经济要素总体的空间分布相对合理。

（2）城市群人口重心分布于九台市西南，年际变动小，2002 年和 2003 年、

① 吴计生、刘惠清：《吉林省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发展》，《区域经济》2005 年第 2 期。



表 1　2001～2010 年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重心时序演变

年份	经济重心		人口重心	
	纬度	经度	纬度	经度
2001	43.973	125.600	44.032	125.540
2002	43.963	125.601	44.032	125.538
2003	43.964	125.606	44.032	125.538
2004	43.964	125.599	44.031	125.534
2005	43.969	125.507	44.035	125.535
2006	43.981	125.493	44.029	125.530
2007	43.973	125.511	44.027	125.527
2008	44.012	125.535	44.027	125.527
2009	43.990	125.452	44.031	125.527
2010	43.983	125.537	44.027	125.521

2007 年和 2008 年人口重心几乎未发生变动。一方面与该区域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等地理优势有关，另一方面，该区域作为粮食主产区，农业从业人员占较大比重。“离土不离乡”的乡土观念和中小城镇低水平城镇化率，限制了区域人口的自由流动①。

（3）相较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变动更活跃，2001～2004 年距离几何重心较远，偏离最大距离达 7.13 千米；2005～2010 年逐年靠近区域几何重心，2009 年长春 GDP 达到十年来最高的 2501.3 亿元，受其影响，经济重心向西偏离几何重心 4.49 千米，位于长春东北部境内。

（二）县域城市区位测度分析

据公式（2）的城市偏离度指数，测算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各县级城市的区位状况，运用 ArcGis 的自然断裂法对 2010 年城市区位偏离度进行分级（表 2）。

1. 城市经济偏离度

城市在区域中的位置，将影响到区域发展间的均衡。长春位于区域经济重心附近，城市经济偏离度随着距离长春的增加而趋高。长春偏离度为 2.05，为微度偏离；外围的农安、德惠、公主岭、伊通、永吉、吉林为轻度偏离；四

① 王秋影、徐效坡：《吉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经济地理》2008 年第 1 期。

表2 2010年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城市区位偏离度分级

	城市人口偏离度	城市经济偏离度
微度偏离	0～1.93	0～2.05
轻度偏离	1.93～9.46	2.05～9.17
中度偏离	9.46～14.07	9.17～14.17
高度偏离	14.07～16.27	14.17～14.06
重度偏离	16.27～18.44	14.06～18.66

平与辽源为中度偏离，松原为高度偏离；经济区位最差的城市是边缘的双辽、乾安，偏离度值为18.66和17.99，为重度偏离。

2. 城市人口偏离度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城市人口区位与经济区位有较高的空间耦合性，城市人口偏离度同样遵循以长春为核心向外递增的规律。省会长春人口区位为微度偏离，周边城市除九台外，均为轻度偏离；吉林为轻度偏离，四平与辽源为中度偏离，松原为高度偏离；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是双辽、乾安、蛟河、桦甸、松原、东丰。

（三）区域均衡发展系统分析

1. 区域均衡性动态时序分析

选取地理集中指数和集散度作为县域经济与人口差异年际变动指标，得出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经济与人口变动趋势（表3）。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吉林省中部地区经济集中指数逐年提高，表明区域经济集中现象日益明显，县域经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人口流动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和经济集中指数逐年上升不同，人口集中指数在2001～2003年上升，表明此时期的人口县域间的流动明显，县域之间的差距增大；2003～2010年则大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人口县域间趋向于均衡。通过分析人口集散度指数，可以看出，2001～2005年，吉林省中部地区人口由乡村流向城市，2005年以后，城市群集聚人口的能力降低，城乡人口流动波动性明显。第一，县域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现象，均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大小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相



伴而生，而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则大大影响到人口的自由流动[①]，特别是当跨越行政归属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移动阻力较大。第二，前文提及吉林省中部地区作为粮食主产区，第一产业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束缚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吉林省中部城市群除去长春、吉林外，其他城市发展缓慢，城市化动力不足，一些县级城市人口甚至连年减少，如梨树县，城市人口由2001年的19.7万连年减少到2010年的16.55万。第三，区外的良好发展契机，均吸引着该区域城乡人口的外迁，特别是年轻人的外出工作定居，使得区内人口流动势能不足。

表3　2001～2010年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均衡性指标分析

年份	经济集中指数	人口集中指数	集散度
2001	25.34	42.07	59.87
2002	25.42	42.74	59.48
2003	25.53	42.81	60.17
2004	25.63	42.35	58.17
2005	26.18	40.76	58.16
2006	26.46	40.09	58.27
2007	26.66	39.00	58.33
2008	26.66	39.36	58.29
2009	26.65	38.71	58.36
2010	26.63	36.75	57.98

2. 区域均衡性空间分析

进行区域均衡性空间分析时，从经济、人口、土地三要素考虑，选取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选取2001年、2005年、2010年的截面数据，采用ArcGis矢量分析获得三个时间断面的区域要素密集度分布状况。

2001～2005年，区域发展体现出中心极化、外围弱化的空间分异现象。中心城市经济极化，经济密度提高显著，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仍处于较高的经济密度分级之列；中心城市周边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处于第二、三等级，如长春外围的农安县、九台市、德惠市，吉林南部的永吉县、磐

①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期。

石市，四平北部的公主岭市，东北的伊通县；区域边缘的县市，缺少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发展相对滞后，县域间的差距有所减小，分级趋于弱化，如前郭县、双辽市、梨树县、桦甸市等均由第四等级降至最低等级。区域人口总体变动趋势不明显，长春、四平、辽源的人口密度增加明显，外围的九台市、德惠市、公主岭市人口密度与中心城市的差距增大，等级下降，表明中心城市人口的集聚作用显著。吉林人口密度略有增加，永吉县、磐石市均有减小，等级下降，而桦甸市、舒兰市等近吉远长地区，人口密度反有增加，表明吉林市人口流动受长春集聚影响大于吉林。松原区位不佳，偏居一隅，同时发展相对滞后，对人口吸纳的能力有限，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684人下降到472人，外围的前郭县、乾安县、扶余县人口密度均有增加，松原市域人口空间分异明显趋缓。

2005～2010年，城市经济中心性更加明显，长春和吉林仍是该区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在全区处于最高水平，且呈一体化趋势，带动周边地区连片发展。四平和辽源受限于资源不足或资源枯竭，发展后劲不足，与周边县市总量经济差距缩小，市域范围经济均衡性提高，但由于四平、辽源面积较小，相对于外围县市，仍有着较高的经济和人口密度；全区沿东北－西南向大致形成中高周低的空间分异的趋势，西部的长岭县和东部的蛟河市经济密度相对较低，分别为每平方千米212万元和282万元，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外围经济差异仍处于弱化趋势，但已由低水平均衡向较高水平均衡过渡。这个时期人口流动总趋势同样不够明显，除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均发展成为区域性人口增长极，长吉一体化地区形成较完善的城镇体系，除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外，榆树市、德惠市、舒兰市、永吉县、磐石市、公主岭市、伊通市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与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差距拉大。松原市由于缺乏区域性增长极，人口的区内流动仍较弱，但松原的人口密度下降趋势降低，人口流失得到有效缓解。

四　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关系研究

（一）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性的相关分析

利用表3中的地理集中指数和集散度指标数据，结合中部城市群县域



城市区位评价指标，对城市偏离度与区域均衡性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见表4）。

表4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城市区位与地理集中指数的相关系数

	经济偏离度	人口偏离度	经济集中指数	人口集中指数	集散度
经济偏离度	—	0.988**	-0.911**	0.910**	0.600
人口偏离度	0.988**	—	-0.876**	0.896**	0.564
经济集中指数	-0.911**	-0.876**	—	-0.907**	-0.671*
人口集中指数	0.910**	0.896**	-0.907**	—	0.535
集散度	0.600	0.564	-0.671*	0.535	—

注：**表示相关系数的显著水平为0.01，*表示相关系数的显著水平为0.05。

（1）测度城市区位的指标（经济偏离度、人口偏离度）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城市区位状况与区域重心有关，吉林省中部城市群长春居中（距离区域几何重心仅21.55千米），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围绕长春大致均匀分布（距四城市分别为97.9千米、111.8千米、102.6千米、163.0千米）的位置特殊性使得区域几何重心与经济重心、人口重心之间彼此偏离不大，且变动一致。

（2）城市区位与经济集中指数有着较高的负相关性，与人口集中指数则呈现正相关性，与集散度呈现弱相关性；经济集中指数与人口集中指数和集散度均呈较强的负相关。城市区位的改善，表明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影响力提高，且各级城市有较合理的等级规模结构，但吉林中部城市群现在仍处于单中心极化阶段，首位度较高。首位城市位置居中的特殊性，使得城市群区位总体改善，城市偏离度降低，但县域经济由于中心城市极化，差异明显，趋向不均衡；人口则仅在长春近域内集聚，距离较远的县市因城市发展乏力，如辽源等城市面临资源枯竭危险，对人口的极化并不明显，出现城市人口向区域外迁移，县域之间、城乡间人口差距减小现象，使得全区人口更趋向于均衡。

（二）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

区域重心的测算建立在各子区域的各项权重（面积、经济、人口）基础

之上，子区域的发展规模影响到区域重心的跃迁，而区域重心至城市的距离是城市区位的评价依据，因此子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最终影响到城市区位的变动；同时子区域的发展规模显然是区域发展差异的外在表现。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是影响一个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的发展，城市辐射强度既使区域发展产生差异，又使区域差异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而影响城市辐射强度的内在因素即城市能级的强弱，因此，城市能级是影响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内在机制。单中心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意味着区域的重心位置以及区域的发展方向；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与势能，主导着区域重心的跃迁，影响各级城市偏离状况及区域均衡发展；多中心区域，各级中心城市的规模差异及空间位置的合理性则是城市偏离度与区域均衡性的主导因素。

五　结语

城市通过对外围区域的要素剥夺或辐射带动，对区域的均衡发展产生着影响；城市群区域的发展均衡状况则受到各级城市体系合力影响。具体表现在均质区域各点随着距离中心城市远近，受到的剥夺或带动不同，城市近域最易受其影响，远程距离衰减。因此城市在区域中的位置及城市群各级城市分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区域发展的均衡状况。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域经济重心、人口重心距离几何重心偏差较小；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及长春区位的优越性，该区域以长春为核心城市，主导区域发展的局面仍将维持，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将进一步靠近长春，各级城市区位偏离度总体趋向减小。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尚处于城市空间扩张、城市化进程上升的阶段，区域以城市为节点，以要素集聚为主，区域经济要素空间流动频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当前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人口尚处于中心城市集聚阶段，首位城市集聚能力有限，未来较长时间内，人口仍以广域上的原始分散为主，均衡状态尚难以打破。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城市区位与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状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根源在于城市能级的变化，各级城市能级之间的博弈，是区域重心发生跃迁的主导原因，同时城市能级的此消彼长又左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



The Central Jilin Urban Agglomeration Bal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Li Linshan   Yang Qingshan

Abstract: Take Jilin provinc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effect of city location on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by constructing the measure index of the city location and regional balance index, the paper analysis the time and spatial evolution about ten years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s county level city 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counti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The result shows that: ① In recent years, the regional economic center, population center are all gradually near to Changchun; the city location deviation overall decreased and goes well. ②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still in single center polarization phase, the phenomenon of regional economic element agglomeration is obvious; but regional population tends to disperse, especially after 2005, the population gap between coun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l decreases. ③ The internal impact on city location and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shift change of the city level.

Key Words: Jilin province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City location; Balance; Gravity model

B.23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

张 磊　李冬艳*

摘　要：

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大省实现经济腾跃、向农业强省转型的跳板。本文旨在通过对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探索加快推进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　东北地区　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支撑，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于一体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模式。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要求下，在“十二五”时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内，东北地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意义重大，国务院2012年3月出台的《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政策性基础，这些都为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崭新的机遇。

---

* 张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区域经济；李冬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一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发展，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总体上进入了创新阶段。东北地区处在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农业产业化也不断呈现新特点，其在推动东北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龙头企业日益发展壮大，辐射带动能力增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连市场下带农户，是带动农民增收的龙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东北地区以培育、扶持、壮大龙头企业为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2011 年，吉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492 户，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7 户，分别比 2010 年增加 68 户和 13 户，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 176 户，带动种植基地 3700 余万亩，畜禽养殖基地规模饲养量近 5 亿头（只）。2012 年前三个季度，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2815 亿元，同比增长 16.4%。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与汽车、石化三足鼎立的支柱产业。2011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718 个，年销售收入 4317.2 亿元，利税 299.5 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 68.4 万人，带动农民 395 万户，农民人均从产业化链条中实现收入 3040 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6.6%。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7301 亿元，成为辽宁省第二大支柱产业。2011 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500 个，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326 个，国家级龙头企业 36 个，带动种植基地面积 9000 万亩，参与经营农户达到 300 万户。农产品加工业以绿色食品加工为主导，2011 年新建、续建投资亿元以上绿色食品加工项目 191 个，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 435 亿元，增长 45%；实现利税 42.9 亿元，增长 21.5%；绿色食品产业牵动农户 15.2 万户，增长 5.0%。

（二）产业化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主导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农产品生产基地是企业生产的基础和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联结农

户的有效载体。东北地区重视与龙头企业相配套的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发展基础得以夯实。吉林省重点建设中部松辽平原粮、畜生产基地，东部山区、半山区林、特、药生产基地和西部松嫩平原牧、经生产基地等三大类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以玉米、水稻、大豆、生猪、肉牛、禽蛋、乳品、中药材、蔬菜、林特产品等十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体系。黑龙江省2012年投资192亿元重点发展粮食、马铃薯、乳品、生猪、肉牛、蔬菜、山特产品等七大产业，并根据粮食作物生长特点在松嫩平原一、二积温带建设优质玉米生产基地，优质水稻生产基地集中于东部三江平原、江河沿岸和山间谷地；北部四、五积温带建设优质大豆生产基地。以畜牧业生产大县为依托，建设生猪、奶牛和肉牛等基地。目前全省玉米生产基地达到7000万亩，水稻、大豆生产基地各4000万亩，奶牛存栏、生猪出栏分别达到239万头和3055万头；基地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养殖比重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预计到2015年，全省还将建成蓝莓原料基地125万亩，鲜果采摘量达到4万吨。同时引导龙头企业自建基地，从根源上控制农产品质量。辽宁省从2011年开始全面实施新增45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加快昌图等36个国家级粮食大县产能建设，实施优质水稻提升工程、以花生为主的油料建设工程，培育阜蒙、黑山等花生产业示范县，把阜新市建设成全国重要的花生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把朝阳市打造成全省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市。同时，加强仓储设施建设，推进农户科学储粮工程，保障粮食有效供给。

（三）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良好，利益联结方式不再单一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解决农民面向市场化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手段，使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的沟通更加便捷，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2011年东北地区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5万余个，有会员近200万人，覆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服务业等多个生产经营领域，带动农户近60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统购、统产、统销，不但减少了中间环节，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保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吉林省白山市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基础上，发展专业农场，进一步加快了农业实现标准化生产、集约化和品牌化经营的步伐。“公司＋



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联结企业与农户的纽带，使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基地以及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根据农户提供的产品数量返还利润、鼓励农民利用土地或资金入股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合作社成立党支部，保证合作社的正确发展方向和合作社集体性质的本质，在农产品滞销的情况下，专业合作社党支部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有效降低种植户损失程度。

（四）品牌培育成效显著，市场开拓能力提升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有利于农业企业借助品牌效应实现联合，扩大龙头企业规模，资源配置实现最优，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吉林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品牌体系建设，注重生态品牌、特色品牌和原产地品牌的建设和保护。2011 年吉林省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名牌农产品认证的国家级品牌数量 62 个，吉林黄玉米、绿色大米、畜禽加工产品、山野菜、中药材和有机杂粮杂豆等，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牌。黑龙江省积极引导具有传统地方特色和独特品质的农产品进行地理标志注册，现有“五常大米”“庆安大米”两件著名商标；“小兴安岭大森林”也已成功注册集体商标，实现了零的突破，现有中国驰名商标 13 件，省著名商标 125 件。同时注重创新理念，以区域地理理念、资源优势理念树立区域品牌形象。“寒地黑土”品牌就是利用东北地区独有的气候和土壤特征命名，体现寒地黑土物产所特有的品质和区域文化等特色，成为东北地区黑土区域的公用商标。辽宁省注重地理标志商标和出口品牌的培育，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44.2 亿美元，增长了 23.2%。地理标志注册商标达 39 件，实施“公司＋商标＋农户”商标富农战略，鸭绿江米业集团的“鸭绿江”品牌价值达 3000 万元，产品出口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东港草莓”已被评为全国百强品牌，仅品牌价值已逾 10.5 亿元，年出口草莓制品 3 万吨，创汇 3000 多万美元，出口量及草莓制品创汇额均占全国 20% 以上。

二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扶持政

策、龙头企业发展、科技创新、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发展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近几年，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但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不足，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农比重较低的前提下，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就会少之更少。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中用于企业发展、企业技术改造等各类专项资金向农业产业化项目和龙头企业倾斜少。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没有真正形成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同时缺乏对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合理指导。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涉农产业化项目贷款难，办贷审批程序复杂，贷款规模小，龙头企业扶持贷款在涉农贷款中所占比例较低，季节性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尚未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抵押担保形式单一，贷款抵押物范围狭小，企业诚信意识淡薄等都增加了龙头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税收政策有些地方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值税进销项税率不统一，存在“高征低扣”的问题。税种上的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上，对农产品流转方面的税收优惠不多，且优惠政策的措施单一。

（二）大型龙头企业偏少，农产品加工层次偏低

近年来，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大龙”少、“小龙”多，龙头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十分单薄，年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上的大型龙头企业屈指可数，辽宁省辉山集团作为辽宁省最大的乳品企业，其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同伊利、蒙牛等同行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缺乏竞争优势，在我国乳产品企业中仅排在第16位。农产品加工层次还比较低，粗加工多、精深加工少，加工转化增值率低，产品附加值不高。东北地区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50%左右，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一般都在80%以上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流通企业是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键环节，起着不容



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在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重”加工型龙头企业而“轻”流通型龙头企业的发展，导致企业结构不够合理。虽然集群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大群体、小规模，聚而不集”的缺点，相互之间产业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链条不够完善，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

（三）分散式家庭经营有局限，农业产业化进程延缓

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经营的主体，它实现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飞跃。然而，在30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土地承包地块细碎，不利于规模经营，制约土地生产率提高和延缓农业产业化进程，根据测算每个农村劳动力耕种4.7公顷可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吉林省为例，农村户均耕地1.36公顷，是全国农村户均耕地较多的省份，但农村劳动力人均却仅有0.76公顷。同时，土地流转行为过于自由化制约土地流转稳定性且由土地流转引起的纠纷较多。农户现行土地流转主要是自愿、分散进行，靠亲属或熟人转包，流转期限较短，流转手续不规范，流转分散，难以向种养大户或种养能手集中流转，流转中政府协调引导机制缺失，土地流转双方的长期利益平衡点难以有效对接。

（四）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缺乏内生动力

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目前，很多龙头企业的发展过分依赖廉价的资源要素，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科技投入低，50%以上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销售收入的1%，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总体科研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20年。一些龙头企业长期处于低水平技术层面上，缺乏核心生产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造成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产品品质雷同，形成了在相同水平线上的互相重复，企业间形成恶意竞争，致使核心竞争力不强，在市场竞争中难以保持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玉米加工为例，目前，生物技术、电子智能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玉米加工行业，但在东北地区应用这些技术的加工企业却较少。科研环境差，缺乏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产学研链条联结不紧密。科学研发、技术推广及农业科技创新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匮乏，根据对8300多家

省级龙头企业调查，龙头企业科技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3，有高级职称的仅占6%，有中级职称的占19.9%[①]。科学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有待建立，企业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未被充分激发。

（五）农户组织化程度不高，经济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快，农民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多数农民合作组织成立时间较短，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近年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只注重数量上的快速增多忽视其质量和规模，很多合作社有名无实，从吉林省延边州调研来看，在232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够建账运作的不足30%。合作社规模小，服务层次低，带动功能弱，游离在产业化组织之外的农户所占比例较高，缺乏市场竞争力。有的即使建立了“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组织，但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和农户之间也只是简单松散的经济联合体，利益联结不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不规范。订单农业为农户规避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但企业或农民违约合同现象时有发生，农企矛盾突出，同时农民获得保护的也仅仅是生产价格，进行再次分配的“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建立，农户无法获得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中增值的高额利润，农民增收幅度较小。贸工农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没有真正形成。农户重生产、轻流通，企业重销售、轻生产，出现产加销脱节、贸工农分离，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不多，有的产业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经常发生。

三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因地制宜，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经营农业、发展农业，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破解资金难题，扩大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推动产业集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科技创新能力，在新形势下推进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跨越式发展。

---

① 何定明：《2012龙头企业加力科技创新》，2012年1月17日《农民日报》。



（一）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境

国家及省政府要完善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税收、融资等保障政策体系，保证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大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的投入力度，改变财政支出结构，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各级相关部门的专项资金要重点向大型龙头企业、支柱产业、农产品生产基地投入。政府部门主动牵头完善农业产业化社会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出资建设公益性强的农业产业化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农业产业化担保公司，完善信贷担保体系，金融部门应适当放宽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担保低押条件，减少各种金融办理手续，为农产品加工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政策，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务负担，制定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创业优惠各项扶持政策，扶持中小加工企业加快发展步伐。

（二）实行龙头企业凝聚融合，打造东北地区农业产业领军地位

引导壮大龙头企业，加大品牌形象建设，积极通过融资整合增强企业能力。东北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间要加强资源整合，实现产业集群发展，通过实施融资、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组建在全国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和极大带动能力的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扩大产业规模，提高整体竞争力。积极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和驰名商标申请，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三品一标”产品认证步伐，扩大“三品一标”农产品基地数量，进一步加强农业品牌的开发、保护、宣传和推介，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积极开拓东北地区农产品在东北亚乃至全球的知名度，增加知名名牌农产品的数量，提高农产品出口份额。选择一批潜力突出、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竞争优势明显的龙头企业、大型农产品加工项目，重点在玉米、水稻、大豆、乳品、人参、蔬菜和精品畜牧、绿色特色林特产品上进行精深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产品增值，使东北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带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加快土地流转，建立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性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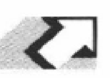
件。根据东北地区不同地域特点，因地制宜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进程，特别是要借鉴黑龙江垦区农业土地流转经验做法，在东北三大平原地区探索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方式，通过租赁、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多种运作模式。土地面积少的农户之间可以实行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入股，建立合伙经营土地模式；农村经济能人可以带头组建土地规模经营公司，农户以土地使用权，非农户以资金设备或技术入股。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加快培育一批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为代表的土地规模经营主体，稳步扩大规模经营面积，重点宣传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建设一批规模大、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

（四）增强技术创新协作能力，提升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科技支撑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原动力，农业技术推广在农户的有效落实是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活力再现。创新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的产业化，最有效的途径是整合东北地区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重点农业企业的科技推广资源，实现技术资源共享共用工程，引导和促进东北地区现有农业研究推广机构和大型农业生产流通企业发挥各自优势进行相互融通协作，提高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力。促进有条件的基础农业科研机构向应用型农业科技推广转型，大型农业企业提高农产品自主研发应用能力，促使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部分农业科研机构与生产资料生产企业联合组建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发展模式，建立种子、化肥和农畜产品生产、销售、研究、技术推广服务一体化企业运行公司，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提高科技服务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五）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运行机制，释放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能量

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长期有效运行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核心，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上企业和农户之间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



制。政府要为农民学习知识和技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扩大农村职业学校对农民的培训范围，通过提高自身整体素质来提高农民参与竞争的能力，农村种植大户、党员等要率先积极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来，通过提高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合作社等沟通媒介组织数量质量来增强农户自身参与市场组织化程度；深入推行农产品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经营管理规范化的“三化”合作社活动；大力发展“公司 + 基地 + 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通过合作社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龙头企业可以吸收基地农户参与公司入股，实行股份合作经营，风险公担，利润按股份分红，适当提高农户的比较利益；企业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提供各种生产服务，按优惠价格或保护价收购农户的产品，切实保证农户的根本利益来实现企业和农户利益长期稳定共赢。

Research on Issu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Northeast Area

Zhang Lei　Li Dongyan

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ynergism, farmer'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measur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issues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Northeast Area; Leading Enterprises

B.24
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分析

纪明辉　丁晓燕*

摘　要：

东北地区抢抓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机遇，坚持科学发展，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积极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经济社会发展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本报告对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小康建设的薄弱点，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东北地区　小康社会建设　进程分析

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小康"的概念，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0多年中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追求的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更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目标。对东北地区建设小康社会情况进行分析，找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小康建设的薄弱点，对推进东北地区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分析

为全面反映我国及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状况，国家统计局研究制定

* 纪明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软科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丁晓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软科学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宏观经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方案中监测的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六方面，通过计算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实现程度60%为总体小康，100%为全面小康。我们利用此方案及其数据，对东北地区小康社会建设进行评价。

（一）总体进程逐步加快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稳步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从2000年的60.3%提高到2010年的82.3%，提高了22个百分点，2010年比2009年提高0.7个百分点。从增速上看，东北地区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速为2.64%，比“十五”时期的1.76%的年均增速高出0.88个百分点。在2010年，辽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首次超过85%，吉林省首次超过80%，黑龙江已接近80%。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快于全国

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2000年的0.7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的2.2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四大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年均提高百分点由高到低分别是东部2.14个百分点、东北1.76个百分点、中部1.71个百分点和西部1.21个百分点，但是在“十一五”时期，由高到低的顺序变为中部2.73个百分点、东北2.64个百分点、东部2.59个百分点和西部2.43个百分点。可见，东北地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在保持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增长速度也较快。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实现程度达到100%的指标比全国（5个）分别多5个、3个和1个。

表1　东北地区与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比较

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　国	59.6	60.7	61.8	63.0	64.8	67.2	69.9	72.8	74.7	77.5	80.1
东　北	60.3	62.0	63.9	66.0	67.6	69.2	72.2	74.9	77.5	80.5	82.3
与全国差	0.7	1.3	2.1	3.0	2.8	2	2.3	2.1	2.8	3.0	2.2

（三）六大方面均有大幅提升

2010 年比较 2000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体系的六个方面均有大幅提升。三省在六大方面实现程度平均提升幅度分别为 22.2%、19.0% 和 19.3%。经济发展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31.2 个、22.4 个和 27.1 个百分点，辽宁和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在六大方面中增幅最大。社会和谐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25.7 个、30.2 个和 21.6 个百分点，吉林省在社会和谐领域表现最突出，在六大方面中提高最大。生活质量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25.1 个、24.5 个和 23.4 个百分点。民主法制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19.3 个、20.0 个和 14.6 个百分点。文化教育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17.1 个、5.2 个和 11.4 个百分点。资源环境方面，辽、吉、黑三省实现程度分别提高 14.8 个、11.4 个和 17.4 个百分点。

表 2　辽、吉、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大领域实现程度情况

单位：%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2010 年	2000 年	提高幅度	2010 年	2000 年	提高幅度	2010 年	2000 年	提高幅度
经济发展	91.2	60	31.2	75	52.6	22.4	78.2	51.1	27.1
社会和谐	90.2	64.5	25.7	86.3	56.1	30.2	85.1	63.5	21.6
生活质量	87.7	62.6	25.1	81.1	56.6	24.5	76.9	53.5	23.4
民主法制	89.4	70.1	19.3	93.6	73.6	20.0	93.8	79.2	14.6
文化教育	75.9	58.8	17.1	80.2	75	5.2	64.3	52.9	11.4
资源环境	75	60.2	14.8	77.4	66	11.4	80	62.6	17.4

（四）多项指标实现突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的 23 项指标中，东北地区在越来越多的指标上取得突破，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实现程度达到 100% 的指标增多。2010 年，辽宁省有 10 项指标实现程度达到 100%，其中，人均 GDP、城镇人口比重、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 4 项指标是在“十一五”时期新增加



的。吉林省2010年有8项指标实现程度达到100%，其中5项指标是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100%实现程度的，这5项指标分别是失业率（城镇）、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和耕地面积指数。黑龙江省有达标的指标共6项，比2000年增加了3项。二是实现程度未达到70%的指标减少。辽宁省2010年未达到70%的指标有3个，比2005年减少了5个。吉林省实现程度未达到70%的指标有5项，比2005年减少两项。黑龙江未达到70%的指标有两项，比2009年就减少了两项。

二　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要建设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所以只是某几方面的发展就不能说是全面的和均衡的。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情况良好，呈现六大方面的特点。

（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随着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经济累积效应和改革效应的不断释放，东北地区经济始终保持着稳定较快增长。2010年，辽、吉、黑三省的经济发展实现程度分别为91.2%、75.0%和78.2%。黑龙江省略高于全国平均，吉林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则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5.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是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辽宁省人均GDP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程度达100%，比上年高0.2个百分点。吉林省和黑龙江的人均GDP指标分别比全国水平高11.3个和12.4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个和8.7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化进程加快。辽宁省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2.15%，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15个百分点，实现程度连续3年保持在100%。吉林省城镇人口比重为53.36%，实现程度为88.9%，与上年持平。黑龙江城镇人口比重逐年稳步推进，2010年该比重为55.7%，实现程度为92.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三是就业与再就业工作扎实推进。东北地区三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辽宁省实现程度连续6年保持在100%，吉林和黑龙江自2000年以来实现程度均为100%。

东北地区三省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以下两指标上的表现却很薄弱。一是科技投入出现萎缩，实现程度不尽理想。辽、吉、黑三省2010年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1.56%、0.87%和1.19%，而2009年的水平分别为1.53%、1.12%和1.32%。辽宁实现程度比上年微弱提高1.2个百分点，而吉林和黑龙江则均出现下降，分别降低9.7个和8.7个百分点。二是服务业发展依然乏力，结构调整有待优化。服务业一直是东北地区经济短板，相比于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态势，第三产业明显乏力。2010年，辽、吉、黑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实现程度分别为74.2%、71.8%和74.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均比上年出现下降，降低幅度分别为3.4个、2.0个和4.2个百分点。

（二）和谐社会建设进展顺利

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各阶层、各群体、各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以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来促和谐，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教育的性别平等来筑和谐。东北三省在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快速提升，辽、吉、黑三省社会和谐实现程度分别为90.2%、86.3%和85.1%，均高于全国平均，比上年提高2.3个、2.2个和1.4个百分点。具体指标的表现稍有差异。一是收入分配情况较好。辽宁省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387，除2007年外，2000年以来各年实现程度均为100%。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基尼系数自2000以来实现程度一直保持100%。二是城乡一体化进程较顺利。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其中，辽宁省实现程度连续3年保持在100%，吉林和黑龙江则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100%。三是区域经济发展始终注重均衡性与协调性。三省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也达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辽宁省该指标实现程度达到100%连续保持了10年，吉林省连续保持了11年，黑龙江省有波动趋势，在2000~2010年的11年中，有5年未实现目标，其余年份均达到100%。四是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稳步提高。东北地区积极加快实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辽宁省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达到76.1%，高于全国3.3个百分点，与上年基本持平。吉林省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为



70.7%，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黑龙江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为65.3%，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五是女性受教育权利保障性逐步提高。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差异系数的实现程度分别是98.6%、90.3%和94.8%，分别比上年提高11.6个、-2.6个、2.3个百分点，吉林省实现程度有所降低，而且三省该指标的实现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需要进一步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利。

（三）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改善

全面小康就是不仅要保持经济总体的快速发展，更要把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实现程度分别为87.7%、81.3%和76.9%，分别比上年提高2.5个、2.3个和2.3个百分点。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水平有很大提高。辽宁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2007年超过50%、2008年突破60%、2010年达到74.3%。吉林省和黑龙江省20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分别为59.5%和55.7%，比上年分别提高4.5个和4.3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消费结构更加合理。辽宁和吉林的恩格尔系数实现程度自2005年起连续6年达到100%，黑龙江自2001年起连续10年达到100%。三是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201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实现程度分别达到84.2%、77.5%和70.9%，比上年分别提高0.4个、1.6个和2.9个百分点。四是医疗卫生水平稳步提高。辽宁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两项指标实现程度分别自2007年和2006年起连续4年和5年保持100%。吉林省这两项指标实现程度分别自2003年和2008年起连续8年和3年保持100%。2010年黑龙江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实现程度为90.0%，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平均预期寿命实现程度97.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四）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健全

东北地区一直不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推进平安建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辽宁省民主法制实现程度2007年超过80%，2010年接近90%，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民主法制在全部六大监测子系统中实现程

度最高，2010年分别为93.6%和93.8%，比上年分别提高0.6个和1.2个百分点。所包含的两项指标表现也较好。一是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较高。通过不断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辽、吉、黑三省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实现程度均达到91.1%的水平，分别比上年提高11.1个、1.1个和1.1个百分点。二是社会安全指数平稳提升。东北三省平安建设成效显著，城乡社会生活总体上安全有序。2010年，辽、吉、黑三省社会安全指数实现程度分别为88%、95.7%和96.1%，比上年分别提高0.4个、0.2个和1.4个百分点。

（五）文化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

东北三省文化产业稳步推进，教育事业长足发展。2010年，辽、吉、黑三省文化教育实现程度分别为75.9%、80.2%和64.3%，分别比上年提高3.3个、2.5个和2个百分点。一是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中有升。辽宁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程度为61.6%，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吉林省该指标实现程度为74.2%，与上年基本持平。黑龙江省该指标实现程度为42%，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二是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有较大提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实现程度分别为70%、67.4%和68%，分别比上年提高7个、7.9个和1.1个百分点。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有突破。通过有力措施保障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辽宁和吉林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程度首次突破90%，分别达到92.1%和90.4%，黑龙江该指标实现程度为85.4%，三省分别比上年提高2.8个、3.3个和0.4个百分点。

（六）资源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通过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积极推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经济模式，东北地区资源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发展仍不稳定，实现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010年，辽、吉、黑三省资源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75%、77.4%和80%，辽宁实现程度略有下降，比上年降低0.4个百分点，吉林和黑龙江省分别比上年提升1.2个和1.4个百分点。辽宁和吉林的资源环境小康实现程



度低于全国平均，黑龙江比全国平均略高出1.2个百分点。从具体指标来看，辽宁和吉林的单位GDP能耗分别为61.3%和66.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9.5%），黑龙江此项指标实现程度为79.9%，比全国平均高出10.4个百分点，说明黑龙江省的节能减排效果比较显著，与上年相比，吉林省提高3.3个百分点，辽宁和黑龙江分别降低了0.6个和0.8个百分点；三省的耕地面积指数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自2000年均保持100%的实现程度；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的环境质量指数实现程度分别为75.8%、77.1%和73.4%，辽宁和黑龙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也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4个百分点。

三　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

总体上看，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按照2000~2010年年均2.0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测算，预计“十二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将突破90%，基本实现全面小康。从三个省份各自的增长速度测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个、1.8个和1.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末将分别达到97.1%、89.2%和85.5%的实现程度，辽宁将基本实现全面小康，吉林和黑龙江接近实现全面小康。到2020年，辽宁省可实现全面小康，吉林和黑龙江的实现程度将分别达到99%和98.5%，与全面小康还有差距。还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从经济社会指标的发展趋势看，还是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小康进程看，目标越接近，困难越增加，速度越放缓，尤其在实现程度突破90%后，提升速度将明显放缓。而且，辽、吉、黑三省均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有些是个别的，有些是共性的，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东北三省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实现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该指标实现程度为62.3%，要按时完成目标，需年均提高3.8个百分点，而自2000年以来该指标实现程度年均仅提高2.7个百分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有难度。吉林省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实现程度仅为35%，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一半，需要年均增速达到 6.5 个百分点才能按时完成指标，从 2000～2010年情况看，年均增速在 6.8 个百分点，但该指标实现程度波动较大，“十一五”时期就升降数次，期末比期初实现程度还低，实现基础尚不牢固。黑龙江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实现程度 47.5%，达标程度不到一半。到 2020 年完成小康目标，需要年均增速 5.3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年均增速仅为 2.8 个百分点，可见任务相当艰巨。

（二）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现程度达到 86.2%，辽、吉、黑三省该指标实现程度则分别低于全国水平 12 个、14.4 个和 11.8 个百分点，差距非常明显。辽宁省要按时完成小康目标，实现程度需年均提高 2.6 个百分点，而自 2005 年起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实现程度年均下降 1.5 个百分点，与目标值的差距不减反增，实现目标难度较大。吉林省要按时实现小康目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现程度需要年均提高 2.8 个百分点，但是 2000～2010 年间，该指标实现程度由 80.3% 降低到 71.8%，其中仅有 3 个年份出现微弱的增长。黑龙江省该指标到 2010 年实现目标也需要年均提高 2.6 个百分点，但 2000～2010 年仅年均提高 0.78 个百分点。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趋势不容乐观。

（三）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辽宁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3 个百分点，而吉林和黑龙江则比全国低 7.5 个和 11.3 个百分点。相对来说，辽宁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主要源于其增长速度较快，“十一五”期间，实现程度平均每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照此速度，可按时实现目标。吉林与黑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到 2020 年实现目标，分别需要年均提高 4.1 个和 4.4 个百分点，两省 2000～2010 年平均提高 3.3 个和 2.9 个百分点，可见，实现目标很有难度。

（四）文化产业发展速度缓慢

辽宁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现程度刚刚突破 60%，是 23 项监测



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从进度看，要按时完成目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程度需年均提高3.8个百分点，但10年来该指标实现程度年均提高3.1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仅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吉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程度为74.2%，2000~2010年这11年来，吉林省该指标实现程度在2000~2005年的6年里始终是74%，2006~2010年的5年里始终是74.2%，增速非常缓慢。黑龙江省情况更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程度仅为4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2000~2010年年均提高2.0个百分点，以此速度增长，2020年实现程度也刚能达到60%的水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基础差和速度慢双重困境。

（五）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增长缓慢

辽宁省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实现程度刚刚达到70%，要按时完成目标，实现程度需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但10年来该指标实现程度不升反降，其中，“十一五”时期实现程度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吉林省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实现程度为67.4%，到2020年实现目标需年均增长3.3个百分点，而2000~2010年仅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而且该指标实现程度从2000年的58.6%，一度增长到2003年的80.5%，之后就起伏不定，2009年又降低到59.5%，几乎与2000年水平相当。不稳定的增长给目标的实现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黑龙江省该指标实现程度为68%，比2000年还下降了0.4个百分点。可见，三省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要按时达到目标难度也很大。

（六）环境保护压力较大

作为老工业基地，以资源消耗性的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在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要付出更多的资源环境代价，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一是节能降耗压力大。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单位GDP能耗实现程度分别是61.3%、66.6%和79.9%，要按时实现目标，分别要年均提高3.9个、3.4个和2.1个百分点，三省该指标在2000~2010年的年均提高点数分别为2.2个、1.8个和3个百分点，黑龙江

省有希望按时实现目标，辽宁和吉林面临的压力很大。二是环境保护的任务很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环境质量指数实现程度分别为75.8%、77.1%和73.4%，要分别年均提高2.5个、2.3个和2.7个百分点才能保证到2020年实现目标，但2000~2010年三省该指标实现程度年均提高1.3个、0.9个和1.2个百分点，按时实现目标均缺乏基础和保障。

四　推进东北地区小康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发展方式，夯实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各方面得以发展的根本。继续提升经济总量，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技术产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发展；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比重和水平。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加大支农力度，推进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有效投入，全面落实惠农政策，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使其长期化、制度化，确保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用于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重大农业科研项目的建设。尤其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力度，实现农业增值、农民增收。

（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保障体系

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要贯彻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方针，把发展经济与造福百姓统一起来，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支持创业、劳务输出、提高工资和保障救助等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的实施，改善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及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推动社会精神文明不断进步。

（四）保护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约束，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使环境保护更加紧密地与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促进污染排放总量的减少，改善环境质量。加大依法保护耕地资源的力度，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防护等林业生态工程。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改进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完善有偿使用机制，正确处理保护耕地与满足建设用地需求的关系，保持耕地动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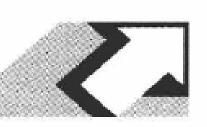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Northeastern Region

Ji Minghui　Ding Xiaoyan

Abstract: Northeastern region seiz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tackle tough,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taken a solid step towar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objectives. The report giv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n building well-off social conditions, identify the weak points of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construction of Liaoning, Jilin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s,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Northeastern regio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Process analysis

大　事　记



Chronicle Event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B.25 2012年京津冀与首都经济圈区域经济大事记

李彦军　王婷婷 整理

1月6日　天津市召开2012年合作交流工作会议，会议安排部署了2012年加强国内招商引资、扩大区域合作交流工作的思路和举措，要求进一步深化区域务实合作，密切与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兄弟省市区的战略合作，主动参与京津冀都市圈建设，推进交流、信息、旅游、人才和劳务一体化建设，推动异地联建产业园区，加快“无水港”建设，加大对内陆地区的辐射力度。

2月2日　天津市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举行签约仪式，载人空间站等超大型航天器项目落户滨海高新区。

2月6日　北京市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签署了关于联合推广清洁能源（LNG）公交车辆战略合作协议。该战略协议致力于推广和利用清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市民出行条件。

2月7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落实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和任务工作分工的通知》，强调实施“四个一”战略重点：加快构筑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加快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加快培育千亿元级重点园区和大型企业集团。

2 月 23 日　科技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天津举行了 2012 年部市工作会商会议。会上，科技部与天津市围绕“实施好天津市纯电动汽车运行示范工程，把天津建设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和示范运行基地”“大力推动 863 计划伙伴城区建设试点工作，把天津建设成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3 月 13 日　《京锡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4 月 19 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省重点建设项目管理的意见》，优先安排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4 月 21 日　北京市在平谷举行小城镇发展基金项目开工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5 月 11 日　天津市举行中国·天津第十九届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八届 PECC 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

5 月 15 日　第三次京津冀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联席会议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召开。会上，一省两市就畅通治超信息通报、抄送制度、处罚接收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货物单位、建立完善重点路段联合治超长效机制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5 月 17 日　中国·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在河北廊坊隆重开幕。经洽会瞄准三个重点，即在重点区域上深度推进与京津及周边省市、日韩、港台的合作；在重点企业上深度推进与骨干央企、知名外企、大型民企的合作；在重点领域上深度推进提升改造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大力拓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合作。

5 月 18 日　京津冀民营企业合作专题对接会在廊坊举行，吸引了 120 多名企业家、园区代表参加。会议搭建了民营企业经贸合作的平台，促进了京津冀合作向深度推进。

5 月 31 日　国务院批准的 2012 年区域规划审批计划中，《首都经济圈发

展规划》居首。

6月7日 “新广州－新商机”天津推介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广州市政府与天津市政府共同签署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共达成签约项目52个，累计总投资金额达到633.6亿元。

6月18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国经发展投资基金在京拓展业务，携手建设“全球智库（北京）集聚区”。

7月2日 “2012京津两地中华老字号文化建设经验交流研讨会”在天津召开，研讨会通过两地老字号企业相互交流，挖掘弘扬老字号的传统文化，推动老字号企业文化建设、品牌建设、诚信建设、促进京津老字号企业之间加强合作，使京津两地老字号企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7月17日 “第五届京津冀晋蒙政协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在呼和浩特召开，论坛就区域物流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和互利合作的前景等问题开展了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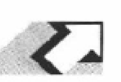
8月30日 秦皇岛市与联通河北省分公司签约合作共建“智慧城市”，利用三年时间将该市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9月26日 第十六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在廊坊举行。农交会推进农业项目合作洽谈，加快现代新型农业建设，提高农业效益，打造农副产品、农业项目、农用物资、农业科技和农业信息的零距离交流平台。

9月27日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北京·澳门经贸交流洽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地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工商企业界人士500多人参与洽谈会，共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澳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进程，并探讨两地政府和企业面对的发展机遇。

9月27日 “2012京津冀晋蒙区域协作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论坛以“首都经济圈：内涵与路径”为主题，与会百余位学者，围绕着理论内涵、发展规划、发展路径、城市群发展、生态环保、能源建设、区域协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10月8日 北京市领导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进行座谈，共商加快发展首都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0 月 9 日 天津市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共建智慧天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签字仪式。

10 月 26 日 天津市举行 2012 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会议并举行共建国际矿业金融改革示范基地合作备忘录协议签字仪式。

10 月 30 日 “京冀合作部门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对做好 2013 ~ 2015 年京冀两省市合作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明确合作领域、确定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方式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探讨。

11 月 6 日 第 16 届京港洽谈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共有涉及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等京港两地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 35 个项目签约，所有投资项目签约金额均超过了 1 亿元，总额达 636. 3 亿元，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创历届之最。

11 月 22 日 京蒙区域合作及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新一轮京蒙区域合作及对口帮扶工作，商讨了下一步京蒙帮扶合作事宜。

11 月 22 日 冀津汽车零部件招商推介会在河北沧州市青县举行。推介会将合作各方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土地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了多方联合、跨区域优势资源整合。

12 月 4 日 为推动蓉京两地旅游交流合作，成都市旅游局和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正式签署《区域旅游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地将在旅游项目、旅游宣传、旅游会务等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

12 月 6 日 河南省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合作、交流、发展、共赢”为主题，以优势产业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签约为主要内容，加强河南与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促进河南与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2 月 7 日 廊坊市新型工业化产业（电子信息）示范基地和沧州市新型工业化产业（化工）示范基地顺利通过工信部评审，标志两家国家级基地成功创建，河北省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省份。

12 月 17 日 天津、辽宁、河北和山东 4 个海事局 VTS 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提升北方区域 VTS 整体水平。

12 月 18 日 由河北省信息产业投资公司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公司及 5

家民营股东共同组建的河北红土创业投资基金 12 月 18 日正式签约成立。基金规模 3 亿元，投资领域将集中在河北省政府大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主要投资于河北省成长型中小企业。

12 月 26 日　国务院同意调整北京中关村示范区空间规模布局，中关村确定新一轮发展蓝图。

B.26

2012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大事记

徐春华 整理

1月6日 2011年长三角城市会展联盟年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来自长三角20个城市会展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展览公司、会展中心的代表45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通过了长三角地区2011年会展业发展工作报告，提出了2012年工作设想，讨论了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和理事会会议制度，提出了举办第四届长三角城市会展发展论坛的构想。

3月31日 2012年度长三角道路运输一体化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沪、苏、浙三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明确2012年将就毗邻地区长途客运公交化，创建长三角省际道路客运品牌班线，巩固长三角交通执法联动联勤机制、推进道路运输管理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以进一步推进长三角道路客运以及货运物流一体化发展。

4月17~18日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二次市长联席会议在浙江台州举行，会议围绕“陆海联动，共赢发展”主题，就共同发展海洋经济议题，展开一年一度的头脑风暴。

5月3日 “长三角”邮游合作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围绕“畅游长三角”旅游优惠活动，编制、发行《畅游长三角区域优惠联票明信片册》等工作开展研讨。

5月8日 2012年长三角地区环保合作联席会议在丽水龙泉召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签订了《2012年长三角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框架》协议，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5月8日 江苏扬州泰州机场正式通航，扬州泰州机场是国家“十一五”建设的重要支线机场，服务范围以扬州、泰州为主，同时辐射镇江、南通以及安徽省部分地区。

5月10日 “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第五届三次理事大会”在湖北

武汉召开，会议围绕坚持规范创新，实现产权市场转型发展的主题，着重促进非上市公司股权流转，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股权质押，努力形成中小企业服务链，做好为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工作。

6月7日 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研究通过了《2012年长三角合作工作计划》，交流讨论了交通、能源、信息化、科技、环保、信用、人力社保、金融、涉外服务、城市合作、产业转移等重点专题工作思路。

6月27日 第四届长三角地区侨商组织秘书长联席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与会侨商代表就如何加强工作协同，共同维护侨商合法权益，推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并就建立长三角地区侨商组织合作平台、完善合作机制等事宜达成共识。

6月27日 长三角发展论坛（第十五次）暨“长三角节能减排联席会议”（第五次）在上海虹桥宾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科技与建筑节能，从工业建筑节能、住宅建筑节能、公共建筑节能、新农村建筑节能四个方面介绍了节能示范的案例。

7月3~4日 2012年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就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协作达成三点共识：一是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建立更加畅通的合作交流机制；二是及时通报人才工作的政策、活动和相关信息；三是持开放的态度，共同推进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

8月15日 2012年长三角旅游市场工作联席会议在上海浦东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召开，沪苏浙皖省市领导就关于进一步推进沪苏浙皖旅游一体化，落实2011年5月召开的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联席会议上提出的共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群的总体要求并共同签署的《区域旅游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

8月23日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会议讨论了浙江省科技厅提出的2012年长创联办重点工作计划，并进行了轮值主席交接仪式。

9月6日 以“巾帼科技牵手，助力创业创新”为主题第九届泛长三角地区女性合作发展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大会发布了《泛长三角地区巾帼科技创新联盟行动南京宣言》。



9 月 21 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召开，会议重点围绕“联动实施国家战略、共同推进创新发展”主题，就加快结构调整、推动创业创新、强化公共服务、深化合作开放等议题进行座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和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9 月 26 日 上海组合港管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长三角区域港航合作的方案，明确指出将加强长三角区域港口规划协调，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和港口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支持港航企业跨区域开展业务合作，加大航运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创新力度。

10 月 10 日 第十届泛长三角地区女性合作发展联席会议在浙江绍兴举行，会议以“妇女发展与文化繁荣”为主题，交流四地妇联引领妇女推进文化发展的经验，提炼妇女推动文化发展的精神，促进妇女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贡献。

10 月 12 日 2012 年长三角地区能源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在浙江召开，会议回顾了长三角能源合作工作取得的成效，明确下一步要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

10 月 18 日 2012 年长三角信息合作联席会议全体理事会议暨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对长三角信息合作联席会议成立十周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回顾。

10 月 26～27 日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论坛在合肥市翡翠湖迎宾馆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创新发展与创新承接：长三角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11 月 8～10 日 长江三角洲价格信息工作交流网络三届三次会议在上海浦东新区召开，会议围绕着“加强市场放开商品价格监管和价格信息服务”的主题，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11 月 9 日 “2012 长三角旅游合作联席会议”在无锡召开，会上，苏沪浙皖三省一市联合签署了《共同推进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发展合作协议》，发布了《长三角房车旅游大纲》，启动了长三角“游邮联合”项目。

11 月 17～19 日 第九届长三角科技论坛在连云港市举行，论坛围绕“科技创新促进港产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主题，涉及城市规划、港口经济、电

机、能源、航空航天、科技期刊、气象、光学、园艺、药学、防震减灾、辐射加工、生物产业、农机、营养、纺织、植物、水产、航运、船舶等多个领域。

11 月 23 日 第五届长三角海归创新创业圆桌会议在江苏省海安市举行，会议主题为“海归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议旨在通过整合长三角海归资源，交流探讨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的孵化与投资，加速创新资源流动，提高海归企业核心竞争力。

11 月 25 日 “2012 中国长三角青商论坛暨海内外杰青嘉年华”在江苏省丹阳市举行，论坛围绕“会聚天下英才·创领青商未来”主题，搭建海内外杰青与中国长三角地区官、产、学、研、媒等跨界青年才俊的交流合作平台。

11 月 26 日 长三角市（区）长圆桌会在无锡召开，长三角 20 多位市（区）长共聚一堂，围绕江浙沪三地服务业合作共赢发展等内容进行交流，讨论通过并共同签署发布了《无锡·协同创新、智慧城市与服务业发展市长宣言》。

12 月 5 日 长三角地区第八届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理论研讨会在绍兴召开，16 个城市的 18 家参会单位分别就“毗邻城市公交化运营模式研究”“道路客运安全监管理论与实践”“结合十八大精神宣传贯彻，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12 月 14 日 2012 年中国（上海）智慧城市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之路”为主题，并突出强调“标准、融合、创新、协作、应用”五大关键词。

B.27

2012 年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大事记

张建平*整理

1 月 12 日 广州、澳门联合主办的“2012 年穗澳贸促机构、商协会联席会议暨行业对接洽谈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广州、澳门贸促机构、商协会共同举办的首次联席会议。

3 月 5 日 解放军总装备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准了《珠三角卫星导航应用示范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第一个区域示范应用工程正式落地广东省。

3 月 8 日 广东省环保厅在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珠三角首批 17 个自动监测站点从当日起正式公布包括 PM2.5 在内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珠三角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按照新标准公布监测指标并评价空气质量的城市群地区。

3 月 23 日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发出《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严格控制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的意见》的通知。该意见指出，从即日起，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5 市率先开展 VOCs（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试点工作，VOCs 是 PM2.5 和城市灰霾的重要来源之一。

4 月 19 日 粤港澳文化合作第十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三地政府文化部门共同签署了《粤剧保护传承意向书》。

5 月 4 日 珠三角五大机场轮值联席会议在广东省深圳召开。

5 月 10 日 泛珠内地 9 省（区）应急管理合作联席会议秘书处发布《泛珠三角区域内地 9 省（区）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管理办法》。

5 月 15 日 2012 年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召开。

---

* 张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5 月 16 日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分别与中国银行签署了《金融创新合作备忘录》。广东省 20 余家重点企业还分别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等签署了《“走出去”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多元化金融服务协议》。

6 月 25 日 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组织编制、中国首部以“优质生活”为主题的区域合作规划——《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在粤港澳三地同步对外发布。

7 月 5 日下午 广东省和香港特区联合举办“粤港澳深度合作，构建大珠三角新引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功能区及广东省产业转移园投资说明会”。

7 月 17 日 南方电网公司旗下广东电网珠海供电局与澳门电力公司联合成立“珠澳联网设施日常运维及应急抢修联动机构”，并签署《珠海 - 澳门联网电力设备日常运维及应急抢修联动机制备忘录》。

7 月 18 日 为进一步加强粤港经贸合作，率先实现 CEPA 项下粤港两地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同推进两地经贸合作与交流再上新台阶，广东省与香港特区在广州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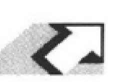
7 月 19 日 粤港两地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粤港学前教育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7 月 25 日 广东省新闻办举行《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新闻发布会。《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印发。

7 月 31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粤港两地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应用于粤港跨境电子交易的电子签名证书或认可数码证书的互认申请、核准、管理规定及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职能等相关细则。

8 月 22 日 广东省和香港共同举办的“粤港共促‘双转移’暨肇庆高新区投资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9 月 3 日 广东与澳门签署《粤澳影视文化合作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为



止，粤澳两地达成的最高规格的影视文化合作协议。

9 月 7 日 广东省委通过了《推动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广东省创建幸福村居五年行动计划》。

9 月 14 日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在广州市召开。会上，粤港双方签署了《粤港共同推动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协议》《数值天气预报技术长期合作协定》《粤港食品安全工作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及广东软件行业协会合作意向书》《粤港推进在粤港资加工贸易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合作协议》《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意向书》《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与香港科技园公司战略合作协议》7 份合作协议。

9 月 25 日 深圳、珠海、香港、澳门四地在深签署首份旅游合作协议。澳门旅游局、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旅游业议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及珠海市文体旅游局在深圳签署了《深港澳珠四地旅游合作协议》。

10 月 8 ~ 11 日 广东省和香港特区签订了粤港廉政建设交流合作意向书，并纳入粤港交流年度重点合作项目。

10 月 11 ~ 13 日 泛珠三角区域内地 9 省（区）应急管理合作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10 月 23 日 珠海与香港中华总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在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及其他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珠海“三高一特”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

10 月 23 日 广州市南沙区分别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澳门南沙商会签署合作协议。这是南沙区获批为国家级新区后，举办的首批涉港澳的大型签约活动。

10 月 31 日 广东省和澳门特区联合主办的“2012 粤澳物流合作洽谈会”在广州市南沙区召开，主题是粤澳物流合作的新设想和新思路。

11 月 15 ~ 16 日 粤港澳三地卫生部门在广州召开第十二次粤港澳防治传染病联席会议。

11 月 23 日 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召开。粤港双方全面评估《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2002 ~ 2010）》

实施结果，商讨未来8年两地空气污染减排工作以及2013年工作重点。

11月26日 “第八届泛珠媒体合作峰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主题是融合、转型、跨越——新时期报业集团的创新发展之路。来自泛珠“9+2”各省区的主流平面媒体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新时期传统报业集团的转型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11月27日 第十三次粤港澳主要商会高层圆桌会议在广州市南沙区召开。

11月29日至12月2日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省（区）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海南召开。

12月1日 2012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

12月7日 “第十一届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主题是粤港合作、共创商机。